

齐世荣 主编

# 绵延千载的中外文化交流

沈立新/著



中国青年出版社

(京)新登字 083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绵延千载的中外文化交流/沈立新著. -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1999

ISBN 7-5006-3523-0

I 绵… II. 沈… III. 文化交流-中外关系-文化史 IV .G12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1999)第 30633 号

\*

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 发行

社址:北京东四 12 条 21 号 邮政编码:100708

河北遵化市胶印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

787×1092 1/32 12.5 印张 2 插页 210 千字

1999 年 7 月北京第 1 版 1999 年 7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数:1—6,000 册 定价:14.40 元

## 总 序

齐世荣

人类正在跨入信息时代,在新的时代里,科学技术知识在推动人类社会前进的过程中将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当前,人们对自然科学和技术的重要性认识得比较充分,但是我们也不可忽视社会科学(包括历史科学在内)的价值。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十分重视历史知识,把它看作是一种革命力量。恩格斯说:“他(指马克思)把科学首先看成是历史的有力的杠杆,看成是最高意义上的革命力量。而且他正是把科学当做这种力量来加以利用,在他看来,他所掌握的渊博的知识,特别是有关历史的一切领域的知识,用处就在这里。”<sup>①</sup>

世界历史是历史科学的一个重要分支,正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我国人民,特别是各级领导干部,迫切需要丰富自己的历史知识,这既包括中国历史知识,也包括世界历史知识。邓小平说:“中国要谋求发展,摆脱贫穷和落

---

<sup>①</sup>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9卷,第372—373页。

## 总序

---

后,就必须开放。开放不仅是发展国际间的交往,而且要吸收国际的经验。”<sup>①</sup>江泽民同志在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75周年座谈会上发表的《努力建设高素质的干部队伍》这篇讲话中,着重讲了学习中外历史的重要性。他说:“希望我们的各级领导干部,认真地读一点历史,首先要了解中国的历史。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为了适应扩大国际交往的需要,更好地学习借鉴世界各国的长处,还要了解世界的历史。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

为了达到普及世界历史知识的目的,我们编了一套20卷本的世界历史丛书,它们之间既互有联系,又可独立成篇。这20卷论述的都是世界历史上的重大事件(当然不是全部),时间上从古到今,地域上包括欧、美、亚、非几个大洲。我们的写法是力求深入浅出,以期引起读者的兴趣,为此基本上不加脚注,但在每本书后附一个主要参考书目,藉以说明写作的根据,并供读者进一步研究之用。

本套丛书的所有题目,都是作者和我一起商定的,编完后中国青年出版社编辑同志加了一个总标题:《精粹世界史》。按我个人的意见,“精粹”只包含两层意思:一是所选的20个专题数目虽然不多,但都是世界历史上的重大事件和问题;二是每本书的字数不过20万左右,尽量体现“少而精”的原则。“精粹”二字,绝不表示作者和主编自诩这套丛

---

<sup>①</sup> 《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66页。

书写得如何高明,已经达到“精品”的标准。我们自知还有不少缺点,恳切希望得到广大读者和专家的批评指正。

作者多数是中青年学者,也有少数老专家,这说明世界历史这门学科已经后继有人,实在值得欣慰。欣慰之余,爱赞数语如上,权以为序。

1998年8月25日

## 目 录

前 言 .....	(1)
第一章 中外科技文化交流 .....	(6)
一、农耕技术及农作物 .....	(7)
二、中国丝绸的魅力 .....	(13)
三、中国瓷器名扬天下 .....	(16)
四、中国的漆轿和欧洲箱式马车 .....	(25)
五、中国石狮雄峙世界各地 .....	(27)
六、颇具特色的天文历法系统 .....	(31)
七、医学文化交流 .....	(35)
八、细小银针造福万民 .....	(39)
九、精美的建筑艺术景观 .....	(43)
十、多姿多彩的阿拉伯风格建筑 .....	(47)

第二章 中国四大发明对世界文 明的贡献 .....	(51)
一、“蔡侯纸”的发明 .....	(52)
二、环球旅行两千年 .....	(54)
三、法国蔡伦纪念馆 .....	(58)
四、人类文明史上划时代的发明 .....	(60)
五、印刷术的向外传播过程 .....	(63)
六、书本不再是少数人独享的奢侈品 .....	(69)
七、火药的发明与传播 .....	(71)
八、骑士阶层被炸得粉碎 .....	(74)
九、指南针的发明与应用 .....	(75)
十、指南针的西传 .....	(77)
十一、世界第一次开始缩小 .....	(79)
第三章 郑和下西洋与中外文化 交流 .....	(81)
一、七下西洋壮举与促进东方社会文明 .....	(81)

二、16 国外交使节访华 .....	(86)
三、渤泥国王体魄托葬中华 .....	(87)
四、苏禄国王长眠中华大地 .....	(92)
五、古麻刺朗国王病逝福建 .....	(97)
六、印尼三宝瓏和三宝洞 .....	(101)
七、泰国的三宝公鸡和三宝庙 .....	(107)
八、斯里兰卡郑和碑 .....	(112)
九、存留马六甲的郑和遗迹 .....	(114)
第四章 传教士与西学传播 .....	(119)
一、耶稣会士来华 .....	(121)
二、地理知识的传播 .....	(124)
三、测绘中国地图 .....	(127)
四、天文数学的传播 .....	(131)
五、康熙皇帝与自然科学 .....	(135)
六、出版字典和《圣经》翻译 .....	(137)
七、“西学热”中的三大翻译出版机构 .....	(143)
八、中学西传——向西方介绍中华文化	



## 目 录

---

.....	(151)
九、“中国地理学之父”卫匡国 .....	(156)
<b>第五章 欧洲启蒙运动与中国文 化因素 .....</b>	<b>(159)</b>
一、启蒙运动发生背景 .....	(161)
二、启蒙运动领袖伏尔泰 .....	(166)
三、重农学派对中国文明的讴歌 .....	(173)
四、莱布尼兹崇拜中国儒家 .....	(178)
<b>第六章 晚清的中日文化交流 .....</b>	<b>(186)</b>
一、《海国图志》——日本维新思想家 的启蒙书 .....	(188)
二、王韬与他的《扶桑游记》 .....	(194)
三、黄遵宪与中日文化交流 .....	(201)
四、杨守敬访求逸书记 .....	(207)
五、留学生与中日文化交流 .....	(213)
六、梁启超传播日本学的贡献 .....	(220)

第七章	19世纪下半叶的中美文 化交流 .....	(228)
一、	镌刻在华盛顿纪念塔里的中文石碑 .....	(230)
二、	中美两国早期的图书交流 .....	(241)
三、	中国幼童留学美国 .....	(248)
四、	费城世界博览会上的大清国代表 .....	(256)
五、	美国传教士与“洋学堂” .....	(266)
六、	中国官办“洋学堂”——京师同文馆 .....	(270)
第八章	中国园林艺术风靡世界 .....	(274)
一、	中国园林艺术的风格和意趣 .....	(274)
二、	中国园林艺术的西传 .....	(280)
	英国的自然风致园(282) 中国园林风行法 国(284) 中国园林对德国的影响(286) 美国 对中国园林的倾慕(287)	
三、	当今世界的中国园林热 .....	(288)

纽约的室内苏州园林——明轩(289) 温哥华的逸园(291) 悉尼中国花园(294) 横滨友谊园(298) 泰国智乐园(301) 蒙特利尔梦湖国(302)

## 第九章 孔子学说在世界各地的传播与影响 ..... (306)

### 一、儒学在韩国 ..... (308)

韩国的祭孔大典(316)

### 二、儒学在日本 ..... (318)

日本的孔庙(322) 日本的祭孔大典(326)

### 三、儒学在法国 ..... (332)

法国华人的祭孔大典(333)

### 四、儒学在美国的复兴 ..... (335)

孔子生日——美国的教师节(337) 美国的孔子塑像(338) 美国的祭孔大典(341)

## 第十章 千年茶香飘五洲 ..... (346)

### 一、中国茶文化的内涵与特点 ..... (346)

### 二、日本茶道——中国茶文化的分支 ..... (352)

- 三、摩洛哥的薄荷茶 ..... (355)
- 四、中国茶文化在欧洲的传播 ..... (357)
- 俄罗斯的饮茶之风(358) 法国的茶会(362)
- 荷兰的饮茶礼仪(364) 茶叶与鸦片战争(364)
- 饮茶——英国人的头号国饮(367)
- 五、美国的“饮茶革命” ..... (371)
- 美国饮茶新潮的再起(375)
- 六、中国茶文化回归与复苏原因析 ... (377)
- 主要参考书目 ..... (382)

## 前 言

世界文化是多元的,国家不论大小,历史不论短长,每个国家和地区的人民,由于不同的生活方式,不同的生活习惯,形成不同的心理状态,产生不同的物质文明,创造出不同的民族文化,它们都对世界文明有所贡献。世界各国人民时时刻刻都生活在文化交流之中,并且取长补短,都从文化交流融合中得到物质和精神方面的好处,使各自的文化瑰宝成为世界人民共同拥有的财富。以文化交流为桥梁,促进中国与外国之间的相互了解,加深中国人民与外国人民之间的友谊,这是中外文化交流的要义所在。人类文化没有交流就没有进步,中外文化交流越频繁,中外之间的了解就越深入,中国人民与世界各国人民之间的友谊就越巩固。在文化交流中由交融所引起的变异,历来是文化演进的重要渠道之一。中国人民如何在承传发扬中华民族固有文化的同时,吸收外来文化以补本国文化之缺,这是一项长期的任务。

中外文化交流源远流长,绵延不绝,但在每一个不同的

历史时期,有不同的交流渠道、形式和内容。

中国自 80 年代起推行改革开放国策后,经济持续发展,政局稳定,人民生活改善,综合国力大大提高。经济发展与文化发展密切相关,经济的高速增长必然会带来科技文化的繁荣,这就为中外文化交流创造了一个良好的环境。中国经济在日益走向世界的同时,中国文化也不可避免地在世界上产生影响。国门一经打开,国与国、人民与人民之间的交往日益频繁,中国以更开放的姿态走向世界,中外文化的交流,无论从数量上和质量上看,都大大超过以往,达到一个新的高度。如今,世界上越来越多的国家和人民,都对独具魅力的中华文化及中国人的思维方式表示出浓厚兴趣,都想体味东方文明的广博和深邃。及时地把握这一新情况,全面深刻地反映这一新变化,是笔者的本意之一。

中外文化交流历史悠久,内容宏富,其资料之多汗牛充栋,要事无巨细、面面俱到是不可能的。本书选择了中外文化交流史上一些重大事件,然后从某一侧面切入加以叙述和介绍,从这一意义上来说,本书仅勾画出了中外文化交流史中由古及今,古今相结合方面的一个大致轮廓。概括起来本书有以下两大特点:

第一是涵盖面比较广,内容丰富多彩。本书一共十章,粗略地可分为古代三章,近代四章,现代三章。但具体的历史年限划分并不严格,在对历史事件和人物的叙述中,常常是古中有今,今中有古,相互交叉叠现。从内容上看,本书

几乎包括了精神文化和物质文化层面的所有领域,诸如政治经济、典章律令、教育礼仪、宗教哲学、语言文字、书法绘画、天文历法、地图测绘、音乐舞蹈、医学体育、烹饪服饰、园林艺术、农耕艺术、雕塑建筑、造纸印刷、丝绸印染、陶瓷漆器等,或详或简,都有论述和介绍。笔者试图以通俗流畅的笔调,通过对波澜壮阔、源远流长的中外文化交流的叙述,表达一定学术内容,使读者获取新知识,扩大知识面,并兼顾不同知识层次的需要。

第二,充入新资料,增添新内容。笔者在书中对最近几年来中外文化交流中所存在的、大量的、分散的新题材和新景象,加以汇总和分类梳理后撰写成章,藉此给读者以新鲜感。例如,最近几年来中国茶飘香世界各地,茶事在沉寂许久后开始勃兴,这既与这世界的纷繁,欲望奔涌和人心浮躁有关,也与现代人为求得内心沉静、师法自然和追求强身健体的世界潮流有关。喝茶有益于身心健康的观念日益深入人心,饮茶也许会成为 21 世纪世界饮料市场上的新潮流。

孔子学说在世界上的传播与影响越来越广泛,许多国家相继恢复或开始每年举行祭孔大典,届时人数众多,场面肃穆庄严,程序繁多,给人留下极其深刻印象。自纽约孔子广场竖起孔子青铜塑像后,美国又有许多城市相继增添多座孔子塑像。美国的“孔子文化热”有增无减,孔子的生日——9月28日也已成为美国教师节。大凡有机会去美国首都华盛顿的人,必去参观白宫,但最先映入眼帘的是高达

550英尺的华盛顿纪念塔,这是哥伦比亚特区最高的建筑物。就在该塔第10层的内壁上,嵌有一块长方形花岗岩中文石碑,这是清末福建巡抚徐继畲赠送的,此事成为中美文化交流史上的重大事件之一,所有这一切,对于渴望了解外部世界的读者定会获得满足感。

中国园林也是中华5000年文明的载体之一。中国那种以崇尚自然为主题的自然山水园林风格,在世界上独树一帜,备受世界各国人民的喜爱和重视。如今,具有中国浓郁民族特色的古典园林建筑项目,在西欧、北美、亚洲、大洋洲、非洲等10多个国家和地区相继落成,中国园林艺术之花在异国他乡大放异彩。书中对在国外一些有代表性中国花园的建园过程和文化特色所作的介绍,也会引起读者关注的。

即使是对诸如中外科技文化交流、中国四大发明及郑和下西洋等这一类古老而传统的选题,笔者也补充了一些新资料。例如中国石狮备受古代建筑艺术家的青睐,时至今日,那些造型千姿百态、线条优美、精雕细刻的石狮,又在中外文化交流中舞出国门,其踪迹遍及世界各地。又如郑和下西洋,在世界各地迄今还存留很多遗迹遗物,有关郑和的美丽传说也在当地人民中广为流传,那古色古香的三宝庙、三宝井、三宝洞、郑和碑等,既是中外文化交流的产物,又是自古以来中外人民友好往来的明证。

1997年5月,法国总统希拉克在访华时曾说,在政治



关系和经济关系下面,存在着一个文化底座。文化是人与人之间沟通的渠道。随着交通和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东西方人民之间的相互认识和了解正不断加深,东西方之间的文化交流和沟通也在不断加强。值此新世纪的脚步声日益迫近之际,笔者愿与国人一起,满怀信心地迎接世界文化走向中国,中国文化走向世界的新时代。

受资料限制和学识水平不高等诸多因素影响,本书的缺陷和不足之处势所难免,恳请同行或专家学者批评指正。

1998年12月上海

## 第一章 中外科技文化交流

中国文明是世界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科学技术曾经取得过辉煌成就,同时中国也从世界文明中吸取养分来滋润和发展自己。早在古代时,中国的某些科学技术领域的发展已达到相当高度,例如秦汉时,数学、天文学、医药学和农艺学等已基本形成体系,造船、建筑、化工、冶铸等一些重要生产技术,已日趋成熟。唐宋时期的科技发展达到一个新的高峰,除四大发明外,在诸如采矿、冶炼、纺织、陶瓷、航海、农业机械、建筑、水利工程,农耕技术等方面,都有不少发明或革新。尽管在 15—16 世纪后,中国的科技发展速度减缓,由盛而衰,但在一个相当长时期内,中国科技一直处于世界领先地位。据从一项统计资料中得知,明代以前,世界上重要发明创造和重大科技成就约有 300 项,其中中国占 175 项,约占总数的 57% 以上。对此,李约瑟在《中国科学技术史》一书序言中说:“中国的这些发明和发现往往远远超过同时代的欧洲,特别是在 15 世纪之前更是如此,关于这一点可以毫不费力地加以证明。”

中国科技文化在其漫长的发展过程和创造出许多惊人成就的同时,也通过各种渠道和途径,传播和影响到相当广泛的地区,与世界各国科技文化接触融会,交流合作,绵延不绝,共同提高。兹分别叙述如下:

## 一、农耕技术及农作物

中国传统农业科学技术体系,早在秦汉时已经初具规模,并在这一基础上不断创新和完善,其耕作理论相当完备和卓越。中国古代的 300 余种农书对此均有真实纪录,如:利用土地资源,实行精耕细作,提高土地利用率,用养结合,使地力常新。此外,还实行多种经营,综合发展,培育农作物和家畜良种,不断革新改良,制作精巧农具,利用自然力灌溉,注意农田水利工程兴修。中国古代农业的发展水平,一直处于世界领先地位,中国中原地区的农耕技术对我国边疆地区和周边国家产生了很大影响。公元 225 年诸葛亮南征时到达云南,就把汉族先进的农业生产技术传到了西南边境少数民族地区。据《华阳国志》记载,武侯在平流后,便“劝诸夷筑城堡,务农桑,诸夷皆自山林徙平原”。无疑这是一个很大的进步。中国先进的农业生产技术后来又传到缅甸,如耕田用三尺犁,中间架一格,一人在前牵牛,一人扶犁,另一人在后面下种的耕田方法,在缅甸北部地区仍可见到。诸葛亮由此也受到缅甸人民的尊敬,在缅甸境内曾建

有诸葛祠、武侯祠、孔明城等。《缅藩新记》中云：“而缅地有武侯庙，盖孟获实即缅酋，故土人言七擒七纵之事，犹能历指其处云。”

劳动生产工具的改善对生产力发展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中国在西汉时期已普遍推广犁耕，后来还发明了铁足耨车等播种工具，可使开沟、平整、播种等工序一次完成。中国铁制农具、木制水车、制陶、制茶、制糖等技术在人民的友好交往中传往东南亚，例如加里曼丹董坡索人在使用犁耙耕种后，既精耕细作，又提高了劳动生产率。中国在3世纪时出现的水车（又名翻车）和13世纪出现的水力翻车（又名筒车），为我国南方农民普遍使用引水入田的灌溉农具，传人越南后对越南的农业生产非常有利。菲律宾吕宋的高山省农民，在高低不平的山峦中开辟梯田，一层层用石头垒砌，然后引山水灌溉，种植水稻，其耕种方法与我国差不多，这种梯田文化也是由中国传人。

中国的水稻种植技术早在日本弥生时代（相当于中国秦汉时代）已传到日本，普及整个本州岛，农业生产工具也由石器、木器逐渐发展到铁器，使劳动生产率大大提高。唐代时中日两国的经济文化交流范围更广，层次也更深。在日中国移民秦氏的后代，曾率部模仿春秋战国时代大型水利工程郑国渠，在柱川修筑葛野川提。遍唐日僧空海（774—835年）回日本后，曾先后主持兴修万浓池和益田池。公元829年日本开始制造唐式水车，藉此车水入田；以水为

动力的碾磨、水碓(舂米)先后在隋唐时传入日本,这对发展农业,提高生产效率大有帮助。

世界各民族之间生产技术和知识文化的交流,其结果是大大丰富了双方人民的生活内容。

中国在古代已能制造麦芽糖,南北朝时期又能制蔗糖,唐代时吸取印度制糖技术,唐太宗曾派人去印度学习熬糖法,使制糖的工艺日趋完善,已经超过了印度,所制造的白糖其色味比西域更佳。中国的砂糖开始输入到日本、南亚和东南亚国家去。日本在平安时代和镰仓时代都由中国输入食糖。明代时中国食糖可能经琉球间接输入日本,食糖成为主要贸易产品之一。

中国棉花在北宋时期,种植仅限于两广和福建等地,后种植区域不断扩大。南宋末年成书的《农桑辑要》,记述了全套棉花栽培技术。元代时中国植棉技术传入高丽,其过程颇为有趣。高丽王朝时期,使臣文益渐于1363年赴元,回国时在中国境内一棉田旁摘取棉实10多枚带回,次年回故乡晋州后,将棉实交舅舅郑天益种植,结果仅成活一株,当年收获时得棉实百余枚。后郑天益年年培育,不断扩大,于1367年将所获棉种交乡里人种植。后来有位名叫弘愿的胡僧在天益家见到棉花,不禁感慨系之曰:“不图今日复见本土之物”,并将纺织之术毫无保留地教给天益,不久由家中奴婢织出朝鲜首匹棉布。从此一传十,十传百,传遍整个乡间,10余年后传遍全朝鲜,高丽王鉴于文益渐之功劳,

任命其为典仪注簿，后官至司仪大夫。

中朝之间还有许多农业生产技术交流。李朝朝廷曾传旨，要全国各地把握农业生产季节，按中国农书指导农业，适时播种。例如《农桑辑要》一书规定“水稻，三月种者为上时，四月上旬为中时，下旬为下时……”在《四时纂要》中记有“谷种，二月上旬为上时……又以今人已验之事言之，早种则所出倍多，晚种则禾谷盛长而所出少矣。以此观之，凡稼穡皆以早耕为贵……然节候有早晚……不可一概施之也”。

中国是世界上最早种植水稻的国家，相传在周代时水稻已开始传到国外。两宋时期在江南地区种植的水稻也开始推广到北方地区种植。在中国水稻传到国外的同时，作为双向交流，也从国外引进优良稻种。越南人擅长种植水稻，宋真宗时从越南中部引进占城稻。北宋大中祥符五年（1012年）中国江浙一带闹旱灾，水田很难有收获，为应急就把该稻种分发给农民种植。一位福建籍县官去河南鲁山任知县时，亦将占城稻移植过去。据说明代郑和下西洋时也带回暹罗（今泰国）稻和占城稻良种。如今中国江南一带有一种细小尖长的白米，人们称为“洋暹米”，即是这一品种。费信在《星槎胜览》一书中对此曾说“米粒尖小，然炊饭甚香”。

中国地域广阔，人口众多，历代王朝均实行“以农立国”方略，故古代农学发达，光农书就有 300 余种，关于土地丈

量技术与地图绘制技术也相当出色。明代徐光启耗费 10 余年心血所著《农政全书》于 1369 年出版,共 60 卷,70 余万字,分成农本、田利、农事、水利、农器、树艺、蚕桑、蚕桑广类、种植、牧养、制造、荒政 12 项,系统地总结了屯垦、水利和备荒三个方面的历史经验。书中徐光启本人撰写 6 万余字,都是亲身经验所得。其余为选录前人著述,但也附有自己的见解和评论,书中的许多主张,如治水应与治田相结合,京师附近种植水稻潜力大,关于棉花栽培技术等。都具有实用价值,是一部有关农业生产管理和政策的专著。该书的出版表明中国传统的农业生产技术,在明清时已臻成熟,并已达到相当的科学水平。

海外华侨历来是中外文化交流的桥梁,在农作物交流方面尤其是如此。中国的白菜、韭菜、荔枝、龙眼、肉桂、茶叶等在印度尼西亚广泛栽种。有位印尼华裔学者在《印尼华裔对印尼民族文化的创立有哪些贡献》一书中说:“当华人的祖先来到印尼时,他们不是像阿拉伯人或西方人那样带来宗教,而是带来了日后为印尼平民百姓所食用的食品。西方人虽然也带来了干酪和牛油,但这些食品比不上豆芽、豆腐、豆干、酱油、豆浆、茶叶、萝卜、咸菜那样普及和便宜。”中华传统食品传入印尼,既为印尼社会提供大众化的日常食品,也推动了中、印尼两国的文化交流,同时也再次说明文化是推进物质文明建设的有力杠杆。华侨也把印尼的某些蔬菜和果树品种带回中国栽种,如荷兰豆(豌豆)和

芒果等相传系从印尼传入。如今荷兰豆已遍及福建各地，并成为入冬后吃的一种菜豆。

常绿乔木缅茄树原产缅甸，今存留于广东高州（又称茂名）城北门观山山麓的一棵，枝繁叶茂，浓荫蔽天，充满生机，该树的来历有一段充满传奇色彩的故事。明万历年间（1573—1620年）缅甸东吁王朝进贡一批缅茄树种，明神宗赏给当朝官员，其中广东茂名籍太仆李邦直得两颗，归里后种一颗未萌发，另一颗给孩子佩挂，后不慎丢失，怀疑婢女盗窃，严刑拷打，至含冤死去。不久一缅茄小树苗自床底下破土而出，李家乃拆房围篱，悉心养护，树高12丈，须数人合抱。当地人民为冤死婢女鸣不平，有《高州府志》留传下来的竹枝词为证：

缅茄树大已几寻，婢女含冤悲古今。

硕果至今犹不食，坚贞真见女儿心。

缅茄树每年5月开花，8月结籽，但历来多种不萌，培植不易，故被视为奇珍。古树至今犹存，成为中缅两国自古就进行经济文化交流的佐证。

中华民族的辉煌创造力渗透于多方面的科技成就之中。明代的《本草纲目》、《农政全书》与《天工开物》三部著作，被誉为中国古代医药学、农学和工艺三大领域内的最高水平总结，在中外科技文化交流史上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宋应星（1587—？）江西奉新县人，万历举人，经所搜集、整理、编撰的《天工开物》全书共50卷，图文并茂，为世界上第



一部有关农业和手工业生产方面的工艺学百科全书。其内容有作物栽培、养蚕、纺织、染色、粮食加工、熬盐、制糖、酿酒、烧瓷、冶铸、锤锻、舟车制造、烧制石灰、榨油、造纸、采矿、兵器、颜料、珠玉采集等，几乎涉及当时所有农业、手工业等重要部门生产技术、工艺流程的全过程。该书以先进的生产方式出现为前提，既有先进的生产技术的介绍，又有具体而详尽的操作方法。该书刊行以后很快传到日本，立刻被翻刻，广为流传，备受重视，并据此发展成一门“天工学”，对后来日本的明治维新发挥一定作用。该书在中国却因“于功名进取毫不相关”而受冷落，很快绝版失传，直到1926年才从日本寻回一部翻印本（解放后国内发现原版一部）。1869年时，有了法文的摘译本，后来又相继被译成英、德等多种文字，在世界科技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 二、中国丝绸的魅力

中国是丝绸的故乡，是世界上第一个发明丝绸的国家。在中西文化交流史上，丝绸起了最初的、极其重要的作用，西方人正是通过色彩艳丽的丝绸认识了东方的文明古国——中国。早在公元前16—11世纪的商代，中国的种桑、养蚕、缫丝、织绸技术已有很大发展。商周时期制造的丝织品以绮最为精致，而最先向外输出的也是绮，因此，西亚和印度人把中国称为产绮之国，古希腊人则称中国“赛利斯”

## 中国丝绸的魅力

(seres),此词是根据汉语“丝”的发音而取的,它的对应物应指中国特有的绮。公元1世纪罗马作家普林尼的《博物志》作如下描述:“赛利斯”国以树林中盛产细丝而闻名,丝是灰色的,悬垂于树上,“赛利斯”人把它采集后,放在水里浸湿,由妇女们加以梳理,再精织成美丽的绮。西方人由此想像:中国乃是遍地丝绸的锦绣国家,国民们个个身着绫罗绸缎,气宇轩昂。

自从张骞出使西域后,丝绸便经“丝绸之路”大量销往西域诸国。丝绸贸易的一条较为固定的路线是从昆仑山脉北麓或天山南麓往西穿越葱岭(帕米尔),经中亚细亚最后运往波斯,然后再转运条支(今伊拉克)、大秦(即罗马帝国)。汉代中国丝绸最大买主当属罗马帝国,华丝运销希腊、罗马,备受欢迎。罗马的恺撒大帝(公元前100—前44年)有一次穿着中国丝袍去看戏,全场哗然,惊羨之声不绝于耳。当时丝绸几乎同纯金等价,除王公贵族外,一般人只能“望丝兴叹”。在丝绸西运同时,中国的养蚕和织丝技术也传到西方。波斯在5世纪时已学会了养蚕织丝技术,不久,拜占廷、印度等国也学会了中国的养蚕织丝技术。

汉代时提花布机的功能很全,能够织制许多复杂变化的纹样,这种高水平的提花织机传入西方后,立即取代原先那种功能单一的织机。对此李约瑟认为,中国不仅是最早发明养蚕织丝的国家,也是最早创造先进的提花织机的国家。西方的提花织机是由中国传去的,故比中国晚4个世

纪。

唐朝时中国丝绸从广州起航经南海,最远可到达波斯湾的巴士拉港(今伊拉克),该航线将东南亚、南亚和阿拉伯三大地区连在一起。宋元时代丝帛和瓷器始终是出口货物中的两大支柱。15世纪郑和下西洋时宝船所装的货物中,锦绮、纱罗、绫绢、纴丝等也占极大部分。中国丝绸外传,特别的受惠国当推东邻日本和朝鲜。大约在秦和西汉时期,中国丝织物和织丝技术已传到日本,例如三国时代日本有“蚕桑”和“缣绵”,南北朝时期,南朝应大和朝廷要求,派送去许多长于纺织、缝纫的技术工人,中国的绫、锦等高级丝织物传入日本,日本的丝绢产量和品种有所增加,对日本、朝鲜两国人民的生活有很大影响,这从他们衣裙、袍服等民族服饰中可略见一斑。各种精美的丝织物不仅是宋朝用来馈赠外国使者和博得远方来客倾羨的礼品,也像黄金一样是坚挺的硬通货,例如南宋嘉定十二年(1219年)时,由于大量进口香药,金银外流过多,于是改用绢帛、锦绮、瓷器之类换货。

宋代时中国江南有苏州“宋部”和南京“云锦”,前者用色典雅凝重,后者用色沉艳厚重,别具一格,很受欢迎。缎是中国古代最华丽和最细腻的丝织物,平滑而有光泽,立体感很强。宋代的缣丝织制品多半以唐宋名画作底本,有极高的艺术性,既是实用的纺织品,又是高雅的工艺品。

元代时中国丝织物风行世界的地域范围更加广阔,据

## 中国瓷器名扬天下

---

汪大渊的《岛夷志略》介绍，东起菲律宾的吕宋、印尼的马鲁古、班达、帝汶，西至印度的科泽科特、伊朗的霍尔木兹、埃及的杜米亚特，直到大西洋滨摩洛哥的丹吉尔，南面最远运抵索马里的摩加迪沙、坦桑尼亚的基尔瓦。1565年，菲律宾群岛大部分沦为西班牙殖民地，于是出现了以对华贸易为基础的1573—1815年的马尼拉和阿卡普尔科之间的大帆船贸易，我国丝绸由此传播到北美洲的墨西哥、南美洲的秘鲁、阿根廷、智利等国家，至此，中国丝绸经海、陆两条“丝绸之路”，传遍全世界，誉满五大洲。

中国丝绸外传，对世界各国社会文明进步贡献良多。三国时，有些国家的男子还处于赤身裸体阶段，我国丝绸传入后才改变这一不文明习俗。东南亚人、南亚人“以帛缠首”，阿拉伯人以“白色帛缠首”，至今仍相当普遍。一些国家宫廷中用的幡帷伞、僧侣袈裟、神父法衣，民间用的绢伞、绢扇甚至制作高级洋娃娃、婚纱礼服等面料，都离不开丝绸。由此可见，中国丝绸在丰富、美化人民生活，使世界变得多姿多彩，更加美好方面，功不可没。

### 三、中国瓷器名扬天下

外国人称中国为 China。“China”即瓷器的意思，可见外国人早就把瓷器看作是中国的重大发明与创造。瓷器由陶器发展而来，古代的硬陶和白陶是陶器向瓷器的过渡，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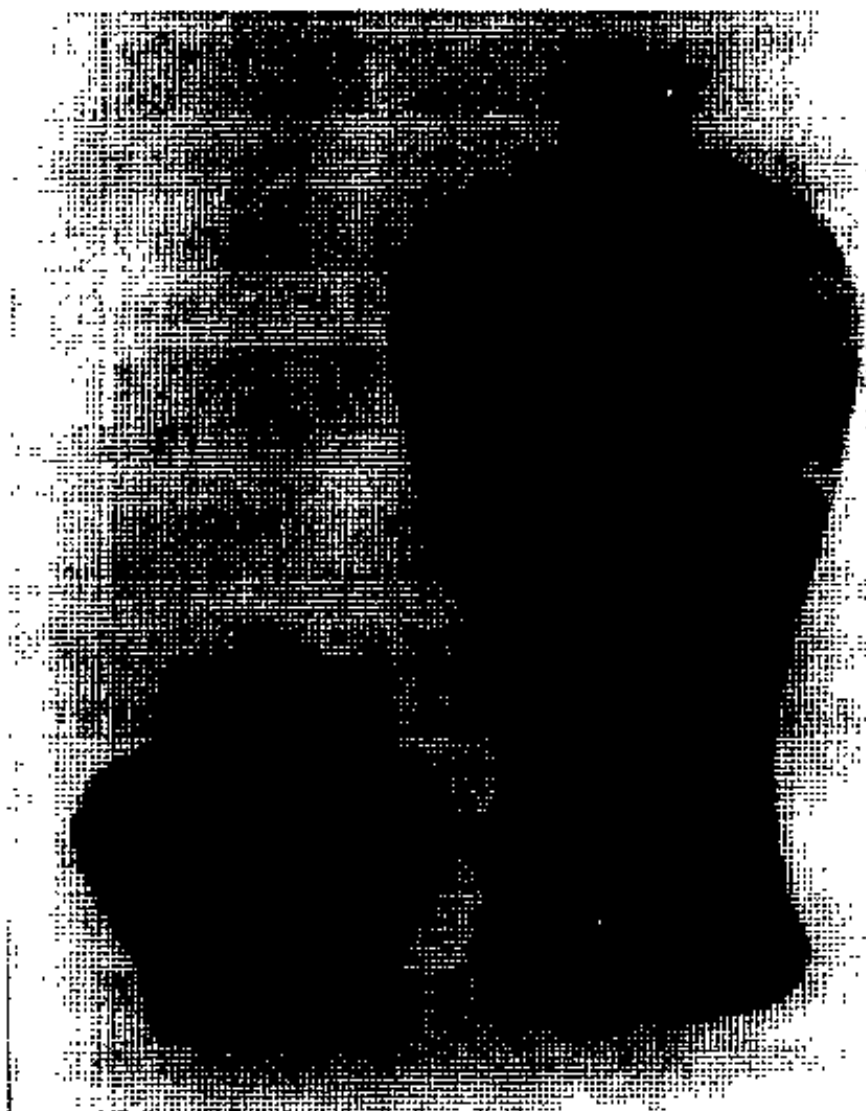
明釉药是制瓷技术的关键,东汉时我国已有了真正的瓷器,南北朝时瓷器的生产技术已日趋成熟。唐代烧制瓷器的技术发展到了一个新阶段,生产出美丽的青瓷器。唐代的名窑有邢窑(今河北内丘),所生产的白瓷有“类雪”之誉。此外,江西景德镇的白瓷其工艺水平已接近现代水平。五代十国时期(907—960年)由柴窑生产出来的青瓷已经闻名遐迩,被称赞为“青如天,明如镜,薄如纸,声如磬”。宋元时制瓷技术又有新发展,是瓷器发展过程中一个非常重要的时期,制瓷业非常发达和普及,从而形成宋代有影响的八大窑系:北方有定窑、磁窑、均窑和耀窑;南方有景德镇窑、越州窑(浙江绍兴、余姚一带)、龙窑(今浙江处州)、建窑(今福建省建阳县水吉镇)。当时所生产的青瓷和白瓷以纯净为主,彩瓷以色彩鲜艳,光彩夺目著称。

越窑烧制出来的青瓷酒杯,“纹如乱丝,其薄如纸,以酒注之,温温然有气相吹如沸汤,名曰暖杯”,“九秋风露越窑开,夺得千峰翠色来”,此为陆龟蒙诗对越窑瓷器的赞叹。邢窑产品也质料细润,素净洁白,光彩夺目,美不胜收。

在景德镇的传统产品中,多种为中国瓷器精品,例如著名的青花瓷在胚胎上绘画,再施以白釉或青釉,瓷白花青,大方素雅,清丽可人。运用镂空技艺制作的“青花玲珑瓷”,给人以一种清新明亮、素雅洁净之美感。如在釉上加金加彩后,能制造出“加彩青花玲珑瓷”,显得格外富丽堂皇。薄胎瓷碗是景德镇瓷技一绝,从元代起即能生产,该产品具有

“薄如纸，白如玉，明如镜，声如磬”的特点，产品的名贵和珍奇之处在于从上到底都薄如蛋壳，托在手上轻若浮云，看上去如云中月、雾中山，若隐若现，飘忽不定，巧夺天工。

中国瓷器影响之大，遍及世界各国。唐代以青瓷器经海路传播到世界各地去，形成名扬天下的“海上丝绸之路”。



13 世纪时的珐花瓷瓶。

大约 10—11 世纪时，我国的制瓷技术开始传入周边国家。10 世纪后半期至 11 世纪初，高丽已能仿制宋代越州窑青瓷，11 世纪中叶，又受中国龙泉窑影响，生产

出真正的青绿色青瓷。高丽的初期青瓷,为纯粹青色瓷,无纹,其釉色、形态、纹样俱佳,其造型和工艺堪称一流,为高丽青瓷中的杰作。白瓷比青瓷进步,中国景德镇制作的白瓷,泛有青色,称为“影青”,更是独特的发展。高丽白瓷约于12世纪面世,源于景德镇窑系。高丽使用白色高岭土作为白瓷的胎土,器壁很薄,器形和花纹等和中国宋元白瓷不相上下。白瓷成为李朝人的珍贵瓷器,又是朝鲜国王的专用品。

宋代的青瓷、白瓷输入日本后,备受贵族的喜爱,平安时代时研制出了施釉陶器,有彩釉、灰釉等种类。公元1200年左右,中国茶传入日本,饮茶风俗渐盛,欣赏中国瓷器日益普遍化,瓷器需要量大增,这也促进了陶瓷器制造业的发展。有位名叫五郎大夫祥瑞的人,于1510年随庵桂悟入明朝,学习制瓷之法,于永正10年(1513年)返回日本后,在伊万里建窑烧制,其产品名“伊万里烧”。有日本“陶祖”之称的李参平于1616年发现有田瓷石后,便在那里设窑烧制,创造出闻名遐迩的有田陶瓷文化。有田陶瓷不仅在技法上直接受自宋朝开始一直到清朝的彩绘的影响,而且从内容到形式都具有很深中国文化的烙印,如明朝的青花艺术、清朝的五彩艺术样式等,成为绚丽多彩的中日文化交流的组成部分。日本收藏有中国许多陶瓷精品,其中青花瓷最多。例如东京国立博物馆有元、明、清二代青花瓷,其中有件元代青花荷莲鱼藻纹罐,形体敦厚,笔意飘逸豪放,令

人称绝。兵库历史博物馆收藏有从该县出土的明代青花芙蓉花卉纹盘,釉色浓正,栩栩如生。如今的日本人对精美的中国瓷器仍情有独钟,1982年1月8日,在东京举行的“江西工艺美术、景德镇陶瓷展览会”上,一种“薄胎瓷”碗售价98万日元(当时折合人民币7350元),开馆当天展出30余只立即被抢购一空,未买到者为错过机会而惋惜万分。

中国古陶瓷文化对加强中国与东南亚各国人民的经济文化联系,增进彼此的了解与友谊发挥了积极作用,对东南亚各国的社会民俗产生相当大的影响。据历史记载,在中国陶瓷未传入之前,南洋很多地方土著多以蕉芋叶子作为饮食容器,而有了陶瓷后,“寻常人家……盛饭用中国瓦盘”,“用盘盛满其饭,浇酥油汤汁,以手撮人口中而食”。菲律宾许多部落以拥有多少中国瓷器(主要是宋瓷和明瓷)作为衡量财富的标准,婆罗洲一带也是“其家中之财富,皆视其所藏之陶瓷多少为衡(标准)”。当然,中国瓷器也作为传家宝而世代相传。在东南亚国家一些地区人民的婚姻生活中,瓷器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土著人常把嫁女能有中国陶瓷花瓶、缸瓮作为嫁妆,视为最体面之事,新郎给新娘家的聘礼全部或部分为瓷器。较富有的家庭,“其女嫁时所得之妆奁,必与其母前嫁所得妆奁相同量,例如彼之老母前所得者……瓮五个……其女嫁时亦如此数”。在宗教仪式上,献给神灵的供物也须安放在瓷盘上。缅甸常将中国瓷罐埋在地下,或送往佛庙供奉。当然,中国陶瓷器也被作为可以充



分保障债权的抵押品。

菲律宾人十分珍视中国瓷器,平时常将瓷器埋在地下,节日时取出一用,用毕再埋,由此菲律宾出土中国瓷数量可观,收藏的瓷器也很丰富和完整,在所有东南亚国家中首屈一指。

中国陶瓷器还对南洋的丧葬习俗产生影响。文莱等地人民“人死葬瓮中以藏”,“暂厝七日”,后举行葬礼。有的是将尸体直接装人大陶瓮埋入地下,有的是先把死入土葬,过些日子再捡骨装入陶瓮埋葬(第二次埋葬)。开始时由于中国陶瓷器珍贵,故一般人常从旧墓中取出陶瓮,将尸骨掷入江中(水葬),然后再用,一个陶瓮常常用过四五次。随着瓷器输入的增加,有些富人将瓷瓮作为葬瓮。在暹罗、菲律宾卡拉塔甘和沙捞越的曼拉诺人中间,陶瓷又是重要的殉葬品,凡死者生前使用过的瓷器均要带去,为此墓葬中屡被发现有中国瓷器,例如菲律宾卑舒姑巴亚南县的比拉村,就有百座以上的中世纪坟墓之中发现了中国陶瓷葬品。

我国青瓷从海路传入缅甸,自13世纪80年代至15世纪40年代的这150余年间,中国大量青瓷从福建泉州运往马达班湾(Martaban Gulf)的毛淡棉,然后在该处再转运出口;也有在当地仿制,使马达班瓷器风行全缅甸。缅甸盛产玉石,但不谙加工制作,作为双向交流,缅甸玉石是明朝中缅经贸往来中的又一大宗产品。缅甸木邦的孟密、孟养的孟拱是宝石和琥珀的主要产地。我国一些商人每年经滇缅

陆路，入缅北经营玉石开采业，开采工人最多时每年近千人，产品最多时年产数千担。他们将宝石从缅北运回腾冲进行加工，制成各种饰品或出口，或行销全国。明代时华商在缅经营玉石珠宝的商店多至百余家，在缅甸旧都阿摩罗补罗（Amarapura）城遗址的一座中国古庙中，刻有 5000 个中国玉商行的名字。乾隆年间，在缅经营玉石的华商更多，促进了缅甸玉石行业的发展。1872 年，清廷曾派人去缅甸购买很多宝石，为同治帝筹备婚礼，由此更使缅甸玉石业声名远播。

玉石是雕刻玉佛的珍贵材料，故缅甸玉佛闻名于世。随着玉石贸易业的兴盛，传入我国的缅甸玉佛不计其数。缅甸玉佛传入中国时间应当是很早的，例如杭州灵隐寺内所供奉的“明代缅甸玉佛”即是明证。除此之外，上海玉佛寺、北京广济寺、四川峨眉山金顶、山西五台山碧山寺、安徽九华山化城寺、厦门南普陀寺等多处，均供奉缅甸玉佛。上述千姿百态的卧佛、坐佛和立佛，都由缅甸白玉雕琢而成，并镶嵌珍贵宝石，洁白无瑕，工艺精湛，形象生动逼真，成为中缅人民友好相处和佛教文化交流的历史见证。

中国瓷器约于 9—10 世纪时传入阿拉伯国家，从伊拉克、叙利亚、黎巴嫩等国出土的文物中看到，唐瓷遗物甚少，大部分是宋瓷和明瓷。沙特阿拉伯的达兰市附近的卡提夫曾出土北宋铜币“绍圣元宝”（1094—1098 年）和南宋的“绍定元宝”（1228—1233 年），此为宋代输出瓷器时遗留的钱

币。10世纪初,中国瓷器也大量传入埃及,1912年在对弗斯塔特(为风沙掩埋的城市)的挖掘中,发现大量中国瓷碎片,多属宋代的影青及龙泉窑瓷。埃及从法帖梅王朝(969—1171年)起开始仿制中国瓷,穆斯林工匠们仿制的中国青花瓷,造型和纹饰都和中国类同,但胎骨为埃及瓷土,器皿上常用阿拉伯文刻上制作者的名字。

15世纪初郑和下西洋时,瓷器是必备的出口货,而且以青花瓷为主,在派往麦加的使者中所携带的货物也是麝香和瓷器。随着瓷器不断传入阿拉伯,瓷器深入到每一家庭。例如13世纪时,埃及与非洲沿海各国人民常用华瓷作为礼品,进行装饰,瓷盘、碟、碗等被镶嵌在清真寺门楣和富豪客厅的壁龛中,成为时髦和华贵的装饰图案。福建省德化县的德化窑产品,种类繁多,其中军持<sup>①</sup>大量销到阿拉伯各国。军持是烧器,也有仿剔红剔黑工艺特征烧制的黑釉剔花瓶、罐、炉等器。

西方世界最早提到中国瓷器者为意大利旅行家马可·波罗,他所携带回去的福建德化窑产品青白釉小花瓶,至今尚有一件存放于意大利博物馆。中国瓷最早在欧洲出现时被视为珍品。欧洲的制瓷技术约于1407年由意大利威尼斯的炼金术士安东尼奥从阿拉伯人那里学来,此后欧洲才

<sup>①</sup> 军持:梵语,即水瓶,僧人游方时皆携带用作贮水,以备饮用及净手等。伊斯兰教徒日常拜功作小净,朝觐麦加时贮淡水,归途贮圣水等大量需要军持。

逐渐有了自制的瓷器。18世纪时在欧洲人概念中，“瓷器”即是“中国”。中国龙泉青瓷首次抵达法国时，法国人就为这美丽无比的青色所折服，由于无法形容这美丽，就称之为雪拉同(Celadon，一长篇小说中主人公所穿美丽的青色衣裳)。1716年法国有首盛赞中国瓷器的诗写道：“来啊，观赏这件瓷器，吸引我的是它的绚丽。它来自一个新的天地，从未见过如此优美的艺术。多么诱人，精致脱俗，它的故土，来自中华。”法国作家雨果对中国的瓷器和漆器也十分喜爱，其收藏品于1851年在他被流放时拍卖。雨果也曾写有赞美中国瓷器的美丽诗句。直到如今，法国的瓷业中心利摩日镇的哈瓦龙瓷厂，仍然在生产中国式青瓷，向欧美各国出口。

中国制瓷技术约于17世纪中叶通过德尔夫(Delft)传到荷兰，后又传到德国，先在纽伦堡、孚尔达和拜罗伊等地试产。1708年萨克森国已能制造红色瓷器，1710年又在德累斯顿附近一个叫迈森的地方设立瓷厂，迈森瓷的器形也仿中国。1983年初在北京举行的“前柏林王室瓷窑陶器展览”，有一段说明词为：“以中国瓷器为蓝本，柏林的王室瓷窑的创作中一直把这古老的美学观点在德国传递了多少世代……。”中国的古瓷精品在欧美一些国家的拍卖会上，一直成为抢手货。1984年在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举行的一次拍卖会上，一位日本商人以60多万美元买走一件明代生产的龙虾盘。

中国瓷器中的精品元代青花瓶被许多欧洲国家收藏。英国达维德基金会,收藏有一件元代的青花云龙纹象耳瓶,在瓶颈部还带有确切的纪年:“信州路玉山县顺城乡德教里荆塘社奉圣弟子张文进喜舍香炉花瓶一副祈保合家清吉子女平安至正十一年四月良辰谨记星源祖殿胡净一元帅打供。”国外一些青花瓷研究者,已将写有至正十一年(1351年)的云龙纹象耳瓶,当作辨识至正青花瓷的标准器。在伊朗和土耳其博物馆内亦收藏有这类青花器。相传该产品是本世纪20年代,一位名叫达维德的英国青年从北京琉璃厂购得,后带回英国珍藏至今。

#### 四、中国的漆轿和欧洲箱式马车

和瓷器一样,漆器也是我国古代的重大发明。当时人们在无意中将漆树上流出来的一种汁液涂抹到容器上,器物表面会出现一层发亮的膜,此为最早的漆器。髹漆工艺的普及约在春秋时代,当时已开始栽培漆树和桐油树。战国时代(公元前5—3世纪)已有专管漆树的官。隋唐时漆器有很大发展,宋元时期髹漆工艺开始逐步专业化。明熹宗天启五年(1625年)黄成编有《髹饰录》一书,详细介绍制漆技术。

中国漆器很早就传到国外。缅甸蒲甘王朝初期(中国北宋时期)中国制漆技术传入缅甸,缅甸人民加以发挥,把

中国漆器的制作技术发展成民族传统工艺,使缅甸漆器成为中缅文化交流的产物。蒲甘出产的漆器品种有果盘、漆画、香烟盒、茶筒、斋饭格盒、彩色桌椅等二三百种,成为人们日常生活中必不可少的用品。随着旅游业的发展,缅甸漆器备受外国游客青睐,销售量不断增加。1948年缅甸独立后曾在蒲甘创办一所漆器训练学校,由经验丰富的艺人传授制漆、绘制、雕刻各种图案的技术。学校旁的漆器博物馆展出19世纪以来各种漆器精品。朝鲜半岛上高句丽、百济、新罗三国鼎立时期已能生产漆品。在高丽漆器中,以镶嵌贝壳、玳瑁、铜线的螺钿漆器闻名于世,但此技来源于中国唐代称作“平脱”的金银装饰物。汉代四川生产的漆器在朝鲜北部大批出土,可见中国漆器传入朝鲜时间很早。

日本的制漆技术也由中国传入。隋唐时期随着中国输入日本许多漆器,制漆技术也同时传入日本。经过日本人多年不断的开拓和研制,到9—10世纪时,日本已能制作泥金画漆,其法独特,为日本之首创,以至中国还派人前去学习。明代宣德年间(1426—1435年)曾派漆工杨坝“往日本学制漆器,其缥霞山水人物,神气飞动,描写不如,愈久愈鲜,世号洋倭漆”。正由于掌握了日本泥金画漆的工艺,才能制造出许多珍贵的“洋倭漆”作品。另一种螺钿漆新工艺,即用贝壳镶嵌在漆中,拼成花纹图案。这一技艺本为我国的传统漆器工艺,但自宋代以后,日本的螺钿漆器开始显

示其特殊魅力,大有后来居上之势,宋代有人赞颂倭人的螺钿漆器为“物象百态,颇极工巧,非若今市人所售者”。说明日本人的这一漆器从原料到工艺制造均已超过中国。

17、18世纪时,欧洲的法国、德国和意大利等也先后仿制中国漆器,并获得成功,在一定时期内影响颇大。1698年法国第一艘商船昂菲德里特(Amphrityite)号来华,1701年又作第二次航行,从中国带回大量丝绸、瓷器,法国人竞相穿丝绸,摆放瓷器和漆器成为一种时尚。中国的轿子17世纪时也被引入欧洲,上漆的中国抬轿此时还是欧洲一种等级的标志,维也纳在举行的一次抬轿出巡大典时,德国皇帝的轿子装饰特别华丽,走在前列,宫廷和大臣的轿子殿后。18世纪中,法国人首先在轿子底下装轮,漆轿变为马车,故早期的箱式马车一如中国的轿子。

## 五、中国石狮雄峙世界各地

中国各地石雕狮子,其量不计其数。那优美的线条,精细的镌刻,生动逼真的形象,是无数能工巧匠惊人毅力和杰出智慧的结晶。作为古建筑文化,在中国古代时,凡宫殿、王府门前,都有一对石狮子或铜狮子陈列,称为看守大门的“司阍”,威武雄壮,象征主人的威严和权势。寺庙、陵墓的狮子,是护法灵兽的标志,鬃鬣巨口,凶悍威武,给人以一种肃穆庄严之感。桥头、民宅处的狮子,则玲珑妩媚,给人增



石狮子——中外文化交流的产物。

添喜庆吉祥气氛。但在等级观念森严的封建社会，人们不能随意在大门前放置石狮，比如七品官以下官员的府宅就不得陈列。石狮子头上的鬃毛疙瘩，其数量越多，表明主人的官位越高，最多的石狮头部，鬃毛疙瘩有 13 个，谓之“十三太保”，只有一品官、驸马、公、侯等府第门前才能设置。在“龙”之外，狮子又成为中国皇权的第二象征。

狮雕风行中国和备受古代建筑艺术家青睐，与西亚文化的传入中国有关，石狮子可谓中外文化交流的产物。狮



子原产非洲、东南亚、印度、巴西等地。埃及早在公元前3500年的加尔采文化末期已能创作艺术水平很高的狮雕作品,金字塔前的“狮身人面像”便是几千年前西亚北非对狮子崇尚的标志,印度和巴基斯坦也早有“翼狮”之类的雕塑。狮子最早传入中国是在西汉时期。公元前138年,张骞带精于骑射的上卒和向导100人从长安出发首次出使西域,开辟了沟通中西经济文化交流的渠道。当时的中亚和西亚地区出产狮子,这就为狮子引入中国具备了条件。从现存最古老的东汉石狮身上,仍然可看到受西亚雕塑的影响——狮身长有双翼。

狮子传入我国,史书上记载为东汉章帝章和元年(公元87年),安息国王献狮子,翌年,月氏王献狮子,顺帝阳嘉二年(公元134年)疏勒国王献狮子。汉代班固所撰的《汉书·西域传》写道:“自是之后,明珠、文甲、通犀、翠羽之珍盈于后宫,蒲梢、龙文、鱼目、汗血之马充于黄门,巨象、狮子、猛犬、大雀之群食于外囿。殊方异物,四面而至。”不过远在真狮传入中国之前,中国已经有了石狮子的记载,据唐代王睿《炙毂子录》记载“事始汉霍去病,去病墓前始置石人、石马及石狮等”。这或许是我国历史上有关石狮子的最早记载,可能是人们根据记载或传说雕刻的。

真狮的输入和狮子形象的出现是佛教传播的结果。佛教传入中国使狮子至尊高贵的地位大大提高,石狮的形象亦发生深刻变化。据佛经介绍说:“释迦佛生时,一手指天,

一手指地，作狮子吼”，因此有“佛为人中狮子”之说。随着佛教在中国的迅猛发展，佛经对狮子的推崇，很快就接受西亚、印度等地传来的“翼狮”雕刻，狮雕的应用范围也逐步扩大，由宫殿陵墓、寺庙和文衙武辕前面，发展到富家住宅的庭前，都用石狮子来守门，成为避邪驱鬼的灵兽，并以壮观，给整座建筑物凭添无限生气。就是在门枕石、门楣、檐角等建筑部位，也往往雕上几只神态各异的石狮子，几乎成为古建筑不可缺少的装饰和艺术欣赏品。狮雕也慢慢由石狮子引出铁狮子和铜狮子。

石狮子的造型千姿百态，充分反映了劳动人民的丰富想像力和聪明才智。我国最古老的石狮子在四川省雅安高颐墓前，为东汉遗物。这只石狮昂首挺胸，张嘴扬颈，作行走状，狮身有双翼，似有腾跃之感。保存在江苏省句容县梁朝陵墓前的石狮是六朝遗物，用一块整石雕成，造型古朴，线条浑圆粗壮，简洁有力，狮身两侧也有飞翅，目光远射，仰天震吼，神态凶猛，有古埃及狮身人面兽的遗韵，这说明国家与国家、民族与民族之间的文化交流始终没有停止过，即使在古代也是如此。

作为巴比伦古老文明图腾的狮子，其形象如今已遍及中华大地，并在民间大出风头。随着我们国家的日益繁荣富强和中外交往的不断拓展，石狮子又舞出国门，其踪迹遍及世界五大洲。例如中国文化名城苏州自 80 年代以来，姑苏石狮成为出口商品，小则论斤，大则论吨，前后已有近百

尊石狮奔赴世界各地。陕北榆林地区的绥德县,所出产的石狮子也远销美、法、英、日及东南亚的十几个国家和地区。作为世界各国唐人街标志的大牌楼两边,如加拿大维多利亚唐人街古色古香的“同济门”旁,澳大利亚墨尔本唐人街口古建筑“棧星门”旁,伦敦唐人街大牌楼旁,毛里求斯首都路易港宫殿式建筑“中国文化中心”大门两侧等,都有石狮雄峙。苏州市市长出访与之结为友好城市的日本金泽、意大利威尼斯时,其赠礼即是雕刻精美的姑苏石狮。狮子古代时系由西亚传入中国,作为雕刻艺术之花,在中华文化艺术圃中历千余年之久而不衰,如今又源源不断从中国流向世界各地,这一现象也许就是季羨林先生所说文化交流史中的“倒流现象”。

## 六、颇具特色的天文历法系统

中国是世界上天文发达最早的国家之一。例如关于太阳黑子,公元前 140 年的《淮南子》上已有记载,国外关于哈雷彗星的记载也比中国晚 500 多年。早在公元前 134 年(汉武帝时期),中国经观测后记录下第一颗新星,为此在外国人编的《新星汇编》中也把这颗星列为第一颗。

历法是世界人类的古老文化之一,中国成文的历法始于周末,所取得的一系列成就在世界天文历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公元前 5 世纪初中国已经开始使用四分历,定一年

## 颇具特色的天文历法系统

---

为 365.25 天,这在当时是最先进的历法,与希腊的历法相似,但希腊比中国晚 100 年。唐代张遂(僧名一行)与机械师合作,制造出浑天铜仪,后经努力于 727 年编修完成了新历书《大衍历》,表明中国古代的历法体系已经走向成熟。

元代时天文历法与阿拉伯国家之间有过广泛而深入的交流。波斯人札马鲁丁因精于历算而被召来华,带来了一大批阿拉伯天文仪器和阿拉伯文的托勒密著《天文大全》等 23 部科学著作。由他所编修的万年历于 1267 年完成后,在一定范围内试行。该历是首部得到政府许可获准使用的回回历。1271 年正式在元大都设立回回司天台。札马鲁丁在编制万年历的同时,在北京建立观象台,并制造星盘等仪器 7 件。与此同时,中国的天文学知识也传到中亚和西亚。纳速刺丁建造设在伊利汗的马拉干天文台,并主持编纂《伊儿汗历》,其中包括有中国历法的内容。元代科学家郭守敬(1231—1316 年)在数学、天文和仪器制造方面都有卓越贡献,他所参与制定的授时历于 1280 年完成,次年正式颁行,所采用的天文常数比较准确,而且还创立了 3 次内插法和弧矢割圆术。授时历以 365.2425 天为一年,和地球实际绕太阳一周周期只差 26 秒,经过 3320 年后才相差一日,跟目前国际通行的公历(格里哥利历)完全相同。但是该历比《授时历》要晚 300 年。《授时历》还应用数字上的招差法推算太阳、月亮以及五星逐日的情况,比欧洲早了将近 400

年。

我国边区少数民族在吸取中原文化养料后,又将历法逐渐南传,其干支纪年法传到泰国的素可泰王国。从泰国故宫遗址考古挖掘出的石碑中得知,在从1292—1518年间20块素可泰碑铭中,有7块使用中国干支纪年和纪日,此为中国的历法传入泰国的明证。在泰国北部兰那泰王国的14世纪碑铭中,也以干支纪年纪日,并把十二生肖纪年和七曜星期周看作是孟族的。

元代时派人将授时历赠送给越南陈朝,对越南人民日常生活和农业生产发展产生积极作用,这一历法一直沿用到明末。越阮氏王朝嘉隆八年(1809年),越南自北京购回《历象考成》后,参照该书奏请颁行《协纪历》,至此,越南的历法才正式确定下来。直到今天中国民间还在广泛采用的24节气,《协纪历》中也采用,与中国的历法完全一样。中国历法中的“干支纪日”也被越南的《协纪历》采用,例如在越南阮氏王朝维新十年(1916年)的历书上,写有“正月大(庚午)三日壬申巳正一刻十四分立春。正月节十八日丁亥卯正一刻十三分雨水”字样。此外,越南的端午节是五月初五,中秋节气八月十五,皆源于中国。

日本受中国历法影响更是非常深远。日圣武天皇天平七年(735年),日本的吉备真备由唐留学回国,献上所带回的大衍历。天平宝字八年(764年)日本政府宣布废置仪风历,选用从内容到机构更为精确的大衍历。后于天安元年

(857年)采用中国的五纪历。日清和天皇贞观四年(862年)又采用唐徐昂于822年制定的宣明历,该历在日本使用长达823年,直到贞享历于1685年颁用为止。回顾历史可知,日本自推古女天皇十二年(604年)至灵元天皇贞享元年(1648年),先后颁用中国的元嘉历、仪风历、大衍历、五纪历和宣明历等5部历法,前后长达1100年之久,史称“汉历五传”。受中国历法影响,日本也采用阴历,例如将24节气中的立春之月列为岁首。

印度的天文历算也对中国产生影响,在唐初编纂的《隋书·经籍志》里曾列举许多有关印度天文历算的书。《大唐内典录》卷五也收录《婆罗门天文》20卷,尽管此书已散佚,但对唐代历法明显起过作用。印度算术也影响中国,印度古代的数法有十进、百进、倍进、百百千进诸法,其中的百进和倍进随佛经的翻译而传入中国。

印度的算术、代数和三角学等后来经阿拉伯传入欧洲。明代的程大位于1592年写成《直指算法统宗》17卷,这是一本关于珠算的入门书,颇具实用价值。该书在明清两代不断翻刻、改编,在中国数学史上影响极大。该书的595个应用题数字计算、开方运算等都是用珠算完成的。中国所发明的珠算先后传到日本、朝鲜和越南等国,一直沿用至今。例如,中国算盘约于明清之际传入越南,珠算对越南数学的发展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程大位的书传入越南后成为越南珠算实际应用的教科书。综上所述,中国古代科学技术

对人类社会文明进步所作的重大贡献,诚如英国科学史家贝尔纳所指出的那样,中国“许多世纪以来,一直是人类文明和科学的巨大中心之一”。

## 七、医学文化交流

在中国科技史上,中医学具有极其重要的地位。中国医学发源甚早,在战国时代出现的《黄帝内经》一书,已能系



不同肤色的英国人 在伦敦华人开设的中医诊疗所  
“康宁堂”前排起长龙,等候就诊。

统地论述人体的生理机制及其规律,还有人体解剖知识、初步的血液循环概念,发病的原因分析以及防治理论等。该书作为传统的中医理论体系,具有强大的生命力,至今仍是中医工作者的指导性著作,这在世界科技史上是罕见的。在秦汉至南北朝时期基本已形成一种独特的理论体系,到唐时期其成就更加巨大。元时交通发达,来自中亚和西亚的色目人在政治上受到蒙古统治者的信任和重用,阿拉伯医学也随之传入中国。元时有在大汗宫廷中服务的回回医生。阿拉伯各地本就盛产各种香药,所配置成的各种良方,疗效奇特,回回医生医术高明,备受中国人士欢迎。1292年,在元宫廷太医院下专设回回药方院和回回药物局两个阿拉伯式药学管理机构,分管大都(北京)和上都(多伦)的宫廷医药。公元1322年将上述两机构合并于广惠司统一掌管。回回医药也流行民间,一些来华的阿拉伯人以卖药为业,许多回回老医生在中国江南各地街头卖药行医,以金丝膏药治疗跌打损伤效果最为显著。

阿拉伯药典早在元时已有中译本,现北京图书馆收藏有《回回药方》残本4册,为元末由阿拉伯文译成中文,在明初印刷而成的。该书涉及内科、妇科、儿科、外科、正骨、针灸和药剂等各个分科,是一部门类俱全、搜罗宏富的医学百科全书。阿拉伯著名医学家阿维森纳(980—1037年)所著的《医典》在12—17世纪时一直是西方医学的指南,在亚洲更是非常实用的百科全书。中国流传的版本该是大科学家



拉泰夫(1156—1242年)作有注释的签注本。

中国的医学著作也传入阿拉伯,例如唐代孙思邈的《千金要方》在元时被译成波斯文。此外,波斯国有位大丞相叫拉施德丁(Khodja Rashid - eddin),以半生时间和心血编写一部世界史,名《史集》,其中第一部关于蒙古史的部分最为翔实,因为得到元朝官员孛罗的亲自讲授和指导,还邀请两位中国文人替他翻译汉文资料。这部名著于1310年完成,受到中外研究蒙古史和元史学者的重视。拉施德丁于公元1313年主持编辑了一本名为《伊利汗的中国科学宝藏》的中国医学百科全书。书中涉及到脉学、解剖学、胚胎学、妇科学、药物学等。在书中还提到过中国晋代名医王叔和(265—317年)和他的《脉经》一书,可见对中国脉学的重视程度。中国中医学整体观和综合观等较成熟的理论体系,成为阿拉伯医学的重要参考文献。该书的出版为中国和伊朗两国的医学文化交流作出卓越贡献。

宋时与邻国高丽在医学方面也有小规模交流,北宋元丰元年(1078年)宋使回国时,高丽国王文宗附表陈诉,因患风痹,请宋派遣医官,并赠送医药。为此宋于翌年派出一个包括有翰林医官参加的88人代表团携带百余种药到高丽。高丽国并于1136年规定以中国古医书《针经》、《黄帝明堂经》、《针灸甲乙经》作为学习医学针灸的必修课。中国和朝鲜很早就有了在汉方医学方面的交流。例如于1610年完成的《东医宝鉴》,是李朝王室御医许浚奉命参照

朝中两国医书,经过 16 年努力撰写的。该书于 18 世纪时广泛流传于中日两国,受到中日医学界的重视,既为中朝日三国汉方医学发展作出重要贡献,也是中朝文化交流的结晶。

越南医学也有其辉煌的历史,和日本、朝鲜等一样,都是中国医学的支流。隋唐时,《内经》、《脉经》等中国医书传入越南,明时李挺的《医学入门》、张介宾的《景岳全书》和李时珍的《本草纲目》等医学经典著作先后传入越南,促进越南“东医”的发展。中国的针灸疗法 14 世纪时已被越南医生广泛使用。越南陈朝年间,元兵南侵,有位名叫邹孙的以医从军,被俘后留在越南行医,因医治越南诸侯王而致富。其儿子邹庚继承父业,亦成为著名医生。陈宪宗开祐十一年(1339 年)中秋之夜,宪宗儿子坐船游览西湖市,不慎溺水休克,邹庚用针灸治疗,使其很快苏醒,自此以后邹庚被誉为神医。

中国医学史上最杰出成就者当为明代的李时珍(1518—1593 年),他经过 27 年艰苦努力所完成的巨著《本草纲目》计 190 万字,共 52 卷,书中介绍药物 1892 种,药物形态图 1160 多幅,归纳为 62 类。该书系统总结了 16 世纪以前我国丰富的药物经验,涉及古代自然科学的许多领域。李时珍所提出的植物分类法,比西方植物分类学的创始人、瑞典博物学家林奈(1707—1778 年)在《自然系统》(1753 年出版)中所提出的分类法早一个半世纪。《本草纲目》最先

传入日本,从1637—1796的160余年间,日本初刻该书的各类版本达9次之多。后来又相继传入朝鲜和越南。《本草纲目》早在1647年被首次译成拉丁文,以后又被译成英、日、法、德和俄等多种文字,至今流传全世界为民造福,受到世界各国的重视,被誉为“东方医学巨典”。达尔文也赞誉这部巨著为“中国古代的百科全书”。达尔文在《人类的由来及性选择》一书中曾引用《本草纲目》中关于金鱼颜色形成的史料来说明动物的人工选择。

## 八、细小银针造福万民

针灸疗法为中国医学的精髓,传统医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历史悠久,源远流长。这一古老神奇而卓有成效的疗法很早就传布到世界各地去。早在秦汉时期,中医学包括针灸疗法便传到朝鲜、日本、东南亚和中亚各国。公元552年梁文帝曾赠送日本政府《针经》一书。公元6世纪中叶,中国医生曾去日本讲学,并把大批中国医书和针灸穴位图带去日本。公元701年,日本法令《大宝律令》规定以中国的《黄帝明堂经》、《针灸甲乙经》等作为学习医学和针灸学的必修课,由此使针灸在日本得到很大发展。北宋时期的医官王惟一对针灸疗法有很大贡献,他验证人身上共有穴位360多个,以此绘成12幅经络穴位图。1027年他著有《铜人腧穴针灸图经》3卷,统一各家对腧穴的不同说法,并

亲自设计监制两具针灸铜人。元代的针灸学大家滑寿于1341年撰写《十四经发挥》一书，主张任、督二脉各有专穴，可与十二经相提并论，并指出周身腧651个，与王惟一铜人经基本相同。王惟一和滑寿成为宋元时期的两位针灸学大家，其著作流传甚广，受到日本、朝鲜、越南等国医生欢迎。日本针灸学多以滑氏为标准。明代时杨继洲集历代各家针灸成果和实验经验所得，著有《针灸大成》一书，对后世的影响深远。

宋元以后，随着航运事业的发达及海路的开通，针灸疗法逐渐被介绍到欧洲，英、法、德、荷、奥地利等国的一些医学家，开始对针灸疗法进行研究并应用于临床，同时亦翻译一些有关的中医针灸著作。如今针灸疗法被世界上许多国家广为采用，声誉卓著。大约在距今的300多年前，荷兰王国东印度公司医生瑞尼，将中国的针灸疗法介绍到欧洲去，从而成为中国针灸西传欧洲的先驱者。300多年后的今天，针灸疗法在欧洲蓬勃发展，并被医学界推崇备至。在瑞典政府委托哥德堡大学所作的一项调查报告得出结论：“承认中国针灸治病有一定的疗效，并且针灸可治疗多种疾病，不单没有其它副作用及危险，而且在治疗上有确切的效果。”对于治疗哮喘、心漏病、高血压、风湿性关节炎等常见病、疑难病疗效显著，还可利用针灸方法戒酒、戒烟和戒毒。由荷兰、英国、德国、比利时等国中医针灸学校或学术团体联合发起，欧洲中医针灸培训中心于1990年初在荷兰成

立。该中心成立的目的是进一步提高欧洲各国现有中医针灸师的临床技能、治疗水平和医学理论,积极推广中医对常见病、疑难病和多发病新的治疗经验和研究成果。该中心同时在比利时、英国和德国设立分中心以招收学员。

欧洲有不少西医对针灸情有独钟,成为著名的针灸医生。在法国有位被禁闭的士兵报告上尉,说是屁股痛得厉害。军医诊断后病人患有严重痔疮,在翻阅了《中国针灸简明手册》后,立即取出银针在士兵膝盖附近穴位上扎针,在场者目瞪口呆,以为医生疯了,可是患者第二天报告说,他的屁股一点也不痛了。此事 1936 年发生于法国奥尔良城某军队禁闭室内,这位医生即是蜚声针灸界的法国针灸医生乔治·格拉尔博士。

在英国,中国的中医学亦受到皇家信赖,据说女皇每次外出旅行,必带些中草药。女皇的妹妹玛嘉烈公主曾用中草药治愈周期性偏头痛。英国前首相、保守党前领袖霍姆男爵的女儿梅丽尔·达比既开针灸诊疗所行医,还兼当教师,把针灸技术传授给英国学生。1979 年第 6 届世界针灸大会在巴黎召开,22 个国家和地区的医生和学者作了 113 篇报告,其中法国最多。可以预见,针灸疗法在欧洲医学界的地位及其治疗水平将会有很大提高。

尽管中国针灸疗法在 17 世纪初已传入欧洲,但就其神奇功效及民间广泛应用方面,美洲却是后来居上,针灸疗法在本世纪六七十年代起才系统传入美国,但发展很快。如

今当你在美国旧金山、纽约等城市的唐人街行走，华人开设的中医和针灸诊疗所触目皆是。

1975年美国纽约率先立法允许医生及牙医使用针刺疗法。80年代时成立了全美针灸学会，还出版发行6种针灸杂志。如今美国约有2万余名针灸医生，以加州为最多。有位在纽约开业的比尔森医生说：“就止痛而言，针刺也许是副作用最小的而效果最大的安全疗法。”其中“针灸戒烟”疗效奇特，在美国社会上引起很大反响，一些有10年以上历史、每天不少于两包烟的“瘾君子”，经过约一周半的针灸治疗，90%以上的人烟瘾大减，如再经4个疗程共6周时间的治疗，便能彻底戒烟。越来越多的美国人开始认识和接受针灸疗法，美国许多州已先后通过针灸立法。美联社驻北京记者报道说：针灸“这种古老的中医疗法，已被证明对于中国以外的世界具有经久不衰的魅力”。由此可见，针灸不仅是中国传统医学宝库中的精品，而且也是世界医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日益受到各国人民的欢迎。

如今中医针灸诊疗所几乎已遍布世界每一角落，其影响与日俱增。例如华人叶彬举在巴基斯坦卡拉奇开设的小型针灸医疗所，每天要工作15—16小时，所治愈的患者有工人、农民、职员、政府部长、军区司令和国家总统，还有美、英、法、日、荷、俄等驻当地的外交官及来访的国际友人。当叶彬举的巴中针灸院于1986年12月4日开业时，齐亚·哈克总统亲自为该院开幕剪彩。叶以崇高的医德和精湛的技

艺为无数病人解除痛苦的同时,也为中华民族的传统医术赢得荣誉。

## 九、精美的建筑艺术景观

中国的建筑艺术,在不同历史时期对日本佛教建筑曾产生很大影响。日本从大化革新起在各个领域内全面吸收唐文化,其首都的建设也仿照长安的布局。最初日本佛教建筑受北魏样式影响,后又仿唐,如由鉴真高僧及其弟子所建的唐招提寺,位于今日本奈良市五条町,十足的唐朝风格建筑,是研究唐代建筑物典型的“范本”,迄今已成为中日文化交流史上的重要文物。日僧重源于1167—1168年入宋后,曾在明州参与过佛寺的建造,并取得相当的实践经验,返日后以带回中国浙江一带的“天竺样”建筑形式建造东大寺。今日东大寺的南大门及钟楼、播磨净土寺的净土堂、醍醐寺的经藏等即为此风格,其主要特色为简朴、庄重,给人以一种开阔和沉实有力的感觉。

后来,日本的佛寺建筑又出现“唐样”,又称“禅宗样”,是与日僧俊苾于1191—1211年入宋有关。这一照搬南宋禅宗寺院的建筑形式,一改日本传统的“和样”风格,而是把大门、三门、佛殿、讲堂置于一条直线,把僧堂、库房、钟楼、经藏、宿舍、厕所等置于左右两旁,通过回廊连接起来。这一样式由日僧荣西开始,并通过在日中国高僧兰溪道隆、无

学祖元等修建长寺、圆觉寺等来实现。这一样式随禅宗在日本的兴盛而普及全国,对日本禅宗建筑产生极大影响。在南宋“禅宗样”的影响之下,日本还出现“和样”吸收“唐样”的风格,两者相互混合,中日合璧,两种建筑文化交相辉映。

室町时代初期(14世纪初),日本一些大寺的建筑风格,如伽兰的布局、殿堂结构、大殿内佛像的供奉、禅寺的法式甚至僧人的法规、仪式和饮食起居等几乎全部与宋元的禅寺一样。17世纪时,聚集日本长崎的中国商人和华侨日多,为免受日本幕府1612年取缔天主教法令的株连,也为了满足对丧葬法事以及祈祷海上航行风平浪静等宗教生活的需要,南京、泉州、福州等华侨,便在本帮帮会内兴建兴福、福济、崇福三寺,统称“唐三寺”,加上稍后中国名僧隐元来日后修建的黄檗山万福寺,都是在中国僧人监督下建成的。这些明代建筑式样的佛寺,改变了日本那种以经堂和讲堂为主要建筑物的特点,前面有祭祀四大天王的天王殿,里而的正殿为大雄宝殿,最里面为法堂和走廊等。此外,到处悬挂楹联和匾额,充分显示出明清建筑风格的特点。

中国的土木建筑技术很早就传入越南。在越南北部和中部的考古挖掘中,曾发现中国汉代的砖墓,还有多处砖瓦窑,说明中国砖瓦在汉代已传入越南。越南人善于学习、吸收中国的建筑技术,参照中国城市建设布局建设起来的宫殿、城池相当漂亮。明时不少越南人到中国来,永乐年间,



明朝驻交趾的总兵张辅曾先后三次将网罗到的 16000 多名交趾优秀人才遣送到南京。永乐 11 年(1413 年)交趾工匠 130 多人携带家眷到达南京。先期来华的范弘、王谨、阮安三人,明成祖派官员教他们读书,指导他们研究中国经史。后来,范、王两人在朝廷任职,而阮安是位杰出的建筑师,对明代北京京城的建设有杰出贡献。

永乐四年(1406 年)明成祖开始营建北京城,阮安负责总设计,其重点工程为兴建紫禁城(即宫城)和皇城。由阮安负责设计的紫禁城长 960 米,东西宽 760 米,并有故宫三大殿之称的前三殿(皇极殿,今称太和殿;中极殿,今称中和殿;建极殿,今称保和殿)和后三殿(乾清宫,内廷的前殿;交泰殿,内廷的中殿;坤宁殿,交泰殿之后的后殿)。宫城的正门为午门,北门为玄武门(今称神户门)。后三殿北通御花园,园的中央有钦安殿。宫城东西两面为城墙,设有东华门和西华门。紫禁城周围开凿护城河,全部用条石砌成驳岸。除此以外,还对大城进行改造,在南郊正阳门外,永定门内路东修建了规模宏大的天坛。如此布局匀称、庄严雄伟、富丽堂皇的明代建筑群,在 4 年之内完成,确实很伟大。

明正统五年(1440 年)5 月,明英宗下令重建北京宫殿中的奉天、华盖、谨身三殿时,仍由阮安负责设计。在此时期内,阮安还负责治理杨村河道,竣工后又奉命治理张村河,后因劳累过度病故于道。中国人民将永远缅怀这位越南天才建筑家的光辉业绩。

在清乾隆年间发生的中缅战争(1766—1769年),虽然双方在1769年11月通过和谈宣告结束,但双方交换战俘问题却一直得不到解决。据哈威的《缅甸史》记载,“中国战俘有2500人仍羁留缅京,或从事种植,或事工艺,并娶缅甸妇女为妻”。除战俘以外,当时溃散流落于缅甸城乡的华人也不少,他们把中华文化传播到缅甸,由此成为中缅生产技术文化的交流者,为缅甸的经济发展和社会文明进步作出贡献。在长达4年的中缅战争中,大批中国造船工人被征调到伊洛瓦底江上游的野牛坝制造战船,被俘以后仍然在缅甸人的造船业中工作,今日缅文中的“唐舡”、“舡舩”等帆船名词,正是由中国造船工人传入缅甸的。此外,工匠们还在缅甸生产铁锚,有利于水上航运业发展。中国工匠还参加缅甸都城曼德勒宫廷的建筑设计,其宫廷花园称为“德由午阴”,意为“中国花园”。曼德勒皇城的设计和督造,由旅缅流侨尹蓉担任。他在缅京还建造了一座仿和顺乡中天寺宫殿的腾越(迤西)会馆(后改称为云南会馆至今),完全按中国建筑风格兴建,门前的一幅对联曰:“苍山东峙,回首多情;黑水南来,同舟共济”,在异国他乡见之,使人觉得分外亲切。中国木匠在缅甸制作的“德由格”(中国百叶窗),开启可通风透光,闭合可防风雨蔽日,非常美观实用,颇受缅甸人民欢迎。

缅甸蒲甘佛教文化艺术也受中华文化影响。著名的瑞喜宫佛塔及其辅助性建筑物瑞陶辛佛塔,其建筑结构和外

型,颇似北京北海公园中的白塔。尤其是雄峙在塔前的一对巨大石狮及其颈上的悬铃饰物,亦受中国石雕狮的影响。在蒲甘众多的佛塔寺庙中,还能见到从北京传入的辐射拱门,还有如北京故宫的多层飞檐楼阁。一些缅甸学者认为,蒲甘后期的缅甸绘画艺术也受中国影响。

## 十、多姿多彩的阿拉伯风格建筑

唐永徽二年(651年)中国和阿拉伯帝国正式建交,是年8月25日,第一个阿拉伯使者奉第三任哈里发欧斯曼之命来到长安。此后,两国使者友好往来日益频繁,进一步推动经济、文化的交流。由于大量阿拉伯人来到中国,宋、元时期,在广州、泉州、杭州等地出现了许多阿拉伯建筑。阿拉伯风格的建筑物大都集中在各地的清真寺以及穆斯林墓葬的附属建筑物上。阿拉伯建筑在元时盛行一时,元世祖忽必烈登位后,曾任命阿拉伯工匠也黑迭儿及其子马合马沙主持工程建设部门,为京城大都的建设作出贡献。元代时福建泉州至少有6座清真寺,杭州不但有多座清真寺,还有回回住宅区,甚至有阿拉伯式高层建筑。此外,广州、扬州、宁波(四明)、西安、昆明等地均存留清真古寺。

伊斯兰教有一整套宗教仪式和制度,早期来华的穆斯林为了履行宗教义务,完成教规规定的仪式,必须有一个场所,兴建寺院便提上了议事日程。伊斯兰教的寺院,在明代

时被称为礼拜寺,到了清代才改称清真寺。根据现有的原始记载、墓碑以及遗址等各种资料得知,广州的怀圣寺、杭州的真教寺可谓是我国最早的清真寺。此外,北京的牛街礼拜堂、泉州清净寺和扬州仙鹤寺也是我国早期的著名清真寺。

怀圣寺,俗称光塔寺,位于今广州市光塔路。寺称怀圣,即指教徒们虽身处异国他乡,但仍情系伊斯兰教创始人穆罕默德之意。相传该寺建于唐代,但至今不能作定论。现存怀圣寺中最早的碑刻为元至正十年(1350年)郭嘉所作的《广州重建怀圣寺碑记》,但碑文中并没有该寺具体的创建年代。世事沧桑,相传唐代所建的怀圣寺也不一定就是今日怀圣寺的规模,因为其间已有过多次较大的修葺和扩建。今日的怀圣寺由寺门、看月楼、水房、长廊、碑亭、礼拜殿和光塔等组成,可容纳1000多名穆斯林进行活动。光塔在怀圣寺西南角,塔高36.6米,塔形独特,虽屡经修建,仍保持着阿拉伯的民族风格。

凤凰寺,在今杭州中山中路。该寺原名真教寺、礼拜寺、回回堂,宋代时称文锦坊、俗称洋坝头,清道光十八年(1838年)才改称凤凰寺。该寺始建于唐代,元延祐年间(1314—1320年)由回回大师、埃及富商奥托曼家族的一员阿老丁重建,明清时重修,现存的大殿为元至正元年(1341年)的遗物。在殿内正向墙的明代木雕上,刻有笔势优美的阿拉伯文《可兰经》,寺的式样为埃及风格。

牛街礼拜寺,位于北京广安门内牛街,相传在辽统和十四年(996年)由“筛海”那速鲁定奉敕创建,明正统七年(1442年)重修,清康熙三十五年(1696年)又重新修整。宋末元初,“筛海”阿哈买德(伽色尼人)和阿力(布拉哈人)来该寺掌教,先后于1280年、1283年去世,墓、碣迄今仍保存在寺内。全寺主要建筑有礼拜殿、梆歌楼、望月楼和碑亭等。在主要建筑物的细部装饰上,布满阿拉伯文的花朵图案,具有浓厚的阿拉伯风格。

清净寺,据北墙的阿拉伯碑刻记载得知,该寺又名“艾苏哈卜寺”,位于福建省泉州市区涂门街中段,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仿照叙利亚大马士革伊斯兰礼拜堂建筑形式。始建于回历400年,即北宋大中祥符二年(1009年),元至大二年(1309年)修整,元至正十年(1350年)及明万历三十七年(1609年)重修。现存主要建筑有北宋时所建的拱门(大门楼)、奉天坛和近代改建的明善堂等。寺内有明代重修时所立的石碑,碑文中有穆斯林应遵循的教规礼节,制定得相当详尽具体。1162—1163年,穆斯林商人试那围(Sirapi)在泉州建立了藩商公墓。

仙鹤寺,位于扬州南门大街。相传于南宋咸淳年间(1265—1274年)由西域补好丁(又译普哈丁)游历至此创建,明洪武十三年(1390年)由哈三重建,嘉靖二年(1523年)由住持哈铭重修。该寺大门东向,入内为一小院,院中有一南宋银杏树,高大挺拔,树叶繁茂。殿内宣谕台上有八

## 多姿多彩的阿拉伯风格建筑

---

角亭,内藏《可兰经》。其建筑风格既有伊斯兰文化特色,也溶进了仙鹤形布局的中国民族风格。该寺也是伊斯兰教早期传入我国的文化遗迹之一,它与广州怀圣寺、泉州清净寺和杭州凤凰寺同为我国伊斯兰教的四大名寺。

综上所述,古代沿着陆上“丝绸之路”和海上“香料之路”来华的穆斯林商人,是沟通中外文化交流的友好使者。连同上述在内分布在我国各地的清真古寺,既是我国人民与阿拉伯各国人民友好往来和传统友谊的历史见证,又是中阿文化交流的重要史迹。

## 第二章 中国四大发明对世界文明的贡献

中华民族的辉煌创造力,体现在多方面的突出成就中,四大发明即是其中之一。当16、17世纪之交欧洲耶稣会士踏上中华国土时,面对中国古代科学技术的光芒,立即由衷发出“古代中国人是伟大的创造者”的惊叹。四大发明是中华民族奉献给世界的伟大科技成果,并且改变了整个人类的历史进程。

造纸术的发明与外传,改变了文化信息传播因材料范围受到限制的困难。雕版印刷术是世界印刷技术史上的一项创举,印刷术的发展,促使图书的价格便宜,数量增多,普通人也能开始阅读,欧洲文学的真正历史也是自14世纪开始的。火药的发明及其后火炮火器的使用,在城市市民阶层的反封建斗争中发挥了极大威力。指南针的使用,为远航和探险成功创造了有利条件,地理大发现和殖民地的建立,导致资本主义世界出现,促使资产阶级成长壮大和封建贵族没落衰亡。

从公元5世纪至16世纪文艺复兴运动之前,欧洲处于

## “蔡侯纸”的发明

---

愚昧无知的“黑暗时代”，故中国四大发明传至欧洲，对欧洲社会发展和科学技术进步产生巨大推动作用，为欧洲科学文明的新世纪带来黎明。四大发明巨大的科学、文化价值，迄今仍为世界所公认。

### 一、“蔡侯纸”的发明

公元 105 年是人类文明史上划时代的一年。这一年中国的蔡伦总结了西汉以来用麻质纤维造纸的经验，改进造纸方法，用树皮、麻头、破布、旧渔网等作原料，生产出质地精良、轻便而价廉适用的纸。此为世界上首次用专门方法，有目的制造出来的植物纤维纸，蔡伦将他的造纸发明献给了东汉皇帝。由于蔡伦被封为龙亭侯，所以人们又称这一发明为“蔡侯纸”。在中国人民的心目中，蔡伦与造纸发明是密不可分的，蔡伦也就被后人尊奉为造纸之神。传说唐代时曾在河南某地发现过一只石臼，相传是蔡伦最初用来浸解破布、渔网等造纸原材料用的。后来举行过隆重仪式后，该石臼被运到首都，置于御内。

“蔡侯纸”的出现，在造纸术发现史上是一件大事，它标志着纸张最终替代竹、帛而成为主要的书写材料。到东汉末年，造纸业已成为独立的行业。在蔡伦之后，东汉末年又有左伯（字子邑，故又称左子邑）对造纸方法作改良，这种左伯纸被赞誉为“子邑之纸，研妙辉光，伸将之墨，一点如漆，



伯英之笔,穷神尽思”。但此人是如何改进造纸法的史籍难找。

1933年有人在新疆罗布淖尔西汉烽燧遗址发现麻质白纸,1957年5月8日,我国考古工作者又在陕西省西安市郊区灞桥一座西汉墓葬中,发掘出用麻绳头、破布、旧渔网等废旧麻料制成的植物纤维纸,这是世界上最早的纸,因而被命名为“灞桥纸”。该纸的出土被更改了结论,把中国造纸术的发明年代推前到西汉汉武帝刘彻(公元前140年至公元前87年)年间,此时我国已经掌握了植物纤维的造纸方法,比“蔡侯纸”提早了250年。尽管如此,但上述一些纸可能不是有目的专门制造出来的,仅是处理植物纤维时(如沤麻等)的一种副产品,充其量只是植物纤维造纸术的前身。

蔡侯纸发明以后,由于中国地域辽阔及交通不便等原因,未能及时传播到各地去,老式的简牍、缣帛等和植物纤维纸并存,全部用植物纤维纸取代,约持续了好几百年。晋时造纸术又有明显进步,造纸原材料多样化,各地可就地取材,用当地原料生产各种纸张,同时已有染成颜色的纸张问世。唐宋时代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文化事业的繁荣,加上雕版和活字印刷术的问世,促使造纸业有更大发展。唐时宣州府泾县(今安徽省泾县西)生产出来的宣纸,成为“文房四宝”之一。这种纸柔软、均匀,洁白细密,吸水性好,质地坚韧,颜色不易变色,宜于保存,书法家爱在宣纸上挥毫。

## 环球旅行两千年

唐时已经有了彩色纸,表明纸张在磨光、印花及染色等工艺方面有了长足发展。元明时,造纸工业不仅遍及全国,而且用于造纸的原材料不断扩大,造纸的制造方法不断完善,纸张的品种和质量也有很大提高。中国的造纸术首先向周边国家传播。

## 二、环球旅行两千年

公元6世纪时,造纸术开始传往邻邦朝鲜、越南和日本,并开始传播到世界各地。朝鲜所产的高丽纸(又名“韩纸”和“高丽贡纸”)久负盛名,谷应泰在《博喜要览》云,高丽纸“发墨可爱,此中国所尤,亦奇品也”。乾隆期间中国民间亦有仿制高丽纸者。

中国造纸术南传至越南的交趾地区后,交趾人亦有所创造。他们先是以谷树皮造纸,后来发展到用香树皮造纸,交趾盛产蜜香树,用其皮所造的蜜香纸,微带褐色,其纹如鱼子,香而坚韧,水浸不烂,质量极佳。西晋太康五年(284年)大秦(罗马)曾献蜜香纸3万幅给晋,估计就是交趾所产之纸,因为那时西方国家还不会造纸。

日本人学会造纸术比朝鲜人晚,但比阿拉伯人要早100多年,而且所造纸张种类达100余种,其中以美浓、石川、高野山纸最出名。据记载早在唐建中元年(780年)时,第16次遣唐使来华,使者兴能带来的纸“似茧而泽,人莫

识”。其中的两幅纸后来为五代文人陶谷见到，他对此描绘道：“一云女儿青，微紺；一云卵日光，白滑如镜面，笔至上多褪，非善书者不敢用，意惟鸡林纸似可比肩。”说明其纸张质量之好，已非同寻常。

造纸术经中亚传入阿拉伯世界，不但纯属偶然，而且还有一点传奇色彩。唐玄宗天宝十年(751年)七月，唐朝将领高仙芝(任安西四镇节度使)俘获了石国(今塔什干)国王。后王子逃走，并向“诸胡”告状。于是，“诸胡”就暗中引大食军队(阿拉伯军队)进攻高仙芝。两军在咀罗斯(今哈萨克斯坦境内的江布尔城)附近的阿特拉赫交战，相持5日，后因唐军葛逻禄部的倒戈而被阿拉伯军击溃，高仙芝几乎全军覆没。在那些被大食军俘去的中国士兵中，除了绾绢机杼、金银匠、画匠外，还有造纸、造武器和造工具的工匠，他们被带回撒马尔罕(今乌兹别克斯坦境内)后，就把造纸方法告诉了阿拉伯人，阿拉伯人学会以后，便在撒马尔罕建立起造纸厂，这些中国工匠就成为阿拉伯帝国造纸工业的开山鼻祖。

撒马尔罕生产的纸张，除满足当地需要外，还成了大宗出口产品，一直到11世纪，在阿拉伯世界仍保持着很高的地位。这显然是和中国工匠指导操作分不开的。794年，在哈里发的首都巴格达也开设了规模较大的造纸厂，据说其中也有不少中国工匠。

随着造纸质量的不断提高和纸张需求量的增加，阿拉

伯半岛东南的蒂哈玛在 9 世纪时也办起了造纸厂,原料取材于植物纤维。不久,叙利亚的大马士革又办起了造纸厂,所生产的纸在好几个世纪里都是出口欧洲的主要商品。因此,欧洲人一般都将纸称为大马士革纸。从马可·波罗时代起直到 1885 年的一段时间里,破布造纸都被认为是撒马尔罕的阿拉伯人发明的。直到 1885 年,经维也纳大学教授威斯特第二次对中国出土古纸进行显微分析,才证明这种棉质纸确系蔡伦所发明。在 794 年巴格达设立造纸厂前后,用植物纤维造纸的方法流传到一向生产苇纸(芦苇劈开,晒干,压平后使用)的下埃及。此后,埃及文书使用苇纸、羊皮纸的比例逐渐减少,而代之以中国式纸张。

欧洲最早的纸面文件,出现于意大利的西西里,它是 1109 年从北非传人的。这一年西西里国王罗哲尔一世用阿拉伯文和拉丁文书写的一道法令,被认为是欧洲最早的纸本文件。而纸张从西西里传到意大利的另一城市热那亚,居然花了近 40 年时间,如今在热那亚档案库内有一纸本文件,其年代为 1154 年。

1150 年,在阿拉伯人统治下的西班牙开始造纸。这被认为是欧洲的第一个造纸工厂,而此时离蔡伦发明造纸术已整整 1000 多年了。尽管造纸术经伊斯兰国家传入了欧洲,但其速度并不很快,规模也不大。1221 年,意大利统治者腓特列二世根据教皇的旨意,曾禁止用纸张书写公文。但是,这一禁令并不怎么有效,纸张的需要量也并没有因此

而下跌。1276年建立在蒙第法诺的意大利第一家造纸厂，到14世纪时已成为欧洲的纸张出口基地之一。14世纪初，纸在欧洲还很少见，常由大马上革和西班牙输入，在意大利新建的三家纸厂也生产少量纸张。撒马尔罕的造纸术，其工艺已经成熟，质量也已稳定，13世纪由阿拉伯人传授给西班牙与意大利人的造纸术，和他们8世纪所学来的完全一样，也就是说欧洲最早使用的纸，与500年或更远以前中国雕版印刷用纸，也无实质性区别。

1320年，德国的科隆和梅因兹等城市也有了造纸工厂。到14世纪末，意大利、法国、西班牙和德国等都已能生产纸张，并已经代替羊皮纸而成为通行的书写材料。从15世纪起，以德国为中心的造纸法继续自东向西传播。不久，奥地利、俄国、英国以及一些北欧国家相继出现了造纸厂。到16世纪时，纸张在欧洲已广泛流行。

美洲大陆所用的纸张一向依靠欧洲输入，造纸厂的出现是16和17世纪的事。墨西哥因得益于西班牙的传播，在1575年开始有了美洲最早的纸厂。美国到1690年方在费城开始造纸。而大洋洲则到1868年才在澳大利亚的墨尔本出现造纸业。由此可见，经过了2000年漫长的环球旅行之后，蔡侯纸才最后传遍五大洲。

### 三、法国蔡伦纪念馆

纸张的广泛应用,为文化的传播和保存提供了极为有利的条件。在率先掌握造纸术的阿拉伯帝国,各地的清真寺都附设有图书馆和学校。到10世纪时,巴格达、摩苏尔、设拉子、巴士拉和门夫等地都成立了学校和图书馆,成为阿拉伯帝国的文化中心。在阿拔斯王朝哈里发河论·拉西德时代,阿拉伯人就已着手进行翻译工作;到哈里发马门执政时,又成立了由科学院、图书馆和译学馆组成的“智慧宫”。译学馆专门翻译希腊文、叙利亚文、波斯文和梵文的各种著作,而撒马尔罕和巴格达等地生产的纸张又为翻译工作的大规模展开提供了物质基础。古希腊亚里士多德、柏拉图、希波克拉特等人的许多名著,就是先被译成叙利亚文,再被译成阿拉伯文而传世的。古希腊的许多科学著作之所以能长期保存下来,几乎全赖阿拉伯文译本,然后通过阿拉伯人的介绍而为中古时期的西欧所了解。新教的传播以及大量佛经的流传,靠的也是纸张。

纸张之所以能造福于人类,还在于它价廉物美,使用方便。一小卷纸可以代替整车的竹木简,价格便宜,使穷人也有了抄书读书的机会,于是知识很快得到了普及和传播。纸的大量生产和广泛应用,对人们的教育、政治、商业、文化等日常生活也带来了极大的便利。例如,纸张的发明使流

通货币发生了新的飞跃,即从笨重的金、银、铜币变成了轻巧的纸币,其携带、交换和流通更为方便。据说中国唐代就已出现过一种版印的纸币“飞钱”,到宋元时纸币已经很多。明时上面盖有印章的宝钞的纸质和印刷更为精美,犹如艺术品。欧洲旅行家到中国来最早接触的印刷物就是纸币,马可·波罗等人曾对此作过详细的记载。

欧洲人知道纸牌是在14世纪末。他们最初玩纸牌的形状、图案大小和数目均和中国相同,因此被认为元时输入欧洲的。纸张又是理想的包装材料。根据1040年一位波斯商人的记载,埃及很早已使用纸作包装材料了,在开罗卖菜和香料的小贩,都随备纸张包扎物品。纸张又是印刷的前提。印刷术一经发明,更推动了世界文化的发展。

从公元5世纪开始至16世纪文艺复兴运动之前,整个欧洲上空乌云弥漫,是个没有医院、没有学校、没有科学的世界,人们生活在愚昧无知、社会停滞不前的漫长黑夜之中,史书上称之为“黑暗时代”。中国这四大发明传入欧洲后,起到临产催生的作用,从而产生了文艺复兴运动,为欧洲科学文化新世纪带来了黎明。从这一意义上讲,纸张对西方文明进程的影响,对推进全人类文化发展的重大作用,无论怎样估计都不会过分。蔡伦由此受到世界各国人民的尊敬和怀念。

法国人民尊重历史,为缅怀蔡伦为人类社会所作的杰出贡献,特在法国中部安贝尔市一个古老造纸作坊旁,建起

蔡伦纪念馆。这一造纸作坊依然采用手工操作，作坊旁清澈的溪流推动着缓慢滚动、长满青苔的水轮，所发出的吱吱唧唧的响声，使人联想到已经流逝的漫长岁月，那沉重木锤敲击着的石臼声，犹如许多个世纪留下的回声。旅游者为了抒发思古之幽情，边参观边掏钱购买这粗厚结实的纸张，带回家去留作纪念。

蔡伦纪念馆内陈列着许多从中国物色来的早期汉字木刻板，很多用古老纸张印刷成的中国线装书籍，还有世界各地在不同历史时期所出产的纸张样品。纪念馆四壁所挂的巨型壁画，反映出世界造纸业的发展过程，纸张和造纸术从中国传入西方的年代以及路线图，同样给参观者留下极其深刻印象。

### 四、人类文明史上划时代的发明

中华民族对世界文明的发展作出了许多伟大的贡献，印刷术便是其中之一。正是印刷术的发明和传播，孕育了近代文明，导致了科学文化的巨大飞跃，堪称人类社会的“文明之母”。印刷术发明经历了雕版印刷和活字印刷两个阶段。中国雕版印刷术的发明时间，学者们看法不一，有隋文帝开皇13年（593年）、770年以前、唐玄宗（712—756年）时期等。后来学者们一致同意发明于唐朝，具体年代说法也不一，较多意见认为大约发明于唐太宗贞观十年（636



年),问世以后推广和发展很快,到9世纪时已成为一种新兴的重要手工业部门,对人们的经济活动和文化生活起很大作用。雕版印刷一般选用纹质细密的坚实的木材为原料,一般都是梨木,大致的工序为:刻工们把写在薄而透明纸上的原稿,贴在板上,粘合为一,使字成为反体,然后将这层纸揭去,反体形式的字迹清晰地留在木板上,刻工们便以熟练的手法,使用锋利的刻刀刻写,即成雕版。然后印工们把蘸有墨的刷子进行印刷,使字迹刊印在纸上。一人可在一天内印出2000张。每一印张印好后对折起来,使空白面在内,折缝在书的外边,另一边供穿线装订,把散页订结成册。

由于刻字印刷比手写传抄优越百倍,因而被不断推广传播。早期的印刷主要在民间进行,大致用于如下几个方面。其一为宗教印刷,如大量印刷佛像和佛经等。在敦煌发现的《金刚经》,刻印于唐咸通9年(868年),是由王玠为了替父母布施而刻印的,该书内容记述佛祖和他弟子须菩提的谈话,讨论一切皆空道理。书前还附有刻缕精美的版画佛像,是早期刻书者最喜欢刻印的一本书,该书为现存中国最早的印本书,但已于1907年被斯坦因盗运去伦敦;其二为文学印刷,刻印诗集、音韵书和教学用书。唐代著名诗人的诗作已刻印成书广为流传。唐长庆四年(824年)诗人元稹为白居易《长庆集》写的序文中说到,有人拿白居易诗的写本和印本在街头叫卖或换取酒茶;其三为科技印刷,用

于历法、医药等科学技术书籍的印刷。唐文宗大和年间(828—835年),四川和江淮一带民间每年“以版印历日”,在市场出售,以致不等朝廷颁新历,“其印历已满天下”。可见在唐朝后期雕版印刷已相当普遍了。雕版印刷术为我国印刷史上的主流,迄今流传下来的许多古籍大部分是雕版印本,即使在活字印刷术发明后,在相当长时期内雕版印刷仍是古代印刷的主要形式,长期停留在手工业阶段很少有变化。

然而,一部字数众多的书籍,其雕版往往要耗资数年时间,非常不便,效率低下。宋庆历年间(1041—1048年),平民毕升(?—约1051年)在总结前人和当时雕版印刷术的基础上,发明了胶泥活字印刷术。宋朝科学家沈括,在他的著作《梦溪笔谈》一书中,对毕升的发明作了详细的记载,尽管毕升发明活字时,沈括只是十几岁的小孩,但其真实可靠性犹如亲眼所见一般,后人未曾有过异议。沈括记载的印刷的顺序大致如下:先用胶泥刻字,用火烧硬后变成活字,活字排满版后用火烘热,使松香和蜡熔化,铁板冷却后活字就固定在板上,即可上墨印刷。两块铁板交替使用,一板印刷,一板布字,缩短时间,效率就提高很多。如果印上几百、几千册,其速度就更快。毕升活字印刷的基本原理,与近代盛行的铅字排印方法完全相同。活字印刷省字省力,经济方便,大大提高工作效率,是一项伟大的发明,在中国和世界印刷史上都是一项创举。欧洲最早的活字印刷品为德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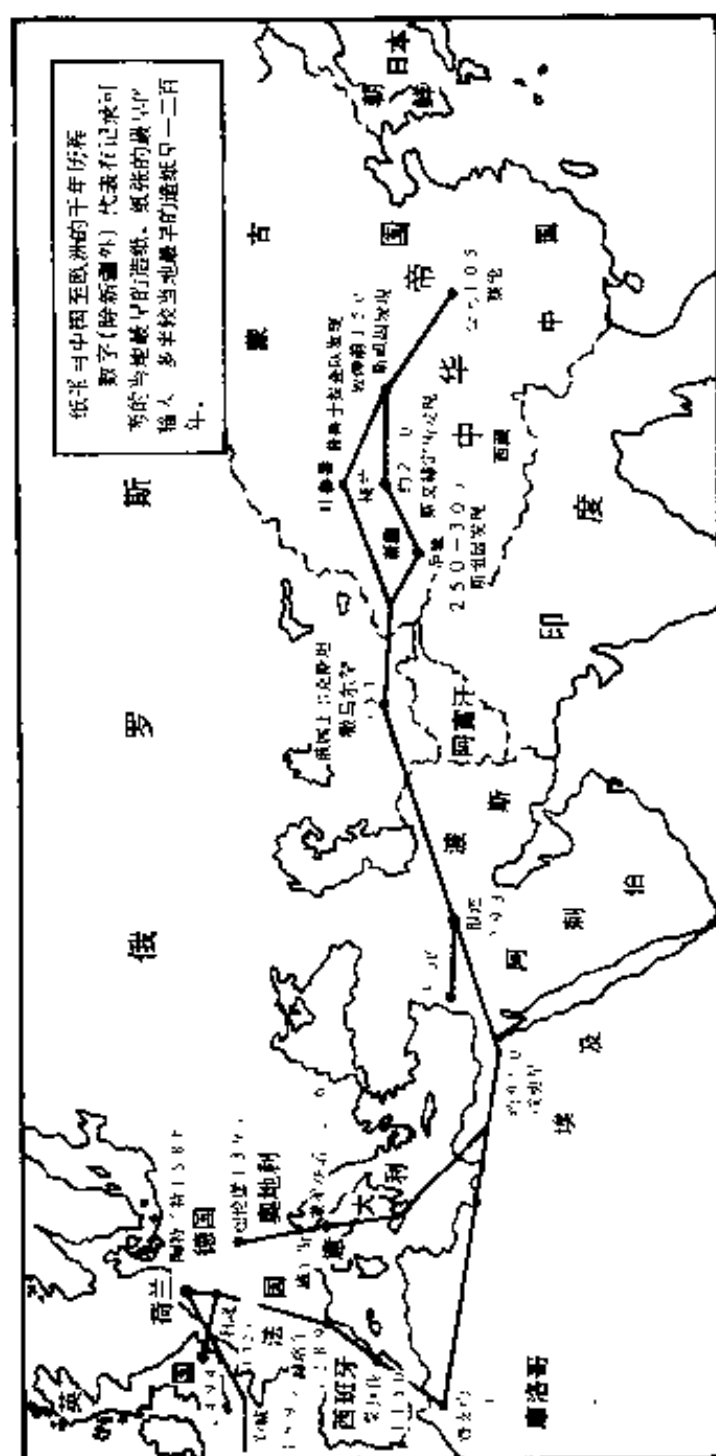
人约翰·谷腾堡于 1456 年印刷的《圣经》，毕升发明的胶泥活字印刷比他早了 400 多年。

### 五、印刷术的向外传播过程

中国印刷术发明的过程，也是它向外传播的过程。越南、朝鲜、日本等亚洲国家与中国毗邻，因而也就成了中国印刷术最初的受惠国家。中国印刷术传入越南，促使越南文化教育事业有很大发展。据史料记载陈朝元丰年间（1251—1258 年）木印的户口帖子，为越南历史上首次有记载的印刷品。陈英宗兴隆三年（1295 年）时，又从中国元朝“收得《大藏经》回留天长府，副本刊行”。过了数年又印行法事道场新文，及公文格式颁布国内。19 世纪初叶，旧阮京城顺化取代河内成为新的政治中心，刻书业随之有很大发展。越南后黎朝的梁如鹄于 1443 年、1459 年两次赴明朝，学习中国人的刻书方法，回国后传授于乡人，依样仿刻经史版本，印行于世，使越南 500 多年来的雕版之术都受他影响，功不可没。越南刻字工们为纪念其功绩，均尊奉梁如鹄为刻字祖师。

我国雕版印刷于北宋时传入朝鲜。当时朝鲜的执政者显宗皇帝派遣使者来中国求请雕印佛教典籍《大藏经》。宋朝真宗皇帝慷慨无价赠送，前后不下六七部。在这基础上，朝鲜也开始了雕版印刷过程。11 世纪时，朝鲜不仅能刻印

## 印刷术的向外传播过程



选自(美)卡特:《中国印刷术的发明和它的西传》一书。  
商务印书馆, 1957年12月版, 第99页。

工程浩大的《大藏经》，而且还能刻印多种儒家经典和医书，这些印书的模本都是由中国运去的。后来，中国宋代活字印刷也传入朝鲜，朝鲜人称之为“陶活字”，1395年朝鲜印成了自己的活字印刷本《通鉴纲目》。值得大加赞赏的是，朝鲜人运用自己的智慧，推陈出新，在毕升胶泥活字基础之上，发明了铜活字和铅活字。其制字方法大致如下：先用桦木刻字作范本，然后用海边沙土铺在盘中，将木刻字压印在沙土上，造成阴文字形浇铸。上面放一有孔的盖，铜汁的浇铸由孔注入，待冷却后便成活字。朝鲜文字的字模与欧洲大不一样，欧洲人铸造的活字因大小一样而自然排列在一起，而朝鲜活字因大小不一而很难排列在一起，需用蜡版或排在竹架内，由此揭开了世界印刷史上用金属浇铸活字的崭新一页。朝鲜人以1403年书籍院实际工作年份为始，该年成为印刷史上一个新时期的开端。高丽人所创造的金属活字，比德国用金属活字和中国用铜活字都要早。朝鲜的这一活字印刷首先传回中国，后又传到日本，成为中朝文化交流的又一佳话。“文字结构最不适合于活字印刷的国家，却也就是首先创造和发展活字印刷的国家”，这在世界文化事业发展史上也是十分有趣的史实。

日本与中国很早就有了交通。大化革新后，日本全国上下掀起了一股学习大唐文化的热潮，政府多次派“遣唐使”、留学生及僧侣到唐朝京城长安学习，回去时都携带大批中国文物典籍，其中就有唐朝雕版印刷的书籍。称德女



中国古代纸牌。

活字印刷已经传入朝鲜和欧洲后,才经朝鲜和欧洲两条路再传入日本。

天皇统治时(748—769年),日本仿效中国开始自己刻印雕版书。称德天皇是个虔诚的佛教信徒,为求吉利长寿,她命令用雕版印刷100万张经咒,分置于100万座小木塔里,直到770年,方才大功告成。称德天皇并没有因此得到永生,却在经咒刚印完之际辞世了,但是她却在无意中为日本的印刷事业做了一件大好事。经咒每张长约18英寸,阔2英寸,纸上共分30行,每行5字,至今在日本的法隆寺内保存着许多原刻的经咒和安放经咒的经幢。现今英国大英博物馆和德国莱比锡博物馆也藏有日本经咒4张。日本的活字印刷较晚,只是在中国

印刷术向西方的传播比较缓慢。这主要有两个方面的原因：一是西去的交通较为困难；二是地处中国和欧洲之间的阿拉伯国家长期拒绝中国的印刷术，认为印刷用的刷帚是用猪鬃做的，用它来刷印神的名字是莫大的亵渎。随着蒙古人的西侵和十字军的东征，中国与欧洲有了一个正面接触的时期，中国的印刷术也在这时开始传入欧洲。有趣的是，中国印刷术人欧是以纸牌为其通行证的。

纸牌起源于唐朝末年，纸牌式的骰子叫叶子格，如果这一论点成立，那末这就是中国早期雕版印刷术之一。到了宋代，叶子格的演进向两个方面发展，一方面继续印在纸牌上，但花样复杂，图案也更丰富多彩，成为中国及欧洲的纸牌祖先；另一方面刻在骨头或象牙上，但工艺复杂，制作较难，所以在相当长时期内仅是一种简单的骨牌，后来有一种以麻将牌之名传到西方。至宋朝时纸牌印刷花样繁多，纸牌游戏在民间大为流行。元代以后纸牌开始在欧洲出现，纸牌一传入欧洲，便不胫而走，很快便在德国、西班牙、卢森堡、意大利、法国等国风行起来，许多人整天埋首于纸牌中，乐此不疲。巴黎市长担心这种玩乐之风影响生产，不得不下令禁止工人在工作日玩纸牌。但此风还是愈演愈烈，连教士也加入到这一行列中。1404年，伦格里宗教会议通过了禁止教士玩牌的决议。1423年，圣·伯尔拿站在罗马的圣彼得教堂的门口，向听众发表反对玩牌的宣讲，历数玩牌之危害，听众为之感动，纷纷奔回家中，将纸牌拿到广场上

焚毁。

纸牌是欧洲最早雕版印刷物的一种，宗教图像印刷和纸牌印刷齐头并进，由此推动了欧洲印刷业的产生。14世纪的欧洲充满生气，艺术从千年长眠中苏醒，自由精神遍布各地，欧洲雕版印刷物是一幅名为1423年纽伦堡的圣克里斯多福像，它使人立即想到了中国印刷物。和中国印刷物一样，它的图像下面也附有二行文字说明：“不管哪一天你看到了圣克里斯多福的像，哪一天你就可以不受死亡的毒害。”另外，把印有图像和印有文字的单张粘订成册，这也与中国线装书籍只印一面，对半折叠起来，没有印的一面叠在里面的方法一模一样。

欧洲雕版印刷兴起后，意大利、德国、荷兰先后成为最早的基地。威尼斯在15世纪中叶是欧洲印刷业的中心，新建立的印刷所近百个，出版的雕版书籍质好量多。据史书记载，当时在威尼斯从事印刷的帕格尼尼神父曾出版过一本欧洲最早的阿拉伯文的《古兰经》。16世纪中叶阿曼的木刻，栩栩如生地刻画了一个早期欧洲刻工刻制雕版的情形，这幅木刻画可以看作是当时欧洲雕版印刷业兴旺发达的反映，它从中国传入的痕迹也十分明显。

欧洲的活字印刷也直接受中国活字印刷的启发。毕升发明的胶泥活字似乎未能广泛流行，而后木刻的活字却流传甚广。敦煌发现的维吾尔文木刻活字证实，早在元代，木刻活字即已传入中业。传入欧洲的以这种木刻活字最为可



信,因为维吾尔文字与欧洲文字有相近之处,都可用字母活字。传播这种木刻活字的可能是那些经常来往于中国和欧洲之间的传教士、旅行家,他们将木活字带回欧洲,促使德国、荷兰、法国先后试验活字印刷。德国捷足先登,谷腾堡在1456年首先用活字印刷成欧洲文化史上第一部拉丁字母的《圣经》。他借鉴中国和朝鲜的活字印刷法,根据欧洲文字的特点,大胆革新,创造了字模、字母活字、压印机等活字印刷,促使印刷事业出现重大发展。

1477年,英国伦敦运用中国印刷术开设首家印刷店。在红白玫瑰战争(1455—1485年)废墟上建立起来的都铎王朝(1485—1603年)终于使英国形成了统一的语言文字,这就是英语。英语是在原伦敦方言基础上,吸取法兰西语和拉丁语词汇而形成的。中国印刷术传入英国后,对英国语言文字统一起了重大作用。对此英国学者威尔斯说:“纸起源于中国……随后印刷术也逐渐发展起来,从此全世界人民的精神生活进入了充满活力的阶段。在没有纸和印刷术的时候,传授知识只能点点滴滴的进行,而现在却像开闸的洪水一样在广大的范围内迅速地传播。在这种情况下,成千上万的思想家涌现出来了。”

### 六、书本不再是少数人独享的奢侈品

印刷术的输入、应用和推广,对欧洲科学文化的普及与

提高,就像文字对人类社会的影响一样重要。中世纪欧洲的主要书写材料是昂贵的羊皮纸,一部书需要羊皮几十甚至几百张。如《圣经》一册,得用羊皮 300 多张。如此昂贵的书籍,一般平民不敢奢望。欧洲人每人每年也只能抄写两本书,书成为少数上层统治阶级独享的奢侈品,知识仅为少数人所有。法国文豪巴尔扎克曾经说过:“中国人发明火药的时候,法国人还在用棍棒厮杀,中国人发明了印刷术,而法国人还不曾学会识字。”这虽然是巴尔扎克的文学语言,但也完全是事实。印刷术推广后,每个工人每年可印出 2400 本书,这就使书本从少数人手里解放出来,也把学术、教育从基督教修道院中解放出来,恩格斯对此指出:“印刷术的发明以及商业发展的迫切需要,不仅改变了只有僧侣才能读书写字的状况,而且也改变了只有僧侣才能受较高级的教育状况。”<sup>①</sup>工匠们在把自己的印刷经验记录下来后,便向更广的范围传播开去,成为推动整个社会科学文化发展的重要工具。印刷术的出现也为当时欧洲的宗教改革运动和反封建斗争提供了有力武器,对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确立和思想文化的交流传播起了极大的推动作用。

由此可见,中国印刷术的外传,实际上是一个国际性的文化大交流,它的影响是极其深远的。马克思对三大发明输入欧洲后所产生的巨大影响作了极其生动的描绘,他说:

---

<sup>①</sup>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7 卷,第 391 页。

“火药、罗盘针、印刷术——这是预兆资产阶级社会到来的三项伟大发明。火药把骑士阶层炸得粉碎，罗盘针打开了世界市场，并建立了殖民地，而印刷术却变成新教的工具，并且一般地说，变成科学复兴的手段，变成创造精神发展的必要前提的最强大推动力。”<sup>①</sup>

## 七、火药的发明与传播

火药是中华民族的四大发明之一。火药的发明跟炼丹方士有关，第一次把火药的配方记录下来的是隋末唐初的炼丹家和药物学家孙思邈。在他所著的《丹经内伏硫磺法》中，已提到了硫磺的“伏火”方法：把硫磺、硝石各二两的粉末放进锅里，然后加入三个烧红成炭的皂角，使之产生焰火。中唐炼丹书《铅汞甲辰至宝集成》已经提到“伏火矾法”，《真元妙道要略》已经提到“伏硫磺法”，以此推测，我国火药的发明不晚于唐朝初年，约在7世纪。火药发明以后，很快被应用于制造武器。唐朝咸通九年（868年）十月庞勋起义进攻宿州时，就曾以火箭射城外茅屋。宋代又出现了爆炸性的霹雳炮和铁火炮，杀伤力已很大。公元1126年，李纲（1083—1140年）就是用霹雳炮杀退金兵以解开封之围的。此后，火枪、突火枪等管形火器相继问世，预示着传统

---

<sup>①</sup> 马克思：《机器、自然力和科学的应用》，人民出版社1978年版，第67页。

的攻防器具盔甲、大刀、骏马等在战争中的作用开始减弱。管形火器提高了弹道的稳定性和射击的准确性，在兵器发展史上是个很大的突破，为近代枪炮的不断发展和完善奠定了初步基础。

我国发明的火药和火器，最先传入阿拉伯国家，以后又从阿拉伯传入欧洲。恩格斯对此指出说：“现在已经毫无疑问地证实了，火药是从中国经过印度传给阿拉伯人，又由阿拉伯人和火药武器一道经过西班牙传入欧洲。”

公元8世纪，阿拉伯帝国（大食）正处于极盛时期，疆域东起印度河流域，西临大西洋，横跨亚非欧三大洲。由于它与唐朝经常往来，炼丹术便从中国传入了伊斯兰国家，阿拉伯人才知道用硝。硝最初由中国传入西亚，被波斯人叫作“中国盐”，只用于治疗、炼金银和制造玻璃。13世纪初的伊宾拜尔在所著《医药典》中提到，埃及的老医生还称硝为“中国雪”。其他地区的人则称作“巴鲁得”，意为军用的硝，现今在阿拉伯文中则专指火药。由“中国盐”转变为“巴鲁得”，表明硝已从药用扩大为军用，并提供了硝自中国西传的路线。

火药的传播，很可能是通过海上贸易来完成的。当时中国的帆船已可抵达亚丁，这些帆船装备有火器，往返于阿拉伯和泉州之间。此外，阿拉伯商人在中国的许多城市和沿海港口极为活跃，他们也是这种新发明的最可靠的传递者。从较早的阿拉伯文抄本中得知，约在13世纪初，伊斯

兰国家就完成将硝用于配制火药、制作火器的试验。到 13 世纪后期,哈桑所著阿拉伯文兵书《马术和军械》则更明确记载了火药配方时“中国铁”的用量。可见,火药是由中国传入伊斯兰国家的。

随着火药的广泛传播,中国的火箭和火枪也传入了伊斯兰国家。据《马术和军械》说,当时阿拉伯有一种“契丹火枪”,枪头叫“契丹火箭”。稍后的另一种佚名阿拉伯兵书,也称当时陆战用的火枪和水战用的火箭为“契丹火箭”。由于当时阿拉伯世界称中国为“契丹”,所以传入的火器也都有契丹的名称。

与火药的传播方式不尽相同,火器主要是通过战争西传的。据史书记载,蒙古军曾西征中亚、波斯等地,在交战的同时,火器的制造和使用方法也传入阿拉伯国家。由于管形火器使用方便,杀伤力大,因而这些新式武器立即得到应用和仿制。13 世纪末至 14 世纪初,伊斯兰国家将蒙古人传去的火筒和突火枪加以改进,发展成了两种“马达发”,即“火器”的意思。

阿拉伯国家的文化对欧洲的影响很大,欧洲有关火药和火器制造的知识就是从阿拉伯人那里获得的。欧洲现存最古的一种火攻书《制敌燃烧火攻法》,就是在 13 世纪下半叶由阿拉伯文译成拉丁文,然后再传入欧洲的。此书用于军事上的方子有 14 个,其中 9 项谈火攻。另一种阿拉伯文写本《八十八自然实验法》,也经欧洲人译成拉丁文,其中的

许多火药方子与《制敌燃烧火攻法》相似。

## 八、骑士阶层被炸得粉碎

大亚力卑尔特和罗吉尔·培根是当时的欧洲著名学者、炼丹术士，他们在著作中都提到过火药，对于传播火药知识起过一些作用。但是，他们还不会制造火药，直到他们死后数十年，欧洲才有了火药。实际上，欧洲人是在和伊斯兰国家进行战争中才真正学会使用火药和制造火器的。据西方文献记载，法国、英国、德国和俄国使用火药、铁火罐、铁炮等，都在14世纪中期，具体地说，法国为1338年，英国为1340年，德国为1346年，俄国更迟至1382年。这一时期，欧洲各国与穆斯林进行了一系列的战争。在战场上，欧洲军队吃尽了火器的苦头。在1290年的阿卡之役（Acre，位于巴勒斯坦北部）中，马穆鲁克使用了92座抛石机，并用它来发射火球、火瓶和火罐，终于击毁了一切防御工事，迫使法兰克人撤出这座亚洲大陆的最后堡垒，宣告第8次十字军东征的彻底失败。战争使欧洲人学会了火药武器的制造和应用，并在英法两国的百年战争（1337—1453年）中迅速得到发展。与雕版印刷和造纸一样，西班牙和意大利也较早从伊斯兰国家获得了先进的火器。1326年，意大利人已掌握了火器的秘密，开始制造铁炮和铁弹，从此结束了欧洲没有金属管形火器的历史。

中国封建社会发明的火药和火器,经阿拉伯人传入欧洲后,便成为以城市为依靠的新兴君主政体反对封建贵族强有力的武器,对摧毁西欧骑士阶层起了决定性的作用,由此使社会发生巨大变革,正如美国学者德克·海德所说:“倘使没有纸和印刷术,我们将仍然生活在中世纪。如果没有火药,世界也许会少受点痛苦,但另一方面,中世纪欧洲那些穿戴盔甲的骑士们可能仍然在他们有护城河围绕的城堡里称王称霸,不可一世,而我们的社会可能仍然处在封建制度的奴役之下。……”从这一意义上说,火药的发明确实成了欧洲封建社会的“催命符”和预兆资产阶级社会到来的“助产婆”。另一方面,火炮的生产与使用需要力学,从而使力学成为近代科学的带头学科。

### 九、指南针的发明与应用

中国是世界上最早发明指南针的国家。远在 2000 多年前,我们的祖先就发现天然磁石具有指示南北方向的特性。最早的记载见之于《韩非子·有度》,上有“先王立司南以端朝夕”的语。在《鬼谷子·谋》中也有记载,有位郑国人带着司南到山中采玉,没有迷失方向的故事。那时的指南针是用天然磁石制成的,样子像一只勺,底圆,可以在刻着“二十四向”(将圆罗盘 360 度分成 24 等分)的“地盘”上来回旋转,当它静止时,勺柄即指南方。古人称此指南针为

“司南”。宋时人们经过对人工磁化和使用磁针两方面的探索,导致了指南针的发明和广泛应用。但是这一方法所得磁性较弱,实用价值不大。后来人们又用另一种磁性更大的人工磁化方法制成指南鱼,此后又在改进指南鱼的基础上,制成简便有效、具有实用价值的指南针。

中国在很早就发现了磁偏现象。沈括在《梦溪笔谈》中谈到,指南针常微偏东,不全指南的地磁偏角现象存在。哥伦布于1492年在发现新大陆的航行中,当发现地磁偏差现象时非常惊慌,以至不敢相信而未作记录。后来欧洲人才意识到这一点,并对罗盘加以改进。中国的这一发现也比欧洲人早了400多年。

指南针应用于航海是在北宋年间。北宋朱彧的《萍洲可谈》卷二明确记载有“舟师识地理,夜则观星,昼则观日,阴晦则观指南针”。南宋陈元靓在《事林广记》中还介绍了当时流行的指南龟,即将一块天然磁石安装在木刻的指南龟腹内,在木龟腹下挖一光滑的小穴,对准了放在顶端尖滑的竹钉子上,使支点处摩擦阻力很小,木龟便可自由转动以指南,此即为后来出现的旱罗盘的雏形。

早在唐代,中国船工已运用自己的智慧为航海作出贡献,据记载843年时,一艘中国商船首次开辟由日本嘉值岛至浙江温州的新航线,全程约6昼夜。元时中国海运更加发达,所开辟的南洋航线和北洋航线,将中国江南一带米粮源源不断运往大都(北京)。中国航海业的蓬勃发展,历经



元、明而不衰,宋代的造船数量已相当大,每年造船约 3000 艘,元时每年多达 5000 余艘,据意大利旅行家马可·波罗估计,中国每年上、下航行船只总数在 20 万艘以上。宋元时期,无论在造船数量和质量上,都体现出中国造船业的兴旺发达局面。宋元时期,中国已能制造远洋巨型海船,据摩洛哥大旅行家伊本巴图塔记载,中国船分为三等,最大者称为舰,张 3 帆至 12 帆,可载千人,有公私房间甚多,供商人乘客使用,并有盥洗室及其他舒服方便的生活设施。元代中国商人出海时为保证安全,多使用大海船,大都在泉州或广州制造。

元时在航海中不论昼夜阴晴,都已使用指南针导航了。明时郑和率庞大船队七下西洋能航行自如,也是娴熟地运用科学航海技术,依靠指南针来辨别航向。由此可见,指南针的发明和使用,也是造船和航海事业发展的产物。

关于指南针的装置方法,沈括在书中记载有 4 种:水浮法、指甲旋定法、碗唇旋定法和缕悬法,其中以单丝线悬挂在指南针中间为最好。最初,在航海时使用的水浮指南针,后来发展成的水罗盘称为“针盘”,由一名叫做“火长”的人专门掌管,成为船只在茫茫大海中航行的“千里眼”。

### 十、指南针的西传

由于指南针在航海中的应用价值极大,受到了外国航

海家的普遍重视而被采用。关于指南针西传的具体过程，迄今还未找到确切的文献记载。一般认为，大约于公元 12 世纪前后，阿拉伯人从海路最先学得中国指南针制作技术，而后再由他们传入欧洲，促进世界航海事业的发展 and 人类文化的进步。

宋代海外贸易比唐代更发达，专门管理对外贸易事宜的市舶司遍及东南沿海城市，如广州、泉州、明州（今宁波）、杭州等都设有市舶司。与宋朝进行贸易的国家很多，其中阿拉伯商人占了很大的比重。不少阿拉伯商人来中国后，长期居住在广州、泉州一带。有一位名叫蒲希密的阿拉伯商人坐船到广州经商，一住 5 年不归，以致其子远涉重洋前来中国寻找。有的阿拉伯人甚至终老中国。他们在同中国的贸易交往中，很自然地学得了指南针的制作技术，并用之于航海。后来经过阿拉伯人的媒介作用，指南针又传入了欧洲。

在阿拉伯文献中，最早提到指南针的年代要晚于 1125 年。1230 年，有个名叫穆罕默德·奥菲的阿拉伯人在其波斯轶闻集《故事总汇》中，记述了一个在航海中如何凭一尾用磁石擦过的鱼儿找到航路的故事。所谓磁石擦过的鱼儿，可能就是当时的测向工具——指南鱼。在郑和下西洋使用的《郑和航海图》末附有《过海牵星图》4 幅，向达先生对此说：“其时中国的航海家早已知道使用罗盘了。而印度洋上的航海家一直到 15 世纪末还是靠观察南半球可见的

南极星观察其他星宿高度的简单仪器来定航行方位。这和《郑和航海图》后面的《过海牵星图》颇有近似之处。”在欧洲,用拉丁语最早记载指南针的时间是在 12 世纪晚期。英国的斯蒂芬·F·梅森在其《自然科学史》中曾提及:“在 13 世纪,磁针罗盘在欧洲出现。”从这些材料得知,无论是阿拉伯还是欧洲,使用指南针的时间都晚于中国。

宋代用于航海的水浮指南针,使用时不易稳定。指南针传入欧洲后,欧洲航海家们采用更先进的支轴装置,用一根支轴的尖端固定住磁针,使磁针水平旋转,称旱针,使用起来比水针更方便,就不怕迷航了。随着航海事业的发展,人们要求随时知道船舶在海上航行的位置,于是促进了绘制线路和航海图的工作。航海需要地图,当时的欧洲地图,主要是依据 2 世纪托勒密的天文地理著作绘制的,谬误不少。由于指南针传入欧洲,地图的准确性提高了。航海罗盘全周 360 度,分为 24 等分,15 度为一向,是为正针。两正针夹缝间则为缝针,总共 48 向。此后,航海家们又有更详细的航海图问世。有了航海图,人们可以精确地计算船舶航海的日程和航海位置。这一切,也是使用中国罗盘所带来的成果。

### 十一、世界第一次开始缩小

指南针的发明及其应用于航海事业,使人类获得了全

天候航行的能力,人们有了在汪洋大海中昼夜航行的自由。驾驶着装有关指南针的航船,1487年,葡萄牙人迪亚士发现了非洲南端的好望角;1492年,哥伦布越过大西洋,发现了新大陆;葡萄牙人达·伽马经过好望角到达印度洋,开辟了新航线;麦哲伦完成了环球大航行。随着交通运输业和商业的繁荣,在社会的巨大变革中,指南针的传播及其应用,打破了欧洲中世纪的闭塞状态,引导资本主义走向世界。火药和指南针的应用和发展,构成后来的一“炮”一“舰”,成为帝国主义掠夺殖民地的工具。世界第一次开始缩小了,原先孤零零的不相联系的大陆和国家从此紧紧地联在一起。诚如一位外国学者所说的那样:“如果说火药的应用,促进了资本主义在欧洲大陆的胜利,那么指南针在航海上的使用,则帮助了西方资产阶级发现并征服了全世界。”

指南针的应用,促进了海上贸易的进一步发展,也加强了各国人民之间的友好往来和文化交流。科学家们受指南针磁力现象的启示,进一步研究认识了光、电、磁和机械运动之间的关系,为发电机的制造奠定了理论基础。人们又对电磁波进行了广泛探索,相继发明了雷达和无线电广播。指南针的发明应用,为欧洲科学文化的新世纪带来了黎明,进而也加速了世界文明的发展。

## 第三章 郑和下西洋与中外文化交流

### 一、七下西洋壮举与促进东方社会文明

15世纪上半期郑和下西洋的壮举,不仅在中国历史,也在世界历史上留下辉煌的一页。从明永乐二年(1405年)到宣德八年(1433年),明朝政府派遣郑和率领庞大船队,每次动用二万七八千人,船舶60余艘,云帆高张,昼夜星驰,在近30年时间内七下西洋,帆船遍及亚非30余个国家和地区,无论在政治、外交、经贸活动等诸方面都取得了很大成就。郑和下西洋在中外文化交流方面所作的杰出贡献,常为一些学者所忽略,其实本该是大书特书的。

郑和下西洋时秉承明成祖“恒遣使宣教化于海外诸番国,导以礼义,变其夷习”之旨,赍诏往谕,注重教化,在政治上广播仁义,几乎每到一地,“所至颁中华正朔,宣扬文教,俾天子生灵,旁达于无外”。在郑和下西洋过程中,不但充分展示其精神文明成果,使中华文化在西洋诸国得到广泛

## 七下西洋壮举与促进东方社会文明

传播,极大地提高了中国在国际上的地位,而且影响海外国家人民的精神生活,接受中国礼仪,改变落后的“夷习”生活习俗,促进社会的文明进步,在当时历史条件下,所起的进步作用是显而易见的。郑和下西洋也促进了中国与亚非各国间友好关系与经济文化的交流,出自对先进的中华文化和中华风物的仰慕之情,不少国家甚至“愿比内郡依华风”。

15世纪为世界航海史上的辉煌时代,郑和下西洋和西欧一些国家的重大航海活动都在这一世纪。郑和船队访问到达过当时的37个国家和地区,航程遍及东南亚、孟加拉湾、阿拉伯海、波斯湾、印度洋,曾环绕马达加斯加岛,深入到红海并访问了近莫桑比克境内的国家,其船队分支甚至绕过好望角,驶抵非洲西南沿岸。郑和船队远航次数之多,航程范围之广,船舶之大,人员之众,在当时都可称世界之最。郑和船队的远海航行,比欧洲人新航路开辟中津津乐道的三件事要早得多。例如,比由巴托罗缪·迪亚士率领葡萄牙舰队,从红海南下于1487年到达非洲极南端的好望角要早83年;比西班牙航海家哥伦布1492年发现新大陆要早87年;比葡萄牙人瓦斯科·达·伽马东航,于1497年发现从欧洲直通印度的新航路要早92年。郑和下西洋体现了中华民族前所未有的开拓进取精神,在开辟新航路、沟通商路,增强中国对外联系、扩大贸易、促进中外文化交流等诸方面,在世界航海史上应占有先导的光辉地位。

郑和下西洋开创华侨开发南洋的新时代。元时中国东

南沿海因人多地少,生计艰难,加上蒙古贵族劫夺压榨,因此很早就有人出海去南洋谋生,明代以前南洋诸岛上已居住有不少华侨。郑和船队下西洋声势浩大,打通了中国往南洋各地的海上交通,也极大地提高了中国在海外的声誉,使闯南洋谋生的人更多,明初海外的华侨社会渐成规模。虽明王朝厉行海禁,片板不准下海,但江浙、闽粤人民下南洋风气既开,到15世纪至17世纪时,南洋华侨人数增长之快,分布范围之广,都是以往朝代不能相比的。正是这一批批中国移民,把中国发达的生产技术和思想文化带到南洋各地,促进当地经济发展、文化繁荣和社会的文明进步。实际上这一时期成为南洋发展史上的重要时期,而这一切都与郑和下西洋有直接联系。

郑和下西洋推动中国与世界各地医药文化的交流。由于采办番药是郑和下西洋的主要经贸活动之一,故船队每到一地,常用各种办法收集和整理世界各地的药物栽种、药性、使用和医术等资料,并采办如丁香、脑香、木香、乳香、安息香、苏合油、没药、豆蔻、大风子、葶澄茄、翔羊、犀角、羚羊角、龙脑、血竭、乌木、苏木等药材。据统计在郑和下西洋过程中,各国向明王朝的贡药及郑和以物交换及采办带回的各类药物有20余种,充实和丰富了中国传统中医药的宝库,提高了中药的医疗作用,也为上述许多药材输入中国打开了通道。除此以外,如今在中国的一些植物中,有些是郑和船队从国外移植过来的,如海棠、蔷薇花、五谷树、沉香和

黄熟香等。当然，郑和船队在和各国人民的交往之中，也把中国出产的大黄、肉桂、樟脑、麝香等传到国外。

郑和下西洋增强了中国对亚非各国的认识，开阔了人们的眼界和对太平洋、印度洋地区的地理知识。郑和在亲身实践中所绘制的《郑和航海图》记载详尽，大多指明船舶的航向、罗盘针的度数、各国的方位、航道的远近、中途的停泊、沿线的礁石和浅滩等。凡船队经过一地，都给予一定命名，在 500 余个地名中，外国地名 300 多个，大多数是马来半岛、印度半岛和阿拉伯半岛沿岸地名。可以这样说，此为 中国现存最早一部描述亚非海域的精确航海图。

郑和船队远航时的随从翻译官马欢著有《瀛涯胜览》，费信著有《星槎胜览》，巩珍著有《西洋番国志》。上述三书所记都是作者亲身经历、所见所闻的第一手资料，大凡郑和远航活动过程、西洋各国政治经济、文化传统、山川地理、名胜古迹、气候物产、宗教信仰、民俗礼仪、语言文学等均有详尽的综合性介绍，成为后人研究 15 世纪“西洋”各国基本状况和国际关系的重要资料，是为后人留下的一份文化遗产，弥足珍贵。印尼、马来西亚许多学者在介绍自己国家古代史时，常常引用马欢等的著作，可见《瀛涯胜览》等古籍已经成为研究东南亚国家历史的珍贵史料。上述书中对南洋各国的民俗风情也有相当详细的记载，成为今人南洋史研究中的重要资料。例如费信在《星槎胜览》中记述满刺加国“气候朝热暮寒，男女椎髻，身肤黑漆，间有白者，唐人种也。



俗尚淳厚,民淘钓网鱼为业。屋如楼阁而不铺板,但用木高低层布,连床就榻。……”上述随郑和远航直接形成的三部著作,永远不会因岁月的流逝而褪色。

在郑和下西洋过程中,广大海外地区的物产传入中国,使中华文明更加多姿多彩。据马欢和费信在著作中涉及,郑和在海外见到的珍稀动物有60多种,植物有50多种,经过引进、推广和繁殖,逐渐成为中国物产。例如胡椒在中国原先是稀世珍品,经大宗输入后,已成为中国人民日常烹饪中的重要佐料。郑和下西洋也促进中国玻璃制造业的发展和突破,许多跟随宝船来华的阿拉伯玻璃工匠,介绍玻璃制造新技术,传授烧制钠钾玻璃新工艺,从而引起玻璃制造工艺的改革,各种新型、美观、实用的玻璃器皿试制后成批生产,日渐普及应用,使玻璃不再成为稀罕之物。

明代著名的宣德青花瓷,其某些原材料也是由郑和船队从东南亚各地带回的。例如从苏门答腊带回的苏泥,渤泥国的渤青和回青,文莱、苏门答腊的紫绯、胭脂石,暹罗的风磨铜,三佛齐的紫石,琉球的澜砂,天方国的卤砂等,都是明代发明多彩瓷器的重要原料。青花瓷器在永乐、宣德年间的产量之大,品种之多,工艺水平之高,均已达登峰地步。中国精美瓷器大量销售亚非国家,促进了社会的文明进步,也扩大了中国文化在海外的传播。张燮《东西洋考》载,加里曼丹文郎马神人民“初盛食,以蕉叶为盘,及通中国,乃渐用瓷器。又好市华人瓷器,画龙其外,人死贮瓮中以葬”。

无论从历史文献的记载和考古挖掘中均能充分证明,在当时亚非各国人民的日常生活中,瓷器已成为不可缺少之物。

### 二、16 国外交使节访华

在郑和下西洋之前,东南亚以及南亚各国之间,随着其势力的此消彼长,以及各国历史短长、生产发展水平、宗教信仰的不同,彼此间的纷争、磨擦不断,并不时引起冲突和战乱,严重影响东南亚地区的和平安定局面,也影响中国与该地区的交往。郑和使团的任务之一即是从中进行斡旋调解,支持正义,扶正压邪,消除隔阂,平息冲突。与此同时,郑和也通过敷宣教化,扶助弱小民族,抑制强暴,即在各国之间传播不可以众欺寡,以强凌弱,以共享天下太平之福的仁爱思想,并为发展中国和亚非国家的友好关系而努力。郑和推行睦邻外交,每到一地,立即向当地统治者转交明朝皇帝的信件,开读诏书,赏赐礼物,热情邀请许多国家元首访问明朝,这一为“扫胡元之弊习,正华夏之彝伦,振纲常以布中外,敷文德以及四方”所作的努力,取得了明显效果。

永乐二十一年(1423年)九月,郑和第六次下西洋归来不久,“西洋(可能为琐里国)、古里、忽鲁谟斯、锡兰、阿丹、祖法儿、刺撒、不刺哇、木骨都束、柯枝、加异勒、溜山、喃渤利、苏门答腊、阿鲁、满刺加等 16 国,或初次,或再次,共遣使千二百人贡方物至京”。亚非 16 个国家 1000 多外交使

节同时来华访问,这在封建时代的中国外交史上是罕见的,亦是郑和下西洋所取得的辉煌外交成果。有些国家的王公君长,往往在郑和船队返航时,便亲自率领他们的嫔妃、儿女或者派遣使节,携带方物前来中国向明朝进贡。各国代表团在华期间,所到之处均受到明朝政府官员的礼遇。明朝政府对这些僻居荒寂,尚处于部落或奴隶社会阶段的首长或使臣,非但不歧视怠慢,而且还专门制定有番王朝贡礼、番国遣使朝贡礼、番国进贺表笺礼等,按一定规格进行隆重热情的接待。

在永乐六年至十八年(1408—1420年)的12年中,在郑和船队所到达的诸多国家中,就有渤泥、满刺加、苏禄、占麻刺朗4个国家的国王,沿着郑和所开辟的航道,不远万里来中国访问,其中渤泥、苏禄、占麻刺朗三国国王在访华期间病逝,长眠中华大地,为发展亚非国家与中国人民之间的友谊而献身,成为中外友好关系的象征及中外文化交流的历史见证。

### 三、渤泥国王体魄托葬中华

郑和第一次下西洋回国后,沿途所到各国纷纷派遣使臣来中国通好,其中较早来访的外国国王则是渤泥国国王麻那惹加那乃。渤泥国,在我国古化文献里曾有婆利、佛泥、渤尼、婆罗、文莱等不同称呼和写法。渤泥自古就是加

里曼丹岛上的一个古老大国,中国宋代时它曾统治着 14 个州,其首都“以版为城,城中居者万余人”。近代时,西欧殖民主义者入侵,并实行分而治之政策,完整而统一的渤泥国被肢解为文莱、沙撈越、沙巴三邦。1984 年 1 月 1 日宣布独立,成为一个独立的主权国家,其国名为文莱达鲁萨兰国(Negara Brunei Darussalam),“达鲁萨兰”源于阿拉伯文,意为“和平之地”和“安乐世界”。

早在 6 世纪初,渤泥就与隋朝有往来。唐总章二年(669 年)渤泥国开始与中国互通使节。宋元丰五年(1082 年),渤泥使节到中国访问,受到热情接待。明朝建立后,朱元璋于洪武二年(1369 年)八月主动派遣都监院御使张敬之、福建行省都事沈铁出使渤泥国,进一步增进两国人民的友谊。第二年,渤泥国王马哈漠·沙派专使,随张敬之赴中国回访,受到朱元璋的厚待。永乐三年(1405 年)麻那惹加那乃继位后不久,便遣使来华,受到明成祖热情款待。明成祖也派官员去渤泥国,册封麻那惹加那乃为王,并赐印诰、敕符、勘合、锦绮、彩币等礼物。

明永乐六年(1408 年),渤泥国王麻那惹加那乃亲自率王后、王子及王弟、陪臣 150 余人组成的庞大使团,乘坐水舟,历经两个多月的旅途艰辛,专程来华访问。消息传来,明成祖特派御使太监张谦前往福建迎接。渤泥国王一行在泉州港登岸后,便受到明廷特使和当地官民的热烈欢迎。稍事休息后在张谦陪同下前往京都南京,沿途州县官吏设

宴迎送。

八月乙未日,京都城内张灯结彩,笙箫鼓乐,一派喜庆景象。当年轻英武的国王及其随从人员进入城内时,人们鼓乐齐鸣,欢声四起,以表达对来访贵宾的欢迎之情。明成祖在内宫华盖殿设宴款待,接着又在金銮殿奉天门举行盛大国宴为渤泥国王洗尘,宾主亲切交谈,这位年轻国王向朱棣表示:“天以覆我,地以载我,天子以义宁我,我长我幼,处有安居,食有和味,衣有宜服,利用备器,以资其生,强不敢凌弱,众不敢欺寡,非天子孰使之然也?”原来渤泥是弱国,在未与明王朝建立邦交前,曾被“苏禄起兵来侵,子女玉帛尽为所掠”,自从郑和在海外贯彻和平外交与睦邻政策后,渤泥始国有宁日,人民得以享太平之福,明成祖对国王的谈吐举止留下深刻印象。

明成祖安排国王在会同馆下榻(相当于今日的国宾馆,馆址在今日南京通济门附近),每天由高级官员陪伴,并配备差用人员。一月之后,渤泥国王身染重病,且一病不起,明成祖派太医会诊,全力进行抢救,并派重臣每日前往病榻探视病情,后抢救无效,麻那惹加那乃国王于十月己亥病逝会同馆,年仅28岁。临终前立下“死后体魄托葬中华”的遗言,并嘱咐王子“誓世世毋忘天子恩”。

明成祖惊闻噩耗,非常悲痛,当即答应国王“体魄托葬中华”的遗愿,下令为其举行国哀,准以上礼安葬,并按中国礼俗赐谥号“恭顺”,派太子率文武大臣前往吊唁致祭,命太

## 渤泥国王体魄托葬中华

常寺择日、选地，命工部赶制棺椁明器，督造陵墓，令礼部主持安葬仪式。是月庚寅日，在南京中华门外雨花台西石子冈乌龟山南麓（今向花村之西）举行奉安大典，并建享殿、树石刻、立碑石于墓前。此外，明成祖还专拨三户入籍中国的南洋人家长年守墓，规定礼部每年春秋两季祭祀。

明成祖允准年仅4岁的王太子暹旺在南京继位为渤泥新王，由太后及三位王叔辅弼。成祖还赐予冠服、玉带、仪仗、鞍马、服物、器皿及金银、锦绮、钱币等。当时，渤泥国正遭受东邻爪哇国的侵扰。太后及王叔等一致请求明成祖，劝说爪哇国免去渤泥国向其交纳“片脑”40斤岁贡的重负，赐封渤泥国的后山。成祖一一答应。后经明朝政府从中排解和规劝，终于说服爪哇国王免去渤泥国的岁贡；明成祖又嘱郑和下西洋时帮助渤泥国摆脱了爪哇的控制，使之成为一个独立的国家，并赐封渤泥后山为“长宁镇国之山”，特地制成碑石，命张谦送往渤泥国，此碑文为：“矗矗高山，以镇王国。俸文于石，懋昭王德，王德克昭，王国攸宁，于万斯年，仰我大明。”渤泥新王暹旺一行回国之前，明成祖厚赠玉带、金银钱钞、锦绮沙罗、帐幔衾褥及各种器物等礼物，专派御使张谦、行人周航等护送回国，并“留镇一年慰国人之望”。

3年之后，即永乐九年（1411年）九月，渤泥新王遣使访明，表示谢忱。永乐十年（1412年）初，明成祖也派御使张谦携带礼物回访。同年九月，麻那惹加那乃逝世4周年前

夕,8岁的渤泥新王偕其母又来南京访问、扫墓,受到明成祖的亲切接待,并赠与丰厚礼物。渤泥新王一行在南京逗留了将近半年,才恋恋不舍回国。此后,两国使节及其商人往来不绝,直至明代万历年间荷兰殖民主义者入侵渤泥国后,两国之间的友好联系才被迫中断。

由于渤泥国王墓在文献记载中语焉不详,正史上说“葬之安德门外石子岗”,地方文献上则说“墓在石子岗”,到了民国中期,有人要在绵延十多公里的石子岗上寻觅国王墓,却是“遗迹皆渺不可寻矣”!1958年5月,南京市人民政府文物保管委员会在文物普查中,从残存石碑的下段隐约发现“渤泥国王去中国”和“葬于安德门外石子岗”这16个字,始信这就是数十年已“渺不可寻”的渤泥国王墓。自1958—1977年9月,我国政府多次拨款对国王墓进行修葺。1981年在江苏省重新公布全省文物保护单位时,国王墓被列为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明代皇帝朱棣与渤泥两代国王之间的亲密友谊和友好交往,已成为中国和文莱两国关系史上的一段佳话。今日坐落于南京雨花台石子岗的渤泥国王墓,掩映在青松翠柏之中,和明代王侯将相的陵墓同样宏伟,它既是中国与东南亚国家之间传统友谊的象征,也是中国和文莱两国人民自古友好交往的历史见证。

#### 四、苏禄国王长眠中华大地

在绿树掩映的山东省德州市郊北营村，矗立着一座造型古朴、气势雄伟的古墓，这里长眠着一位古代菲律宾苏禄国国王。

苏禄(Sulu)是菲律宾群岛南部的一个海岛，在古代是个独立国家。这个富饶美丽的岛国盛产珍珠，巴拉望和苏禄海底是亚洲最丰富的珠床，素有“东方珍珠”的美称。据汪大渊的《岛夷志略》介绍，苏禄的珍珠采集业和手工业相当发达，书中有“此苏禄之珠，色青白而圆，其价甚昂，中国人首饰用之，其色不褪。号为绝品，有径寸者”的记录。当时的苏禄国是东南亚地区的贸易中心之一，慕名前往采购珍珠的各国商人川流不息。

早在唐代，中国与苏禄国已有贸易往来。尽管郑和在下西洋过程中是否亲到苏禄的记载和说法不一，不过费信在《星槎胜览》中对苏禄有详细记载，明人陆容《菽园杂记》卷三也记载郑和到过苏禄。马尼拉史学家赛地与菲律宾史学家阿罗多·格雷罗的研究，都确认郑和亲自访问过苏禄。苏禄群岛上有三宝颜市也说明与郑和来访有关。明朝永乐年间，苏禄国曾四次派人到中国访问，每次都受到明朝政府极其隆重的接待，由此在中菲两国关系史上引出一段脍炙人口的佳话。



明永乐 15 年(1417 年)8 月初一,苏禄国东王巴都葛叭答刺,西王麻哈刺吒葛刺马丁,已故峒王妻都葛巴刺卜诸王,联合组成一个包括亲属随从在内达 340 多人的庞大使团,到中国访问,受到明朝政府的热情接待。永乐皇帝除举行隆重的国宴外,还邀请诸王游览北京名胜,表示了明成祖对苏禄国的重视和友好。明朝政府赐国王以印诰、袈衣、冠服以及鞍马、仪仗等礼物,代表团各随从 300 余人也受赐冠带、金织文绮、袈衣不等。

八月庚戌(27 日)苏禄国诸王一行圆满结束访问,带着明朝政府回赠的厚礼离开北京,坐船沿着运河南行,于同年九月十三日到达山东德州时,苏禄东王不幸病逝德州驿馆。这一噩耗很快传到北京,永乐帝闻讯非常悲痛,立即遣礼部郎中陈士启前往德州致祭并慰问使团人员,还指示要以隆重王礼进行安葬。明朝政府还按中国的风俗习惯,留东王王妃、王子和随从十余人守墓 3 年。永乐帝还命东王长子都马含率众归国,继承王位,并且慰勉他继承先父遗志,继续与中国保持友好关系。《明史》卷 325 记载:“帝遣官赐祭,命有司营葬,勒碑墓道,谥曰‘恭定’,留妻妾、侍从十人守墓,俟毕三年丧,遣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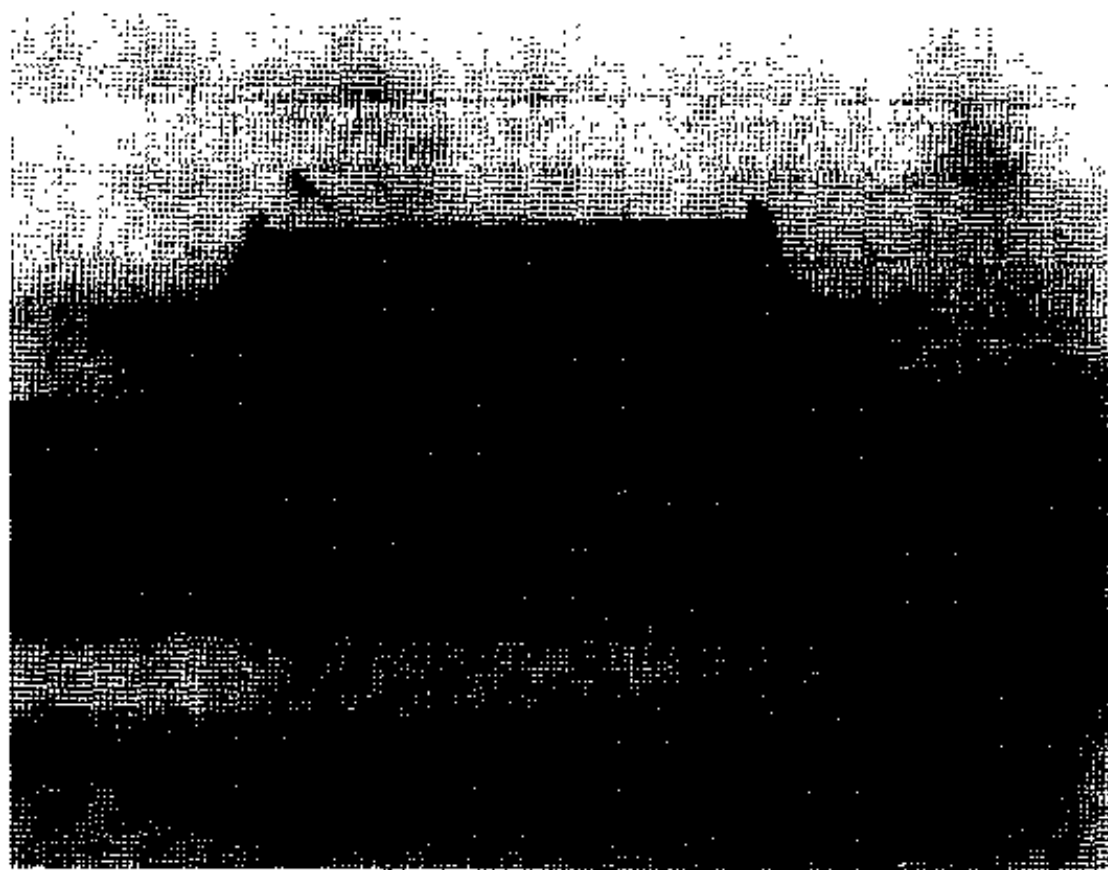
次年(永乐十六年,1418 年)明朝政府又在东王墓前修造祠庙,树立了高大的《御制苏禄国东王碑》,永乐帝亲自撰写的碑文赞誉东王“聪明特达,超出等伦”,“诚贯金石”,苏禄国东王访问中国所取得的功绩将是“光荣被其国家,庆泽

流于后人，名声昭于史册，永世而不磨”的。

明朝政府为东王在德州营建了巍然壮观的陵墓。古墓坐落在一个南北长 77 米、东西宽 56 米、高 1.2 米的高台上。墓前为一条砖砌的宽墓道，还修建了享堂、配殿、仪门、祔恩门等建筑物。墓道两旁矗立着翁仲华表、石人石兽等大型石雕，其气势和风格一如明代王陵。此外，明朝政府还在王墓周围拨出祭田 238 亩赠送给东王亲属，并让其世代享受俸禄；同时还将历城县夏乃、马亚斯、陈咬金三户回民充当看坟人，供其役使及耕种维修王墓等工作。明末学者顾炎武（1613—1682 年）曾写有《过苏禄国王墓》诗，内有“丰碑遥见炳奎题，尚忆先朝宠日碑。世有国人供洒扫，每勤词客驻轮蹄……”诗句，可知这位已故苏禄国王长留人民心间，慕名前往凭吊洒扫者络绎不绝。

东王王妃等在德州守墓 6 年，丁永乐 21 年（1423 年）启程回国。也许是东王魂留在中华大地，或者是对中国特别眷恋吧，翌年王妃又带着次子安都禄、三子温哈刺来华，从此就长久留居德州守墓，直至逝世后附葬在王墓的东侧。永乐十八、十九、二十二年（1420 年、1421 年、1424 年），苏禄国又先后三次派出使节访问中国，其中永乐十九年（1421 年）那次系东王之母所派遣，由王叔叭都加里来华访问，并以一颗重达 7 两的大珍珠相赠。

德州市郊的东王古墓，到了清朝并没有因政局变动、朝廷更迭而受影响。每逢春天的清明和秋天的中元两季，还



山东德州重建的苏禄东王享殿。

让德州地方官上墓致祭，并有固定祭文，使官方祭祀成为定制。随着岁月的流逝，在德州守墓的东王后裔及其仆从成了中华民族大家庭的一员。经过繁衍生息，王墓所在地的北营村逐渐成为一个菲律宾人血统的村庄。清雍正九年（1731年），苏禄国王到中国访问时道经德州，曾瞻拜祖茔。东王的第8世孙通述国王要求清廷将德州守墓人员的子孙入籍中华。后经清廷礼部查明，准予入籍，并按中国姓氏的

单音习惯,取温哈刺、安都鲁两位王子中文译名的第一个汉字,题定温、安两姓,在德州安家落户。时至今日,温、安两姓已传至 20 世孙,已有居民 120 多户,计 460 余人。

国与国之间的友好合作和文化交流总是呈双向的。随着中国与苏禄国之间人民的友好往来,也有一些中国商人长期居住苏禄,与苏禄人民通婚,并把中国耕作方法、农具等传去苏禄,共同开发,为社会文明进步作出贡献。后来在反西班牙殖民主义的斗争中,不少土炮就是华侨帮助苏禄人建造的。

新中国成立后,东王墓受到党和人民政府的重视,1956 年被列为山东省文物保护单位,1988 年 1 月 13 日国务院公布东王墓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从 1965—1990 年国家已先后 8 次拨款进行重建或修葺,如重建享殿、游廊、东西配殿、仪门、牌楼等,在旧护城河上新建石桥一座,清真寺也修葺一新。1991 年春,在祠庙院内栽种冬青和月季,在东王墓周围补栽了松柏。中外人士前来观光者络绎不绝,已成为德州著名旅游胜地,亦为中菲人民传统友谊谱写新的篇章。

1980 年 7 月,中央新闻电影制片厂来德州拍摄苏禄国东王墓的纪录片,同时片中也拍下了东王后人在北营村的生活状况,以赠送给当时的菲律宾总统及其夫人。苏禄国王为缔造中菲人民友谊而献身的精神,一直为人们所钦佩和敬仰。1987 年正值东王访华和逝世 570 周年纪念之际,

由中国北京电影制片厂和菲律宾国家文化中心联合拍摄的大型彩色历史故事片《苏禄国王与中国皇帝》摄制完成,上下集,耗资近千万元,由中菲两国影坛著名演员王心刚(饰永乐帝朱棣)、维克·瓦尔嘎斯(饰苏禄东王巴都葛叭答刺)领衔主演,放映后在中菲两国引起轰动。影片不但使这一脍炙人口的传奇故事为世界上更多人了解,而且还使中菲两国人民的传统友谊和团结合作出现新的高潮。

## 五、古麻刺朗国王病逝福建

明代永乐年间,太监张谦奉明成祖之命,在出使渤泥等国的航程中,发现了一个名叫麻刺朗的小国。永乐十五年(1417年)九月,张谦又作为皇帝特使,带着诏书,前往麻刺朗国,晋见国王斡刺义亦敦奔,并赠献绒棉、绉丝、纱罗等礼物。国王大喜时深知自己是个弱小国家,若能有大明皇朝的庇护,不仅可免遭周围邻国的欺凌,还可互通有无,进一步开展贸易往来和文化交流。根据上海《文汇报》记者徐作生先生的考证,麻刺朗国(Kumalarang)为菲律宾群岛古代岛国,我国出版的《世界地图》“菲律宾”地图上被译作“库马拉朗”,位于今菲律宾棉兰老岛东北部,西临苏禄海,那里居住的古老土著,称作 Kulaman,中文译为古刺人。

明永乐十八年(1420年)十月,古麻刺朗国国王斡刺义亦敦奔来华入贡来到明朝京师南京,受到明成祖的隆重接

待。那天，巍峨的皇城鞭炮齐鸣，锦衣卫陈设仪仗，乐师们奏起《感皇恩》的乐曲。按照明朝礼仪，斡刺义亦敦奔及其妻、子、陪臣均着明朝朝服，跪于丹陛，拱手加额，三呼“成祖皇帝万岁”。明成祖通过翻译慰问说：“国王远道而来，知尊中国，可佩可嘉，皇帝问您一路辛苦了！”国王答言：“兹遇中官张谦，钦诣皇帝陛下称贺。我虽然是国人推选出来的，但未受大明的朝命，望皇帝幸赐之。”成祖答应请求，下诏仍以“古麻刺朗”为国号封之，并赐印诰、冠带、仪仗、文绮、纱罗、金织裘衣，还赐王妃冠服，其陪臣各赐彩帛、衣服、文绮等物。是晚，明成祖又在奉天殿设盛宴款待古麻刺朗国贵宾。

斡刺义亦敦奔国王一行在中国住了半年，于永乐十九年（1421年）四月启程回国。途经福建时国王不幸染病身亡。明成祖特以谥号“康靖”，并命礼部主事杨善及工部官员等主持葬礼，并按王公的规格营建陵寝。国王之妻对此非常感激，在拜谢杨善时说：“夫君祚薄，不幸而逝，有遗命，子刺苾嗣王位，立誓世世代代不忘天子恩德。”斡刺义亦敦奔国王被安葬在福建闽侯（今日福州）西郊茶园山上，陵墓前立康靖王陵碑一座，一些陪臣念国王生前之恩，自愿留在闽侯，与国王子孙世世代代为国王守陵。

永乐二十二年十月（1424年）古麻刺朗国新国王刺苾派遣叭谛吉三等人率领使团来华，并朝贡麒麟（长颈鹿）和珠宝等。当使团得知明成祖朱棣已于三月前（永乐二十二年秋七月庚寅）去世的消息后，心中都很难受，叭谛吉三不

禁黯然神伤,并决定去北京,在明成祖陵墓上培一抔黄土,栽一株树以作莫祀。此后由于一些沿海大国的骚扰掳掠以及西班牙殖民者的入侵,古麻刺朗国不再有贡使来华。岁月悠悠,人世沧桑,500多年过去了,这个“东南海中小国”及魂系中华国土的康靖王陵已难以考辨,成了中外历史上的一个悬案。

我国解放初期,海内外一些专家学者曾先后来人或来函,查找康靖王陵。福州市领导同志对此也甚为关注,曾组织市文物考古工作者多次到市郊勘访,但均未发现有关线索。查《福州府志》卷23《冢墓》云:“康靖王墓在草市都茶园山。”《闽都记》曰:“永乐间古麻刺朗国王入贡,以疾卒,赐谥‘康靖’,有司营葬,春秋祭之。其陪臣数姓皆内附官,给廩食。”由此可知,康靖王葬地当在福州西郊凤凰池兆之茶园山一带。

据凤凰池村长者所述,康靖王陵早年确实存在,陵前有石人(翁仲)二,石马、石羊各一。陵前有石碑一座,字形如蝌蚪,不识。1952年,因福州市传染病医院选址于此,施工时石人、石马、石羊都被推土机从茶园山半山坡上推下出来。据目击者说,康靖王陵呈圆丘形,占地面积约300平方米,封土系糯米汁、石灰、沙土拌和而成,十分牢固,这种封土至今在陵墓原址仍可找到。除翁仲、石马、石羊、石碑外,陵前还竖有两根旗杆(即望柱),可惜这些遗物没有得到保护。

自从永乐十九年(1421年)斡刺义亦敦奔国王病逝后,明朝政府每逢清明和重阳之际,都委派当地官员前往康靖王陵祭祀。留在中国守陵的国王陪臣的后裔,当时都由朝廷供给廩食和俸薪。何乔远《闽书·岛夷志》有记述:“诏谥康靖,敕葬闽县,令有司致祭,陪臣子孙皆与廩食于官。嘉靖中,有葛良贵者为侯官诸生,同时陪臣子孙多不延,所食于官惟葛及一、二姓云。”后来国王后裔便在中华大地上繁衍生息,并融入当地社会。

现在能查访到的这些陪臣的后裔,只有葛氏一族。其始祖随中国习惯简姓葛(葛音“ga”),名蔚庵,居于康靖王陵以西的洪塘镇,当地官府拨给他房屋及田产,至明末还按时供给薪俸。至今,洪塘镇洪山乡仍有一种用糯米做的食物,叫“葛葛梁”,葛氏家族祭祀祖先时,用它作供品。据《闽书》记载,葛良贵在嘉靖年间经考试,入府学。由此可见,古麻剌朗国人的后裔在明代就已完全接受了中国文化,成为中华民族大家庭中的一员。到了明代后期,葛氏后裔中的许多人渐以才学见长,并陆续往府城迁居。至晚清时,洪塘葛氏家族大多散居于杨桥头、宦贵巷(一名番鬼巷)、仓角一带,他们之中多以教书为业。如一位名叫葛世枢的长者,1987年时已87岁高龄,其父为同治年间进士,做过光绪皇帝的老师。而今,葛氏家族中从事教育工作的仍不在少数,有的还作为学者到英国访问讲学。

现任福州仓角头9号的葛福煌老人是葛氏家族的嫡传



后裔,他说,仓角的葛氏祠堂原有一个族谱,一直由他保存。葛氏祠堂地基有百余亩,规模颇巨,内供奉葛蔚庵神像,着明代朝服;祠堂总神位上写着“洪塘葛氏祖宗神位”,这是葛氏祖居洪塘的实证。后来,祠堂被改建成小学,族谱也在10年动乱中以“破四旧”为名被查抄焚毁。

1988年4月16日,适逢菲律宾总统科拉松·阿基诺访华寻祖之际,《福建日报》以《中菲两国人民友好交往的历史见证,菲律宾一占国国王葬于福州》为题,介绍了古麻剌朗国国王斡刺义亦敦奔率臣来华人贡,歿后赐葬中华大地的动人史实。这说明,中菲人民之间的友谊又有了新的发展。如果康靖王泉下有知,对此也会感到欣慰的。

## 六、印尼三宝瓏和三宝洞

印尼的三宝瓏(Semarang)为爪哇岛第三大城市,今中爪哇省省政府所在地。三宝瓏最初叫阿森—阿朗,意为“叶子稀疏的阿森树”。为了方便,后来逐渐简化为森阿朗和森马朗。当地华侨称三仔冷、三马瓏等,但普遍被译为三宝瓏,且沿袭至今。也有人说在三宝瓏未开发之前未有其名,殆郑和到三宝瓏后,当地土著和华侨为纪念郑和方以此名称呼。三宝瓏有三宝洞(Sam Poo Tong),其址又叫葛堂巴都(Gedong Batoe),意为石室,但华侨都叫三保洞,位于该市市中心约5公里处,为一个四面环山,树木郁郁葱葱的盆地,

## 印尼三宝瓏和三宝洞

是个天然石洞，洞门横额为“寻弥流芳”，门联为：“受命皇朝临海国，留琮石洞庇人家”。

洞内有三保庙，入洞后首先见到巨大的拱门，门前有一对石狮，后面又各矗立着一名守门的石像大将。庙宇入口处有一高大三重式牌楼，飞檐翘角，古色古香。大殿由几根朱红色圆柱支撑着伞形殿顶，顶上铺红瓦，另有朱栏环绕的走廊，极富中国民族建筑风格。庙门上镌横额“德绥威服”，两侧有联曰：“滇人明史风来世，井水洞山留去思”。庙内众多的对联中有章炳麟（章太炎）名联：“寻君千载后，而我一能无”，上款题为“民国五年十月过三保洞书此，神若有灵，广其昭鉴”，下款题为“勋二位前东三省筹边使章炳麟”。张君励先生亦曾到此一游，其题联曰：“继张（騫）班（超）立功异域，开哥（伦布）麦（哲伦）探险先河”，上款题为“题垄川三宝洞”，下款题为“民国四十一年一月张君励”。大殿内三保大人的立式塑像高80公分，系从中国运来，身着明代官服，相貌庄严，英姿勃发。像前供桌上供品丰富。善男信女匍匐在地，香烟缭绕，口中念念有词，似在祈求着什么，也有人在抽签占卜。三保庙内还有一船锚庙，庙中供奉着一大铁锚，相传此为三保大人留下的圣物，两侧有联曰：“古物惟尊表其诚，泊舵以锚坚如铁。”

郑和船队在下西洋过程中，曾先后数次在印尼的雅加达、井里汶、爪哇及泗水等地登陆，为传播中华文化，为增进中国印尼人民之间的友好往来和相互了解作出贡献，由此

在当地居民及印尼华侨华人中留下很多传说。王大海的《海岛逸志》中记载印尼有一种药物：“榴莲树如洋桃，实大如柚，剖之，肉颗颗如鸡蛋，色白有核，其香浓浊不堪，妇人嗜之，华人且掩鼻而过焉。”据说郑和船队到达印尼时，正遇瘟疫流行，华人纷纷祈求郑和帮助治病，郑和告知说，可把榴莲当药吃，人们闻风而动，在吃榴莲后不久，疫情顿消，从此榴莲果成为印尼华人喜爱的水果。

郑和船队曾到过印尼的巴厘岛(Bali Pulau)，为此在那里也留有许多遗迹。在该岛巴都尔村纪念郑和厨师的庙里，至今还保存着中国传统的铜铸香炉、绣着黄龙的三角旗和中国明朝的铜钱。在巴厘许多寺庙的祈祷仪式中，人们沿习使用的铜钱，相传就是当年郑和留下的，故巴厘的中国古钱币特别多。1956年宋庆龄在全国人大常委会所作的“访问印度尼西亚”报告中指出：“……我们国内已不易看到的铜钱，在巴厘岛上家家都能找到。这种铜钱被停止流通还是不久的事情。现在人们把铜钱结成一串一串的吊起来当做宗教仪式上不可缺少的神器。在一家银器店里我们发现一串串的铜钱有开元年号的，有万历年号的……”由郑和船队从中国带来的瓷器、丝织品、铜制家庭生活用品等，至今在巴厘的一些地方还能见到。

关于三宝洞也有一段来历。据说郑和船队有一次在爪哇附近海面航行时，其副手景弘患病，郑和便下令船队在三宝垅附近登陆，上岸后发现一个洞穴(即今日三宝洞)，便

临时将此作为病房,并在洞外盖一小屋,郑和还亲自为王景弘配药煎熬。十余天后郑和船队启程航行,王景弘继续养病,并留下十余名船员、一艘木船和粮食等。王病愈后并未去追赶船队,而是留下开荒种地,从事商贸活动,并在当地传播伊斯兰教,引导人们定期去三宝洞,向郑和雕像顶礼膜拜,久而久之成为一种习俗,每逢中国农历初一和十五,便去三宝洞祭拜郑和雕像和王景弘之墓。三宝垅华侨对三保大人保佑他们在此地安居乐业,生意日益兴隆常怀感激之情,为此曾于清雍正二年(1724年)在三宝洞举行盛大集会,以示对三保大人感恩戴德。同时还对三宝洞进行修葺,在洞前修建一条檐廊,以供游客遮荫,为香客们休息和消遣提供方便。集会经费及维修费用均由华侨公众捐献。

19世纪下半叶,三宝洞一带土地落入一犹太人后裔手中,并对前去三宝洞进香者收取买路钱,长此勒索,何时终了,人们愤愤不平。三宝垅华侨黄志信老先生(糖王黄仲涵之父)于是在三保大人像前许愿,日后如若生意兴旺,事业有成,定要买下这块土地,不久终于天从人愿,于1879年买下这块土地,从此人们的奠祭和朝拜活动不再受阻。并立碑以志纪念。其碑文详细纪实如下:

时望安为王公三保大人归真之地,山明水秀,树木葱茏,麓有石门,天然成洞,三保圣神着灵于此,俗称三宝洞者,以神得名也。我唐人旅居雅地者,咸叨庇佑,而航海经商,洞尤资保护,功在民

庶，口悉为碑。是以每逢朔望，善男信女，诸参信神，用申悃懔，肩摩踵接，车辘马嘶，诚盛迹也。是山向为宋仔（指吕宋西班牙人）故，业岁索路金五百，我公馆征诸店户，以供斯款，虽为数无多，而慢神害理，历代相沿，宁有既也。信目击情殷，杞忧徒抱，乃于己卯夏月，拍卖黎弄（Lolong，出于葡萄牙语 Leilao），赖神默助，竟逐初心，于是除路资，修废圯，新洞庭，浚沟浚，庶士女得尽虔诚，馨香永荐，借以冀荫，阖境康安，炽昌勿替者也，窃恐后人不能体此意，爰述所由，勒诸坚石，俾后之承我业者，遵守勿违，且以明我之所得是地，革陋规者，皆出神圣默助，致使然也，是为识。清光绪五年岁次己卯，和兰西历一千八百九十七年，望山主人黄志信敬勒。

三宝洞圣地经后人不断集资扩建，如建造凉亭数只，不断装饰美化等，使之不仅在印尼，而且在整个东南亚闻名遐迩。1945年印尼独立后，有关郑和的各种纪念活动在三宝瓏重新活跃起来。500多年来，印尼人民也极其珍视三宝洞和三宝庙，将此视为两国人民友谊的象征。三宝瓏市市政府还于1960年（一说1966年）在三宝洞内立一块纪念碑，上面刻有中、英、印尼三种文字的碑文，叙述郑和简历及其下西洋的不朽功绩。位于三宝洞左翼长廊中的碑文题为“三宝洞三宝庙三保大人简略”，内文为：“明永乐年间有郑

和者，是中国云南人氏，奉命特派为钦差大臣，周游各国，故七下西洋，兹如爪哇、苏门答腊、孟加拉、阿拉伯等国，都是必经之地。受命以来，怀抱绥抚政策，宣扬文化为主旨，所到之地，备受各国欢迎，且派使臣往返，藉作投报之谊，五百年来邦交弗替，故吾侨来此谋生者，瓜瓞绵绵，数以百万计，推朔原委，非郑公功德之赐而云何？！公七下西洋，先后到爪哇两次，始于一四〇六年，继后一四一六年，登陆地点是垄川海滨西蒙安行营，驻扎于西蒙安之阳。逝世于一四三五年，后人追念其丰功伟绩，特于是地，辟一洞建一庙，以为奉祀之，通称为三宝洞三宝庙。弟子林清志立石于一九六〇年。”上列碑文中之地名西蒙安，询得当地人，谓即为 Simangan 之译音。

三宝瓏人民及华侨华人，在心灵和信仰上都附会中国农历六月三十日是郑和船员上岸之日，三宝洞附近是其扎营暂住之地，因此这一天三宝瓏人民都要举行盛大的庆祝活动，年年如此，盛况空前。还在6月30日之前几天，印尼人民和华人就聚集在三宝洞附近，更多的人则从埠外、岛外和国外赶来，如有新加坡、菲律宾、泰国和马来西亚等国华人，专程前来参加这一盛典。成千上万人赶来进香，留宿求福，如1985年时大街小巷就铺上2000多张席子，供人露天住宿。

举世瞩目的神像出游活动，于6月30日清晨4时许由华裔女青年抬着三保大人塑像，自大觉寺出发沿街缓行，路

旁观者万头攒动,沿途彩旗招展,人们敲锣打鼓,舞龙舞狮,向三宝洞进发。当队伍到达三宝洞前院时,便将神像面朝东方,万千群众便在香烟缭绕中虔诚祈祷,以便获得三保大人福祉。许多年迈之人也尽力挤入人群,当抚摸到三保大人塑像后,心中激动万分,相信此后定能延年益寿。当日中午,神像出游队伍返回大觉寺后,庆祝活动在华人聚居的街坊继续举行,当地居民夹道观赏这一年一度的盛景,直到天黑后人们才尽兴而归。

郑和下西洋在印尼三宝瓏所留下的众多遗迹、遗物和传说,虽带有一定神话色彩,但也反映出一个基本史实,即大批华侨正是紧随郑和下西洋所开辟的航道去南洋谋生的,其中一部分人在三宝瓏定居,为该市城市建设和社会经济繁荣作出贡献。成千上万人年年来三宝洞参加神像出游活动,虔诚地向三保大人祈求慈悲,保佑万事如意。尽管其中一些人已经不识汉文,不会讲汉语,但他们那种对郑和的祭拜方式,对郑和的怀念和崇敬心理是多么宽广久远和深入人心。

### 七、泰国的三宝公鸡和三宝庙

郑和船队在下西洋过程中,曾于明永乐五年(1407年),明永乐七年(1409年)的第二、第三次下西洋中,到过暹罗(今泰国),郑和的船员曾划着小船,和泰国人民进行贸

易活动,和泰国王室进行经济文化交流。除此以外,郑和还去看望和慰问聚居在山巴的华侨,向他们传递有关祖国和家乡的信息,并且提出,只要大家勤勉刻苦,与当地人民和睦相处,前景光明。郑和还惠赠泰王许多礼品,拜托泰王多关心和照顾华侨。泰王亦交给郑和许多金银珠宝,转赠给明成祖。为此泰国也留有许多郑和的遗迹遗物,流传着许多郑和的故事、郑和的传说和佳话,甚至还保留着一些和郑和有关的风俗习惯。例如泰国的水浴治病也与郑和有关。暹罗气候炎热,不冲凉即会生病,据说这也是三保公所教会的。每当小孩生下来后,每天都要坚持浇冷水数次,直到面白唇青才抱起。在清人陈伦炯所著《海国闻见录·南洋记》中,也有描述郑和为乡民治病情况。据说番病流行时,“每向三保求药,无以济施,药投之溪,令其水浴”。至今许多人尚以浴溪浇水为治病。相传每年10月15日为圣日,该日三保公下药于江河中,若在这天汲水,可以久藏不坏,所以是夜家家忙于汲水。

据说泰国农民种田不大施肥料也与郑和有关,一天郑和正在田间行走,看到一些暹罗人正在施肥,郑和便教育说,“你们把稻草烧在田里便是肥料了,不必另再施肥了。”普通的稻草灰经三保公的嘴巴一说,真的威力无比,肥效极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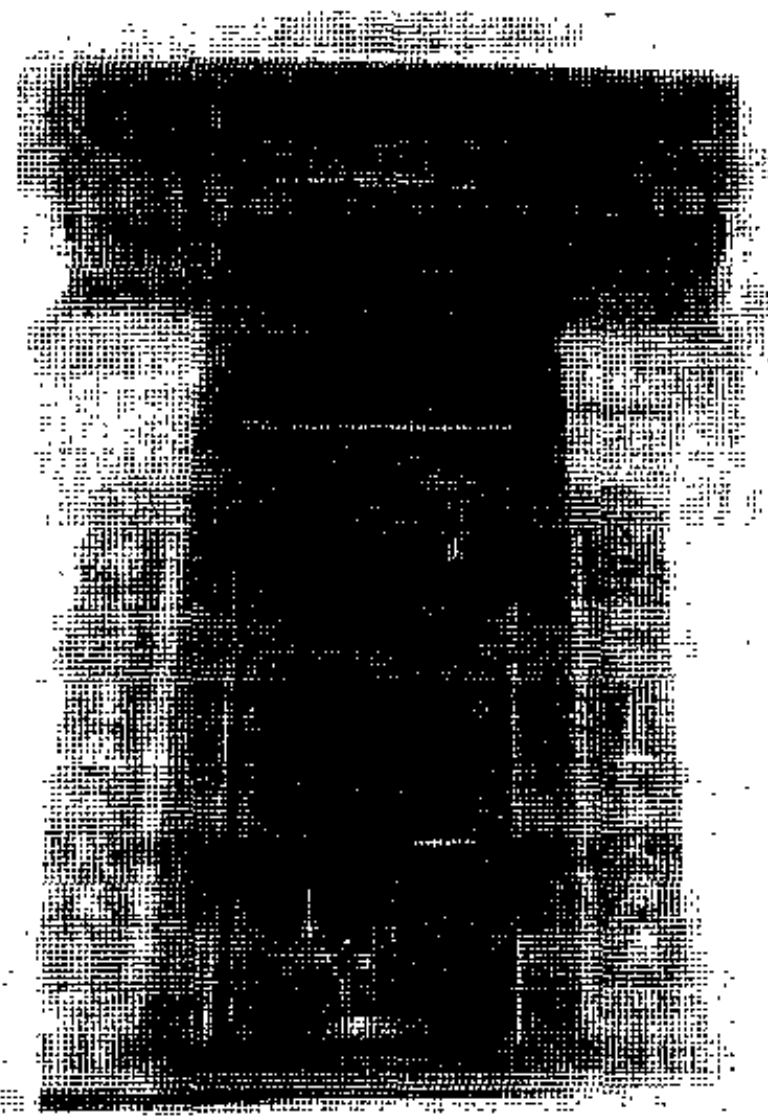
旅居泰国首都曼谷一带的广东籍华侨,特别喜欢和保护一种小动物三宝公鸡,他们祖祖辈辈相信这是由三保公派来的神物,千万不能冒犯,能保护华侨,每晚所发出“克



苦,克苦”的叫声,即是昔日郑和对侨胞的教诲之声。其实这三宝公鸡不是饲养的家禽,更不是好斗而能报晓的大公鸡,却是泰国特有的一种大壁虎。这一小动物蛇头尖嘴,鼓膜发达,眼睑能活动,灰黑色,短尾巴,身长约20厘米,昼伏夜出,生长在天花板夹缝之中,三宝公鸡也与郑和下西洋的一段传说有关。

当年广东省潮州、汕头一带农民,正是沿着郑和开辟的鼓线,相继乘坐红头船来到泰国及南洋谋生,郑和对华侨的关心和爱护,也使大家备受鼓舞,就在郑和离开泰国的当天晚上,墙上不时发出“克苦,克苦”的叫声,人们都说这是三保公所发出的声音,是三保公对华侨的教诲,“三宝公鸡”由此得名。每当华侨遇到艰难困苦,处于逆境中时,只要一听到那“克苦,克苦”的叫声,立刻会热血涌上心头,激起战胜困难的勇气。小动物每次只叫五六声,最多只叫八声,如果有人听到连叫十二声,那么此人定会福星高照,好运来临了。郑和对南洋华侨的抚慰,具有巨大的精神鼓舞力量。作为一种精神寄托,华侨对郑和的怀念和崇敬之情历久不衰。泰国三巴的华侨还为三保公树碑立石,永志不忘。泰国的三宝港在今日暹罗湾,位于泰国湄南河的河口处,也为纪念郑和而得名。三宝禅寺在首都曼谷,相传这也是华侨为纪念郑和而修建,其石刻塑像,曲栏回廊,雕梁画栋,有很高的艺术价值。

三宝公庙由于庙中供奉“帕南车佛像”,故泰名为帕南



泰国三宝公庙门口的一幅楹联为：

上联：三味宝真如无人无我

下联：佛心公造化不灭不生

车寺，初建于公元 1324 年，位于阿瑜陀耶城（大城）城郊之南约 10 公里处，濒临湄南河东岸，阿瑜陀耶王朝（又名大城王朝）初期，该地曾是华人聚居区，又是较繁华的商贸集市。阿瑜陀耶王朝和中国关系密切，曾多次通使明朝。15 世纪初郑和在下西洋过程中曾访问过阿瑜陀耶城，有利于增进两国人

民之间的友谊和了解，在当地人民中留下极其难忘的印象。为感谢郑和抚慰华侨，关心华侨之恩情，以及纪念郑和的访问，当地华人遂将帕南车寺于 1617 年左右改名为三宝公庙。在第 6 次緬暹战争中，緬甸于 1767 年攻陷阿瑜陀耶王

朝,阿瑜陀耶王朝灭亡,城中宫殿、寺院悉数被焚毁,三宝公庙因地处城郊,方幸免于难,但亦遭一定破坏。后来的吞武里王朝和曼谷王朝等对该庙多次修葺和维护。华人为此还专门组成常年理事会,1974—1975年度的三宝公庙常年理事会名单镌刻在一石块上,负责对该庙的全面管理。

三宝公庙按泰国传统佛寺装饰布置,大殿前的一长走廊与前殿相接,正中供桌上的三只铜香炉引人注目,一只年份不详,另两只分别于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和清宣统元年(1909年)。长廊两侧为左右佛堂,里面均供佛像。正殿大门上额有一中文字木制大匾“三宝佛公”,两边的对联为“三味宝真如无人无我,佛心公造化不灭不生”。另有二联,一联为林宗和于壬子年(1972年)冬月敬谢:“三宝灵应风调雨顺,佛公显赫国泰民安”。一联为柯光汉丁巳年(1977年)拜题:“七度使邻邦有明盛记传异域,三保驾慈航万国衣冠拜故乡”。充分反映出对三保公的怀念和崇敬之情。今天三宝公庙不仅是泰华民众求神问卜、进香祭拜的重要宗教场所,亦是一处著名旅游观光点,每日如潮水般涌来的观光客不计其数。庙前的广场上停满汽车,香客和游客摩肩接踵,广场上供应香烛冥纸、各类小吃和旅游纪念品的小货摊生意兴隆,其热闹和兴旺场面,犹如赶集和庙会。

## 八、斯里兰卡郑和碑

斯里兰卡郑和所立之碑，名为《布施锡兰山佛寺碑》。锡兰山即今日南亚国家斯里兰卡，郑和在下西洋过程中多次到过锡兰山。锡兰山古称狮子国，又称僧伽罗国，为南印度的佛教圣地。锡兰山相传是释迦牟尼传教的地方，那里还供奉着佛牙，相传朝拜者来到此寺“凡有祷禳，应答如响，国有凶荒灾异，精意恳祈，灵祥随至”。所以信奉佛教者对此寺均无限向往。郑和在艰难困苦的航海中，自然希望得到佛祖庇佑，所以每至锡兰山，必进寺祭拜并有佛事活动，以祈求佛祖保佑平安。郑和在1405年的第一次下西洋过程中来到锡兰山，曾去该寺进行佛事活动。当1407年第二次来到锡兰山时，除了递交国书和赠送礼品外，还向栋德拉岬佛寺布施大批礼品，建立石碑以记其事。

郑和一行于明永乐七年（1409年）二月初一日“赍诏敕金银供器采妆织金宝幡布施于寺及建石碑”以示永久。这块“布施锡兰山佛寺碑”碑石略带绿色，高4.5尺，宽2.5尺，碑首为龙头雕刻，碑铭共三种文字，上为汉字，下为泰米尔文和波斯文，今仅汉文尚存，余二文大半蹉隳，不可辨认。碑文颂扬了佛世尊，说：“仰维慈尊，圆明广大，道臻玄妙，法济群伦，历劫沙河，悉归弘化，能仁慧力，妙应大方。”碑文还对锡兰山佛教圣地大加赞扬，说：“言言梵刹，灵盛翕彰。”碑

文最后记下这次布施钱物的具体数目：“总计布施锡兰山立佛立寺供养金一千钱，银五千钱，各色绉丝五十匹，织金绉丝宝幡四对，红二对，黄一对，青一对。古铜香炉五个，钱金座硃红金香炉五个，金莲花五对，香油二千五百觔，烛蜡十对，松香十炷。”锡兰山人民崇信佛教，并以自己拥有历史悠久和光辉灿烂的佛教文化感到自豪，郑和对佛世尊的颂扬，对佛寺所布施丰厚的香礼，有助于促进中斯两国人民之间的友谊。锡兰山佛寺闻名遐迩，是各国旅游者、香客、商人、使者云集之地，故郑和的布施及其立碑之举，也扩大了中国在海外的影响。此碑的发现和展出，既是郑和下西洋壮举在海外的一个重要遗迹，又是中斯两国文化交流和友好相处的历史见证。

岁月流逝，人世沧桑，郑和在海外的一些遗迹遗物，有的已被淹没，是在近世被发现的，锡兰山的郑和碑是于1911年在斯里兰卡南部滨海城市高尔市发现的。一位名叫陶莫林的工程师，在市政建设过程中疏理克瑞普斯路排水涵洞时，发现了这块石碑，斯里兰卡政府和人民对此非常重视，今存放于科伦坡国家博物馆内并向广大公众开放。这一石碑发现的重大意义在于，不单是中斯人民传统友谊的象征，又是中斯两国文化交流的结晶。此外，根据中国史籍记载，郑和使团还在满刺加、渤泥、柯枝等国留下镇国山碑，但都在漫长的岁月中被淹没，迄今尚未发现。

## 九、存留马六甲的郑和遗迹

马六甲为满刺加王国都城,濒临马六甲海峡,为亚非欧水上交通必经之地,很早就与我国有往来,华侨移居该地的时间也早,人数不少。15世纪初满刺加立国,1405年明成祖封拜里迷苏刺为王,从此中国和满刺加之间的友好关系有了很大发展。据统计资料得知,在满刺加王国存在的一百余年间,满刺加经常派使者去中国“朝贡”,“或连岁,或间岁入贡以为常”,有时一年数贡,有时国王后妃等亲自来贡,仅《明史·满刺加国传》中列举重要者,即有22次之多。满刺加的开头三任国王,先后五次率妻子陪臣到中国访问,访



马来西亚副首相安华凭吊郑和墓题词:向伟大的郑和致意——为了持久的马中友谊。

问团规模不小,有时多达数百人,这在中外关系史上是不多见的。

马六甲是郑和七下西洋中到达次数最多和逗留时间最长的地点之一,且是郑和船队的物资中转站和回归集中地。马欢在《瀛佳胜览》中记载有:“中国宝船到彼,则立排栅,如城垣,设四门更鼓楼,夜则提铃巡警。内又立重栅,如小城,盖造库藏仓廩,一应钱粮顿在其内”。返航时,各支船队“回到此处取齐,打整番货,装载船内”,停泊候风,一俟“南风正顺”,即刻起锚扬帆,开船回还,一路顺风,抵达国内。由于上述的一些特殊原因,郑和存留在马六甲的遗迹遗物之多,传说之广,影响之久远,都是其他地方所无法比拟的,现择要简述如下:

马六甲有座不高的圆形小山叫三宝山,就是武吉支那,意为中国的山,那里是郑和驻兵和设官厂之地。那里还有一座历史悠久的马来西亚华人公冢,占地 103 亩,有 2500 余个坟墓。是由马六甲第二任华人甲必丹李为经(1614—1688 年)从荷兰殖民当局手中买下的,作为安葬华人遗骸之用。三宝山华人公墓的形成也与郑和下西洋有关。相传郑和船队人员在马六甲逗留期间,随从人员死亡后即葬于此,其后当地华侨便将此地作为义山。

三宝山下有三保亭,是于清乾隆六十年(1795 年)马六甲第 8 任华人甲必丹蔡士章在三宝山西南山麓所建,为了纪念郑和,该亭取命“宝山亭”,专供扫墓者休息之用。亭内

## 存留马六甲的郑和遗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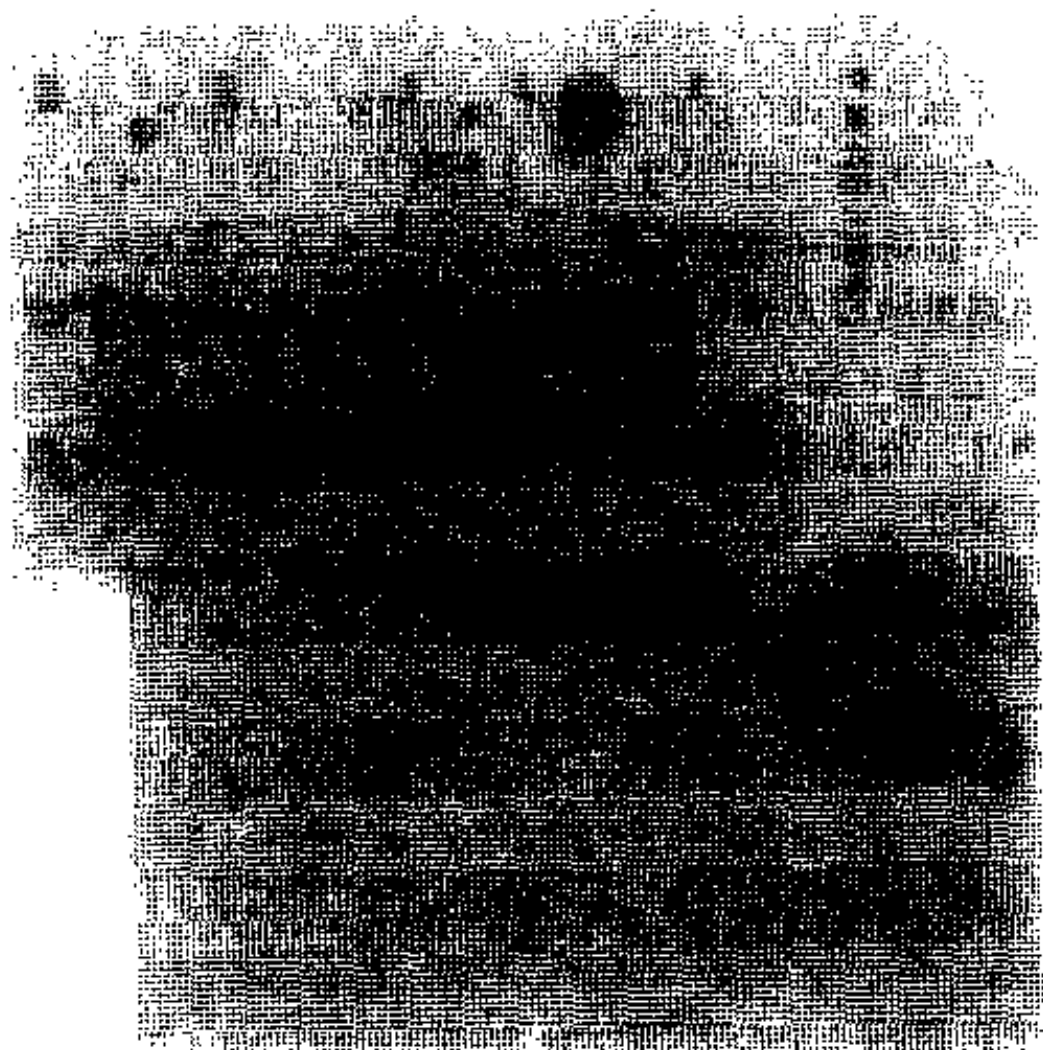
---

的《建造祠坛功得碑记》，记述建亭缘起。亭内的郑和神像、福德正坤与妈祖像三者并立，后郑和像遭窃，今日供奉的仅是郑和金身神像的相片。正门前有一大花圃，圃中鲜花盛开，沁人心脾，还有一棵浓荫蔽日的大树，掩映着门匾“宝山亭”三个大字。亭旁有一幅对联曰：“魂依甲地万古幽冥沾福德，公庇征人千年享祀配春秋”。已经成为著名旅游景点，每日清晨，从世界各地来到马六甲的华人游客，争相汇集宝山亭，参观和寻觅郑和的遗迹遗闻，一睹三保太监神采，许多老人和妇女，更是在郑和金身面前虔诚膜拜，以祈求平安。

三宝山下还有三保庙，共三进，红墙绿瓦，飞檐翘角，与国内一般庙宇风格相似。据说建庙所需建筑材料，哪怕是一砖一瓦都由船队自中国运来。此庙由马六甲华人甲必丹蔡士章等人于1795年建造，以纪念三保公。郑和塑像置于殿中，一身戎装，英武威严，正门口对联曰：“五百年前留胜迹，四方界内显威灵”，表达出后人对三保公的怀念和崇敬之情。

关于三保公庙的来历，当地还流传着这样一则故事，相传于公元1407年郑和船队行至马六甲海面时，风浪大作，有一船破洞而漏之不止，情况相当危险。后经郑和对天祷告后，一大鱼立即跳入船中，正好堵塞漏洞，船方得以平安抵达马六甲。靠岸后郑和用手将鱼丢入海中放生，从此那种鱼后代的背上均留有手指痕，人称郑和鱼或大伯公鱼。





马六甲三保井。

为了纪念郑和来访及有功的大伯公鱼，遂将此庙称为三保公庙。善男信女前往三保庙进香者络绎不绝，香火旺盛，亦是旅游者必到的著名景点。

在三保庙穿过大堂，来到后院右侧，可见一口古井，名曰“三保井”，相传该井为郑和所开掘，郑和船队人员抵达后

## 存留马六甲的郑和遗迹

---

皆用此井水。井水清冽甘美,有人服用或冲凉,可治病消灾和延年益寿,于是竞相汲用,也有人将硬币投入井中,以求三保公保佑。如今该井已加井盖并围圈予以保护。在大堂前院左侧另有一口“公主井”,又名苏丹井,亦已加井盖予以保护。据说郑和下西洋来到马六甲这座著名港口城市后,便和那里的商人建立起密切关系,并奏请朝廷将朱丽宝(汉丽宝)公主下嫁马六甲王子苏丹满苏沙,并带 500 名童男童女护驾。公主随从人员便挖了此井,即使是大旱之年也未干涸过。

## 第四章 传教士与西学传播

西方的天主教耶稣会士于 16 世纪中叶开始来华,19 世纪初期,基督教(新教)布道者又相继踏上中国国土,他们在传教的同时,作为一种手段,在向中国介绍西方过程中,亦将西方的科学文化及社会政治思想引进中国,给中国的封建社会注入西方资本主义新文化。这一由传教士为媒介的中西文化接触,又称“西学东渐”,是这一时代中国认识学习西方的主要途径。新传教士在中国推广、传播基督文明中,所从事的文化教育和出版活动相当突出,无论从数量和质量上相比,均超出前期的耶稣会士。西学东渐对中国现代化运动有很大的促进作用。耶稣会上来华传播地理方面的新知识新观念,利玛窦所改绘的世界地图,纠正了“天圆地方”的错误观念,给人带来世界地理科学的新认识。康熙年间以传教士为主的地图测绘,其最终成果《皇舆全览图》,不仅在中国,也是世界地图测绘史上的空前壮举。传教士将西方的天文学及数学知识带来中国,特别是一些天文仪器,对中国天体观察和天文研究有促进作用,天文望远镜的

引进,有助于中国开展光学研究。西方数学名著《几何原本》以及《同文算指》,在中国的翻译出版,为欧洲数学传入中国作出贡献。

法国传教士金尼阁的《西儒耳目资》一书,是我国最早一部拉丁文拼音汉字字汇,拓展了汉字拼音化的新道路,在明清两朝有很大影响。英国传教士马里逊汉语版《圣经》的翻译出版,为在华传播基督教文化作出贡献,同时也是中英文化史上的重大事件。19世纪下半叶,在“西学热”中成立的京师同文馆翻译馆、江南制造局翻译馆和广学会,为中国第一代三大翻译出版机构,翻译各种由传教士引进的西方近代科学知识书籍,在西学传播中起很大作用。江南制造局翻译馆将西方应用类自然科学著作,如数理化、声光电、军工矿冶等翻译出版,推动中国近代科学体系的建立和发展。英国传教士傅兰雅在译馆任职30余年,翻译介绍科技书籍多达139部。广学会出版的大量西学译著,学科范围广,门类多,内容丰富。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在广学会任职25年,光他一人所译之书就达百余种。意大利籍传教士马尔蒂诺所写的《中国新地图集》一书,不仅成为欧洲人研究中国历史地理的重要著作,也是中国人史地研究中的一部重要著作。

文化交流常常是有来有往、互相影响。传教士在将西学介绍、引进给中国的同时,他们也从中国人的生活方式中汲取营养,将中国的儒学经典和诗词戏曲等介绍给西方。

传教士们分别用拉丁文、西班牙文、意大利文、法文、英文、俄文等多种文字,撰写或翻译大量作品,将中国文化介绍给西方。例如英国传教士理雅各,自1861年起出版英译本《中国经典》28卷,将中国儒家经典中的四书五经、诸子学说等系统完整地介绍给西方,在西欧各国受到热烈欢迎。有些英译本迄今在西方仍是标准译本。传教士创办的期刊,也为向西方介绍中国作出很大努力。这些出版物成为西方了解中国的重要渠道。

### 一、耶稣会士来华

文艺复兴运动在制造资产阶级“古典”文学艺术的同时,也孕育了近代自然科学,近代文学艺术的繁荣为自然科学从神学中解放出来创造了必要的社会条件。新人文主义思想和人类应该了解并驾驭大自然和世界的观念,揭开了欧洲影响世界的时代。地理大发现既是寻找发财致富的来源,也为十字架提供了更多可以征服的地区。随着葡萄牙、西班牙和荷兰等国对远东的殖民扩张,传教士也紧随其炮舰开始叩击中国大门。

耶稣会由西班牙贵族依纳爵·罗耀拉于1534年成立,1540年时罗马教皇保罗三世颁发谕旨,正式批准耶稣会成立,其成员统称为耶稣会士。它的宗旨是重振罗马教会,为欧洲资本主义效劳。葡萄牙国王约翰三世于1540年要求

## 耶稣会士来华

罗马教皇保罗三世派遣传教士到中国活动,次年耶稣会总会长罗耀拉即派西班牙贵族方济各·沙勿略东来。沙勿略于1552年10月到达广东台山县正南海的上川岛,但无法进入广州,于同年12月因病死于该岛,时年46岁。后天主教人士称沙勿略为“远东开教之元勋”。



17世纪时的利玛窦与徐光启画像。

葡萄牙人后来获得明嘉靖帝(1522—1566年在位)批准,在澳门交纳地租,建屋居住。就此,以澳门为大本营,传教士们便接踵而来。16世纪末来华的传教士大都具有丰富的科学知识,他们均以近代科学知识为“敲门砖”,藉此迎合中国百姓心理,在宫中立足,开展传教活动。

耶稣会上来华后,在传播西方科学技术知识中,既与在朝的上大夫如徐光启、李之藻等人关系密切,也深得自明代万历至清代乾隆时期的皇帝的赏识,从而在明末清初之际出现中西文化交流的高潮。在耶稣会士中比较著名而又掌握一定科学知识者,计有意大利人利玛窦、德国人汤若望、比利时人南怀仁、意大利人艾儒略、法国人金尼阁和白晋等。其中利玛窦成为天主教在中国的奠基人。

利玛窦(1552—1610年)出生于意大利中部的马切拉塔城(Macerata),他出生之日正是西班牙传教士方济各·沙勿略在中国广东上川岛去世之时,这当然纯属巧合。利玛窦自幼聪颖好学,在神学院毕业即到澳门专心学习中文,后于1583年9月来到广东肇庆,成为在中国内地开教的创始人。利玛窦说中国话,穿僧装,见人鞠躬打揖,见高官还欠身下跪,他说来中国不为传教,而因“仰慕中国文化政治而来”。然而来华二年半,到1585年底只收得教徒20来人。利玛窦于是改弦更张,提出以“科学”与“儒学”并举,采取迂回办法和间接传教,即先从“科学”入手,让中国人对西方科学产生兴趣,进而再接受西方上帝的教理。此外,利玛窦还建议罗马教廷多派遣一些有学问的传教士到中国,因此在明清之际来华的传教士中,确有许多人是博学多才者。由此使耶稣会士在华传教的同时,掀起了传播科学知识的热潮。

这位“身穿紫袍,头戴黑色高冠,长着一部卷曲的美髯,

长面、隆准，气宇轩昂”的老夫子，在北京定居后，终日与公卿、士大夫周旋，居然受人尊敬，每天拜访他的人平均有 20 多，明廷也不让他纳税，而由中国皇帝出钱，以维持耶稣会士的生活。1610 年 5 月 11 日下午 6 时，利氏因病去世，时年 59 岁，但在华传教已 28 年。万历皇帝认为利氏“慕义远来，劝学明理，著述有称，宜加优恤”，故打破惯例，特划地一块，葬于北京。今北京阜城门外车公庄处一幽静庭院内，碑石正面一行工整的汉文大字——“耶稣会利公之墓”，这里就是这位意大利传教士的长眠之地。

利玛窦以介绍西学为传教开路，其中文译著共有 19 种，编入《明史·艺文志》的有 6 种，被《四库全书》收录或存目的共 13 种。利氏在最后书写的一封信中强调：“派往中国的传教士，不但要好，还应该具有才能，因为我们所要与之接触的人，都是智慧高强而学问渊博的人。”16 世纪末、17 世纪西学的输入，加深了中国人对西方世界的认识和观念的更新，也深刻影响着中国的士大夫阶层，利玛窦拉开了这一沉重历史的帷幕，可以这样说，“西学东渐”正是从利玛窦开始的。

## 二、地理知识的传播

利玛窦在留居广东肇庆期间，特意将一幅以西文注释的世界地图悬于传教士住宅大厅内，引起当地富绅和士大



夫的极大兴趣,视为奇图。当时岭西按察副使王泮要求利氏将该图译成中文,以便刊印。为此利氏于1584年编制了一幅《山海輿地全图》,刚编制好便立即刊印。由于时间仓促,刻工不慎,图中讹误很多,但仍被中国人所珍视,被多次印刷,还成为馈赠亲友的礼品。

利玛窦在南昌、南京、北京等地多次编绘世界地图,其中以1602年在北京由李之藻刻印的《坤輿万国全图》为最精详和最完善。该图以奥尔蒂利乌斯(1527—1598年)1570年世界地图为蓝本,参照多种中国地图、地志,采用平面投影法,纬线为平行线,经线为曲线绘成。全图及附图均有注释,另附太阳入赤道纬度等表。为迎合“中国居中,海环其外”的传统心理,利氏特将中国从原图的东面移至中央,本初子午线纵贯而过。

利氏在这幅改绘的世界地图中,将西方的经纬度制图法、五大洲(亚洲、欧洲、南北美洲、非洲、南极洲)的知识、地球说和五带(热带、南北温带、南北寒带)的划分法等传入中国。更重要的是,该图还纠正了以往西方地图上中国部分的讹误,创定了一批洲、海地名以及地理学上专有名词的中文译名,例如亚洲、欧洲、大西洋、地中海、罗马、古巴、加拿大以及地球南北极、南北极圈和赤道等一直沿用至今。从这一意义上来说,中国人对欧洲和世界有比较正确的了解,确从利玛窦开始,利氏可谓是中国地图科学由传统走向近代这一转折时期的关键人物。

西方传教士带来地理方面新知识新观念的,除利玛窦外,还有金尼阁、庞迪我、毕方济、南怀仁、蒋友仁和艾儒略等。南怀仁的《坤輿全图》于1674年分成两卷付印,上卷总述自然地理,下卷分五大洲叙说,最后是四海总说,分绘两个半球。该图已增绘了澳大利亚洲。1761年蒋友仁也向康熙进呈《坤輿全图》,1767年正式刊印,也是两个半球图,高6尺,宽14尺。在上述地图中,无论是内容、绘制方法还是理论等均未超出利玛窦的水平。金尼阁带来中国7000余部欧洲图书,全面介绍欧洲的山川地理、风俗民情、物产技艺和政教武备等,向达先生认为金氏也是将西学传入中国的功臣,其贡献“比之玄奘取经西竺,盖不多让”。

和利玛窦一样,艾儒略也是意大利籍耶稣会上,他于1610年到澳门,数年后入北京,还曾到上海、扬州、陕西、山西、杭州、福建等地传教,后于1649年死于延平。他于1623年刊印的《职方外纪》,是在中国出版的第一部中文版世界地理著作。该书共5卷,系统介绍世界五大洲各国的风土、民俗、气候和名胜。第一卷亚细亚,第二卷欧罗巴州,在全书中占篇幅最多,卷首列欧洲全图,然后分成各节,详细叙述欧洲的方域,列国、风俗、饮食、服饰、气候、物产、宫室、制度、立学、设官、宗教、政刑、武备等内容,详尽而具体。第三卷利未亚(非洲),第四卷亚墨利加(美洲)和墨瓦蜡泥加(泛指南极),第五卷四海总说,专述海洋知识,列举海名、海岛、海族、海产、海状、海舶和海道等。

该书也纠正了中国古人所说“天圆地方”的错误,但被收入《四库全书》后,在其《四库全书提要》中却说,该书“所述多奇异,不可究诘,似不免多所夸饰,然天地之大,何所不有?录而存之,亦足以广异文也”。这轻描淡写,不符合实际的评论,反映出中国一小部分知识人士的幼稚无知。

### 三、测绘中国地图

1662年康熙帝执政后不久,为巩固统一,便展开大规模战争。在戎马生涯中他深感地图的重要,但在旧有的中国地图中,或模糊不清,或简单缺漏,甚至讹误百出,于是测绘新地图的念头油然而生。在1687年来华的5位法国耶稣会士中,白晋和张诚留京都供职,为康熙讲授西方自然科学。张诚还陪同康熙狩猎,很快学会汉语和满文,并多次充当译员。1689年张诚进呈康熙一幅亚洲地图,但中国东北部分无资料而空白,遂向康熙建议组织一次全国性普查,绘制新地图。康熙在定下测绘全国及分省地图的决心后,一面在传教士中广罗有关专业人才,一面遣传教士白晋回欧洲招聘人才和置办仪器设备。

1707年至1717年,由白晋、雷孝思、杜德美及德国传教士费隐等人率领,由传教士和华人组成的测量队,先后完成对万里长城、东北、朝鲜边境图们江、松花江一带,直隶、满洲、长城西部、蒙古、新疆、陕西、山西、山东、河南、江南(今

江苏、安徽、浙江、福建)、台湾西部、江西、广汉(今广东)、广西、四川、云南、贵州、湖广(今湖北、湖南)的测绘工作。西藏和朝鲜地图委托他人测绘,最后由杜德美、雷孝思审核。

雷孝思是测量工作中的中心人物,一丝不苟,工作态度极其认真负责,他在一封信中曾说到:“我可以向你保证,我们没有忘记可以使我们把工作做好的一切事情。我们亲自访问了各省一切的重要城镇。我们查阅了各地官府收藏的舆图与史书,我们询问了官吏和各村的耆神。我们也从未停止实地测量。”1717年1月1日,最后一批参与测绘的传教士返京,至此长达10年,足迹几乎遍及整个中华版图的宏伟工程终于告一段落。

1718年,由杜德美主事,总揽关内15省,关外满、蒙、朝全境都测绘成图,成总图32幅,总称为《皇舆全览图》最后编制完毕,并进呈康熙御览。面对该图,康熙感慨万千,发出“朕费三十余年之心力,始克告成”的喟叹。图按1:400000比例制成,纵横数丈,合之可为一图,分之局部也可为一图,但其中尚缺西藏全部及蒙古最西部。此图于1717年初版本刻共28幅,翌年出满文铜版,由意大利传教士马国贤手刻。最末版于1721年木刻而成,其形状同第一版,但西藏部分已有所加强。

《皇舆全览图》的制成,不仅在中国,也是世界地图测绘史上的空前壮举,它打破连续使用700余年的网格法,标志着中国地图科学跨入近代行列,由于当时西欧各国还未完

成本国大地的测量,故中国这一划时代的工作,已经走在世界各国科学水平的前列。这一成就的取得,是与依靠传教士及引进西方近代科学分不开的,传教士是这一伟大工程的组织者和执行者,他们几乎承担了全部的测绘工作,在东至台湾,西至哈密,北抵贝加尔湖,南临云贵的广大地域范围内,处处留下他们的足迹和洒下的汗水。当时测量工具极其简陋,只能用绳丈量,并用三角法测量,结合观察天体测法来确定经纬度。同时绘图时也开始运用梯形投影法。李约瑟认为,《皇舆全览图》“不但是亚洲当时所有的地图中最好一幅,而且比当时的所有欧洲地图都更好、更准确”。清初全国地图测绘的情况和资料,经传教士们带回西方,1735年巴黎出版有杜赫德著《中国地理历史政治及地方全志》一书,其所有资料,均来自从中国回去的传教士们的文稿,成为中国与世界各国有来有往,双向文化交流的一部分。

康熙年间的地图测绘,在世界地图测绘史上有两件事非同寻常:其一为尺度的具体规定。康熙规定每200里合地球经线一度,每里1800尺,每尺等于经线的1%秒。这种以地球形体定长度之法在世界上是最早的,例如法国要到18世纪末才以赤道之长来定米(公尺)制长度;其二,由于传教士们的精心测量,首次发现地球经度的长度因纬度高下而有所不同,例如北纬47度处比41度处测得的每度经线的长度大258公尺,纬度越高,每度经线的直线距离越

大。正当英国牛顿的地球扁圆说和卡西尼的长圆说彼此对立、尚无定论之时,从中国大地测量得来的第一流成果,为牛顿的扁圆说提供了强有力的科学根据,成为世界科学史上的一项重大贡献。与此同时,关于大地球形之说也终于在中国知识界取得合法地位。

《皇舆全览图》的不足及遗留问题,至乾隆时才基本解决。于1761年完成的《西域图志》成为以后所有新疆地图的蓝本。西藏叛乱平息后,乾隆又组织人继续测绘,参加者除负责测量天山以北的何国宗、天山以南的明安图(蒙古族)外,传教士再次扮演重要角色。傅作霖、宋君荣、高慎思、亚洛沙等在新疆部分测绘中,承担了大部分工作。1761年传教士宋君荣、蒋友仁等在中国学者配合下,在《皇舆全览图》基础上,根据新完成的《西域图志》及西藏的测绘资料,增订编制成以亚洲大陆为主,分成两半球的中外大地图《乾隆内府铜版地图》,又名《乾隆十三排地图》。<sup>①</sup>该图宽十二尺半,高六尺半,采用梯形投影法,比例为1:15000000,图幅范围较《皇舆全览图》大一倍以上,其范围涉及北至北冰洋、南至印度洋、西达红海、地中海和波罗的海,尤其在西域部分,即西藏地区大有充实,成为一幅极其精确完备的亚洲大陆全图。中国在制图方面又一次走在世界各国前列,传教士所作的努力,功不可没。

---

<sup>①</sup> 因在地图分幅上,每纬差5度为1排,共13排,故名。

#### 四、天文数学的传播

明末清初,在传教士参与下的中国学者,编译了一批介绍西方天文学和数学知识的书籍。明末的政治家、科学家上海人徐光启,对西方的天文学非常感兴趣,不仅掌握许多新知识,且应用到天文观测的实践中去,他的天象预报常比别人准确,因而有很高威信。明代使用的大统历,到万历三十八年(1610年)日食10多次,误差已达一二刻以至四刻。该年十一月朔日食时,钦天监和春官正戈谦亨等预测都不正确。1629年,钦天监根据大统历、回回历推算的日食,结果又未验准,历法改革势在必行。明崇祯二年(1629年)为推行历法改革所组建的历局,于农历9月22日正式开局,并命徐光启督率一切,李之藻辅助之。从崇祯二年至七年(1629—1634年),在由徐光启、李天经先后主持领导下的历局,聘请龙华民、邓玉函、罗雅谷、汤若望等传教士们参加修历,五次缮写进呈历书共137卷,由徐光启主持编制,徐去世后由李天经续成,书名为《崇祯历书》,又名《西洋新法历书》,但因明王朝灭亡而未推行。1645年汤若望呈上用西法推算的《时宪历》被采用,颁行天下。汤若望受命主管钦天监。该书系统介绍欧洲天文学知识,突破了我国两千年传统天文历法的框框,对中国天文学发展产生很大影响。书中不但介绍哥白尼、第谷·布拉赫、开普勒等人的天文数

据和最新科学成果,而且还引入了地球经、纬度的概念,还有一些有关的测定和计算方法等。

西方的天文仪器也随传教士一起传入中国。利玛窦、庞迪我来中国时都带有天文仪器。1583年1月利玛窦到广东肇庆后,“间制地图、浑仪、天地球考、时晷、惜时之具,以赠于当道”。利玛窦带来的望远镜又名千里镜,在当时该是很先进的,连那些将西方科学技术视为“奇技淫巧”,不屑一顾的反对派,也不得不承认“彼夷所制窥天窥日诸器,颇称精好”。

1622年来华的德国传教士汤若望向顺治皇帝进献新历法,被委任为钦天监监正职务,并掌握钦天监大印和人事权,建立北京皇家天文台,后升任工部右侍郎,是在中国当官得势的极少数外国人之一。他著有《新法表异》宣传新历法,并革新许多天文仪器。他于1622年来华时,也带来欧洲新式天文望远镜,后又将塞都利1616年在法兰克福出版的著作译成中文,名为《远镜说》。书中不但介绍望远镜的原理、制造和使用方法,而且对光在水中的折射和光经过凸透镜使物像放大等现象都作详细解释。可以这样说,西方光学的传入中国,是从汤若望的《远镜说》开始的。汤若望于1634年正式安装了一架名为“窥筒”的望远镜,对中国天文望远镜的引进以及仿制作出很大贡献。

汤若望在中国共写有著作28部,核心部分均是天文学,传播西方的天文历算科学知识不遗余力。如果说利玛



窠是中国精神世界的真正发现的话,那末汤若望却是第一个接近中国皇帝、并利用出任朝廷大员而促使西学东渐的耶稣会士。耶稣会士从欧洲携带来华的仪器数量可能是很多的,金尼阁在书函中云“余从各王公大臣所征集及在各地所收购之各项测量仪器与制造仪器之机械,种类之多,品质之精,可谓已一无所缺。即此一书藏与仪器,在离欧时值一万金币”。有那么多贵重仪器作依据,耶稣会士的各项科学研究及技术工作才能充分展开。

1659年来华的比利时传教士南怀仁,康熙时在钦天监任职,他曾先后革新了黄道经纬仪、赤道经纬仪、纪限仪、象限仪、天体仪和地平经仪等6种天文仪器,这些仪器1674年被安置在北京观象台。他在《灵台仪象志》著作中,绘画说明其制造和使用方法,还有用该仪器所测得的各种记录。汤若望病死后,南怀仁继承汤的官位。1716年来华的德国传教士戴进贤,乾隆时曾在钦天监做官,并讲授17世纪德国科学家开普勒发现的行星运转的椭圆轨道,以及牛顿计算地球与日、月距离的方法,这在当时都是从西方传入的最新科学知识。戴进贤等添置的天文仪器计有地平平面日晷仪、简平仪、三辰简平地平台璧仪、地平经纬仪、星晷仪、四游表半圆仪、方矩象限仪、三辰公晷仪、看朔望入交仪、六合验时仪、方月晷仪等。1744年来华的法国耶稣会士蒋友仁,在他那于1767年制印的《坤輿全图》中,系统介绍哥白尼的日心说,论述地球运动的原理,自此以后哥白尼、伽利

略关于行星体系的理论始在中国得到传播。

从西方传入的数学知识主要有欧几里得几何学、算术笔算法、对数和三角学等。利玛窦在北京期间由他口译、徐光启笔述的古希腊欧几里德的《几何原本》6卷，为西方传教士来华后引进的第一本西方数学名著。稿本所用的是利玛窦老师德国数学家克拉维斯的注释本，全书15卷，利氏在译完前6卷之后，不再答应徐光启译完全书的要求。中国古代的数学，只有平面图面积、内外切圆、平行线等理论表述方式，不及西方数学精密，故这本充分公理化的著作，对于欧洲天文学、数学基础的几何学的了解和研究，都是非常重要和有益的。由于该书的原版是欧洲最权威的经典教本，故不仅大大丰富了中国传统的几何学内容，也完善了它的表述方法，对中国数学发展产生重大影响。

徐光启和利玛窦对《几何原本》译文倾注很大心力，再三修改，其间所遇到的困难自然不在话下，对此利玛窦曾说，此书“东西文理，又自绝殊，字义相求，仍多阙略，了然于口，尚可勉强，肆笔为文，便成艰涩”，为此而“每患作辍，三进三止”也是常事。自明至清，该书一再刻印出版，书中所确定的一些数学专用名词如几何、点、线、角等译名一直沿用至今，并影响日本、朝鲜等周边国家。梁启超曾称赞该书“字字精金美玉，为千古不朽之作”。《四库总目提要》则称该书为“弁冕西术不为过矣”。

德国数学家克拉维斯注释本《几何原本》的后9卷，

1857年时由我国数学家李善兰与西人伟烈亚力·维利翻译出版,此外,李善兰还有《代数学》中译本,这样使西方的代数学、解析几何和微积分等相继传入中国。

继《几何原本》翻译外,又有利玛窦口译,李之藻笔录的笔算著作《同文算指》在1613年编成,1614年有北京刻本,亦被收入《四库全书》内。这部依据克拉维斯《实用算术概论》和程大位《算法统宗》编译而成的书,是最早介绍欧洲笔算的著作,这种笔算方法简便可行,与现今算法相近,其中“以减试加”、“以除试乘”等验算方法、比例级数等内容在我国古代数学中是没有的,可谓是中西算术首次汇合成一股潮流,因此被清代数学家继续加以改进,进而普遍推广。除此以外,利玛窦还有《圜容较义》、《测量法义》、《测量异同》和《勾股义》等,都是介绍西方数学的著作,其内容涉及数学的大部分领域。《几何原本》和《同文算指》等著作的翻译出版,谱写了欧洲数学传入中国、中西文化交流的新篇章。

## 五、康熙皇帝与自然科学

清朝入关以后的第二位皇帝康熙,即爱新觉罗·玄烨(1654—1722年),是位爱好自然科学的皇帝,他在天文历算方面的基础扎实,对西方近代科学技术的传入持积极态度,对于当时中国与西方在科学技术方面的差距,也有较为清醒的认识,他曾公开在朝廷大臣面前说,如果就天文、绘画、

科学、技术等方面言之,中国人与西洋人一比,中国人不过是个小孩。他曾向传教士南怀仁学习欧几里得几何学,后来又学测量、天文、物理和医学,在宫中设置研究化学和药学的实验室,还请耶稣会士白晋和张诚进宫学满语,以讲授数学。康熙还派白晋于1639年赴法,募集科学著作和征引科学家来华。1713年康熙还在畅春园蒙养斋设算术馆,培养八旗世家子弟30多人学习算法。凡由外文译成汉文的数学和天文学著作,他都认真阅读,积极钻研。在康熙丰富的自然科学知识中,相比而言,在数学、天文学和测量学方面最精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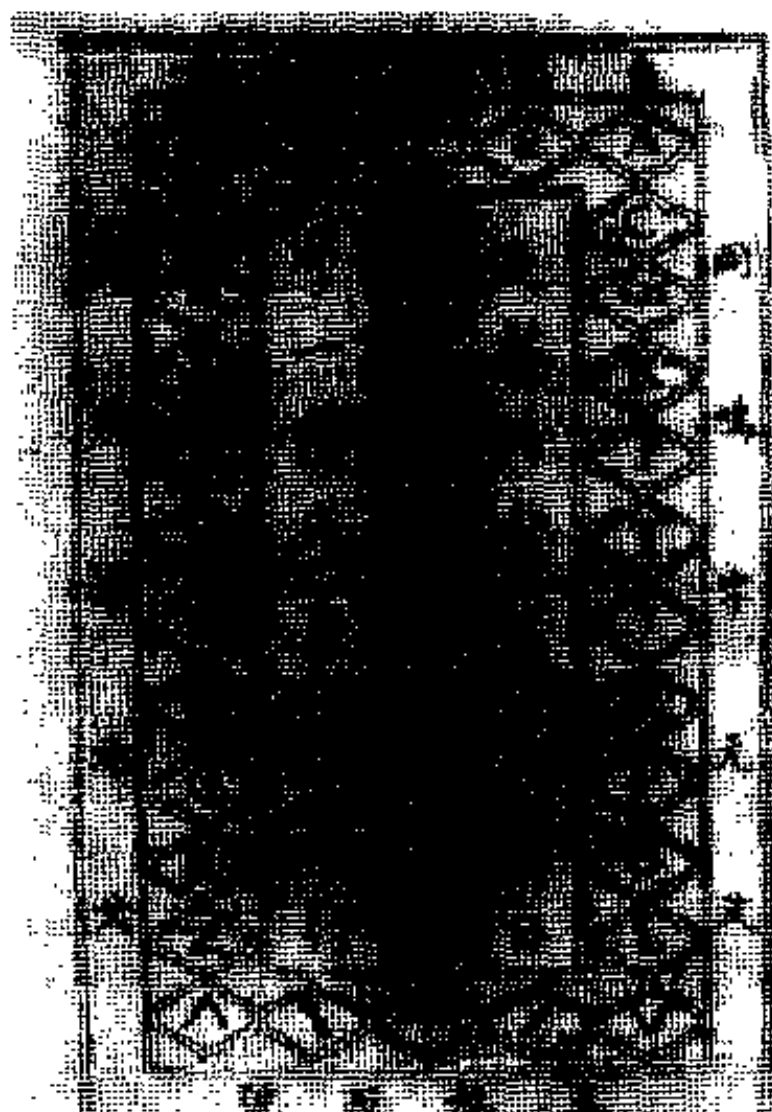
在康熙的大力支持下,自1690至1721年编成的《数理精蕴》是介绍西方数学知识的百科全书。该书共53卷,上编5卷,下编40卷,又表4种8卷。该书是在法国传教士张诚、白晋等人译稿教本基础上,由梅压成等人汇编成的。该书主要内容为详细介绍自17世纪以来传入中国的西方数学,如几何学、三角学、代数和算术知识等,主要的有《应用几何》、《几何原本》、《算法原本》、《算法纂要总纲》、《借根方算法节要》、《勾股相求之法》、《测量高远仪器用法》、《比例规解》、《八线表根》等中译本。当中还介绍了波兰传教士穆尼阁传人的对数及其用表,还介绍英国数学家耐普尔发表的对数法,所列对数都是小数6位。对数法有很大的实用价值,在历法计算中还普遍应用。书中的对假数尺(西洋计算尺)也有详尽说明。《数理精蕴》出版后广为流传,是一

本学习和研究西方数学非常重要的书籍,对中国数学发展产生重大影响。

## 六、出版字典和《圣经》翻译

外国传教士来华后,首要任务是学习中国语文,于是便有了字典编纂和用拉丁字母为汉字注音等举措,并陆续编制出一些为汉字注音的书籍。如利玛窦制成第一套拉丁化的汉字注音方案《西字奇迹》一卷,于1605年在北京印行,郭居静、庞迪我(1571—1618年)等人也编出这类工具书,并早就在教会内部流传。每当碰到不懂或难懂的汉字时,只要随手一翻,便能查出汉字的音、义,非常方便。法国传教士金尼阁(1577—1628年)来华后,应中国学者韩云邀请,于1624年去山西传教,住宿韩家,从未接触过拼音文字的韩云,对金尼阁随手翻阅的小册子大为惊奇,两人在日常生活中互帮互教,切磋交流,最后修订改编成为我国最早一部拉丁文拼音的汉字字汇《西儒耳目资》。

该书共3册,书上题名为泰西金尼阁撰述,晋絳韩云论订,秦泾王徵校梓。于明代天启五年(1625年)夏开始制印,次年春在陕西刻成,后来又有杭州刻本。该书第一册《译引首谱》是总论,主要讲编撰经过、意图和音韵学的基本知识;第二册《列音韵谱》,是讲从音查字,即汉字按音序排列;第三册《列边正谱》,是讲从字查音,即汉字按部首排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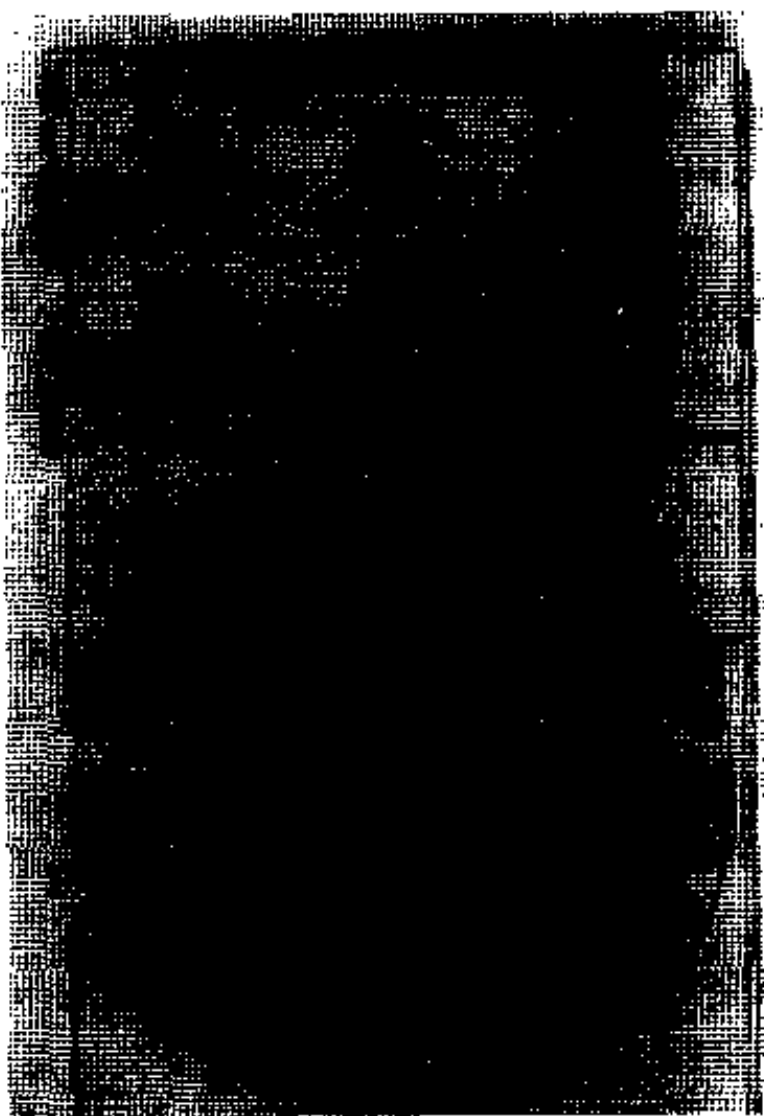
法国传教士金尼阁与中国学者韩云撰写的《西儒耳目资》一书。

该书所用的字母实际上只有5个“自鸣”和20个“同鸣”的字母，就靠这25个字母的互相结合，再加上5个字调的记号，就能把汉字的读音一一拼切出来。

《西儒耳目资》一书出版后，在明清两代产生巨大影响。当初利玛窦、金尼阁等人利用拉丁字母为汉字注音，其本意

非为改革汉字，而是出于肯定汉字和学习汉字，但在西学传入之后，经过中国学者的借鉴、对比和吸收后，都因感到“海错争奇，鲜新可味”而立即抓住这一新概念、新方法和新符号，在中国语言学和拼音化道路上取得一系列进展。明代

学者方以智极其推崇该书,以《通雅》卷 50 切韵声源,提出按照拼音文字来改革汉字;杨选杞在清初模仿金尼阁拼音方案,制作成中国第一套汉字拼音方案;刘选廷在清初著有《五经难字》和《五经叶韵》,首次提出以字母标音为前提的方言调查方案;龚自珍在上述一系列基础之上,提出



《西儒耳目资》一书中的“万国音韵活图”。

了“由声音到语言,再到文字”的语言学理论。金尼阁在其自述中说该书“在使中国人能在三天内通晓西方文字体系”,此话虽可能有点夸张,但该书确实凝聚着中法两国学者的心血,拓展了文字拼音化新的道路,成为中国近百年来所兴起的汉字改革运动的前驱,因而在中西文化交流史上

的功绩不可磨灭。

英国传教士马里逊(1782—1834年)于1807年5月来华,因在中西文化交流史上的杰出贡献,被誉为“欧洲第一汉学家”。早在来华之前,马里逊就接到伦敦教会指示,要他努力学好汉语,在此基础上如有可能,再编一本字典或翻译《圣经》。马里逊抵达中国后,便请数位中国人教授汉语,终日埋首四书五经之中,汉语水平大有长进,并根据伦敦教会的指示,自1808年起开始翻译《圣经》。

基督教经典《圣经》包括旧约和新约两大部分,尽管从基督教在唐代被称为景教起,传入中国已有1200余年历史,但一直无人译介《圣经》。从17世纪初在中国西安出土的一碑刻上得知,公元7世纪时已有人开始翻译《圣经》,并有部分译本在中国流传,但早已失传。约于1700年,巴黎外方传教会的巴设译述了部分《新约》。18世纪末又有耶稣会士贺清泰完成了全书的翻译,但均未在中国刊行流传。马里逊以来华前从大英博物馆全文抄录的巴译本为基础,首先译《新约》,译完一章出版一章,经过5年努力,于1813年全部译毕,随即在广州雇工秘密刻印,共印2000余部,耗费3818元西班牙银币。接着从1814年起,与助手米怜一起着手进行《旧约》的翻译,并采取边译边出单行本的办法,费时5年,于1819年11月25日译完。马里逊高兴地向伦敦教会报告说:“上帝保佑,新、旧约全文的中文翻译已在今天结束。”



《圣经》全书翻译,前后历时达 11 年 3 个月之久,经过仔细修订,于 1823 年将新、旧约合而为一,按中国古书样式在马六甲正式出版,采用古汉语,定名为《神天圣书》,共计 21 卷。汉语全版《圣经》诞生后,不但在中国流传很长时间,而且也对以后各种各样中文版《圣经》的翻译出版产生很大影响。首部中文版《圣经》的问世,不但使中国读者有机会完整地窥见既是基督教经典、又是西方文学和历史巨著的全貌,而且也与世界人民一道品尝这欧洲文化的精品。《圣经》在东西方文化交流史上所占有的重要地位,其意义远远超越宗教本身。据一项统计资料得知,自 1823 年马里逊的古汉语全译本《圣经》出版起至 1988 年止,在这 160 余年间,中国共发行《圣经》3 亿余册,它使一部分中国人接受基督教的伦理思想,改变原有封建社会的生活方式和道德规范,为传播基督教文化作出了贡献,同时也对中国人的社会文化生活产生很大影响。

马里逊在翻译《圣经》的同时,《华英字典》的编纂工作也从 1908 年起逐渐展开。他在给伦敦教会的一份报告中谈到,自从他在东印度公司任职后,“在翻译官方文件的同时,我可以编纂字典。我希望这部字典会给以后来华的传教士,提供极为重要的帮助”。可见编纂这本字典的初衷是为来华传教士攻克语言关提供方便。编纂字典是项极其繁琐而浩大的工程,这对一位来华不久、刚刚涉足中国的外国人来说,其困难是可想而知的。马里逊每天花 6—8 小时编

纂字典，锲而不舍，日积月累，经过相当长时间坚持不懈的努力，终于独立完成了《华英字典》的编辑工作。

《华英字典》共6卷，8开大本，长达4595页，仅从《康熙字典》中收进的汉字加以英译就达千万余字。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字典》3卷，分别于1815、1822、1823年在澳门出版。它以《艺文备览》为蓝本译就，汉英对照，汉字按部首笔划顺序排列，英文释义，后附字母索引。第二部分为《五车韵府》共2卷，分别于1819、1820年问世，也是汉英对照，依音标按英文字母编定，还有索引和表格，在附录中按拼音将汉字的楷书、行书、草书、隶书、篆书、古文六大类作概要介绍。第三部分为《英汉字典》一卷，于1822年在澳门出版，内容有单字、词汇、成语及句型的英汉对照，诠释详尽，例句皆有汉译。1823年11月，《华英字典》巨著全部出齐，耗资12000英镑。

《华英词典》从着手辑译到正式出版，前后费时15年，完全以个人力量在极端困难的状况下完成，令人折服。该字典的诞生不但成为中国英汉字典的嚆矢，更为东西方文化交流创造了方便条件。早在18世纪初时，天主教传教士已编纂过多种版本欧洲文字与中文相对照的字典，但因大多采用鲜为人知的拉丁文，且释义欠详尽而流传不广。马里逊所编的这本字典无论在收字数量或词义诠释上都远胜于这些字典，又取英文翻译，因而在欧洲引起广泛重视，大大促进汉学在西方的发展。

《圣经》和《华英字典》在中国的出版,使马里逊声誉大振,被誉为“欧洲第一汉学家”,1817年时他被英国格拉斯哥大学授予神学博士学位,数年后又成为英国皇家学会会员,英国国王乔治四世(1820—1830年)鉴于马里逊在沟通中英文化交流方面所作的贡献,也通过他的大臣传旨:“对这位绅士的卓越的和有用的工作表示他的高度嘉奖。”

### 七、“西学热”中的三大翻译出版机构

科学技术书籍的编译出版,是向西方学习科学技术知识的重要手段之一。鸦片战争以后中国翻译西方科学技术书籍的工作陆续开展起来。民间的翻译机构出现较早,例如英国传教士麦都思(Medhurst Walter Herty, 1796—1857年)于1843年在上海建立“墨海书馆”,不久北京同文馆内也有译书机构,终于在晚清“西学热”中形成三大翻译出版机构。传教士的译书出版活动,在西学传播中起很大作用,可以这样说,晚清中西文化交流的重要内容之一,是以一个翻译运动伴随或作为前驱的。

美国传教士丁韪良(1827—1916年)于1865年出任京师同文馆英文教习,1869年11月出任该馆总教习,培养出一批翻译官和外交官。同文馆是外语学校,但译书也是同文馆的一个重要方面,丁韪良不仅主持译书的组织工作,他本人或与他人合作编译各类书籍10余种。就其外文文种

## “西学热”中的三大翻译出版机构

---

来说,同文馆所译书籍有英文、法文等,但内容非常广泛,主要有国际国法、西方法律、政治经济学、历史、算学、格物、化学、地理、历法和医学等。丁在同文馆任英文教习后,曾为学员开设富国策课程,将西方政治经济学介绍到中国来,后把英国人一本名为《政治经济学提要》的书翻译过来,中文名《富国策》,相传此为西方政治经济学中的首部中译本。

丁韪良在自然科学方面的三种译著为,1868年京师同文馆印发的《格物入门》7卷,专门介绍西方的数学、物理和化学等科学技术新知识。1886年时又将该书中的测算一卷扩充为《格物测算》8卷单独出版,倡导在各门自然科学的相关学科中结合起来学习。1889年又在旁人协助下,修订《格物入门》、《增订格物入门》两书,由李鸿章作序,被人誉为“以开学人之心思,以利生民之日用”。尽管上述书本的内容比较浅显,但当时中国十分紧缺,故对于近代自然科学知识的普及仍有积极意义。该书1868年在北京同文馆刊印后,第二年就传入日本,并出版了训点刻本,而且也分为7卷,即水学、气学、火学、电学、力学、化学、算学。

相比较而言,丁韪良与他人合作,用中文编译的8种国际法及外交学方面的著作,比较实用而受欢迎。特别是《万国公法》一书为当时国际法方面的权威之作。丁韪良在译书过程中,要求清政府派员为译稿作润色,并出钱刊刻。清政府考虑到该书可能对外有用,故不久恭亲王奕訢派陈钦、李常华、方浚师、毛鸿图4人前去作助手,并拨银500两于

1864年由北京崇实馆刊刻出版。丁韪良8种书中的5种是在同文馆任教期间编的,即1877年的《星轺指掌》4卷,1877年的《公法便览》6卷,1880年的《公法会通》10卷,1883年的《陆地战役新选》,1884年出版的《中国古代万国公法》。

丁韪良的《万国公法》为中国近代外交的理论与实践指南,对清政府的对外关系产生一定影响,给那些长期处于长期闭关自守、与世隔绝的官员,带来当代国际关系方面的新知识,具有求知的启蒙作用,有些官员还试图用国际法来解决中外交涉。该书又是中国第一代外交官必修课本,郭嵩焘、曾纪泽、薛福成、刘锡鸿等人在出使西方前均研读过此书。《万国公法》一书的内容,正是日本开国以后开展外交所需要的国际法知识,因此该书出版的当年就传入日本,第二年(1865年)就由幕府开成所训点刻印为6册本。1868年即明治政府成立这一年,该书同时又有三种日译本出版,到明治初年,该书的各种节译、全译的日译本不下数十种,里面的内容及一些词句被广为引用,风靡一时,现代日语中的“权利”、“义务”、“自治”、“主权”等词汇,都来源于《万国公法》,可见其影响之大。

江南制造局为李鸿章在上海创设的新式军工企业,在规模日趋扩大的同时,对各类专业人士的需求也越来越迫切,人们的眼光便不约而同投向西学。当时人们开始重视西学,与其说因为是来自西方之学,倒不如说因为这是中国没有的新学。1867年著名学者徐寿、华蘅芳供职江南制造

局,便有创设翻译馆之设想,后经曾国藩同意后,立即着手筹备一切。1868年6月,江南制造局翻译馆正式成立,与京师同文馆和稍后成立的广学会一起,成为我国第一代三大翻译出版机构之一。

早在开馆之前,徐寿等人已作了极大努力,争取得到英国新传教士傅兰雅的支持。开馆后便招兵买马,利用上海的有利条件,吸引广大中外学者任职,如美籍学者金楷理、伟烈亚力、林乐知,英籍秀耀春,日籍藤田丰八,中国著名化学家徐寿、徐建寅父子,数学家华蘅芳、华世芳兄弟、李善兰,医学家舒高第、赵元寿,通晓时事洋务的蔡龙九、郑昌棧等。众多学者和翻译家荟萃其间,极一时之盛,江南制造局翻译馆的优势是显而易见的。

1868年5月底,英国传教士傅兰雅(1839—1928年)正式受聘江南制造局翻译馆任译员,年薪800两银。在翻译书籍的选题上,徐寿和傅兰雅本想从基本的科技书籍着手,如翻译《大英百科全书》全部等,但清政府却要翻译一些紧要之书,主要是加速发展军工生产方面的书,如算学、化学、火药、汽机、炮法、防海、练军、开矿、采煤等实用方面的。1871年《汽机发轫》第一批书由江南制造局刊印出版,之后如《克虏伯炮图说》、《轮船布阵》、《冶金录》等相继问世。1879年,译馆共刊行译著98部,计235册,其中有关测量、汽机、电学、工艺、水陆兵法及行船等方面的书66部,计152册,占其总数的67%。

自 19 世纪 80 年代起,译馆在翻译一些应用类科学西书的同时,渐次将西方各门基础科学的著作,如数、理、化等翻译介绍过来,如《电学》一书 10 卷,《热学图说》2 卷,《光学图说》2 卷,《电学鉴原》及其《续编》、《补编》等相继推出,使和傅兰雅一起译书的中国一批近代科学家,逐渐掌握声、光、化、电和军工、矿冶等西方科学知识,推动中国近代科学体系的建立和发展。该馆还发行《西国近事汇编》(又称《中西记闻》),是一种译介外国时事政治的读物,起了新闻纸的作用。

译馆的译书工作看来是相当艰巨的,其方法为采取中西学者合译方法,据傅兰雅介绍,一般先由西人将要译之书“先熟览胸中,而书理已明”,再“以西书之义,逐句读成华语”,然后由中国学者笔录下来。西人如遇有“难言之处”,就与华人逐字斟酌。待译出初稿后,再由中国学者“改正润色,令合于中国文法”。中西合作,发挥双方之长,所以译出的文字通顺畅达,译书质量有了保证。

译馆人员呕心沥血,勤奋工作的精神令人敬佩,没有他们这种严谨的科学态度和孜孜不倦的工作精神,译馆就不会有如此辉煌的成就,在 1868—1907 年间,译馆刊行各种译本 199 种,销售达 6 万部,总数逾 16 万册。这些引进的西方近代科学知识,在晚清知识界风靡一时。西方近代科技知识的引进,也对当时陈旧的思想体系和价值观进行了冲击,一些爱国的旧知识分子在西学中吸取政治营养后,思

## “西学热”中的三大翻译出版机构

想观念开始转变,他们更加迫切希望向西方学习,改革中国现状,从而产生一批著名的改革家和思想家。

国外传教士在江南制造局译书馆中的工作时间,金楷理 9 年,伟烈亚力 8 年,林乐知 10 年,傅兰雅 28 年(1868—1896 年),他们一生中最好的年华即是在译馆中度过的。傅兰雅先后参与译书 129 部,其中 77 部由江南制造局出版,占该局西籍译刊总数的 47.2%,是译馆中译述最多的一位,可谓是中国近代史上最大的翻译家之一。傅兰雅晚年去美国,黄炎培先生 1915 年访美时在旧金山电车上碰到,他拉黄去他家小坐,这位老人说:“我几十年生活,全靠中国人民养我。我必须想一办法报答中国人民。……”近代来华的传教士数以百计,个别人曾以征服者姿态出现,并有与传教士身份不符从事搜集情报、干涉内政、欺骗人民的行为,具有傅兰雅上述这种心态者,恐怕是独一无二的吧!

于 1887 年 11 月在上海成立的同文书会,在 1892 年改称广学会,创办人为英国长老会传教士韦廉臣,此为基督教当时在中国所设立的最大出版机构,其规模和出版物数量大大超过江南制造局译馆及京师同文馆两家。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1845—1919 年)于 1891 年到上海,出任同文书会督办(当然也是广学会督办),扩充会务,增设售书局,到 1916 年卸任,任职长达 25 年,出版很多西学书籍,对中国有一定影响。李提摩太出版西学书籍,希望将中国上层社会人物作为读者对象,使这些人在知识上超过中国旧式文人,



以扩大在社会上的影响力,而“每一个与广学会有关的人士,他的最大目标就是推广基督教文明,只有耶稣基督才能提供给中国所需的这个新道德的动力”。

广学会在戊戌维新运动前后(到1902年止),所出版的西学书籍主要有1892年出版的《中西四大政考》、《五大洲各国统属全图》、《华英谏案定章考》、《八星之一总论》、《五洲各大国志要》、《白西徂东》。1893年出版的《性海渊源》、《治国要务》、《开矿富国说》、《国贵通商说》。1894—1897年出版的《泰西新史揽要》、《中东战纪本末》(初编和续编)、《印度隶英十二益说》、《中国变新策》、《醒华博议》、《新学汇编》、《文学兴国策》、《时事新论》。1899—1900年出版的《李傅相历聘欧美记》、《富民策》、《足民策》、《大同学》、《英国议事章程》等。此外尚有《万国原始志》、《邦交格致之义》、《近时格致之义》、《印度史揽要》、《广学类编》、《格物探源》、《格物须知》、《大英国志》、《天文地理》、《地理全志》、《知识五门》、《教化议》、《西国学校》、《三十一国志要》、《西铎》、《中西关系略论》、《列国岁纪政要》、《列国变通兴盛记》等。

从上述书名中可知,广学会译介的西学,涉及学科广泛,种类很多,内容丰富,既有西方各国的历史地理,也有数理化等自然科学的基础知识,既有社会学、国际政治和外交政策等,也有经济和文化教育等,其中有关论述资产阶级自由、平等、博爱、立宪制度、民主制度、议会制度、图书的出版和报纸创办、工业革命以后西方工矿企业快速发展等占很

大比重。李提摩太主持广学会 25 年,光他一人所译著的书,大小就有一百多种。

由美国传教士林乐知创办的《万国公报》,初为周刊,1889 年 2 月复制后改为月刊,也由广学会出版。该刊存在时间长,流行广,影响较大,例如光绪皇帝也阅读《万国公报》,而且还向广学会订购八九十种书籍。李提摩太出任广学会督办后决定将该刊变成变法维新的刊物,中日甲午战争期间,读者急于了解战况,故该刊的销售量大增。广学会通过《万国公报》以及大量出版物,所介绍西方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和地理历史等状况,这对当时中国知识阶层和一部分官吏,具有某些启迪新知,改变观念的启蒙作用,外国传教士对中国近代科学知识的传播和发展过程中所作的贡献,应该是值得肯定和纪念的。

在广学会所出版的大量著作中,影响最大者当为《泰西新史揽要》和《中东战纪本末》两书。前者原作者为英国人麦垦西的《十九世纪史》,由李提摩太翻译并作序,起中文名《泰西新史揽要》,于 1895 年出版,首版出 3 万册,在当时已是惊人的发行量了。该书叙述 19 世纪西方基督教文化史,全面介绍欧美各国资本主义发展状况,作为一本新书,有助于中国人全面了解西方各国近代史概况,具有一定求知的启蒙作用,梁启超为此称“《泰西新史揽要》述近百年以来欧、美各国变法自强之迹,西史中最佳之书也”。

由美国传教士林乐知(1836—1907 年)编译的《中东战

纪本末》，1896年出版初编8卷，翌年增出续编4卷，1900年又增出三编4卷，全书共16卷。该书刊载大量有关中日甲午战争（1894—1895年）史料，有战争的详细报道，还附有多篇传教士所写的论说。尽管林乐知在译序中对甲午战争的性质等有颠倒黑白，混淆是非，散布“弱肉强食”的殖民主义论调，但书中丰富的资料对了解甲午战争很有参考价值，对于那些想以西学为武器救亡图存的维新派人士来说，也能获得某些警示作用。

## 八、中学西传——向西方介绍中华文化

耶稣会上及其稍后的新传教士，除了将西学介绍来华外，也将中华文化介绍给欧美，西方也吸收东方文化，有人将此称为“东方文化的反弹”。继14、15世纪在欧洲风行一时的《马可·波罗行记》问世后，17、18世纪的耶稣会士又为将古老的中国文明传播至欧洲作出了贡献。当时耶稣会上来华传教的宗旨，与所有其他宗教来中国企图扩大其信仰范围的愿望相同，是一种正当的传教活动。耶稣会士大多是慕中华文明上邦之名而来，一面传教，一面传播西方的科学知识，同时也学习中国文化，传播中国文化。从16世纪末至17世纪初开始，直到19世纪中叶，耶稣会上们分别用拉丁文、葡萄牙文、西班牙文、意大利文、法文和英文，所撰写或翻译的作品有中国语法、会话字典、儒家经典、中国历

史地理现状调查(包括通信、日记和会务报告等)、中国文学艺术和工艺品翻译,创办外文报纸和杂志等,借此定期、大量地向西方介绍中国状况,在欧洲知识界和上流社会流传和宣扬,成为沟通中西文化交流的桥梁。

利玛窦在晚年善于撰写外国传教士在中国传教的经历。利氏于明代万历年间前期来华,对中国情况熟悉,由他来撰写这段历史倒是合适人选。1610年5月利氏病故,人们在他抽屉里发现了这份用意大利文书写的日记体手稿,共131张纸,每张约50行。金尼阁将手稿编纂成书,名为《利玛窦的中国札记》,一共分为5卷:第一卷全面介绍明代概况,主要包括历史地理、山川河流、风俗民情等;第二卷系统介绍耶稣会士来华从沙勿略病死广东台山上川岛和罗明坚立足肇庆府艰难困苦的经历;第三卷记载耶稣会在韶州、南京和南昌的开教经过;第四卷讲利氏两次上北京的经过;第五卷叙述利氏抵北京以后的大致情况。书中以丰富的资料记载,首次将16—17世纪中华帝国政治、经济和文化风俗等全貌进行描述,向西方“揭示了一个新的世界和一个新的民族”,成为西方世界了解“神秘东方”的重要文献。

耶稣会士来华后尽量使自己“中国化”,穿中国衣,说中国话,取中国名字,服从中国礼节,在皇上和大官面前下跪等。他们一般都通中国文字,能看、能说和能写,有的甚至博览群书,熟练掌握中国儒家经籍,其中部分人还是著名科学家和学者。当时欧洲流行拉丁文,利玛窦曾于1593年将

《四书》译成拉丁文寄回意大利,金尼阁曾于1626年将《五经》译成拉丁文,但译稿未留传下来,意大利耶稣会士殷铎泽和葡萄牙耶稣会士郭纳爵两人合作,将《大学》译成拉丁文,于1662年刻印出版时取名《中国的智慧》,后两人又合译《论语》。殷铎泽还于1667年翻译了《中庸》,名为《中国的政治道德学》。康熙晚年提倡研究《易经》对白晋和傅圣泽给予很多鼓励和支持,白晋前后费时6年,最后用拉丁文著有《易经要旨》。后来雷孝思也将《易经》译成拉丁文,并附有注疏。法国耶稣会上宋君荣的《书经》和钱德明的《孔子传》和《孔门子弟传略》对欧洲影响较大。耶稣会士克服无数困难,孜孜不倦研究中国儒家经典,主要的用意在于这是理解中国历史文化的必要知识,希望以中国哲学来论证天主教教义,便于传教,其用心良苦。也有个别传教士为扩大对中国经济的侵略活动有关,此外可能也与中国乾嘉时代的考据风有关。

新传教士将中国儒家经典介绍给西方,影响最大和最成功者,当推英国传教士理雅各(1815—1897年)。理雅各在将英华书院迁到香港后,着手研究和翻译中国儒家经典。1861年理雅各的第一卷《中国经典》英译本出版,内容包括《论语》、《大学》和《中庸》,在此后的25年中,又陆续翻译出版了《孟子》、《春秋》、《左传》、《礼记》、《书经》、《孝经》、《易经》、《诗经》、《道德经》、《庄子》等著作。理雅各译书工作的顺利展开,是和中国学者王韬(1828—1890年)的帮助分不

开的。1863年王韬在香港担任理雅各助手，为译稿中的疑难处进行解释，讲解经意，从而使译书速度提高。1867年王韬又应邀去英国居住两年，继续协助理雅各翻译，理雅各盛赞王韬的学术水平，称王韬“为最博通中国典籍矣”，而且也“未见有人能及于王博士者也”。王韬先助译《书经》和《竹书纪年》，次助译《诗经》，后助译《春秋左氏传》和《易经》，最后助译《礼记》。在译书前王韬常广辑博集，集各家之说，再结合自己的理解和研究心得，确切而全面地进行翻译，从而使译书质量有了保证。

自1861年至1886年的25年间，理雅各在王韬等人的协助下，终于完成了“四书”“五经”的全部翻译，共译成英文名为“The Chinese Classics”的《中国经典》28卷陆续出版，采用英汉对照，并详加注释，终于将中国的儒家经典系统而完整地介绍给欧美，在西方大受欢迎，由此也给理雅各带来很大荣誉，此书曾获法兰西学院儒莲奖，1876年又获爱丁堡大学法学博士学位。英国著名外交官、汉学家翟理斯（1845—1935年）为此曾赞美理雅各：“50余年来，使得英国读者皆能博览孔子经典者，吾人不能不感激理雅各氏不朽之作也。”该书出版至今已逾百年，然而理氏译本仍被认为是中国经典的标准译本，此为理雅各对汉学和中外文化所作的重大贡献。

除了儒家经典外，外国传教士也将中国佛经介绍给西方。自15—16世纪起，随着对东方的殖民扩张、东西方交

往的增多,外国开始对佛教有了较多的了解,佛教文化也自然受到西方学者的关注和重视。最早把佛经译成英文向西欧弘扬佛教者,为中国学者杨文会(1837—1911年)。同治五年(1866年)他在南京创办金陵刻经处,致力于佛经研究,并培养一批中国兼通英文、梵文的人员支援内地。光绪二十年(1894年)他与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合作,将《大乘起信论》译成英文,向西欧弘扬佛法,成为中外佛教文化交流的早期作品。

外国新传教士在中国创办的报刊,较著名者有英文版《中国丛报》(The Chinese Repository)月刊,该刊又译作《中国文库》,每月一期,每年一卷,创刊号于1832年5月在广州出版,至1851年底停刊,前后长达20年,裨治文始终任该刊编辑,后由美国传教士卫三畏负责。该刊不属于任何基督教会,发行对象主要是欧美各国政府、商业团体和在华的外国侨民以及在南洋各地活动的传教士等,无论是编辑还是撰稿人均不拿津贴和稿酬。该刊内容既有对中国出版物进行评论,也有对中国地理、物产、气象、农牧业等的调查;既有对中国政治和商业状况的考察,也有对中国社会结构、伦理道德和宗教信仰的观察和评论。当然,作为传教士创办的外文杂志,该刊也煽动用武力入侵,用大炮轰开封建大门,为资本主义入侵出谋献策。

该刊的创办,正值鸦片战争前后10年间,这是中国政局急剧变化,清王朝专制腐败和中国渐次沦为半封建半殖

## “中国地理学之父”卫匡国

---

民地的动荡年代,因此该刊上面的一些调查报告、侵华主张、研究中国长达20年的文章、有关鸦片贸易和鸦片战争的全过程等,便成为研究中国近代史开端和早期中外关系的第一手资料,一直受到中外学术界的重视,弥足珍贵。除此以外,该刊所译有关的中国历史地理、宗教信仰、儒家典籍和文学艺术方面的文章,也为西方了解中国打开了一个窗口,为中外文化交流作出贡献。

### 九、“中国地理学之父”卫匡国

在耶稣会士中对中国历史地理的介绍,最著名者为马尔蒂诺。意大利籍传教士马尔蒂诺(Martino, 1614—1661年),中文名卫匡国,是传教士和汉学家,又是地理学家和历史学家,曾对中西文化交流有过重大贡献。

卫匡国是历史学家,其主要著作有用拉丁文公开向欧洲介绍的首部中国上古史《中国历史十卷》(又称《中国上古史》)、当时的中国现代史《鞑靼战纪》、《中国耶稣会教士纪略》以及自传性质的《卫匡国行实》等。其中最著名者当为《鞑靼战纪》,这是用拉丁文书写的一部杂记,于1654年在比利时兹凡尔斯、德国科隆和意大利罗马同时出版,次年又在荷兰的阿姆斯特丹出版,这是一部依据儒生、官员和传教士等提供大量可靠资料写成的明清战争史。该书取材真实,头绪清楚,写作态度严谨,颇有史料价值。例如对李自



成攻入北京以后的情况补了过去文献记载的缺漏,对清兵的残暴和南明官僚的腐败等也有详细记载,对此方豪神父曾说:“拉丁文《鞑靼战纪》对于清军入关及南下情形,所记甚详,直言不讳,足补我国正史之阙略。”

相比而言,卫匡国最大的贡献是撰写了《中国新地图集》一书。此书广泛搜集明代中国方輿志的文献和有关资料,并依靠明代陆应旸的《广輿记》,综合利玛窦等耶稣会士长期观测研究结果,并绘制大量手稿,初版于1655年在荷兰首都阿姆斯特丹出版,1672年再版于布拉格,不久在巴黎重印,后被译成多种文字。该书被欧洲学者推崇为地图绘制史上的一个里程碑,卫匡国由此而获得“中国地理学之父”的美称。

该书有图17幅,文字介绍171页(颇似地方志),包括中国全图一幅、分省地图15幅和末尾附日本地图一幅,一律注有精密的经纬度。该书的最大特点为除地图以外,还有详细的地理志,其内容异常丰富,大凡中国各省的名称来源、地理位置、气候物产、天文地理、山脉河流、名胜古迹、人口赋税、城市建筑、掌故逸闻、风俗习惯等均有介绍,其详细和精确程度,令人惊异。对于马可·波罗游记中所出现的一些错误,也作了纠正,对基督教在中国各地的传播与教堂分布等也有叙述,这在中国方志中都是没有的。这部地图集具有极高的科学价值,不仅是欧洲人研究中国历史地理的重要著作,也是中国人史地研究中的一部重要参考书。

卫匡国在福建省的后面附有台湾一节,标明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而且历来属于福建行省管辖。其时正值郑成功收复台湾(1662年2月1日),但在卫匡国的概念中,早在郑成功之前,台湾已属福建省管辖,外国传教士在自己的著作中反映了历史的真实。

欧洲各国称中国为 China(英文),皆源于拉丁文 Sina(支那),而 Sina 这名词来源于“秦”,中意两国人民在古代均互以“大秦”相称,中国典籍中记的大秦国即是汉代的罗马帝国,足见中意人民在历史上早有友好往来。这一正确的解释,卫匡国为第一人。

卫匡国两次来华<sup>①</sup>,为向欧洲人介绍中国文化,增进西方对中国的了解不遗余力,作出了巨大贡献。1661年在杭州时因中暑面染上霍乱,医治无效于6月6日病逝,享年47岁,葬于今杭州市西湖区方井南(俗称四眼井)。卫匡国是继13世纪末来华的意大利旅行家马可·波罗、继16世纪80年代来华的利玛窦之后来华的又一位意大利人士,他那渊博的汉学知识,他的名字和著作,他为丰富多彩的中西文化交流所尽的努力和作出的贡献,中国人民将永志不忘。

---

<sup>①</sup> 卫匡国于1643年来华,后因天主教礼仪之争,于1651年调任中国区耶稣会驻罗马代表,重返欧洲,直至1658年再返中国。

## 第五章 欧洲启蒙运动与中国文化因素

18世纪时,随着欧洲资本主义的发展,资产阶级力量逐渐壮大,他们对封建专制主义者不顾国家民族利益而造成的国家分裂、战祸连绵、民不聊生的黑暗统治,越来越无法忍受。加上法国天主教对新教徒的大规模迫害,使人们对“王权神授”的理论产生动摇。启蒙运动即是要对过去的宗教迷信思想和专制主义暴行进行清算,从思想上予以揭露和鞭笞,然后在废墟上建立起“理性主义王国”,籍此为资产阶级登台鸣锣开道。

欧洲启蒙运动发轫于18世纪20年代,最初开始于英法,50年代以后进入高潮,直到法国1789年资产阶级革命爆发,前后历时近百年。这场由哲学家构成主力的启蒙运动,以法国的伏尔泰和百科全书派为代表,使法国成为整个欧洲启蒙运动的中心。耶稣会士是促成中华文化与欧洲启蒙运动发生联系的媒介。启蒙运动领导者对地处遥远东方的中国产生了浓厚兴趣,在发表的文章和出版的著作中,对中华文化颇有偏爱,伏尔泰在《礼俗论》中认为,对正处于启

## 启蒙运动发生背景

---

蒙时代的欧洲来说,应尊称中国为“先生”。伏尔泰在盛赞儒家学说的同时,甚至还在礼拜堂里挂起孔子像,朝夕膜拜,并通过赞扬孔子来抨击法国专制主义和基督教文化。儒家文化成为欧洲启蒙运动者汲取精神力量的源泉。启蒙运动领导者对宗教神学谎言进行揭露,对旧制度进行批判,藉此启迪人们智慧,唤醒民众,传播理性和科学,推动思想进步,成为近代西欧一次颇为壮观的思想文化革命,并催促了近代欧洲文明的诞生。

无论是法国百科全书派的伏尔泰、有“欧洲孔夫子”尊称的魏奈,还是德国近代思想巨人莱布尼兹,他们都深感中国儒家文化博大精深,这正是当时重物质、重自然科学的欧洲文化所缺乏的,因此对中国人文经典著作进行翻译和介绍,从而构架起中国与欧洲文化交流的桥梁。

欧洲启蒙运动领导者对中国文化大加赞扬,但他们对当时中国社会的认识 and 了解,在今天看来是贫乏和肤浅的,有些人没有到过中国,他们所提出的一些理论和改革计划,想使中国封建制度在欧洲起示范作用的想法,都带有强烈的政治理想色彩,对中国的推崇也有某些言过其实之处。尽管如此,18世纪的欧洲启蒙运动中,来自中国的影响和作用还是很明显的。作为贯穿于17—18世纪欧洲的一次思想运动,启蒙思想价值的光辉也并未因岁月流逝而褪色。

## 一、启蒙运动发生背景

欧洲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的国际战争——三十年战争(1618—1648年),以德意志为主战场,根据威斯特发里亚和约,荷兰和瑞士由德国分裂出去,人民的生命财产蒙受巨大损失,社会经济遭受严重破坏,德意志各邦更加四分五裂。在360多个小邦中,普鲁士和奥地利是其中两个最大的邦。18世纪60年代,英国率先发生了工业革命,这是资本主义发展的必然产物,欧洲其他资本主义国家利用英国工业革命的技术和经验,也相继发展起来。此时的德国各邦诸侯,为争权夺利而起的战祸不断。西班牙国王查理二世死后,因无嗣而引起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1701—1714年)。战争结束后,作为赢家英国取得直布罗陀海峡,普鲁士取得奥得以东直至上波美拉尼亚(今属波兰)东普鲁士等地区,奥地利获得东南欧贝尔格莱德和塞尔维亚北部广大地区。英国的海上殖民势力大大加强,法国遭到削弱,两国间的海上利益冲突加剧。

在欧洲大陆上,普鲁士与奥地利为西里西亚而在1740—1748年发生帝位继承战争,奥地利战败后只好将西里西亚割让给普鲁士。不久英法又因为争夺殖民地、商业霸权以及普奥争夺西里西亚而引起七年战争(1756—1763年),1763年签订的《巴黎和约》确保了英国在战争中获取

的殖民地,法国因经济实力不足而无法继续支持奥地利,普奥也于同年在德国土地上签订和约。从此以后,英国成为海上强国。1764年普鲁士国王弗里德里希·威廉二世(1740—1786年在位)与俄国女皇叶卡捷琳娜二世结盟,并于1772年由俄、普、奥三国联合首次瓜分波兰。自18世纪以来,普鲁士强化中央集权,不断扩充兵力,成为一个军事官僚专制主义国家。

在法国有“太阳王”之称的路易十四,所建立的君主专制统治,以“王权神授”作为理论依据。他不断对外发动战争,晚年时国库空虚,民不聊生,社会生产力严重下降,农民起义此起彼伏,封建专制制度由盛而衰。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地位,路易十四在强化天主教国教地位的同时,又不断取缔新教教派加尔文派,纵容对新教徒进行大规模迫害,致使近20万新教徒逃离法国。当“太阳王”于1715年陨落后,“王权神授”理论基本上已经动摇。路易十五滥发密令,肆意践踏民主,镇压人民,社会思想受到天主教的严格钳制。与此同时,在整个欧洲资本主义发展的前提下,法国资本主义迅速发展,资产阶级也已开始形成,并逐渐富裕和强大起来,他们办农场、工厂,利用新的科学技术发展新兴工业,一个潜在的反抗力量开始活跃起来。

在欧洲文艺复兴运动中产生的近代自然科学和近代哲学也有了重大发展。牛顿运用分析与综合方法,成功地创立了经典力学,这是科学技术史上一次革命,在牛顿前后,

在其他许多领域里,科学家们也为解释一切自然现象作出了贡献。除牛顿力学外,还有富兰克林电学、布拉克热学、林奈植物分类学、哈勒实验生物学、拉瓦锡近代化学等,其理论的新发现使诸如物理学、生物学、地理学、化学、解剖学等进入成熟时期,迎来了一个科学革命的年代。自然科学的新发展不但能使人 and 自然摆脱神的控制,恢复人的尊严,为理性主义前进铺平道路,而且在当时也成为推动社会变革发展的进步力量。一次次探险航行的成功使冒险家、传教士、商人活跃在世界各地,他们从世界各地传回欧洲的大量报告和资料,大大拓展了欧洲人的视野,丰富了人们的地理知识和世界知识。欧洲历史已处于推翻旧的封建专制制度和建立资产阶级新政权的转折关头,18世纪的欧洲启蒙运动正是在上述背景之下发生的。

启蒙运动在世界文化史上的确切含义,是指17—18世纪资产阶级革命前出现的反封建蒙昧主义、论证资本主义合理性的一种思潮,即近代欧洲各国在完成资产阶级政治革命前所经历的一场启蒙运动思想变革。这一贯穿于17—18世纪欧洲的思想运动,也是欧洲社会精神文化领域的一次批判运动。启蒙思想运动也是一个大破大立过程,即对过去的神学蒙昧主义和封建专制主义的倒行逆施,从思想上予以排斥和鞭笞,然后在被推倒的废墟上建立起一个新的“理性主义王国”。

德国著名唯心主义哲学家康德(Immanuel Kant, 1724—

1804年),曾为启蒙下过如下著名的定义:“启蒙是人们由其自我负责的未成年期的出发点。未成年表示无力在无他人引导下运用自己的理智。自我负责就是未及成年。其原因并非缺乏理智,而是缺少决心和勇气在无他人引导时运用自己的理智。Sapere aude! 鼓起你的勇气,运用你自己的理智就是启蒙的格言。”各启蒙思想家以共同的哲学基础作为各自学说的依据,用理论的、文艺的或科学的思想武器,以自觉地宣传教育群众、启迪民智为己任。作为“启蒙”的一种形式,启蒙运动的批判性推动了学术研究的发展,完成了许多专门性的学术著作,出版了《百科全书》,还出版了许多通俗易懂的小册子。从这一意义上来说,法国启蒙运动也是西欧近代一次颇为壮观的思想文化革命。

启蒙运动发轫于18世纪20年代,和其他事物一样,也经历了一个从发生、发展到高潮的过程,直到法国1789年资产阶级革命爆发,前后历时近百年,但在每个欧洲国家中情况不尽相同。欧洲启蒙运动最初开始于英、法。英国的启蒙运动思想家约翰·洛克(John Locke, 1632—1704年),是英国唯物主义经验论的创始人,他继承培根和霍布斯学说,阐述自由、平等和人所应享有的种种权利等。他的政治著作《政府论》为后来孟德斯鸠三权分立原则奠定了基础。法国的早期启蒙思想家笛卡尔(Descartes, 1596—1650年),根据从数学、物理等自然科学中获得的理性认识,提出社会平等的学说和理论。经过伏尔泰、孟德斯鸠和后来卢梭的发



动,加上新一代启蒙学者的不断涌现,18世纪50年代以后启蒙运动开始进入高潮,其标志为百科全书的编撰和出版。伏尔泰和百科全书派成为法国启蒙运动的代表,法国成为整个欧洲启蒙运动的中心。

法国启蒙运动思想家所提出的哲学原则和政治理论,例如伏尔泰以自然神论形式表达的唯物主义哲学思想和反对教权主义,反对宗教狂热,反对君主专制,倡导英国式代议制君王立宪的主张,孟德斯鸠的三权分立学说,卢梭的主权在民原则,以及其他法国启蒙学者所倡导的自由、平等、民主、博爱和天赋人权思想,在欧美各国传播并产生很大影响。例如德国的“狂飙运动”,莱辛、歌德、席勒等人领导的文学革命,康德所开启的哲学革命,普希金、拉吉舍夫等反抗俄国农奴制的十二月党人的活动等,都直接受法国启蒙思潮影响。正当人们从旧的神人关系向新的人人关系过度,处于新旧思想冲突和交替时期,急需寻找新的心理平衡之际,有关中国的各种文化信息,经过传教士纷至沓来,汇成洪流,这就为欧洲接受中国古老文化创造了契机,也更加坚定了启蒙学者摆脱传统观念的信心和决心。无论从哪一方面来看,18世纪的欧洲启蒙运动,来自中国的影响和作用都是非常明显的。

## 二、启蒙运动领袖伏尔泰

在 18 世纪法国启蒙运动中,哲学家构成启蒙队伍的主力、核心、先锋和领袖,如狄德罗、伏尔泰、卢梭、孟德斯鸠、霍尔巴哈、爱尔维修、波维尔等,他们反对法国专制王朝和宗教愚昧主义,提倡理性主义和批判精神,宣扬自然论、无神论和唯物主义,追求政治民主、权利平等和个人自由。18 世纪的启蒙思想家都是世界主义者,他们在争取公民的平等自由,寻找合理的世界秩序中,都把目光投向全世界,也对东方的中国产生浓厚兴趣,其中启蒙运动中无可争辩的领袖人物伏尔泰(Voltaire,1694—1778 年),对中国文化历史价值推崇备至,具有一定代表性。

西欧经过 16 世纪的宗教改革运动,天主教会一统天下的权威已经动摇。但在 17 世纪的法国,一个国王、一种信仰、一部法律的专制主义仍占据统治地位。这时,中国文化通过不同渠道大量流入,给法国思想界带来了新鲜空气,在人们眼前突然展现了一个前所未闻的世界,即在西欧和圣经文化之外还存在着一种中国文化。于是,伏尔泰以此作为武器,猛烈地抨击了西欧和法国的专制主义基督教文化。

伏尔泰和其他启蒙运动者一样,是通过儒家学说来了解中国的,而耶稣会上又是东方中国与欧洲 18 世纪启蒙运动之间的出色媒介。伏尔泰认为,中国是一个开明的君主

制国家,孔夫子和他们一样,为捍卫同一种思想而进行过战斗。伏尔泰说:“作为一个哲学家,要知道世界上发生之事,就必须首先注视东方,东方是一切学术的摇篮,西方的一切都是由此而来的。”人类文明、科学和技术的发展史都是从中国肇始,而且长期遥遥领先。例如,中国的史籍持续不断地记下了日蚀和星球的交会,我们的天文学家验证他们的计算后惊奇地发现,几乎所有的记录都是真实可信的。

在启蒙运动者心中,中国犹如一个已经实现了他们的一切理论和理想的国家,皇帝按天意治理国家,保护人民的利益,关心人民的幸福,中国似乎不存在宗教和国家间的角逐,学者处于特别优越的地位,社会建立在高度的道德原则上,在儒家完美的贤人品格上体现了启蒙运动的“正直的人”的理想。伏尔泰也把孔子的儒家学说当作一种自然论,是和欧洲盛行的那种基于迷信的“神示宗教”完全不同的“理性宗教”的楷模。为此他通过赞扬孔子的道德治国理论来反对基督教的一神教专制。他盛赞孔子“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理论,认为基督教不过禁人行恶,而孔子则劝人行善。倘若人们遵循孔子常说的“仁义”道德,世上就不会有什么斗争了。所以,在伏尔泰心目中,孔子为至圣至贤的哲学家,中国文化是最合乎理性和人道的文化。于是,伏尔泰在自己的礼拜堂里挂上孔子画像,朝夕膜拜。

伏尔泰欣赏中国人对宗教的宽容态度,允许儒、道、法等不同信仰并存。他特别注意中国统治者、上大夫的自然

神的宗教观,认为他们对神的态度可以用一句话来概括:敬天秉公。“天”是天理,是自然,不是神,不是崇拜偶像。由此他加以总结认为:“尊崇一个至高无上的存在,再加诸讲道德、守法律,就构成了中国人的宗教,即皇帝和文人们的宗教。”伏尔泰赞扬中国祭祖祭孔的风俗,在他的心中,孔子并非教主,而是宣扬伦理道德的圣人。他崇尚中国的宗教政策,认为信仰自由是中国的国策,即允许佛教、道教、喇嘛教自由传道。他把上层官吏尊儒和下层百姓信教比作食物粗细的不同,赞扬中国政府专管社会风化,只要百姓遵守国法,并不规定国民的信仰。伏尔泰还同情雍正皇帝的禁教主张,把传教士贬为罗马教皇送往中国的军事侦探。他激烈指责西方传教士干预中国内政,并引用雍正皇帝的话来反诘传教士的所作所为:“‘如果我们中国人去你们欧洲,也和你们在这里一样行事,你们会怎样说呢?你们老实说,这你们能容忍吗?’他说我们‘这种传教的热情’,是我们气候的一种特殊病态,是遥远的亚洲人所从来没有的。他们从来没有派人到欧洲来传教,只有我们,才把自己的意见、信仰连同商品,推销到地球的每一角落。”

耶稣会士是促成中国思想文化和欧洲启蒙运动发生联系的媒介。他们介绍儒学,原本想通过证明它和基督教一致而为基督教的非理性涂金。伏尔泰在研究中国思想文化时也曾受到传教士的启发,但日后却为反宗教论者提供武器,并被用来攻击耶稣会士,这是他们所始料未及的。

中国文明的历史漫长悠久,早在基督教文明兴起于欧洲之前,中国社会就已制定了完善的法律,培养了良俗美德。伏尔泰在其《哲学辞典》的条目中赞扬中国是个“举世最优美、最古老、最广大、人口最多和治理最好的国家”。还讽刺那些自诩基督教为最高文明的信徒,指出中国“整个民族的聚居和繁衍有 50 世纪以上”,当中国已经繁荣广大,具有完善而明智的制度治理国家时,“我们还只是一小撮在阿尔登森林中流浪的野人哩”!

伏尔泰在 1760 年发表的一部世界史著作《礼俗论》,尊重历史的真实,首次将非基督教的古老民族中国、印度、波斯等写进去,并有意将中国古代史安排在第一、第二章的最显要地位,以此来反驳《圣经》历史是人类唯一历史的谬论。他在这一世界上第一部人类文明史中说,在前一个世纪中,我们几乎不知道有中国,然而对正处于启蒙时代的欧洲来说,应尊称中国为“先生”。这本书在当时是人们对远东观察最完备的记载,他在批判宗教神学,宣传启蒙思想的同时,对中国的推崇也达到了登峰造极之境。

伏尔泰反对孟德斯鸠在《论法的精神》一书中关于中国政治制度的观点,认为专制政治是君主不守法律、任意剥夺人民生命财产的政治;认为中国实行的不是专制政体,而是在法律限制下的君主政体。他写道:“皇上虽为专制君主,……但却遵守帝国的法律行事。他不凭个人权力擅准传布基督教。此事须向某部议奏。”这种政治组织实为世界上最

完善的组织,中国的法律也充满着“仁爱”观念,如各地处理重罪案时,未呈皇上本人亲览(甚至需呈上三次),不得对犯人处以极刑。所以,伏尔泰称中国人“是所有的人中最有理性的人”,是世界上无论在道德方面或治理方面最好的民族。伏尔泰发现,自己心中所追求的“哲人治国”的政治理想在遥远的中国文化中却得到了完美的实现。

百科全书派的启蒙学者们,通过对中国儒家思想和政治的赞美,表示他们反对欧洲君主政治的残暴统治,寻求一个具有崇高理性与道德、宽容而有节制的政治制度作为理想目标。狄德罗、爱尔维修、霍尔巴哈、波维尔等均赞赏中国儒家学说的理性特征。狄德罗赞美中国儒学说:“只须以理想或真理,便可治国平天下。”霍尔巴哈说:“中国是世界上唯一的将政治和伦理道德相结合的国家。这个帝国的悠久历史使一切统治者都明瞭,要使国家繁荣,必须仰赖道德。”当时一些启蒙思想学者甚至认为,法国的得救与否,全赖于是否能够充分吸收中国高尚的精神。对此波维尔在他的《哲学家游记》一书中说:“如果中国的法律变为各国的法律,中国就可以为世界提供一个作为归向的美妙境界。到北京去!去瞻仰最伟大的人,他才是上天的真正而完全的楷模。”

伏尔泰对中国的偏爱,还反映在他改编的《中国孤儿》一剧中。中国元曲《赵氏孤儿》是第一部传入欧洲的中国戏剧,它在欧洲最早的译本是由在华传教的耶稣会上马约瑟

于 1732 年译成法文的。该书在翻译过程中已经删节,内容和原剧已有差异,而伏尔泰将它改编成戏剧则有其特别的目的。伏尔泰同卢梭进行过多年的论战,卢梭认为自然状态比文明社会好,主张归真返璞;而伏尔泰则深信理性的力量,智慧的力量,道德的力量,他改编《中国孤儿》一剧,并于公元 1755 年在巴黎公开演出,就是希望起到一种道德的影响。

《赵氏孤儿》剧本为元代纪君祥所撰。剧情发生在公元前 7 世纪,晋灵公时文臣赵盾和武将屠岸贾不睦,屡欲屠杀赵,后用计在灵公前诬告赵氏不忠,将赵家斩尽杀绝。忠于赵家的老医生程婴隐匿并抚养了赵家惟一幸存的后代,20 年后报了冤仇。原剧有弄权、作难、搜孤、救孤、除奸、报仇等段落,伏尔泰摘选了搜孤、救孤的情节,希望体现一种道德影响,于是,将故事发生的时间往后移至元代,并把诸侯国家内部“文武不和”改为两个民族间的矛盾。改编的剧本描写成吉思汗入主中原后,搜求前朝遗孤,抓了遗臣盛缔。盛缔同程婴一样献出自己的儿子,救出了前朝遗孤。盛妻奚氏与成吉思汗曾有旧情,于是成吉思汗提出条件,若奚氏肯异地改嫁,则他可以免于追究。但奚氏爱子爱夫,宁死不从,在场的成吉思汗深受感动,宽恕了所有的人。伏尔泰深信,该剧是第一流作品,有助于了解中国人心理,而把中国人民的道德显示在法国人面前,胜过所有关于中国的论述。他说有关孔子的道德学说已包括在这五幕剧中,“欧洲王公

及商人们发现东方,追求的只是财富,而哲学家在东方发现了一个新的精神和物质的世界”。所以,《中国孤儿》又名《儒家道德的五幕剧》,体现了伏尔泰“文明战胜野蛮”的主旨。

伏尔泰为了追求理性与现实生活的结合而大力美化中国的儒家思想,其影响是不可低估的。在宗教传统根深蒂固的欧洲,越来越多的人已经认识到,在宗教权威之外还有伦理道德的权威,而这种伦理道德的权威并不是来自上帝的启示,而是像中国那样来自所谓“理性”、“良知”,这可以说是思想意识方面的一个巨大发现。

18世纪法国启蒙运动时期出现的对中国伦理道德的颂扬,目的是为了把非欧洲世界的观念引入欧洲思维中去,寻求一种不受政治和文化专制限制的思想文化。所以,他们不仅研究古代希腊罗马,而且也研究古代东方和现代东方,从而打破了欧洲的传统和权威。而对一切国家制度和社会秩序都加以无情的批判,由此传播了理性与科学,唤醒民众,直接促使1789年大革命的爆发。伏尔泰等人提出的许多理论和改革计划,原本只想改造旧制度,使其不触动根本就能变得符合启蒙思想家的要求,他对中国的称颂和赞美也带有强烈的政治理想色彩和言过其实之处,把中国儒家哲学的理想看成是一种现实制度,因而遭到一些较为冷静和慎重者的评判和孟德斯鸠的诘难。

伏尔泰、孟德斯鸠等为反对封建专制制度及天主教反动势力,曾向法国人民推介中国儒家文化,力图引进这加以



美化的“东方开明政治”，从而架起一座中法文化交流之桥。但文化交流常出现有来有往的双向选择。发生在18世纪的法国启蒙运动在中国也产生过历史的回应。在明末清初出现的启蒙思潮，其历史背景、包含内容及思维方式，与欧洲的文艺复兴人文主义有许多相同或近似之处。对程朱理学的蒙昧主义和禁欲主义的批判，在一定程度上是在为萌发中的资本主义因素开锣鸣道。后来法国启蒙思想家名著被介绍到中国来，诸如理性主义、民主思想、自由主义学说等，对一代忧国忧民的志士仁人产生过很大鼓舞作用。清末康有为的变法维新，孙中山先生的革命方略，辛亥革命所追求的理想和目标，五四新文化运动启蒙者所扛起的“德先生”和“赛先生”两面大旗等，也有法国启蒙思想的影子。相得益彰，共同提高，人类文化没有交流就没有进步。不过，由于伏尔泰在法国启蒙运动中的地位和声誉，他在促进欧洲人对中国文化的了解和研究方面的贡献仍然彪炳史册。

### 三、重农学派对中国文明的讴歌

18世纪的欧洲思想界，为了追求理性和现实生活的结合而大力赞扬中国，中国儒家文化成为欧洲启蒙运动者汲取精神力量的源泉。在为自己的政治主张寻找注脚的人中，不仅有伏尔泰那样的学术泰斗，也有一些试图进行某些改革的人。法国政治经济学家、重农学派的代表魁奈就是

## 重农学派对中国文明的讴歌

其中值得一提的人物。1767年,他所著的《中国专制制度》一书充分反映了这一学派对中国制度的钦佩。在魁奈去世之后,他的学生在悼词中将他称为孔子思想的直接继承人。他为实现孔子教导和道德规范,以节制私欲、爱邻如己、敬天爱人等作为行动准则,由此他也被重农学派门徒们冠以“欧洲孔夫子”的尊称。

以重农学派创始人而流芳百世的魁奈(Hancois Quesnay, 1694—1774年),曾是一个博学的医生,写过不少医学和生物学的著作和论文。1749年他55岁时,被任命为法王路易十五的情妇蓬巴杜侯爵夫人的侍医,住进凡尔赛宫。1752年,又因治愈皇太子的痘疮有功,被任命为路易十五的侍医。由于移居凡尔赛宫,魁奈有更多的机会同哲学家和思想家交谈,熟悉法国的政治经济情况。当时,法国因执行财政大臣柯尔贝尔牺牲农业、扶植工商业的重商主义政策,经济问题十分严重,财政亏空已相当于法国年纯收入的32倍,人民生活陷入困境。严峻的现实自然成为人们谈论的中心。魁奈是一个不甘寂寞的人,他在政治上反对孟德斯鸠主张的君主立宪制度,是一个开明专制制度的拥护者。他于1753年开始研究经济问题时,已近60岁了。

蓬巴杜侯爵夫人权势显赫,而且追求奇异。在她的客厅里,中国丰富多彩、引人入胜的文化是一个热烈讨论的题材。她还经常光顾巴黎一家专售中国商品的店铺,仅1752年12月27日一次,就从该店购进数个形状各异、色泽晶莹

的青花瓷瓶。巴黎又是一个耶稣会士来往频繁的城市。中国学者高内思 1750 年抵达巴黎后,一直是科学界的显要人物。魁奈从他身上也学到许多具体的东西,并体现在其著作中。魁奈长期以医为业,从日常接触的人体中得到“自然机体”的实例,具有科学头脑,并养成了一种善于思考的习惯,这为他从事政治经济研究创造了条件。

魁奈视国家为一种工具,运用这种工具,并依靠自然的经济秩序的帮助,也可以说是“纯产品”的帮助,就可以使人复归原始纯真的自然状态。魁奈研究经济问题的出发点是关于自然秩序的学说,这种自然秩序是不以人们的意志和愿望而转移的一种客观存在,它无论在物质世界还是在社会生活中都占着支配地位。在生产领域内,最不受市场干扰而容易找出自然秩序的生产部门就是农业。魁奈将中国看作是一个符合自然秩序的完美楷模。他曾说:“自然秩序为人类所有立法、所有政治、经济及社会行动的最高原则。”他认为,中国正是由于遵守自然规律,才得以年代绵长,疆土辽阔,繁荣不息,并拥有一个稳定而持久的政府。这个范例证明了魁奈的经济理论,即只有从事农业的民族才能组成稳固和持久的国家,这样的国家有能力进行稳固的全面管理,确切地服从于自然规律的不变制度。因此,在这样的场合,农业本身构成了这些国家的基础,土地成为能够满足人民需要的财富的重要来源。然而,农业的发展和衰落本身又必然决定于统治形式。在魁奈的建议和指导下,1756

年,法王路易十五仿效中国皇帝郑重其事地举行春耕,以鼓励法国农业的发展,并公开表示同意重农学派的意见。

魁奈的著作都带有应时实用这样一个非常明确的目的,而且他的许多论点,都以前人为范本和论据,他的某些思想观念特别得力于中国的文化传统。尽管对自然秩序的理解和实践不只限于统治者和政治家,但研究和遵守自然法则是政治家的最高职责,而把这个法则用于教导百姓则是政治家的第二种职责。孔子曾说:“吾尝终日不食,终夜不寝,以思、无益,不如学也。”魁奈赞同这样一种说法,认为:“只有知道法则,才能保证国家的安宁与繁荣。”又说:“理性必须辅以智慧,而后能获得所需的知识。”魁奈对中国的学校也倍加赞扬,说中国的官吏甚至远在穷乡僻壤,都是每月两次召集所属百姓讲学。学校不但教学生读书写字,而且向学生传授知识。因此,良好的教育使中国成为一个模范的国家。可是,这种政府的基础制度,在其他所有国家中都被忽视了。

魁奈与当时欧洲启蒙运动中许多学者的见解有相通之处,即中国政府几千年来为人民谋和平幸福的事实,曾激发伏尔泰以及所有以开明专制为政治理想的同时代人的倾慕。例如在租税制度、法律制度等方面,魁奈也劝人效法中国。在他的笔下,中国的现状成为法国社会的理想蓝图。魁奈分析社会再生产和流通的代表作,是1758年发表的《经济表》。这部天才的作品,贯穿了魁奈思想的二重性:一

方面反映了当时重视数学的心理；另一方面又试图表现事物的全体。他谋求将自然秩序和实际秩序合面为一，想得出一个可以说明世界以及综合一切的数学公式。在这一点上，魁奈的心理和中国“天人合一”的伦理观念是相通的。这种心理上的相通，使魁奈对中国人及其国家概念产生了深深的敬慕。

伏尔泰曾对魁奈的《经济表》大加讥笑，说他实在是把一种中国的学说巧妙地译成数学的公式。魁奈的学生鲍杜也明白地说：“他的基本原理需要几本书才能阐发，而《经济表》仅用四行便包括在内；正如用这四行可以解释伏羲的六十四卦象一样。”处于法国启蒙时代的魁奈，对中国的认识是建立在立志恢复法国在世界历史舞台上的经济和政治地位这一基础之上的。他认为，中国的政治、经济、法律制度遵循顺乎天意的古代哲学原则，这一思想又成为指导社会生活的基本原理。魁奈为自己的学说在遥远的东方帝国成为现实而欣喜不已，反之，中国数千年绵延不绝的治国经邦的哲学原则又给魁奈的理论以生动的证明。

中国留法青年学生高类思、杨德望两人于1764年即将回国时，法国的国务秘书贝尔坦挽留他们多逗留一年，法国重农学派另一改革家杜尔哥（Turgot, 1727—1781年），则接见了高、杨，并给他们带回52个问题（分成四大类）的详细提纲，委托他们回国后进行调查研究，然后予以满意答复。因为重农学派在法国的改革，需要借助中国的实践及经验。

高、杨于 1766 年初回到北京后,定期向贝尔坦进行汇报,并调查这四大类问题。最后与在华的法国耶稣会士合作,汇编成《北京教士报告》,成为 18 世纪中法文化交流的组成部分。

和许多没有到过中国的欧洲著名学者一样,魁奈对中国的认识 and 了解在今天看来是贫乏无知的,甚至是令人发笑的。他对中国的赞赏,也是建立在理想的憧憬和对法国现实的痛心疾首的责任感之上的。为了振兴法国面临的经济崩溃,重整社会法律道德的权威,他把发展的目光注视于飘渺的东方乐土,希望借中国的封建专制制度在欧洲起示范作用,替垂死的法国专制制度打针输血。因此,魁奈的每篇论文里都浸透着他对中国社会近乎神奇的直觉判断和精辟的附会臆想,这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是不难理解的。尽管如此,他的著作对于西方人了解中国,促进中外文化交流,仍有着不可磨灭的影响。

### 四、莱布尼兹崇拜中国儒家

哥特弗里德·威廉·莱布尼兹(Gottfried Wilhelm Leibnitz, 1646—1716 年),是德国近代思想巨人,他学识渊博,才华横溢,在许多知识领域均有建树。后来的学者称莱布尼兹集哲学家、物理学家、数学家、逻辑学家、图书馆学家、历史学家于一身,像他这样博学的全才在亚里士多德以后极少见。

可是,很少有人会想到,莱布尼兹在科学和哲学上的成就与来自东方的中国文化密切相关,成为促进中德文化交流的奠基人。

莱布尼兹生活的时代,正值中国明末清初之际。当时中国的执政者康熙皇帝在对外政策上比较开明,奉行互相学习、取长补短的原则,因而这一时期中西文化上的交往十分频繁,大批西方耶稣会的传教士涌入中国,从京城皇宫到偏远内地都有他们的足迹。这些传教士大多知识渊博,在宣讲基督教教义的同时,也向中国社会传播、介绍西方以天文、数学为主的先进的近代科学知识。为了了解中国社会,这些传教士也努力学习中国文化。他们深感中国以儒家文化为主干的人文思想博大精深,而这正是当时重物质、重自然科学的西方世界所缺乏的。于是,他们对中国的人文经典作了大量的翻译和介绍,以使欧洲人知晓。18世纪中叶在欧洲出现了“中国热”,有人形容欧洲人“对中国,甚至比对欧洲的若干地域还要熟悉”,由此为正在进行的欧洲启蒙运动提供理论武器。例如,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早在1593年即将中国的四书译成拉丁文;比利时传教士柏应理曾在巴黎刊印《中国哲学家孔子》;比利时人金尼阁在1626年曾将五经译成拉丁文;传教士白晋曾对五经中的《易经》作了专门的翻译和研究。中国古代人文经典在欧洲的流传,为莱布尼兹研习中国文化提供了坚实的基础。

莱布尼兹自小聪慧好学,13岁时就能阅读古希腊亚里

士多德深奥的哲学著作,14岁时就以优异的成绩考入德国著名学府莱比锡大学。他最初学法律,后对哲学发生浓厚兴趣,有趣的是,莱布尼兹一生中竟未获得任何哲学教职。1667年,21岁的莱布尼兹第一次接触中国文化,他认真细致地阅读了巴黎出版的关于孔子的论著和传记,东方古国先哲的精深理论强烈地感染着这位年轻人。从这以后,他就与中国结下了不解之缘。莱布尼兹于1689年游历罗马时,结识了意大利耶稣会士闵明我(Grimaldi Philippe marie, 1639—1712年),请他予以帮助,在中国了解有关造纸、火药制造、航海、养蚕、天文、历史的情况,以及中国语言文字等。莱布尼兹也了解中国的老子和孔子,极其推崇中国的实用哲学。他与孔子都认为宗教的精义(包括基督教)在于实际生活中,宗教的主要服务在于创造知识;宗教的目的在于教育群众,使他们的一举一动都符合社会的利益。他的观点与孔子的“道也者,人德之门”,意思非常相近。根据闵明我等人提供的资料,莱布尼兹于1697年出版了《中国新论》一书。他在该书的序言中说,中国与欧洲这两大文化,分处地球的两端,在一个特定的时期内发生接触,相得裨益,实为天意。西方的自然科学和思辨哲学、逻辑学等对东方有一定启发,而中国的实用哲学和国家及政治道德,无疑要比我们优越得多。

莱布尼兹后半生涉足政界,曾任外交官和宫廷顾问,因而得以交结一些国家的显贵,与俄国彼得大帝和中国康熙



皇帝有着良好的私人关系。莱布尼兹创建柏林科学院并任院长后,曾上书俄国彼得大帝和中国康熙皇帝,力促建立俄国和中国的科学院,并愿为此提供帮助。建立德国科学院,作为一个手段,“以打开中国门户,而使中国与欧洲的文化互相交换”,同时他也主张在莫斯科设立一个科学性质的学会,以联络西欧与中国的文化。他还把白晋的《康熙帝传》翻译成拉丁文。直至晚年,莱布尼兹还在给法国宫廷顾问德雷蒙的长信中盛赞中国哲学,他写道:“这种哲学学说或自然神论是从约 3000 年以前建立的,并且极有权威,远在希腊人的哲学很久很久之前。”他认为中国的天命、天道是天在其运行中确定不移的法则,要服从理性的法则就必须顺天,以达到先定的和谐。透过字里行间,一种对中国哲学的敬仰之情跃然纸上。

莱布尼兹的学术思想中渗透着中国文化的精髓,这在他的科学思想和哲学思想方面表现得最显著。1697 年莱布尼兹开始同在北京的传教士白晋通信,共同探讨《易经》长达 6 年之久。莱布尼兹通过白晋了解《易经》,并对《易经》中类似二进制的算法极感兴趣,他用对卦的数学配列顺序深入研究,终于发现了《易经》的二进制原理,最后的研究成果就是莱布尼兹于 1703 年写的《论二进位制算法》。二进位制算法是莱布尼兹在数学科学中最重要的发现之一,它直接来源于中国古代的《易经》。《易经》产生于殷周时期,距今已经几千年了,是中国最早的一部学术性经典著

作。莱布尼兹的《论二进位制算法》与宋代著名儒家学者邵雍的《伏羲六十四卦次序图》、《伏羲六十四卦方位图》完全一致，莱布尼兹自己也认为，关于二进位制的问题并不是他的发明，中国的先哲们在几千年前就已经知道了，他对《易经》以二构造世界的绝妙变化图式惊叹不已。莱布尼兹汲取中国古代《易经》精华，发现二进位制，这一发现不但拉近了东西方两大文明的距离，而且对现代的控制论和计算机原理基础产生重要影响。

莱布尼兹单子论的哲学体系也与中国古代哲学有相通之处。其单子论哲学的核心概念是单子，这个概念使当时的德国人和后来的欧洲人都感到深奥难懂。莱布尼兹既反对笛卡尔把心和物分为两个实体的二元论，也不满意斯宾诺莎把实体归结为自然的做法。他认为实体不是一个，也不是两个，而是无限的，这个无限的实体是精神性的，莱布尼兹把它称为单子。他于1714年发表的《单子论》，确实包含了老子、孔子和中国佛教有关的“道”的观念。在他看来，单子只是一种组成复合物的单纯实体，所谓单纯，就是没有部分的意思：单子都是整体，不可再分是单子的一个重要属性；世界就是由无数单子所构成的单子世界，单子间没有联系，单子间的和谐关系是先定的。这就是莱布尼兹关于单子的基本含义。而中国老子的“道”，宋明理学的“理”、“太极”等，就是和单子一样的精神性实体。中国古代先哲认为，构造世界万物的基础不能是一种物质性的实体，而只能是精

神性的实体,精神性实体乃是天与人、物质与精神的高度统一,它能统领万物,变化莫测。

至于整体与部分的关系,宋代大儒朱熹论述得十分精辟透彻。他发挥了中国禅宗中“一即一切”的观点,提出“理一分殊”说,认为“万个是一个,一个是万个”,并用“月印万川”作比喻:月亮倒映在千万条河流中,每条河流中的月亮都是一个独立的整体,而千万条河流中的月亮实际上都是一个天上的月亮,因此,作为万物的本体的“理”是不可分割的整体,它没有部分。部分和整体只对具体事物的分类有效,而对世界本体的“理”却无效。可见,莱布尼兹关于单子都是整体、没有部分的观点与朱熹的学说多么相似。只是由于东方哲学的这种整体观的体认方法是直觉,与西方惯常的理性思维方法大相径庭,所以莱布尼兹的单子论哲学在很长时间里不被欧洲人所理解,知音难觅。更由于他的单子论包括了物质与精神的一致因素,因而遭到了笃信宗教者的反对。

值得一提的是,莱布尼兹充分认识到中国文化对欧洲近代文化发展的重要意义。他呼吁欧洲社会重视东方源远流长的文化,不要以为欧洲是最理想的美好社会。他认为,在东方幅员辽阔的大地上,还有一个有着更完善的人伦道德的民族存在,这就是中国。莱布尼兹鞭挞了西方社会只重物质经济技术,而道德精神却日益堕落的社会风气,认为治疗西方社会这种弊病的良药就是大力倡导中国重人伦交

际、修身和睦的文化。他为此向欧洲社会发出忠告：“在我看来，我们目前已处于道德沦落难以自拔之境。我甚至认为必须请中国派遣人员，前来教导我们关于自然神学的目的和实践，正如我们派遣教士到中国去传授上帝启示的神学一样。因为我相信，如果任用哲人担任裁判，不是裁判女神的美，而是裁判人民的善，他一定会把金苹果奖予中国人。”莱布尼兹还把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作了比较，认为欧洲文化的特长在于数学、思辨的科学，但在实践哲学方面，欧洲人就大不如中国人了。

莱布尼兹在与世界各国学者联系的 15000 余封信中，有 200 多封论及中国，充分说明他学识的渊博及其对欧洲与中国文化交往的重视。作为哲学家，莱布尼兹最先使其影响越出欧洲范围。他所开创的德国古典思辨哲学，后来由他的高足弗朗克和沃尔夫得以继承。莱布尼兹的《中国新论》出版后，弗朗克立刻致函热烈祝贺，他说：“您刊行的《中国新论》及其中的导论，言词优美，体列完善，我不能不为这部伟大的著作向您致贺。”弗朗克后来还创立一所东方神学院，所设置的课程中包括汉文。

沃尔夫继承了莱布尼兹精神与物质调和的哲学，将莱布尼兹的哲学思想系统化，从而产生一种所谓“莱布尼兹——沃尔夫哲学”。但是人们也看到，莱布尼兹对中国倾注的热情及其所作的种种努力，毕竟收效甚微。沃尔夫于 1722 年在哈勒大学讲授《中国实用哲学》时被驱逐，其原因

是沃尔夫与孔子的世界观有相同的思想基础,他认为孔子的道德学说和基督教道德全无冲突,因而激起新教神学家的愤慨。沃尔夫对孔子的伦理哲学赞赏不已,因为孔子的伦理哲学不是建立在超自然的启示基础上的,而是建立在人的理性基础上的。莱布尼兹的德国古典思辨哲学,后来又经过沃尔夫而过渡给康德。莱布尼兹作为一位享有世界声誉的哲学家,他的影响和所作的贡献不可磨灭,恩格斯在论及 1648—1789 年德国学术界时,称莱布尼兹“是那时代光辉的代表”。<sup>①</sup>

---

<sup>①</sup> 见恩格斯:《关于德国的札记》,载《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18 卷,第 650 页。

## 第六章 晚清的中日文化交流

中日两国是近邻，一衣带水，人民之间的友好交往和文化交流源远流长，史书不绝。在古代相当长的时期内，中日两国的文化交流一直呈“一边倒”，即日本师从中国，学习和吸收中国文化，真挚而持久，令人敬佩。这一状况到了近代才开始改变。明治维新以后的日本文化，反过来对中国产生不小的影响，特别是在宪政革命、教育制度、军事工业、科学技术、翻译通俗文学等方面，日本显示出某种领先和示范作用。由于有此新特点，故近代时期的中日文化交流活动，形式更加多种多样，内容更加丰富多彩。

鸦片战争以后，中国知识分子所撰写的有关世界史地、鸦片战争状况的书籍，经中国商船传入日本后，在日本知识分子中广为流传，备受欢迎。这些书对幕府末年日本人开拓视野、了解世界大势、加强国防及开国维新等，曾产生很大影响，例如《海国图志》被日本人士誉为“天下武夫必读之书”。

在近代的中国驻日本外交官员中，不乏文人学者，他们

胸中富文史、善诗词、工书法，其文化交流活动开展得有声有色。明治时代许多醉心于中国文化的日本文人学者，经常聚会中国驻日公使馆，彼此操笔纵谈，诗酒翰墨，应酬唱答，极一时之盛。学者兼外交官黄遵宪早就提出过，中国对日本的研究，落后于日本对中国的研究，为此他在任职期间深入系统地研究日本，其成果《日本国志》成为第一部日本通志。黄遵宪所写的诗在日本也闻名遐迩。一些外交官在任职期间，还不遗余力搜求散失在日本的中国珍贵典籍，杨守敬访求逸书被传为美谈。

20世纪初，大批中国青年赴日留学，将中日文化交流活动推向新的高峰。留日学生中人才荟萃，能量很大，所办的报刊种类多，内容新，这对启迪民智，开展革命宣传，推翻专制，肇建民国等产生很大影响。戊戌变法失败，梁启超亡命日本，仍专心致志，为使日本学术传播中国作出贡献。在近代中日两国的人员交往中，除政府官员和僧人外，文人学者的互访交流频繁，来往一直不断。王韬在应邀东渡扶桑，漫游瀛岛后所撰写的《扶桑游记》，使国人能从明治维新后日本社会所发生的巨大变化中，获得很多新知。发生在晚清的文化交流活动，犹如涓涓细流，汇入中日文化交流史的大海之中，兹择要分为6个部分叙述如下：

## 一、《海国图志》——日本维新思想家的启蒙书

我国清代著名思想家魏源(1794—1857年)的作品《海国图志》、《圣武记》等,不但对中国近代化有深远影响,而且对邻国日本的近代化产生了巨大影响。魏源原名远达,字默深,湖南邵阳人,19岁时入京,与龚自珍、林则徐、包世臣等人过从甚密,同属主张“经世致用”的今文学派。后中进士,历任内阁中书、知县、知州等职。魏源在世的时代,正值中国积贫积弱,逐渐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他曾参加以林则徐为首的抗英斗争,并亲临浙东前线策划反英斗争。他潜心研究振兴中华的富国强兵之道,介绍外国的先进技术乃至社会制度,把林则徐所开创的睁眼看世界,推进到一个新的阶段。魏源的《海国图志》正是在这一时代背景下写成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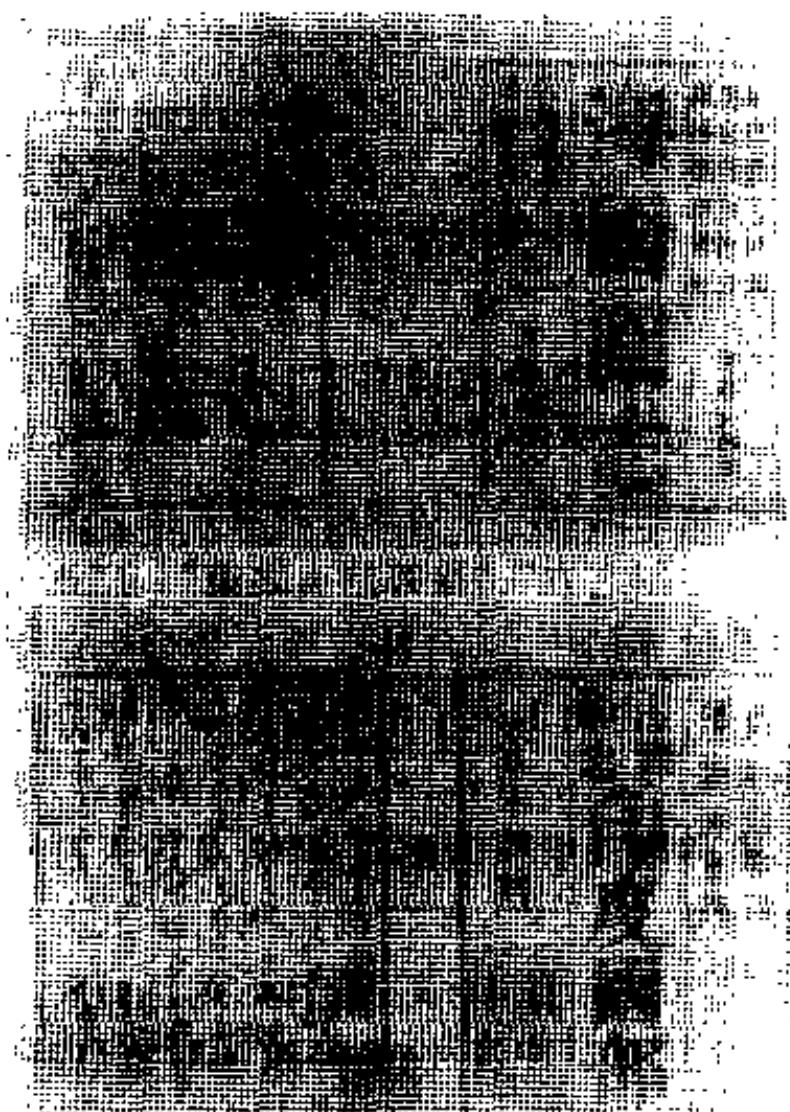
清朝封建专制政权推行闭关锁国政策,不屑于了解外国情形。长期闭目塞听所造成的恶果,使一些人愚顽昏聩。在鸦片战争中,投降派派其特使张喜去见英军统帅,张喜曾有“英国之王果系女人?”“英国在中国何方?”“英国与中国陆路相通否?”等提问。道光皇帝在审问英国战俘时也有“究竟该国(英国)地方周围几许?”“英吉利至四疆各部有无旱路可通?”“与俄罗斯是否接壤?”等问题。这种自己把眼睛蒙起来,不了解国际形势,不接触西方资本主义,不掌握



先进军事科学技术的军队,一旦“外夷交侵,群相惊畏,而莫知所措”,被动挨打势所难免。

受鸦片战争失败的震动和刺激,睁眼看世界,总结战败教训,寻找救国之策和抵御外敌方法,研究外国史地的任务,落到了开明进步的知识分子肩上,要了解外情,必先抛弃“天朝上国”的虚骄心理,放弃夜郎自大、井底观天的观念,改变“儒者著书,惟知九洲以内”的旧传统。研究“外域诸书”对“夷人刊印之新闻纸”亦“不妨兼听并观”,因为只有“知彼虚实,始可以定控制之方”,“徐筹制夷之策”。广州成为当时中国人睁眼看世界的中心,自林则徐在禁烟运动中主张“立译馆翻夷书始”,由此出现了中国近代第一批介绍和研究世界各国史地和现状的著作,林则徐的《四洲志》即是其中之一。该书由林则徐组织人翻译,译自英国人慕瑞(Murray)的《世界地理大全》(1836年伦敦出版),讲五大洲30余个国家的地理历史,由林亲自进行文字修饰后编辑而成。

1841年6月,林则徐被革职流放,途经镇江时将《四洲志》手稿及相关的外国资料交给魏源,魏源受托后以高昂的爱国激情,将《四洲志》作为蓝本,征引历代史志多种,参考古今中外各家著述70余种,并亲自询问一名英国战俘,加上各种奏折及自己亲自掌握的资料,可以说是收集到了当时中国人“所能了解到的一切海外知识”,最后于1842年编成《海国图志》50卷,计57万字,另有23幅地图及8页洋炮图。该书是一部世界地理专著,以分析鸦片战争始末并论



流传日本的《海国图志》版本。

述守、战、款等有关国防策略的《筹海篇》开卷，并叙述各国沿革，最后以介绍西洋天文历法的《地球天文合论》终篇。该书代表了当时中国学术界研究世界史地的最高学术水平，刊行后国内争相传阅，在社会上引起巨大反响，为此魏源又加以修订增补，1847年补充为60卷。到1852

年又增加到100卷时，介绍美国的篇幅比《四洲志》美国部分增加了将近两倍。

《海国图志》传入日本后，最初由于书中有关于大主教的内容，触犯日本锁国禁令，因此被列为禁书而没有流入市场。1854年《神奈川条约》后，美国强迫幕府开港通商，幕

府对该书开始解禁,受到日本有识之士的欢迎和重视,不断加以翻译、训解和刻印,一时在日本出现很多翻刻本、训点本(在汉文上加训读符号或假名)和日译本。由一项统计资料得知,自1854—1856年的3年中,日本出版《海国图志》选本21种,按内容来分,有《筹海篇》、《夷情备采》、《武器图说》方面的5种,关于美国的8种,英国的3种,俄国的2种,法、德、印度各1种。该书由于在日本供不应求而引起书价上涨。据主管输入中国书籍的长崎会所账簿记载,1851年时该书130目,到1859年时已涨至436目,而且买此书者的层次很高,既有执掌大权的幕府高级官吏,也有红叶山学问所、昌平坂学问所等日本最高学府的学者。

在闭关锁国时代,日本人只能从来长崎进行贸易的荷兰商人那里,获得一星半点西方情况,对国际地理知识和西方世界的现状,所知甚少。中国鸦片战争发生和日本遭西方冲击时,朝野一片迷惘和无奈。因此作为一种文化交流,当中国近代第一部系统介绍世界史地的《海国图志》传到日本时,立即受到幕府末期朝野上下的重视,并成为日本要求抵御外敌、革新内政维新志士的重要启蒙书,有力地推动了日本维新思想的发展,成为日本武力倒幕先声的尊王攘夷思想理论的组成部分。对此梁启超在《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一文中谈到,《海国图志》“奖励国民对外之观念”,“日本之平象山(即佐久间象山)、吉田松阴、西乡隆盛,皆为此书所刺激,间接以演尊攘维新之活剧”。当时日本的

众多思想家、政治家,确实从该书中受到启迪,从而提出学习西方科学技术,抵御外敌,革新内政,维护国家民族独立的主张。

《海国图志》中不仅有系统而全面的世界史地知识,而且还结合鸦片战争的经验教训,提出了许多有关加强海防、抵御外敌的策略和建议,这对日本幕府末年在西方列强虎视眈眈下,急于加强海防的日本人具有很大现实意义。学者南洋梯谦推崇该书是部“天下武夫必读之书也。当博施以为国家之用”。

尊王攘夷运动的另一位活动家桥本左内,在读过日译本《海国图志》后,还研究原著,并且作了注释。著名学者横山湖山在读了此书后,也逐渐睁眼看世界,并关注时势。其弟子小野元济译完《海国图志》中的《英吉利广述》后,请他批阅并作序,曾遭他训斥,认为此举违反讲经读史之道,不成体统。但当他后来读了原文后,看到魏源对英国侵略者的具体分析和海疆防御之策后,颇受感动,立即为小野译文作序。此后,横山湖山还为广瀨达翻译的《亚美利加总记后篇》写了跋。

日本幕府末期思想家吉田松阴在狱中得到《海国图志》两册,如获至宝,由于感受很多,体会颇深,还写了《读〈筹海篇〉》等文,对魏源的主张进行评述,并提出自己的见解。他在给哥哥的信中称赞林则徐、魏源两人都是“有志之士”,且通“蟹行学”(亦称横行文字,即横行排印的西文),并劝日本

的有志之士也钻研横行文字。尽管说林、魏通西文一事纯属误会,但却道出了他对林、魏的敬慕之情。

吉田松阴对《海国图志》给予高度评价,他依据从书中所获得的丰富世界知识,结合日本实际,抨击日本幕府的闭关锁国政策,说:“不知外国的事情,徒守海岸,困于贫穷,诚为失策。英吉利、佛兰西等小国,能越万里远海统制别人,都是航海之益。”由此他提出尊皇攘夷、维新改革的主张:“万国环绕,其势如此,若我茫然拱手立于其中,不能察之,实在危险得很”,“只有爱民养士,慎守边圉,善保其国,才能于群夷争聚之中,举足摇手”。特别是魏源在书中提出了著名的“以夷攻夷,以夷款夷,师夷长技以制夷”三大主义,其影响更加深远,简直可“支配百年来之人心”。日本学者大槻桢在《海国图志·夷情备采》序中指出:“海防之道,莫要于知夷情也。知夷情,则强弱之势审,而胜败之机决矣;不知夷情,则事事乖错,变每出意测之外矣。”

另一位维新思想家佐久间象山,在他的文集《省悟录》中说,正当中国发生鸦片战争,处于“英夷寇清国,声势相逮”时,他于1842年11月向幕府提交了著名的《海防八策》,后来他读到了魏源写的《圣武记》,该书作于1842年7月,比他的“上书陈策”早4个月,可谓不约而同。对此象山不胜感慨:“呜呼!予与魏,各生异域,不相识姓名,感时著言,同在是岁,而其所见亦有暗合者,一何是也,真可谓海外同志矣!”

魏源在书中关于海防等较为具体的国策问题的叙述，对日本学者也有影响，佐久间象山在推崇魏源著作的同时，提出了自己的不同见解，认为海防应远制敌于外海，而不是坚壁清野、严密防守，应讲究炮舰和主动出击，而且关于炮舰之学，书中谈得太粗浅。尽管两人看法不同，但足见魏源之书对他颇有参考价值。吉田松阴在读了《筹海篇》以后，认为魏源在议守、议战、议款等方面，都谈得非常透彻，对魏源的策略思想十分推崇，并认为清政府如能采纳，不仅可以抵御英国，也可抵御俄法等国的侵略。对于魏源在书中认为俄、美、法皆憎恨英国，中国可以得到他们水陆援助的想法，提出异议。他认为列强“见利忘义，只要有利，便可以与敌人同盟，反以同盟为敌，此乃常事”。总之，魏源在《海国图志》中，敢于提出了解世界和向西方学习的主张，具有振聋发聩的作用，书中所表达的“经世致用”精神，“制夷”和“筹远”等愿望，具有启蒙意义和先驱作用。

## 二、王韬与他的《扶桑游记》

鸦片战争之后，在内忧外患中能够面对现实，冷眼观察世界，探索救国救民良策的少数知识分子中，王韬算是其中之一。王韬鹏游世界的活动及其《扶桑游记》一书，在中外文化交流及近代启蒙运动中都有不凡贡献。

王韬(1828—1897年)，字兰卿，又字紫诠，1828年生于

江苏浦里的一个塾师之家，年少时喜欢读书，天资聪颖过人，从小胸怀大志，日空一切，落拓不羁。1848年王韬离开乡间来到上海，翌年应英国传教士麦都思之邀入墨海书馆任教师及校编工作，协助西人将西方的格致之学介绍到中国来，颇为西人所倚重。同治元年（1862年）王韬



王韬像。

因“上书太平军”有“通贼”之嫌而受清政府通缉，只得亡命香港。王韬在港协助英华书院院长、英国汉学家理雅各，将中国的四书五经译成英文。1867年底王韬启程西行，40余天后抵达法国马赛，开始了他在欧洲两年多的旅居生活。其间还在英国最高学府牛津大学讲授孔子学说，介绍中国

文化,且毫无胆怯和自卑之感。

1870年春,王韬回到香港,撰写成《法国志略》一书。1871年普法战争后不久,又编撰《普法战纪》14卷,书中详细探讨战争经过及原因,并预测战后国际形势的发展变化。1874年时又在香港创办《循环日报》,每日有论说文见报,宣扬变法图强,其改良维新宣传家之名“蜚声海外”。《普法战纪》写完后尚未付印,在国内已不胫而走,其“钞本流传,南北殆遍”,在中国知识界特别是洋务派官员中流传甚广,毕竟这是中国人所写的第一部欧洲战争史。此时的日本处于开放之初,急于了解西方世界现状,因此该书传到日本,立即被翻刻流行,备受欢迎,日本学者冈千仞说:“《普法战纪》传于我邦,读之者始知有紫沚王先生。之以卓识伟论,鼓舞一世风痹,实为当世伟人矣。”魏源的《海国图志》和王韬的《普法战纪》成为日本知识分子了解世界大势的必读之书。

日本的许多文人学者读其书,慕其文,慕其远见卓识,亟欲相见求教,为此纷纷发信要求王韬东游,而王韬作为一个思想家,也想去日本考察一番,大清的“巍巍上国”、“堂堂天朝”为何“反不如东瀛一岛国”,他想亲自去看一下日本是如何在欧美侵袭之下发愤图强的。王韬于1879年4月23日自上海坐船出发,途经长崎、下关、神户、大阪、横滨,最后到达东京,在日本游览4月余,共计128天,受到各界人士的热烈欢迎。日本人中村正值对王韬访日的轰动效应描述



道：“夫清国之人游吾邦者，自古多矣，然率皆估客，而又限于长崎一方。近来韦布之士来东京间有之，然其身未至而大名先闻，既至而倾动都邑如先生之盛者，未之有也。”又说那里的“都下名士，争与先生交。文酒谈宴，殆无虚日，山游水嬉，追从如云，极一时之盛”。

日本友人非常仰慕王韬才学，要求他记述访日期间的一切活动，愿将他的“生平著述授诸于民”，使其广泛传播，王韬答应后每日必记，笔触所及，奇矫纵横，皆成文章，并录下大量和唱酬答诗文，构成一部意境清新隽永、笔调流畅优美的日记体诗文集《扶桑游记》。该书约4万字，分上、中、下三卷，由日本“报知社”印局社出版，1879年冬出上卷，次年夏出中卷，9月出版下卷。该书一经问世，中日知识界人士争相传诵，以先睹为快。日本人士更以自己被列入其中为荣。王韬扶桑之游所产生的影响，在书中所传递的信息，那兼明中西的学识和涵养、所论述的观念和主张、中日学者文人之间的交往和情谊、明治社会风俗民情的描述等，忝为中日文化交流史上一大盛事。

日本的明治维新、扬弃旧学、提倡西学，促使日本社会发生深刻变化。在西学传播中如何进一步学习西方，王韬也与日本学者进行探讨。19世纪末期，中日两国在如何学习西方的问题上，都面临着封闭与开放、排外与崇洋的取舍和抉择，对此王韬认为，学习西方应该从本国的具体实践出发，弃其糟粕，取其精华，并针对当时一部分人盲目崇洋媚

外,主张“全盘西化”提出:“法苟择其善者,而去其所不可者,则合之道矣。”“择其善者”,“去其不可者”,这才是引进西方文化的正确态度。除此以外,王韬认为学习西方文化不能浅尝辄止,停留在表面,面应学习根本。他在评价日本学者的《万国史略》时指出:“余谓仿效西法,至今日可谓极盛,然究其实,尚属皮毛。并有不必学而学之者,亦有断不可学而学之者。又其病在行之太骤,而摹之似也。”这就是王韬学西学、办洋务的理论主张。从根本上着手,即要改变封建国家政治、经济、军事、教育和法律等制度,总的目的是民富国强。至于西方文化中的那些消极的侈奢淫靡的社会病毒则断不可学。19世纪70年代末的王韬,能有如此远见卓识,确属难能可贵。

王韬在日期间与各界人士广泛接触,仔细考察明治维新后日本社会所发生的深刻变化。对日本军事家西乡隆盛的功过有较为客观的评价,对明治维新时期最后的土族武装叛乱——西南战争(1877年)过程,也有较真实的记录。西乡是“王政复古”中的倒幕主将,深谙兵法,为明治维新立下赫赫战功,可惜晚节不忠,发动叛乱后兵败自尽,“一死鸿毛轻”。王韬在为此面作的长诗歌咏中认为,历史的发展趋势常常是“顺者终兴逆者绝”。

经过明治维新的扫荡和实行“书籍奉还”和“废藩置县”政策后,昔日的封建幕府衰落了,藩侯大名等封建贵族的种种特权也被剥夺殆尽,且被迁往江户,仅保存了一个“华族”

的空头衔,华丽的豪宅和雄伟的宫殿皆被废撤,前后变化之大,盛衰之强烈,恍如隔世和黄粱一梦。王韬认为历史潮流滚滚向前,是谁也阻挡不了的,日本的德川幕府如此,满清王朝的命运也必将是如此。

王韬在日本也考察中华文化在日本的流传、演变和影响,游记中多处留有中日文化交流的史料。中国华侨很早移居日本,为联络乡谊和有一个礼佛祀祖的场所,散居日本各地的侨胞便以地缘为基础,建起许多寺庙,孔庙和关帝庙即是其中之一。在日本东京周围,建有多处规模大小不等的孔庙(有的也称学校),自奈良时代的大宝元年(701年)起,在每年二月和八月的丁日,举行对孔子的拜奠典礼,称为春秋两祭,人们穿古装,放供品,还有道具和奏乐等。王韬叙述说东京的一处孔庙已改成图书馆,但先前的祭孔大典都非常热闹:“旧幕盛时,事孔圣礼极为隆盛,每岁春秋二丁释菜,三百藩侯皆有献供。所奏乐器,金石咸备。维新以来,专尚西学,此事遂废。后就庙中开书籍馆,广蓄书史,日本、中华、泰西三国之书毕具,许内外士子人而纵观。”

王韬在横滨还欣逢华侨的宗教节日,其关公生日的庆典“铿锵歌舞以侑之,殊为热闹”。在当地华侨会馆中所看到的关帝诞辰纪念,其场面更大,气氛更加热烈,“锣鼓喧阗,笙箫如沸,士女来观者,络绎不绝,几乎袂云而汗雨”。关帝在宗教中似为一种民间信仰,如今日本神户的关帝庙内,除奉祀关圣帝外,还有观世音菩萨、天后圣母、财帛星君

等,诸神合于一庙,各显神通,相安无事,此为海外中国式寺庙的一大特点。

王韬结束访日活动后于1879年8月22日启程回国,日本众多友人设宴为王韬饯行,中国驻日大使何如璋、副使张斯桂、参赞黄遵宪等出席,到会者近百人。心情激动的王韬即兴作长诗一首留别,感谢各界朋友的盛情款待,希望中日人民和睦相处,世世代代友好下去,日本友人也酬答唱和,称赞王韬学识渊博,文史皆通,出口成章,博通中外,学贯中西。日本友人狩野良知赞美王韬的诗句有:“逍遥海外作鹏游,足遍东西历数洲。意气乘风涛万里,文章经国业千秋。”另一位友人中村正直有:“那忍匆匆分手去,天涯好会再难求”的诗句,一股对王韬难分难舍的情感,跃然纸上。王韬在东京坐火车至横滨转船回国,何如璋、张斯桂等送行,黄遵宪及日本友人数十人一直送至东京火车站。7位日本友人把他一路送到横滨直至登上轮船,充分体现了中日人民之间的友好情谊。

作为中国文人首次在日本实地考察后所写的日记,《扶桑游记》的观察比较客观公正,且具有较大真实性,书中丰富的史料,有助于中国人了解明治维新后日本社会在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所发生的巨大变化,并从中获得很多新知。例如日本人所著《万国史记》、《美利坚志》等书,均在游记介绍后传入中国。该书文笔生动,骈散相融,书中有关明治时代日本文坛风貌,因系外国人所写,具有特殊价值,故

迄今仍为日本文化界人士所重视。王韬的访日及其《扶桑游记》在两国的流传所产生的影响历久不衰,诚如日本的实藤惠秀氏所评价的那样:“在中日文化交流史上,王韬是最难以令人忘怀之人。”

### 三、黄遵宪与中日文化交流

1871年9月,中日两国签订《中日修好条规》,正式建立外交关系。1877年11月,以何如璋为首的中国驻日使团赴日本,这一使团有个很大特点,即颇多满腹经纶的饱学之士,参赞黄遵宪(1848—1905年)就是其中之一。黄于1882年春调任中国驻旧金山总领事,在日任职4年多,是首届中国驻日使团中影响最大、为中日文化交流贡献最多的外交官。

黄遵宪在日本任职期间,为更好学习日本经验和促进中日文化交流,经常漫游日本各地,作各种考察,参加各种集会,广泛结交各派人士,跟日本学者和诗人唱和诗篇。其交往范围有日本政治家、学者、诗人、书法家、政府官员等。当时日本的许多知识界人士,都会读写汉文,因此尽管中国驻日使团成员中会说日语者很少,却仍然可以通过用笔写汉文的方式来进行交流,这一方式称为“笔谈”。笔谈时彼此写在纸上,可以长期保留,这是中日文化交流的一种特殊方式。黄遵宪用汉文与日本人笔谈的内容极其广泛,涉及

到中日两国的政治、外交、历史地理、文学艺术、学术思想、风俗习惯等。后来这些笔谈被编辑成《黄遵宪与日本友人笔谈遗稿》一书。

从该书中可以发现,黄曾向加藤樱老、源桂阁询问有关日本的音乐问题,和冈鹿千仞谈论中日两国风俗习惯的异同,与石川鸿斋、黍园等讨论《红楼梦》、《源氏物语》等文学名著,与龟谷省轩讨论汉文诗歌风格和特色问题,及《日本杂事诗》,涉及日本人对读书的评价。热爱中华文化的源桂阁对和所有中国人的笔谈都十分珍视,当天晚上就把纸裱好,精心保存起来。如今在日本《大河内文书》及其他各种公私文书档案中,保存着很多这类笔谈的原本,既是中日文化交流的珍贵历史资料,又是中日人民友好的佐证。

黄遵宪于1877年到达日本,通过对日本资本主义政治制度和学术文化的直接观察,觉得中国人对日本的认识很模糊,为了将明治维新期间日本人学习西方的经验教训介绍给中国人,为中国提供日本更真实的详细情况,于是便发凡起例,决定编纂《日本国志》一书。自1878年起即着手开始搜集资料,1879年起正式动笔编写,其间克服无数困难,经历了极其艰难曲折的过程。至1882年春刚完成初稿,又被调任驻美国旧金山领事,1885年他请长假回国,在自己故乡嘉应闭门谢客,埋头继续著述,四易其稿,终于在1887年夏完成全书。1890年在广州付刊,1895年才刻成正式出版。

《日本国志》的资料来源,既有黄遵宪自己对日本历史与现状多角度观察、深入研究的成果,又有日常的调查研究以及与日本友人广泛接触而积累的资料,还大量引用了日本政府各机关、各地方发布的公报、法令和统计数字,其取材范围之广泛,涉及内容之丰富,搜集资料之翔实,均是前所未有的。全书共40卷,50万字,包括卷首的年表和国统志、邻交志、天文志、地理表、职官志、食货志、兵志、刑法志、学术志、礼俗志、物产志、工艺志等12种志。该书是一部日本通志,系统而全面地论述日本历史由远及近,古往今来的概况,特别是详细叙述了明治维新后所推行的各种制度及社会面貌所发生的巨大变化,因此该书又像是一部中国人写的明治维新史。

黄遵宪在书中叙述日本历史与现状的同时,还常结合中国的具体情况作精辟的分析和评论,特别是把日本学习西方的成效和经验教训详细介绍到中国来,以推动中国的变法自强,这从《日本国志》的凡例中可以看出:日本“变法以来,革故鼎新,旧日政令,百不存一。今所撰录,皆详今略古,详近略远,凡牵涉西法,尤加详备,斯适用也”。同样学习西方,中日两国成效不同,日本接受西学后步子迈得很大,这和学习外来文化的态度不同有关。黄遵宪经过对比之后指出:“持中国与日本较,规模稍有不同。日本无日本学,中古之慕隋唐,举国趋而东;近世之拜欧美,举国又趋而西。……若中国旧习,病在尊大,病在固蔽,非病在不能保

守也。”这些对比、评论、分析和见解，给读者以一定启迪，在中国近代史上产生了很大影响。

黄遵宪出任日本外交使节时，日本的明治维新运动开始也仅十来年，但是求变革、求进步的潮流已席卷全国，赴海外留学人数不断增加，明治维新运动各级领导人物都是欧美留学、考察归来的中青年人，充满朝气，富有进取心。在该书的“学术志”中详细叙述道：“明治之年，海外留学者五十人；二年，至百五十人；至五年，大抵千余人。……争延西人为之教师。明治六、七年间，各官省所聘、府县所招，统计不下五六百人。……今之当路诸公，大率从外国学校归来者也。”

文化交流是国际关系中的重要一环。中日两国的文化交流源远流长，彼此浸润，互补短长，范围极其广泛。黄遵宪在该书的“邻交志”和“学术志”中，也追溯了中日文化交流的历史与现状，提出自己对国与国之间文化交流重要性的见解，认为“艺术以相摩而善，武备以相竞而强，物产以有无相通，得以尽地利而夺人巧”，从而达到共同提高，促进彼此间的了解、团结和进步的目的。

黄遵宪的《日本国志》为中国资产阶级勾画了借鉴的蓝图，成为中国近代维新改革运动的思想源泉之一。在甲午战争（1894—1895年）中，经过变法维新的日本，打败了闭关守旧的中国，引起国人极大的震动，故该书备受重视，袁昶曾对黄遵宪说“此书早布，省岁币二万万”。意思是说，如果



《日本国志》赶在甲午海战前出版,中国不至于战败,可省却这二万万两对日本的赔款。书中鼓吹学习西方,效法日本的言论,又成为中国戊戌维新运动的启蒙读物,康有为、梁启超等维新派人上均读过此书,光绪皇帝在戊戌(1898年)这一年接连数次命大臣进呈《日本国志》以备参考,对戊戌变法具有一定促进作用。《日本国志》之所以在中国产生巨大影响,还在于该书在一定时期内,成为人们认识日本、了解日本的必读之书,是近代中国研究日本的一本重要参考书,常为各种著作广泛引用,因而在中日文化交流史上占有很重要地位。

黄遵宪的另一本巨著《日本杂事诗》,初刻本于1879年,由总理衙门以同文馆聚珍版刊行,共收154首,次年王韬也在香港出版《循环日报》社铅印本,先后曾有8种版本。后几经修改增删,于1890年在英国伦敦任参赞期间增订为定本200首,1898年在长沙刊印该定本,分为上下两卷,上卷主要内容为日本的历史、地理、政治、文学等方面,下卷着重写风俗、服饰、技艺、物产等。

黄遵宪不但是位出色的外交官,也是一位才华横溢的诗人。他在日本期间,认真研究日本明治维新政府的典章制度,研究日本的历史地理,考察日本的风俗民情,游览名山大川,了解日本工艺物产,比较中日文化,然后陆续创作百余首“杂事诗”。这些诗或一事一诗,或数事一诗,均是七言绝句,内容非常丰富,文笔生动活泼,短小有趣,用的虽是

文学体裁,但其用意在于让更多的中国人认识日本,特别是了解明治维新。诗后还往往附有长短不等的自注,或予以解释,或补充诗意之不足,较长的注自成一篇小文。这些诗是为编写《日本国志》作准备的,对此黄遵宪说:“余自丁丑(1877年)之冬,奉使随榎。既居东二年,稍与其士大夫游,读其书,习之事,拟草《日本国志》一书。网罗旧闻,参考新政,辄取其杂事,衍为小注,串之以为诗,即今所行杂事诗是也。”

黄遵宪在书中对日本的名山大川、名胜景观、风土人情等都满腔热情地加以歌咏,如对富士山、琵琶湖、整个日本列岛等用诗歌介绍,形象极其生动。对观赏樱花、茶道、和歌等的描写也惟妙惟肖。此外还有歌咏日本国花樱花的长诗《樱花歌》,以及反映京都传统风俗的《都踊歌》等诗歌。对日本明治维新志士佐久间象山、吉田松阴、西乡隆盛等人创作的诗歌予以歌颂。这部以比较通俗的形式写成的日本历史组诗,同时还是一曲别开生面的中日文化交流的颂歌,其中写日本古代引进中华文化的诗歌就达40首左右,如汉字传入日本,儒家经典传入日本,徐福东渡,日本盛行中医中药,明末学者朱舜水赴日,赞美中国美术音乐礼仪,日本汉学发达状况等。

作为文化交流,黄遵宪的杂事诗拉近了中日人民的距离,加深了中日人民之间的友谊与理解,故《日本杂事诗》问世不久,在中日两国便出现数种刻本,深得日本各界人士的

喜爱。“海外偏留文字缘，新诗脱口每争传”，可见黄遵宪的诗在日本的影响之大和所受到的欢迎程度。王韬在《日本杂事诗·序》中写道：“日本人士耳其名，仰之如泰山北斗，执贽求见者户外屐满。而君为之提倡风雅，于所呈诗文，率悉心指其疵谬所在。每一篇出，群奉为金科玉律，此日本开国以来所未有也。”在东京琦玉县的平林寺，至今还留有一座诗碑，这是应日本友人源桂阁之请，黄遵宪以部分手稿相赠，然后埋于土中，以为“稿冢”。于1880年树碑立冢，碑面由黄遵宪亲笔刻写“日本杂事诗最初稿冢”9个大字，背面为源桂阁撰写的《葬诗冢碑阴志》。黄遵宪亲自将诗稿放入袋中并掩埋入土，并洒酒吟诗为证：

“一卷诗兮一杯土，诗与土兮共千古。

乞神佛兮护持之，葬诗魂兮墨江浒。”

诗句永存，诗土芬芳，广为流传，诗碑已成为中日文化交流史上一段佳话。

#### 四、杨守敬访求逸书记

中国外交官杨守敬在日本任职期间，专心致志，竭力搜求中国失传古籍，为保存祖国文化遗产作出贡献的史实，一直被引为美谈，亦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日文化交流史上一件大事。中日两国是近邻，均属汉文化圈，两国文化上的交往历史久远，范围广泛，书籍的流动和传播也成为文化

交流的重要内容之一。中国典籍大量流入日本的主要渠道有二：其一为日本派往中国的遣隋、遣唐使团，许多留学生和学问僧在回日本时均带回大批汉籍和佛经。入宋、入明的僧人亦索要搜集、购买大量书籍回日本。凡遣明使在回国时均请求朝廷赐予书籍；其二为明清两代赴日本从事贸易的中国商船每次携带大批书籍去日本出售，其数量很多，往往一条船上就有上百种，门类也很丰富。中国赴日的僧人、学者和留学生也带去很多汉籍。这种长时期、不间断、大规模的汉籍输入，可谓是中国文化交流史中的一种特殊现象。由此之故，散失、留存在日本的中国典籍之多，难以计数，几乎无处不在。

1877年赴日本出任外交官的黄遵宪，每次见到日本人所珍藏的中国古籍、书画和经卷，都感慨万千。王韬在访日时也非常留意中土东流文献，发现不少在日本学术界影响很大，而在中国已经失传、遗失或极少见之珍本秘籍。王韬见到了清初文人孙豹人著的《溉堂文集》、清人钱牧斋的《初学集》原刻本，还觅得珍本《释氏要览》。看到许多在中国已经失传的珍贵书籍流落异国他邦，常激起一种爱国心和责任感，“岂求灵药入三岛，欲访逸书存百篇”，为此一一记下书名、版本和珍藏处，以期日后使其物归原主，重新回到中华大地。尽管自19世纪70年代起，就有一些中国文人学者搜求散失在日本的珍贵典籍，翻刻、复制、影印，以补阙失，但专门从事购买、收集并系统整理流失在异邦的中国佚

书者,当在 1880 年后从杨守敬起。

杨守敬(1839—1915 年),湖北宜都人,字惺吾,晚号邻苏老人,清同治举人,学识渊博,对金石、板刻、目录、书法等皆有研究,尤长于历史地理学。1880 年应中国首任驻日公使何如璋之邀请赴日,1881 年黎庶昌任第二届驻日公使时,继续留任使馆随员,直至 1884 年回国,在日本任职 5 年。杨守敬在日本访书的动因和经过等,在他自编的《邻苏老人年谱》一书中有详细介绍:“先是余初到日本,游于市上,睹书店中书多所未见者,虽不能购,而心识之。幸所携汉魏六朝碑版亦多日本人未见,又古钱古印为日本人所羨,以有易无,遂盈筐篋。及黎公(指驻日公使黎庶昌——笔者)有刻书之议,则日日物色之,又得森立之《经籍访古志》抄本,其时立之尚存,乃按目索之,其能购者,不惜重值,遂已十得八九,且有为立之所不载者数百种,大抵医书类为多,小学类次之。”

杨守敬大凡一发现秘籍孤本线索后,便跟踪追击,克服重重困难进行访问和收集,有些难得的珍本,尽管索价极高,也要忍痛买下。对日本藏书家即使磨破嘴皮也不肯出售的书,杨守敬只能忍痛割爱,用从国内携带来的汉印印谱、古钱币、碑帖、拓本等交换,以物易物,把珍本弄到手。例如日本藏书家町田久成收藏的《广韵》5 卷系北宋刊本,杨多方求购未遂,黎庶昌公使就亲自出马,仍不得要领。町田平时喜好金石,对杨守敬所带的多种汉印印谱垂涎欲滴,

杨只得以此作为交换,方才得到此书。

杨守敬穷蒐博采,广为搜求的精神实在了不起。凡日本人坚决不愿出让的珍本,便通过各种关系借出来刊印。如《春秋左传集解》古钞卷2本30卷,珍藏于日本政府的枫山文库,杨守敬便锲而不舍,通过种种努力借出来,然后请来10位日本书手在自己寓所日夜加班加点,影钞成折本。该书由于秘而不宣,连日本著名学者山井鼎也没见过,可见其珍贵程度,对此杨守敬喜不自禁:“余乃从百年后得见彼国学者未见之书,不可谓非厚幸乎!”该书称为“六朝之遗,非唐宋本所能相比”,故在“日本惊人秘籍以古钞左传卷子本为第一”,其贵可谓一字千金。

经杨守敬苦苦搜求,来之不易的佚书很多,如《足刻活字本七经》一书,杨守敬赴日后即到处留神,通过4年努力方配全全部七经。古钞《王子安文》卷子本一卷系日人岩谷修所赠,连日本藏书家森立之《经籍访古志》上亦未载。杨守敬在日本苦心寻访,大量收购佚书的冲击波,对日本书市及文人的影响应当是很大的。杨守敬说他初抵日本时,各书店对旧版的汉籍不甚珍重,数量大概也不会很少,后来看到杨守敬没完没了的搜求,受此影响一些日本人也开始出高价购买,于是旧本日稀,中国古籍的身价也越来越高,无意中大大提高了汉籍在日本的地位。

被清廷委任为第二届驻日公使的黎庶昌,也是一位饱学之士,为了使杨守敬搜求到的秘籍佚书重见天日,便支持

全部刊印出来,由杨守敬担任校勘刻印《古逸丛书》的重任。该书搜集古逸珍本 26 种,计 200 余卷,自 1882 年至 1884 年在日本东京刻印出书,其印刷精良,备受称颂。虽然督印百部,仍远远无法满足需要。因被视为奇书而为达官贵人索取一空,渴求无着者对此心怀不满。杨守敬为《古逸丛书》的出版耗费很大心血,200 卷书繁重的校刻工作全落在一个人身上,白天忙于监督刻工,夜间进行校对,终日不得休息,日本的刻书手们也一丝不苟,反复琢磨,精益求精,有的字甚至补刻数次,质量颇佳,例如在《谷梁传》中无一笔差错。

被收入《古逸丛书》的 26 种珍本中,如旧钞卷子本《玉篇》、《玉烛宝典》、《文馆词林》、《汉书食货志》、《春秋谷梁传》等,均是极其珍贵的古籍,有很高的文物价值,是继承中华文化遗产和进行文学、史学、哲学研究的重要参考资料。又如影宋蜀大字本《尔雅》、覆元本《楚辞集注》、影北宋本《姓解》、影宋本《史略》、影旧钞卷子本《天台山记》、影宋本《太平寰宇记》佚文等,都有很高的学术价值,无论是对名物考证还是在史地研究中,都是极重要的典籍。《太平寰宇记》为北宋地理总志,其重要价值在于书中兼及经济文化,增加了民俗、风土、物产等内容,所引书籍达百余种,弥足珍贵。原书 200 卷的宋版本在国内早已失传,《四库全书》中的选钞本目录也缺少其中 113 至 119 卷共 7 卷,而在日本恰保存着该书宋刻本残卷,而且恰好有 113 至 218 卷,于是

杨守敬便从库中借出影刻,补上残缺部分,几成完璧。

杨守敬在日本所搜集到的佚书,《古逸丛书》只是其中的一部分,回国以后其旧稿一直束之高阁。后因各地学者和朋友们的来信索取,杨便逐渐整理旧稿付刊,于1897年刊刻成《日本访书志》,共17卷8册,其中提到的书约计240种,共3万余卷。1915年杨守敬去世后,杨氏的观海堂藏书馆于1919年出售,后归故宫图书馆。该馆一学者又将杨氏遗书、旧稿及所写的序跋等,悉心整理编纂,还参照和引证其他很多书籍,穷数年之努力,最终编成《日本访书志补》于1930年出版。杨守敬在日本访书的其余遗稿的出版,使他多年辛勤得来的劳动成果,完满地划上了句号,不但被学术知识界人上所称道,杨本人如泉下有知,也会为此欣慰的。

早在明清时代,许多日本人来华后,出于对中华文化的仰慕,常请中国人为他们的诗文集作序、跋,或者请中国书法家撰写碑文、行录、像赞、匾额等,并以持有中国人落墨题款的作品为荣,所以中日之间的书法交流早已开展得有声有色了。杨守敬又是一位造诣颇深的书法家,为中国北派书法家藩存的高足,他在驻日使馆任职期间,曾携带去有关汉魏六朝、隋唐碑帖13000余册,在日传授六朝北碑书法,为中日书法文化交流作出了贡献。许多日本书法家经常登门向杨氏请教,通过笔谈交流心得,切磋书法艺术,逐渐形成日本书法以北碑为正宗的新流派。杨守敬回国以后,仍



不断有日本书法家来华上门求教,杨均热情接待,耐心辅导。醉心于中国风格书法的日本人为数不少,1911年时有位日本福冈县人上水野元,专程到中国寻求杨守敬学习书法。此君极其勤奋,每天步行20余里到杨家,杨守敬为他的虚心好学精神所感动,决心收入门下成为关门弟子,因为此时杨已是古稀老人了。

因水野要求,杨守敬撰写了一部《学书述言》的手稿,对各种书法的碑帖作简明介绍和评论,其中涉及的评碑数十种,评帖上百种,书法家上百人,对各家书法的特点、风格和短长,均简明介绍并进行中肯的评论。作为书法人门的一种基本知识,手稿还介绍了学习书法的要领和字体的演变过程等。杨守敬年老多病,辛亥革命时避乱沪上,此书是在严重缺乏资料的情况下凭记忆写成的,更是难能可贵。水野将手稿抄录后带回,在日本刊印流传,1926年时还出版了经人疏释的《学书述言疏释》,成为近代中日书法艺术交流的组成部分。杨守敬访书异邦,搜集整理孤本、善本典籍,使之长留人间,这对研究中国历史、世界文明都具有重要意义,同时也是他为保存中华文化遗产,为中日文化交流所作出的巨大贡献。

## 五、留学生与中日文化交流

派遣留学生历来是世界各国之间进行文化交流的重要

方式。19世纪中叶以后,中国为加快培养人才,吸取西洋现代化科学知识,学习西方先进的新式船炮制造技术,以抵御外国的人侵,求存图强,自1872年起开始派人出洋留学。中日两国为近邻,具有“路近、费省、文同”等诸多便利,早在1896年清政府即已派人去日本留学。甲午战败,中国知识分子开始意识到日本的强大在于明治维新,而明治维新成功又与学习西洋文化有关,通过日本学习西洋文化有仿行较易,可收事半功倍之效,于是在政府的提倡和奖励下,负笈东渡者如潮似涌,形成一次规模空前的留学日本热潮。大批中国留日学生前往日本各地,通过求学、集会、结社、办报、翻译出版书籍等多种形式,开展革命宣传和文化交流活动,在近代中日文化交流史上谱写了内容丰富、色彩斑斓的华章。这次热潮大致在1903年前后形成,1905—1907年达到高潮。据日本学者实藤惠秀在其《中国人留学日本史》一书中统计,1905年后半年,中国在日本的留学生计有8600人,并且认为这一数字“当最确实”。

后来由于中国国内革命形势高涨,特别是辛亥革命爆发后,留日学生纷纷辍学回国,加上日本政府一度无理取缔留学生,故中国虽曾派遣,但回国者甚众,总人数日趋减少,降至5000人左右。自1896年至1911年间,中国留日的官费生、自费生总数当在2万人以上。从1906年开始直到1937年,由于抗战的全面爆发而全面停派留学生,在这42年间留日学生总数不下5万人。其持续时间之长、人数之

多、声势之大、学习专业之广泛、开展活动之频繁,在世界各国留学史上都是罕见的。

与19世纪时清政府派往欧美的留学生几乎全部学习理工和军事不同,20世纪初赴日的中国学生所学习的专业范围相当广泛,主要有政治、文史、外语、师范以及理工、商业、军事、体育、音乐、美术等。在各科中以学文科和军事者占多数,其中又以学政法和陆军最为热门。相比较而言,在医学、农学、兽医和园艺方面,留日学生取得的成就较多些。另外,一些文化素养较高的留学生,被日本朝气蓬勃的新文学运动所鼓舞,便抛却自己的专业和研究科目,转向于文学研究和创作。例如学医的鲁迅、郭沫若,学海军的周作人,学矿物的张资平,学兵器制造的成仿吾,学法制经济的郁达夫等,后来都成为中国新文学运动创作或评论名人,由此有“中国新文坛的大半,是日本留学生建立起来的”说法。在留学生中约有1/5的人进过各种速成班学习,这些人所学到知识有限,许多人不能阅读日本书刊,真正能进入大学本科学习者很少。

由中国留日热潮所造就成的一支庞大的知识分子队伍,对于促进中国近代社会的文明进步,对在政治、经济、军事、教育、思想、文化、科学方面的发展,均产生过巨大影响。留学生在中日文化的交流活动中,日文书籍的翻译出版是其中之一。许多留学生在读了日文书籍以后,极想把书中的新思想和新知识介绍给国人,认为通过翻译介绍外国的

新文化是自己义不容辞的一种责任。1900年在东京成立的译书汇编社,为留日学生中最早成立的翻译团体。社长戢翼翬为首批中国留日学生之一,当时在东京专门学校攻读。该社最主要的工作是出版《译书汇编》月刊,是于1900年12月创刊的,内容选择18、19世纪欧美、日本资产阶级学者的一些著作,以社会和政治类学说著述为主,由日文进行汉译,译文分期连载,每期内容不同,也不分栏目。在创刊号上登载的译文有法国卢梭的《民约论》和孟德斯鸠的《万法精理》、日本著名学者贺长雄的《近世政治史》、乌谷部铨太郎的《政治学提纲》等。

自1902年12月的第9期起,杂志的内容编排体例有所变动,分成政治、经济、法律、历史、哲学、杂纂等栏目,也发表一些由留学生写的评论等。每一编刊完之后便出单行本,1901年刊行的单印本大都是日本学者的著作,如岩崎昌、中村孝的《国法学》、涩江保的《波兰衰亡战史》、高田早苗的《国家学原理》和井上毅的《各国国民公私权考》。在该刊第7期上的预告“已译待刊书目录”中,计有34本,内容涉及政治、经济、外交、教育、历史、新闻、军事、法律和社会学等。《译书汇编》较早而系统地介绍了西方和日本资产阶级的国家和政治学说,从而在思想启蒙运动中,使中国知识分子拓宽了视野,接受了新思想和新知识,进而对促使民族觉醒起了推动作用,对此梁启超曾予以好评:“……《译书汇编》至今尚存,能输入文明思想,为吾国放一大光明,良好珍

诵……”冯自由也在《辛亥前海内外革命书报一览》中作出肯定说,《译书汇编》为“……留学界出版之月刊,以此为最早。……促进吾国青年之民权思想,厥功甚伟”。

自1902年起,中国各省赴日的学生越来越多,各省留学生的同乡会、同学会组织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富于地区性特色的刊物也应运而生,例如1902年,留日学生中出现了另一个重要翻译团体湖南编译社,这是由湖南籍学生中的佼佼者组成的,所办的刊物名《游学译编》,自1902年11月创刊至1903年11月,共出版12册,也出版译著单印本。他们在一则声明中认为“游学诸人原有输入文明开通本国之责务”。与《译书汇编》稍有不同者为,除选译单印本外,也选译部分报纸和杂志上的论文,同时也刊出广告。此外,该刊也带有一定的政治倾向,所刊载的论文引用日本学说和时论,又不时混入各种翻译资料。从该刊的目录上得知,译文内容非常广泛,例如第四册上有政治学说、文化教育、历史地理、人物传记以及外论、时事和余录等。从该刊的广告中看到,湖南编译社还出版日本著作的中译单印本,主要有贺长雄著、许直译的《国家学》,浮田和民著、由杨毓麟译的《史学原论》,还有《国家生理学》、《英汉对译万国地名表》、《支那教育问题》、《哲理微言》等。

福建省的留学生于1904年组织闽学会,发行《闽学会丛书》,亦以翻译出版日文书籍为主,斋藤阿具著、森长民译的《西力东侵史》为该会出版的第一部分,从其公布的广告

上得知,已刊书有《哲学原理》等3部,近刊书目有贺长雄《社会进化论》等4部,已译而未刊者有《今世外交史》、《进化新论》、《新式地文学》等9部。另一个留学生团体文学社,于1903年出版由范迪吉等人选译的《普通百科全书》100册,这是当时日本的一种中学教科书及大专学校参考书,分为宗教哲学、文学、教育、政治、法律、地理历史、自然科学、实业和其他等种类。这批汉译日本书种类多,内容广泛,影响也大,反映出当时中国教育事业的发展,满足了人们对新文化知识渴求的需要。

近代中国的译书事业,始于19世纪中叶,然而在半个世纪内,其译书一直以西文为主,日文所占比例微乎其微,例如1850—1899年所译的567种书中,译自英、美、法、德的达410种,占72.4%,日文的86种,占15.1%。而在1902—1904年三年中所译的533种书中,日文的321种,占60.2%,由此可见其日书中译增长速度之迅猛的盛况。

在国际文化交流中,外来语的输入是不可避免的。中国汉字很早就传入日本,用中文修史在日本一直延续到明治时代。由水户藩源光国倡议所修的《大日本史》,其汉语水平已达到畅达明通的程度。这些用汉文写的史书,其体例完全模仿中国正史,如有本纪、列传、表、志等,记事方法、修志宗旨和精神等也仿效中国。汉字成为日本人民的重要文化工具后,日语和汉字到了如胶似漆的程度,因此日本人民就从不视汉文为“外来语”。当然,日语词汇也影响中

国,留日学生也促进了中日语言词汇的交流与融合。

中国留学生久居日本,接受了日本人为表现西方新事物新思想而创造的一些新名词,便在自己的语言文字中,参考许多日本的文法与语汇,并在日译中文本中使用新词汇。据日本学者实藤惠秀在书中介绍,中国人承认来自日语的现代汉语词汇,总数多达 844 个。

今天我们在书报的阅览中,互惠、千瓦、多元化、最惠国、混凝土、电子、电信、癌、腺、法人等词语,随处可见,并约定俗成,成为中国语的一部分。一些英语中的词语,如淋巴、俱乐部、浪漫等,也由日本音译的外来语而来。总之,日语的词汇成为现代汉语中外来词的主要部分,这些新词汇被人接受下来,融入汉语中后,广为传播,既丰富了汉语的语言词汇,也有助于中国新文体的发展,在阅读时给人以耳目一新之感。

话剧是由西方文化结出的果实,日本戏剧界人士于 19 世纪末自欧洲引进话剧,中国人又通过向日本学习而接近西方,中外文化相互浸润,为中国话剧的产生提供了机缘。西方话剧移植中国有两条途径:一是直接从西方输入;一是间接从日本输入,即直接受欧美影响和间接受日本影响并存,而后一种影响又和中国在日本的留学生有关。1906 年,李叔同(1880—1942 年)等留日学生向日本著名导演藤泽浅二郎学习西洋戏剧的演出。这一形式因简练生动,排演方便,能结合社会现实便于人理解而受到欢迎。1907 年

2月,中国第一个话剧团体春柳社在东京成立,其成员都是中国留学生。该社以“研究新派(话剧)为主,以旧派(传统戏剧)为附属科”,并不时举行排练。

1907年7月,正值中国淮河大水灾,在东京的中国留日学生组织青年会举行赈灾游艺演出,春柳社上演法国小仲马的名剧《茶花女》第三幕的最后两场,以及《黑奴吁天录》等。由曾孝谷饰演阿芒父亲,李叔同男扮女妆演马格丽特。剃去了胡须的李叔同风姿绰约,扮相俊美,评论家居松翁撰文说:“李君的优美婉丽,决非日本的俳優所能比拟。”由于有日本新派艺人从中予以指导,在布景、服饰、舞台设备等各个方面,其良好条件都是国内的“新戏”所没有的,留日学生由此揭开了早期中国话剧发展的帷幕。

春柳社后来发展到80多人,并排演新的剧目,举行第二次公演,同样获得很大成功。该社的一些成员后来回国后,常以“慈善”、“募捐”、“赈灾”的名义在上海等地上演独幕话剧,具有很大的艺术感染力。作为对春柳社戏剧活动的呼应,国内春阳社戏剧团体相继成立,话剧艺术自此在中国生根开花。在这门艺术的传播中,留学生起到了文化交流的桥梁作用。

## 六、梁启超传播日本学的贡献

梁启超(1873—1929年),广东新会人。中国近代著



名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政治家、变法维新宣传鼓动家和杰出学者，一生著述甚丰。梁启超又是将日本文化介绍和传播到中国的一位重要人物，本文就梁启超为日本学传播所作贡献一事论述如下：

中日甲午战争以后，梁启超痛感祖国被瓜分，认为中国的出路就在于仿效日本的明治维



梁启超己亥年像。

新。于是，他积极参加和领导维新变法活动，并开始介绍日本和西方的资产阶级文化。1896年，梁启超等在上海创办了《时务报》，该报辟有译书专栏，聘请通晓中文的日本人古城贞吉翻译日文的政治、经济、军事著作。1897年，梁启超等人在上海又创办了大同译书局，其方针为“以东文为主，

而辅以西文；以政学为先，而次以艺学”，并专托友人赴日本调查采访应译之书，聘请精通中文的日本人襄助译事。同年，大同译书局出书 10 余种，其中包括《日本书目志》4 册。

1898 年 9 月 21 日，慈禧太后发动政变，宣布“举人梁启超与康有为狼狈为奸，所著文字，语言狂谬，着——并严拿惩办”。戊戌变法失败，同年 9 月 25 日晚上，梁启超从天津塘沽港一艘小船上，悄悄登上日本军舰“大岛号”，摆脱清兵汽艇的追赶，侥幸脱险，以只有 26 岁的青年奇慧，亡命日本，孜孜以求，吸收异邦的新文化。梁启超来到日本后悲愤莫名，心潮难平，在所写长诗中有“割慈忍泪出国门，掉头不顾吾其东”等句。同时他也不忘自己亡命他乡的历史使命，积极协助康有为进行反对慈禧复辟，保卫光绪皇位的宣传鼓动工作。在嗣后长达 14 年之久的流亡生涯中，他一方面从事政治活动，另一方面继续介绍、传播西方和日本的资产阶级文化。

在旅日华侨的赞助下，梁启超于 1898 年 12 月 23 日在日本横滨创办了《清议报》，出满百期后于 1901 年 12 月停刊；旋又于 1902 年 2 月在横滨创办了《新民丛报》，至 1907 年冬停刊。这两份报纸虽然宣传改良、主张保皇，在政治上是资产阶级革命运动的绊脚石，但在宣传西方资产阶级文化方面还是起了积极的作用。

梁启超在《清议报》和《新民丛报》上广泛介绍西方和日本的各种哲学、社会政治学说、经济学说和历史人物。他很

推崇日本近代最著名的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教育家福泽谕吉，在《新民丛报》上对其作了较全面的介绍，赞扬福泽“独力创一学校，名曰庆应义塾；创一报馆，名曰《时事新报》，至今为日本私立学校、报馆之巨擘焉。著书数十种，专以输入泰西文明思想为主义。日本之知有西学自福泽始也；其维新改革之事业，亦顾问于福泽者十而六七也。”《清议报》、《新民丛报》上还刊载了福泽谕吉的《男女交际论》和部分语录。梁启超对日本另一位著名的启蒙思想家加藤弘之也极为赞赏。他在《新民丛报》上发表了《加藤博士天则百话》，并加有按语，摘译了加藤氏的著作和主要论点。梁启超还在《清议报》上介绍了日本新闻学家松本君平的资产阶级新闻观，并以此作为自己办报的理论依据，认为“《清议报》事业虽小，而报馆事业则非小”。此外，《清议报》、《新民丛报》上还刊载了日本著名哲学家井上哲次郎等人的文章和日本政治小说《佳人奇遇》、《经国美谈》等。

梁启超通过在日本创办的报刊，用西方和日本的资产阶级新思想、新学说打开了原来只知四书五经之类封建文化的中国人的眼界，激发了中国人民的热情。因此，《清议报》和《新民丛报》不胫而走，畅销于海内外。不少无产阶级革命家如毛泽东、吴玉章等人都曾是热心的读者。《新民丛报》的销量曾高达1万多册，这在当时是一个巨大的数字。梁启超本人也因此成为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最有影响的资产阶级启蒙宣传家。

为了更有效地通过日本学习西方,梁启超积极倡导中国人学习日文,阅读日文著作。他发表了《论学日本文之益》,谆谆告诫国人:“日本自维新三十年来,广求智识于寰宇,其所译所著有用之书不下数千种,而尤详于政治学、资生学(即经济学)、智学(即哲学)、群学(即社会学),皆开明智强国基之急务之”,故“我国人之有志新学者,盖亦学日本文哉”。他强调指出,学习和翻译西书若求速效,学习日文当是一条捷径,“学日本文数月而小成,日本之学已尽为我有矣”。为了帮助中国人民尽快地掌握日文,梁启超还与罗汉高共同编辑了《和文汉读法》,书中将中日两国的文字与语法,对照起来找出异同,然后制订若干通例,初学者碰到难点时,一查便“十可通其八九”。这在近代中日文化交流史上也是一件颇有意义的事情。

梁启超这位在国内时就积极主张译读西书、效行西法的改革者,到日本后,终于有了直接接触和研究西方社会文化的机会。他对西方政治学、经济学、哲学、社会学、史地学等学问的认识与了解,完全与认真阅读大量日本书籍有关。例如,他如饥似渴地阅读日文著作,像西方思想家卢梭的《民约论》、孟德斯鸠的《万法精理》、亚当·斯密的《原富》和霍布士、斯宾诺沙等人的著作、日本思想家吉田松阴、福泽谕吉、加藤弘之、中村正直等人的著作,以及日本新闻学家松本君平的《新闻学》、文学家矢野文雄、柴四郎的政治小说等等。他通过广泛接触西方和日本的资产阶级文化,耳目

为之一新,思想前进了一大步,决心以多种形式将西方文化输入中国。

梁启超在日本所阅读的大量日本书,内容极其丰富,题材也很广泛,他在《乐利主义者泰斗边沁之学说》一文后,曾列举许多参考书目,除了边氏的原著外,还有陆奥宗光译《利学正宗》、中江笃介译《理学沿革史》、纲岛荣一郎著《西洋伦理学史》、《主乐派之伦理说》、山边知春译《伦理学说批判》、竹内楠三著《伦理学》、田中泰磨译《西洋哲学者略传》、杉山藤次郎著《泰西政治学者列传》、小野梓著《国宪泛论》、冈村司著《法学通论》、有贺长雄著《政体论》,一共 11 种,全部是日本人的著作和译著。

梁启超学习日文,读日本书,发表大量文章介绍西学,宣传维新变法,认为中国只有变法才能自强。但是他在日本 4 年中所发表的文章,其重要性和积极意义,已逐渐由鼓动国内的政治改革,转变为宣传西方的学术文化,政治态度虽日趋保守,但在介绍西学和中西文化交流方面作出的贡献也更大。在梁启超所推崇备至和着力介绍的西方思想家中,最著名者为梁氏所称的“十贤”,即哥白尼、培根、笛卡尔、孟德斯鸠、卢梭、富兰克林、瓦特、亚当·斯密、伯伦知理和达尔文。他往往一见到较好的西学著作,便着手译介,例如,英国人的《泰西文明原理》一书于 1902 年 4 月出版后,他在当年冬季就根据日文译文,撰写并发表了《进化论革命者颌德之学说》一文。据梁启超的《东籍月旦》一文介绍,仅

在“伦理学”和“历史”两个部分,系统介绍日本的西学译著就有 72 种。19 世纪末至 20 世纪初,梁启超将许多西方自由资本主义的政治理论和哲学思想名著,不断进行译介,这对刚刚开始变法维新的中国封建社会来说,其及时性和重要性是显而易见的。

日本自明治中期以后,大量翻译外国文学作品,特别注意翻译欧洲近代文学。在外国文学作品翻译中,选题广泛,内容兼容并包,不仅选择各国著名作家的作品,也翻译一般作家作品,还有不少政治题材小说。梁启超很重视研究日本和西方文学中政治性较强的作品,尤其是政治小说,他认为,当时日本等国的政治小说往往反映了弱小国家爱国之士所表现出的激烈的民族主义情绪,最能激起读者对祖国命运和前途的深切关注。因此,梁启超在《清议报》创刊号上发表了《译印政治小说序》,大力倡导翻译政治小说,并在 1898 年 12 月至 1900 年 2 月的《清议报》上连载了自己翻译的日本文学家柴四郎的政治小说《佳人奇遇》。后来,他又从日译本转译了法国作家焦士威尔奴的《十五小豪杰》和佛林玛利安的《世界末日记》。《佳人奇遇》通过主人公游历世界的经历,反映了弱小国家的悲惨境遇和复国救亡活动。这部政治小说在《清议报》连载后,又由上海的广智书局和商务印书馆在 1901、1902 年分别出版了单印本,在中国引起很大反响。商务印书馆出版的《佳人奇遇》虽未署梁启超的名字,但实际上是按照《清议报》上的译文翻印的,它从

1902年初版到1906年11月曾重印过六版,可见读者数量之多。

梁启超的资产阶级启蒙宣传之所以能在中国引起巨大的反响,除了适应当时客观形势的需要,其所讲道理为“当时人人所欲言而迄未能言”以外,还在于他的笔锋常带感情,特别能打动人心。梁启超的文章流畅生动,条理清晰,风格独特。他的文体是通过长年累月的辛勤笔耕,并坚持改革才逐步形成的,在一定程度上也受到日本文体的影响。梁启超流亡日本后,由于大量阅读日文著作和报刊,潜移默化,因而在翻译介绍日文著作时往往自觉或不自觉地接受着日本文体的影响,使自己的汉语文体带有一些日文风格,即“不避排偶,不避长比,不避诗词典故,不避日本输人之新名词”,他所创的这一新文体,时人谓之“启超体”,梁启超本人也自认这一称谓。

在近代中日文化交流过程中,许多日文复合词汇被引入汉语词汇,形成汉语复合词汇,再加上日本文体的混入,从而促进了汉语文体的变化,基本上适应了吸收近代科学技术的需要。这是梁启超和其他许多人长期共同努力的结果。梁启超对日本和西方资产阶级文化的传播,不仅启迪了当时中国人的思想,而且也为近代中日文化交流作出了重大的贡献。

## 第七章 19 世纪下半叶的中美文化交流

中美两国在世界上都是大国,一个是东方文明古国,一个是西方资产阶级新兴国家,由于相距遥远,北美十三洲时期和中国的交往几乎是零。在鸦片战争前的数十年间,彼此也互不了解,相当生疏。1783 年美国的“中国皇后”号首航中国成功后,在对华“贸易热”中,相继而来的仅是些商人、海员和冒险家。中美之间较多的接触和了解是 19 世纪 30 年代由来华传教上的活动开始的。

鸦片战争以后,一些睁眼看世界的中国知识分子,首先对新大陆及由华盛顿创建的共和国有好感,徐继畲的《瀛环志略》在详细介绍美国史地的同时,还在按语中对华盛顿的开国功勋予以颂扬,这才有今日华盛顿纪念塔中的中文石碑。中美两国的文化交流不断向前发展,1869 年中美两国出版物和种籽的互换,尽管是通过外交途径在官方内部进行的,但却是中美两国文化、科技史上迈出的关键性一步,3 年后又有中国幼童赴美留学的计划。

留学生在中美文化交流史上曾起很大作用,因为中国



向美国派遣留学生最早,发展最快,人数最多。在容闳的力争和具体帮助下,选派幼童赴美留学的计划,终于在1872—1875年间完成,以此为开端,1907年北洋大学派遣学生赴美留学,1909年起又有庚款留学,20年代时中国的“留学潮”被引向美国。

中国青年赴美留学,在接触西学,学习西方科学技术的同时,也会接触到美国的物质文明,呼吸到西方民主空气,从而开始对中国的落后状态有深切认识。李圭受派遣赴美参加纪念美国建国百年的费城世博会,回国后留下的记述和介绍,相当生动详尽,表明中国知识分子对西方的观察和认识,已达到新水平。李圭那本《环游地球新录》,谱写了中美文化交流的友好篇章。

美国传教士来华,对于沟通中美之间的外交商务、文化教育起很大作用。他们在传教的同时,附带也传播西方的科学文化知识,例如创办报刊、办印刷所、开医院、撰写介绍中国历史文化的学术性书籍,还创办“洋学堂”。美国传教士在中国办的文化教育事业,对西方文化输入中国产生很大影响,对中国现代化运动也有很大促进作用。除教会大学以外,在中国官办的“洋学堂”京师同文馆中,也由美国传教士丁韪良任总教习。这一首次采用欧美学校办学方式建立的学校,强调实效,注重理论与实践相结合,使近代的科学文化及教育体制得到一定传播。经数年努力,同文馆最终培养出一批外交、洋务运动所需的有用人才。兹分6个

部分叙述如下：

### 一、镌刻在华盛顿纪念塔里的中文石碑

1997年5月15日下午，中美各界人士在美国首都华盛顿的世界著名建筑物之一——华盛顿纪念塔前南草坪上集会，纪念开拓中美友好关系的先驱、清朝福建巡抚徐继畲的《瀛环志略》一书创作出版150周年。美国国务院中国蒙古事务处霍华德·朗格、中国驻美大使馆公使周文重、哈佛大学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主任傅高义教授、中国徐继畲研究会秘书长任复兴等出席仪式，并相继发表演说，缅怀这位中美文化交流的拓荒者，纪念《瀛环志略》问世150周年。

纪念仪式是由麻省大学（即马萨诸塞大学）和中国徐继畲研究会联合发起的。向这一仪式发电、发函祝贺者有中国炎黄研究会、台北山西同乡会、中华人民共和国首任驻美大使柴泽民、山西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李蓼源、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所长张海鹏、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所长陈三井、中国社科院美国研究所所长王缉思、副所长陶文钊等。

简单的纪念仪式之后，中美人士即乘电梯直上塔顶，然后步行下来，观看由中国所赠之石碑。这块沉默了150年之久的石碑，重放光彩，人们重温历史，缅怀徐继畲为发展中美友好关系所作的贡献，时间镜头将我们推向19世纪下

半叶以后，这是大清王朝由盛而衰的多事年代。

徐继畲(1795—1873 年)，号松龕，山西五台人，出生官宦人家，幼承庭训，治科举业，仕途一路顺风，官至福建巡抚，鸦片战争后在福建、厦门两口岸主持对外通商事务，成为近代中国少数最早接触“夷务”的外交官。鸦片战争失败后，为



重新认识世界，探索域外史地，他便潜心搜集中外资料，最后撰写成一部《瀛环志略》。该书的出版，在时间上虽略迟于魏源的《海国图志》、梁廷楠的《海国四说》，但因其资料充实，叙述详细，却能与魏著齐名，并超过梁著，成为被英国大炮惊醒的志士仁人西学的启蒙读物。

徐继畲成书的资料来源相当广泛,最初是在厦门,直接与外国人接触,从美国传教士雅裨理(David Abeel, 1804—1846年)所带来的地图册中,勾摹地图,询译概况。徐与雅裨理见面多次,询问许多外国问题,在书稿中有关雅裨理口授的内容计有10处,由此雅裨理认为徐继畲“这是我迄今遇见的最喜欢提问的一位中国高级官吏”。后来徐继畲又从雅裨理那里得到了更详细的地图册,还有西人所著杂书数十种。此外,还向雅裨理的朋友、美国人甘威廉(甘明),英国驻福州领事李太郭等人请教。徐“到他们的住处,在这里,他们就有机会回答他关于域外国土、风俗习惯的理性询问”。徐公在福建为官时,兼办通商事务,常往返于福州、厦门之间,故接触外国人机会较多,常向外国商人、传教士、领事、医生等作调查研究,“每晤西人,辄披册子考证之”。这种探索使徐继畲大开眼界,也使他的外国史地知识更加丰富。由此可见,《瀛环志略》的得以成书,完全是中外文化交流的产物。

徐继畲还努力搜集流散在东南沿海一带的西洋史地书籍。在厦门时,他的部下(郡守)霍蓉生购得的两册地图,“尤为详密”。他还参考了明末清初外国传教士所绘的一些地图册,如《万国图志》、《职方外纪》等,中国的一些官方史书如《汉书》、《元史》、《明史》、《通纪》、《海国闻见录》、《海岛逸见录》、《海岛逸志》、《海录》等,也都广泛搜罗,还包括一些游记和地理志等私家记述,可以说是荟萃了各种中西著

作。对此徐在《志略》的自序中说：“其书俚不文，淹雅者不能入目，余则荟萃采择，得片纸亦存录勿弃。每晤泰西人，辄披册子考证之，于域外诸国地形时势，稍稍得其涯略。乃依图立说，采诸书之可信者，衍之成篇，久之积成卷帙。每得一书，或有新闻，辄窜改增补，稿凡数十易。自癸卯至今，五阅寒暑，公事之余，惟以此为消遣，未尝一日辍也。”他一丝不苟，广征博引，虚心求真的精神，由此可见一斑。据说在撰写南洋群岛一些章节时，徐继畲还亲自作调查研究，专门向厦门一年长的舵手请教航海知识。

徐继畲从 1843 年至 1848 年，历时五载，“稿凡数十易”，最后将日积月累的文稿编纂成书，于道光 28 年（1848 年）在福建付梓，1850 年刊印，成为一部认识世界、了解夷情的史地之作。全书共 10 卷，卷一和卷二着重于地球基本知识、东亚南洋及大洋洲的情况介绍；卷三介绍印度和西域（今南亚和中亚一带）；卷四至卷七介绍欧罗巴（欧洲），主要是英、法、俄、意、奥、普、希、比、荷、西、葡、丹、瑞典和瑞士等十余国；卷八至卷十共三卷介绍南、北美墨利加（今南、北美洲），重点为米利坚（美国）。书中对南洋各岛国、印度、土耳其、英、法、俄、德、美、荷 6 国叙述最为详细。作为志略，其体裁与一般的地理书有所不同，先叙述地球概貌，后叙述世界各洲各国，每洲先有总叙，后再分叙，大凡各国的疆域形势、地理方位、历史沿革、典章制度、风土人情、人口资源、气候物产、山脉河流、兵力强弱等，基本上都得到反映。对西

方国家的征伐兼并、海外扩张以及与中国交往等，采取有详有略，夹叙夹议的方法，并常用按语来表示自己见解。

书中除介绍世界各个国家及地区的自然地理、历史沿革及风俗习惯外，还涉及到国际关系格局、世界各国政治经济形势、西方列强的殖民扩张等。在对英、美、法等国家富强原因作详细介绍的同时，也预示着中国内忧外患加深，面临严重危机。徐在书中指出，印度及南洋等地，已相继沦为欧洲殖民地，“印度全土，归英辖者十之七，仅余西北数部未服也”。西方殖民主义对东方国家的殖民扩张，也造成了对中国的威胁，中国“求隔绝而不能”，并预感到世界不太平，“天下从此多事矣”。

徐继畲在书中对立国只有 70 余年历史的美国，详述其疆域、山川、气候、物类、人口、风尚、财经、教育等。对资产阶级民主制及其国会，特别是首创于美国的不世袭、不久任的总统选举制度给予特别称颂。对于美国人民在华盛顿总统领导下，不屈不挠，反抗英国殖民侵略，最终取得独立的经过也作了介绍。特别是徐继畲对华盛顿总统推崇备至的两段按语，闪烁着近代民主思想的火花，引起美国人士的特别关注，说明咸丰三年六月的赠送石碑事件并不是偶然的。

《瀛环志略》问世后，在华的传教士们很快予以报道，介绍该书的出版及其内容，裨治文通过在广州出版的英文《中国丛报》对该书作了评述，另一美国传教士卫三畏也在 1851 年 4 月发表评论，用 20 多页篇幅详细分析该书内容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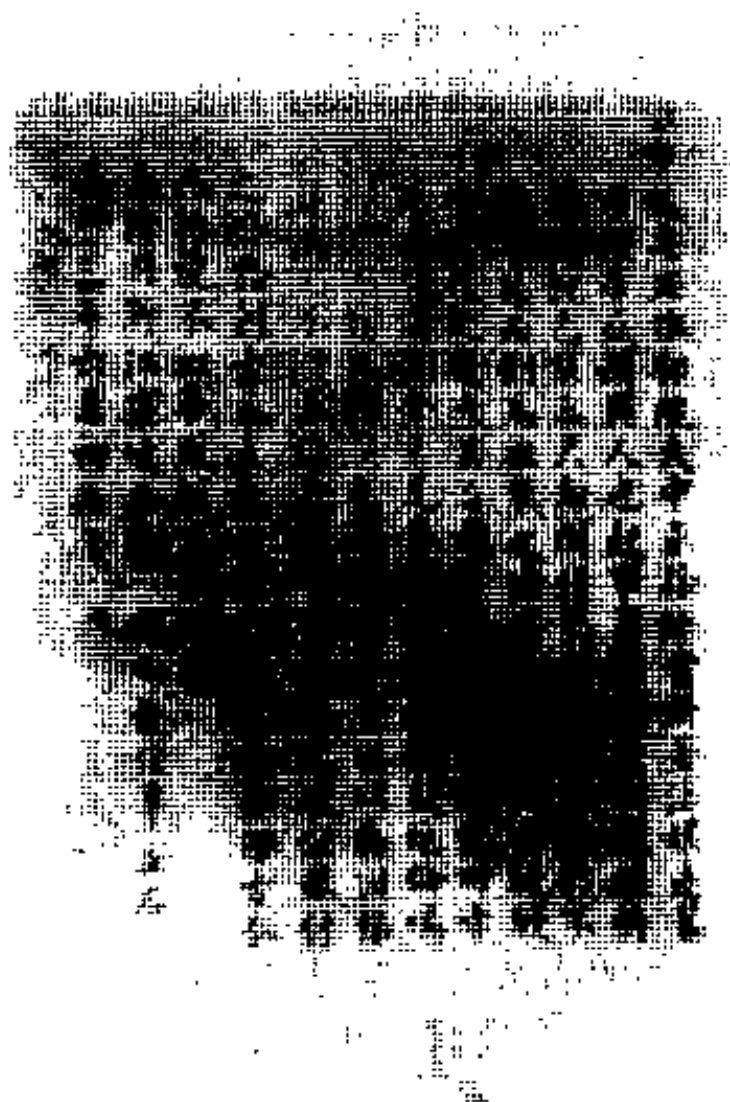
意义,盛赞徐继畲的书是“沿着正确方向迈出的一步”。该书出版后,在东邻日本的影响也很大,在一段时期内再三翻刻,成为一本认识世界的指南,与魏源的《海国图志》一起成为推动明治维新的启蒙书,一位日本历史学家指出:“如果说,幕府末期的日本地理学,特别是有关东南洋的知识,是出于《瀛环志略》之赐,那也并非过甚其词。”

但该书在中国出版以后,因有“张外夷之气焰,损中国之威灵”之嫌,“甫经付梓,即腾谤议”,备受冷落,侧置蒙尘,长期不受重视。直到成书 18 年之后的同治五年(1866 年)才出总理衙门重印,开始广泛流传于世,明珠重生光辉。由于该书对世界地理的研究和介绍有独到之处,且有 40 余幅地图,比较系统和完整,所以魏源在 1852 年增补的《海国图志》100 卷中,引用了许多《瀛环志略》中的有关资料。该书不但成为同文馆的教科书之一,且书中对人名、地名和国名的译法,后来成为总理衙门翻译外文书籍的标准。此书又被人们奉为一部了解世界的标准读本,光绪二年(1876 年)郭松焘出使英国时,也仔细阅读此书,并赞扬其译名,如“直布罗陀”译得恰当。康有为青年时博览群书,在阅读该书后始“知万国之故,地球之理”。梁启超在上海读该书后,方知五大洲各国概况,受到新世界观的启蒙。该书又是出洋考察或出国任外交使节的中国人随身携带的必备书。光绪三十一年(1905 年)端方、载泽、李盛铎等五大臣出洋考察宪政时,出于需要,乃大量印行该书。总之,作为近代中国一

## 镌刻在华盛顿纪念塔里的中文石碑

本系统介绍世界史地的重要著作,在 19 世纪后半期至 20 世纪初,顺应了人们认识世界、走向世界的潮流,大凡在追求新知识的人中,几乎无人不读此书,对同治、光绪两朝的洋务派、维新派人士曾起到很大启迪鼓舞作用。

徐继畲的《瀛环志略》于 1848 年成书之日,适逢大洋彼



华盛顿纪念塔里的中文碑。

岸的华盛顿纪念塔动工兴建之时,工程历时 37 年,至 1884 年始告成。这座耸立在美国首都的标志性建筑物,用纯白大理石砌成,高 550 英尺,犹如一把利剑,呈四棱尖塔状,直指云天。哥伦比亚特区



市政府规定,所有华府的建筑物不得高于此塔。由于位于市区,又邻近白宫,故每年7月4日美国国庆之夜,常在此燃放烟火,举行音乐会,吸引无数观众,为一年一度的盛大欢乐节日。共有盘旋而上的898级石阶(亦可乘电梯直上),每年前往参观者成千上万。纪念塔内壁砌有当时世界各国、美国各州所赠铸文、石刻等共190方,在第10层内壁上嵌有一方周边刻有僧侣、龙、斗士及精致花纹的长方形花岗岩中文石碑,上面用汉字正楷雕刻着《瀛环志略》中摘录出的、徐继畲对华盛顿总统评价的两段按语:

钦命福建巡抚部院大中丞徐继畲所著《瀛环志略》曰:按,华盛顿,异人也,起事勇于胜广,割据雄于曹刘,既已提三尺剑,开疆万里,乃不僭位号,不传子孙,而创为推举之法,几于天下为公,赳赳乎三代之遗意。其治国崇让善俗,不尚武功,亦迥与诸国异。余尝见其画像,气貌雄毅绝伦,呜呼!可不谓人杰矣哉! 米利坚,合众国以为国,幅员万里,不设王侯之号,不循世及之规,公器付之公论,创古今未有之局,一何奇也! 泰西古今人物,能以华盛顿为称首哉!

大清国浙江宁波府 耶稣教信辈立石  
咸丰三年六月初七日 合众国传教士识

碑文中的咸丰三年六月初七日,即为1853年7月12日,此时的徐继畲因其在著述《瀛环志略》中“张大夷情”及

## 镌刻在华盛顿纪念塔里的中文石碑

其他“夷务”上的诸多问题,已受到“弹章至六七”的抨击,被罢职还归山西五台县故里,故对此事的发生,对这份突如其来的殊荣一无所知。此碑上面虽有“宁波府镌”等字样,但碑在福州刻成发运,故在整个宁波却鲜为人知,在宁波的各种地方史籍中也找不到与此事有关的记录。由此可知,此事的发生只能是碑文上所署美国传教士们所为,而且可能有好几人,包括在宁波的浸礼会和长老会的耶稣信徒,如美国长老会医生麦嘉缔(D·B·Mecartee)以及美国长老会宣教士丁韪良等,作为“借花献佛”而假宁波府名义赠送给华盛顿纪念塔的。但不管怎样,此事的发生仍然是早期中美关系史上一件大事,而石碑上两处盛赞华盛顿的150余字的按语,不但为华盛顿纪念塔增光,成为中美文化交流的组成部分,亦是中美人民悠久传统友谊的象征。

同治四年(1865年)底徐继畲奉陛见旨,扶病人都,再次出山,被补为太仆寺卿,以三品京堂在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行走,同治六年(1867年)又任总管同文馆事务大臣,此时在早期中美文化交流中的又一件事是,徐继畲于同治七年(1868年)为丁韪良的著作《格物人门》一书作序:

“泰西之学始于利玛窦之东来,迨后南、艾诸公扩而充之,益见详备。然所言者,天文历法,于格物穷理之说未之详也。余顷待罪闽中,因公至厦门,晤米利坚人雅裨理,广见博闻之士也,能作闽语。余暇辄引与之长谈,于泰西各国古今形势,

粗知大略，至格物之学，未暇及也。”

作为清政府的一名高级官吏，亲自为外国传教士的著作写序的意义为：第一，表明徐继畲对西学的认识，仍居当时中国思想界前列；其二，博得更多传教士及西方人士的好感和尊敬，并认为朝廷处置不当，对徐氏的撤职深表同情。和赠碑、赠画像一起，作序成为整个徐继畲事件的组成部分。

美国传教士医生伯驾 (Peter Parker, 1804—1889 年) 于 1862 年将碑文全文译成英文，然而事情并未结束。在完成赠碑 3 年以后，发生了一件戏剧性的赠画事件。同治六年九月二十四日 (1867 年 10 月 21 日)，即将离任的美国驻华公使蒲安臣 (Burlingame, Anson, 1820—1870 年)，根据美国总统及国务卿的指示，将一幅吉尔伯特·斯图尔特作的华盛顿总统像的复制品，赠送给徐继畲。赠画仪式在北京总理事务衙门举行，总理事务衙门官员出席，由美国传教士卫三畏 (S·W·Williams) 和丁韪良 (W·A·P·Martin) 担任译员。蒲安臣在热情洋溢的致词中说：“画像是总统特地让国务卿请一位卓越艺术家制的，今天我以美利坚合众国全体人民的名义，带着一切美好的祝愿，赠送这幅画像。”蒲安臣还赞赏徐氏的《瀛环志略》，说这“是你祖国奇迹般的学术成就”。同时也对徐氏的遭遇深表同情。这也许是中国高级官员首次接受西方国家元首如此崇高的礼遇。徐继畲在赠画仪式上作简短答词：

## 镌刻在华盛顿纪念塔里的中文石碑

---

“在奠定贵国的基础方面，华盛顿显示出惊人的能力。他已成为全人类的典范和导师。他的美德，已经成为联结古代圣贤和他以后各代伟人的一条纽带，因此，必将永远活在人们心中。”

美国马萨诸塞州大学阿默斯特分校教授德雷克(Fred W. Drake, 汉名龙夫威, 1939— )在美国查阅了 1868 年 3 月 29 日的《纽约时报》第 10 版, 上载赠画仪式上的致词全文, 足见美国舆论界对此事的重视程度, 兹根据原文的摘译抄录如下:

自从阁下编写一部专讲中国域外世界各国的地理历史以来, 已过了将近 18 年。阁下为写此书付出了艰辛的劳动, 展示了正确的判断与令人叹服的渊博学问。阁下详述了各国的伟人, 推崇华盛顿为众伟人之首。阁下还宣称华盛顿恢复了贵国三代传贤不传子的遗风。为了表达美国人民对这些赞辞的感激, 敝国总统要求国务卿聘请著名画家画了这幅像送给阁下。当阁下看到这幅画像的慈祥面容时, 请不要伤心地回忆起为了使贵国人民熟知华盛顿和西方国家而尝到 18 年之久的辛酸后果。阁下现在又兼任同文馆管理大臣, 而这个机构的目的是提倡一些阁下为之而受到弹劾的观点, 并使贵国人民学习华盛顿的语言和原则。华盛顿像贵国人民一样, 重视农业, 也主张

和平。他支持孔子两千多年前讲过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个原则。我们中美两国人民为什么不该相互交流我们的思想呢？我们美国为什么不该了解孔子和孟子的箴言呢？贵国为什么不该了解敝国的科学、铁路、电报以及火轮船呢？伟大的中国曾发明过纸张、印刷、瓷器、罗盘、火药以及“民为邦本”这个学说。为什么不该把这些发明贯彻到底，去享受它们全面发展的成果呢？敝人以美国人民的名义，将这幅画像赠给阁下，希望这幅画像可以永远使阁下和贵国人民回忆起美国人民和贵国的悠久友谊以及他们对贵国道德高尚的代表——阁下所表示的热爱与敬重。

由此可知，宁波府向华盛顿纪念塔赠碑，美国政府向徐继畲回赠画像，这既是中美两国早期文化接触的一件大事，也是中西文化交流史上的良好开端，徐继畲为此作出了很大贡献。由于有这一良好的开端，才有 1869 年两国之间的图书资料交换，中美文化交流又迈出了新的一步。

## 二、中美两国早期的图书交流

美国各家图书馆的中文藏书，其收藏时间之早和册数之多，美国国会图书馆首屈一指。在该馆收藏的中文书籍中，有 130 套 10 种近千册中国古籍，上面都标有这样的题

## 中美两国早期的图书交流

词：“赠美国政府——中国皇帝，1869年6月”。这一史实告诉人们，早在130年前，中国图书已经传入美国，成为中美两国文化交流的发轫时期。

早在1784年，美国轮船“中国皇后”号就到过广州，可是当时美国在海洋事务中还处于无足轻重的地位，所以这次航行未能引起中国人的注意。到19世纪20年代，中国才出现了两本介绍美国的书籍。可是，由于两国交往少，资料奇缺等缘故，其中一本地理书误把美国说成是一个狭长的孤立岛屿。在中国人眼中，美国人只是些搞贸易的“花旗夷人”。直到19世纪30年代，在英国对外侵略的殖民政策影响下，中国沿海的防务问题变得越来越突出，采取妥善的外交对策已经迫在眉睫，在这种情况下，清政府才开始睁眼看世界，探寻外国实况，了解和认识美国也列入了议事日程。以后，中国士大夫亦加强了与美国来华商人、外交官和传教士的接触，通过他们来了解美国。林则徐主持翻译外国书报，收集有关筹办夷务资料，写成了《四洲志》。该书把美国译为“育奈士迭国”，叙述了美洲殖民地的演变、合众国的地理位置、美国的建立及政府结构、运转方式等方面的情况。梁廷楠经过几年调查研究，并阅读了传教士裨治文翻译的《美理哥合众国志略》以后，开始向中国人民介绍美国的独立过程和其他基本国情。后来，魏源的《海国图志》和徐继畲的《瀛环志略》也相继问世。这些书籍在介绍美国历史地理和一般知识方面都有了明显的进步，但书中提到美

国实况的资料还相当有限,不足以全面反映正在发展中的美国。

美国人对中国的了解也是从零开始的。如果以 1784 年 2 月美国的“中国皇后”号首航中国,作为开辟中美关系的新纪元,那末这早期贸易仅使美国对中国有了一个印象而已。18 世纪时美国人对中国的看法与了解,是欧洲人对中国的看法与了解的移植和翻版,人云亦云,毫无主见。例如当乔治·华盛顿总统“了解到中国人不是白种人时表示大为惊讶”,到后来才逐渐摆脱欧洲人的知识背景来认识中国,开始有了自己的看法与了解,这是一个渐进与缓慢的过程。在美国魏得纳图书馆所藏的书目中,1830—1839 年,东亚部分的书只有 6 种,但到 1870—1879 年时已有 58 种,说明在 19 世纪中叶以后,东亚才逐渐成为美国在海外关注的重点。两国相距遥远和文化背景不同,在一定时期内影响了彼此的接触和了解,一位曾在中国和加里福尼亚华人中布道的美国传教士施惠廉,在 1870 年出版的一本书中写道:“我们是世界上最新的帝国,正如中国是世界上最古老的帝国一样。我们的体制还处于探索的初期阶段。”

美国的南北战争(1861—1865 年)结束后,资本主义经济迅速发展,1894 年时,其工业生产已经赶上并超过英国,跃居世界首位。资本主义发展需要市场、原材料和劳动力,美国便把注意力转向国外,开始对亚洲事务发生浓厚兴趣,作为东方大国的中国,更加引人注目。尽管在西方国家中,

美国同中国建立贸易关系较晚,但对华贸易的发展却很快,从1791到1841年的50年中,美国对华贸易增长了6倍之多。美国从早期对外贸易中所获取的利润,对于摆脱大西洋贸易面临的窘境,对于促进东部商业城市的发展,都起过一定积极作用。

用英国科学家史密森(Smithson James, 1765—1829年)所提供的基金,于1846年在美国首都华盛顿设立的史密森学会,其董事会由美国副总统、最高法院院长、参众议员各3名及6名非官方人士组成,内有博物馆和国际交流服务社等多个机构。1867年,史密森博物馆根据美国国际交流法的规定,获得了50份政府文件,准备以此换取其他国家相应的官方出版物。驻北京的美国公使馆也收到了用这种文件来进行交换的通知。1868年3月27日,美国驻京公使馆的具体负责人塞缪尔·韦尔斯·威廉斯正式向清政府总理衙门提出了互换出版物的要求。他在与总理衙门官员的接触中,阐明了美方对交换出版物一事所持的动机、目的、好处和其他看法。但是,清政府对此忧心忡忡,认为将本国政府的工作报告、各种法令和官职任免等情况泄露给美国是件危险的事,况且清政府当时也确实没有出版过统计资料,再加上中美两国都极少有人能阅读、理解对方的国家出版物,因此,这最初的互换计划便被搁置起来。

半年以后,美国农业部敦促美国政府重提互换计划,目的是想通过换取中国农业资料,以解开中国农业长期以来



成功地养活如此众多人口的奥秘。美国农业部未等中国方面作出明确答复,就任命查尔斯·波斯顿上校为特使,随身携带一批美国谷物、蔬菜和豆类的种籽、一些农业、机械和矿业类的书籍,以及有关太平洋铁路的勘测图和报告,前往中国,谋求换取同类资料。同时还带来面交总理衙门的一封信:“今年三月间,卫大臣(负责美国驻中国公使馆事务的威廉斯)称有总会书籍数种,愿与贵国之书互相换易,当经贵衙门复称,俟将来应用时再烦代办等因,乃复函未到本国时,国家派薄士敦(即美国农业部委派的特使查尔斯·波斯顿上校)带来书籍,内言农业机器,金山地理,以便互换,另有本国五谷瓜菜豆种呈上,给贵国农人蒔种,更望贵衙门将中国五谷瓜菜豆种互换,以便本大臣寄回本国,是以今日托卫大臣偕薄士敦前来会晤,所有书籍谷种一并面交。”

1868年9月29日,美国新任驻华公使约翰·罗斯·布朗到达北京。几天后,他在递交国书后的招待会上,提出了互换书籍和种籽一事,并向中国官员介绍了波斯顿上校及其使命。布朗说:“我们预期的目标是建立一种互换制度,使美国政府能为中国提供特别服务,同时也能更多地了解贵国的文学、教育和财政制度,并能更直接地了解贵国的农业体制和产品。”10月19日,在威廉斯先生的陪同下,波斯顿特使向恭亲王递交了美国政府赠送的种籽和书籍,同时表示希望得到回赠。

9天以后,清政府总理衙门致函布朗公使:“美国政府

所赠书籍与种籽均已收悉,不胜感谢。我们拟以同类物品相交换。此举表明贵国政府极为重视发展农业,并怀有促进和加强两国现有友好关系的愿望。”至此为止,原定的缓进计划开始出现转机。不过,清朝官员对两次鸦片战争带来的灾难还记忆犹新,因而在具体办理过程中免不了处处谨慎小心,生怕出现偏差。他们认为,有必要从历史资料中寻找先例,以解决向美国提供中国书籍的合法性和提供些什么内容的资料为宜等问题。他们先在理藩院查得道光二十五年(1845年)间俄国曾经向中国呈进书籍一事的前后经过,并奏请皇帝颁旨:“臣等查道光年间俄国因颁赏后始进书籍。此次美国系先以书籍谷种备进,与俄国案虽相同,惟先后各异,臣等阅美国使臣来函,意重农人蒔种,深望中国换给书籍,词颇恪恭向化,未便拒绝不受,当将书谷种,暂在臣衙门收存,一俟内务府复到,臣等查酌情形,应如何颁赏美国书籍谷种之处,再当请旨遵行。”

就在中国朝廷作出进一步决定以前,又发生了另一件事情:在华盛顿,美国土地总局局长试图从三位中国使臣那儿得到中国政府 1851 年或 1852 年户籍调查资料。但他们因公务繁忙,无暇顾及此事。于是,美国通过外交渠道再一次提出了交换出版物(包括中国人口资料和税收情况)的要求。

面对美国政府一而再、再而三的催促,总理衙门决定回赠美国政府一些中国资料,其中包括:中国书籍 10 种,装成

130 套；另有五谷菜籽 16 种，装成 56 匣；花籽 50 种，装成 50 匣。1869 年 6 月 7 日，总理衙门向美国驻京公使馆如数赠送了上述书籍和种籽。好事多磨，这历经两年多时间的互换出版物的愿望，至此终于成为事实。尽管清政府的回赠在数量上大大超过美国的礼物，但对美方要求提供人口和税收资料一事，却通过信件的解释而婉言谢绝：“有关中国民数，各省官员每年例行咨报户部，但并无成书。”

中国政府精心挑选的 10 种书籍，全部为 15—19 世纪雕版印刷的经典著作和科学论著，门类齐全，包括儒家经典、礼仪、医药、农业、语言、针灸、数学或玄学等，共 949 册（或卷），具体依次为：

- (1) 《皇清经解》366 卷
- (2) 《五礼通考》120 卷
- (3) 《钦定三礼》144 卷
- (4) 《医宗金鉴》91 卷
- (5) 《本草纲目》48 卷
- (6) 《农政全书》24 卷
- (7) 《骈字类编》120 卷
- (8) 《针灸大成》10 卷
- (9) 《梅氏丛书》10 卷
- (10) 《性理大全》16 卷

这批书于 1869 年下半年通过海路运抵美国，藏入美国国会图书馆。

一个多世纪以前中美之间出版物和种籽的互换,尽管一方积极主动,另一方被迫应对,而且是通过外交途径得以完成的,但作为美国国会图书馆入藏的第一批中文书和在中美两国文化、科技史上迈出的关键性一步,对于增进彼此了解,加强两国人民之间的友谊都是非常有益的。3年以后,中国一批幼童赴美留学。

### 三、中国幼童留学美国

中国留学生遍及欧美和日本等许多国家,在历史上的一个时期内,成为中国向西方学习的主要力量,其中又以留美学生的影响与作用最大,因为中国派人赴美国留学一事联系最早,发展最快,人数也最多,成为中美文化交流史上的重要一页。中国最早的官费赴美留学是从幼童开始的。

清末,洋务运动倡导者在经济上热衷于办实业,在军事上力图建立起一支船坚炮利的海陆军,为此李鸿章于1865年在上海设江南制造局(今上海江南造船厂前身),成为清政府新式的军工企业之一。为造就一批洋务运动所必需的专门人才,5年以后,清政府又相继组织四批官费生出洋留学,即幼童赴美国留学。以上之事被认为是洋务运动过程中的两件大事,而这两件事的付诸实施,又与容闳(1828—1912年)的倡导和努力分不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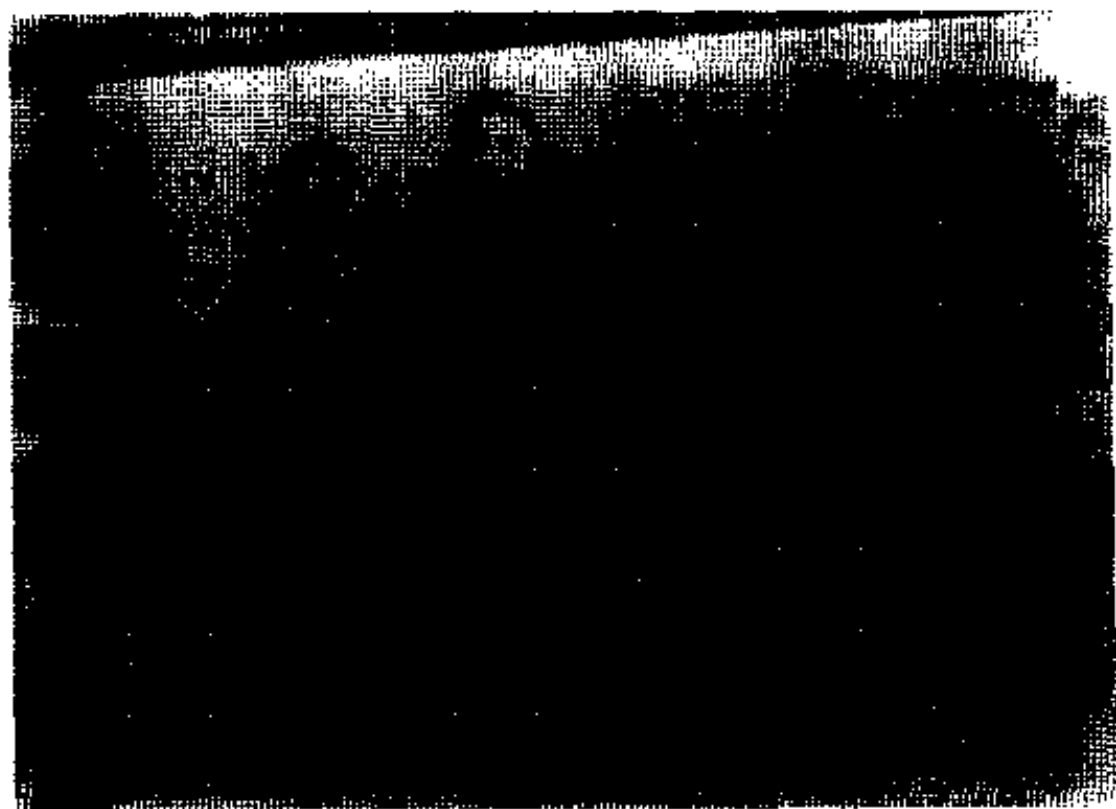
作为中国最早的留美毕业生,容闳成为曾国藩幕僚后,

极力游说中国政府派遣青少年留学生去美国接受西式教育,并以自己亲身经历,说明官派留学生出国,学生在接受西方教育,学到知识经验后,能增进与外国人民的接触和了解,有助于彼此的文化交流,更有助于中国外交、商务与工业的发展,即“借西方文明之学术以改良东方之文化”。当时的李鸿章身为北洋大臣和直隶总督,权倾朝野,一言九鼎,但对容闳所倡导幼童留美之事,心怀疑虑,因为此事在极端保守的中国毕竟太激进了。为此李鸿章联络两江总督曾国藩以及江苏巡抚丁日昌,于1871年9月和1872年上奏清廷,最后终于获得批准。派幼童赴美留学,这在当时确是一件石破天惊的大事,正如曾国藩、李鸿章的奏折所言:“属中华创始之举,抑亦占来未有之事。”

有关的各项准备工作一一展开,关于招生名额及招考章程等,容闳在其《西学东渐记》一书中有详细记述。招生总额为120人,分4批,每批30人,规定年龄为12岁至15岁,家庭清白,有殷实保证和体检合格者。考试科目为汉文写读,已学习英文者须加试英文,考试合格后人预备学校学习中西文字。为此于1870年在上海成立出洋留学预备学校,在校至少学一年,每半年考试一次,合格者方可派赴美国。学生的家长必先于志愿书上签名,书中载明听其子弟出洋留学15年(自抵美入学之日起至学成止),在15年中如有疾病死亡及意外灾害等,政府概不负责。但学生所需一切经费及出洋服装等,皆由政府出资供给。

中国长期实行闭关锁国政策,与世隔绝,而且一向视外国人为蛮夷戎狄,在人们想像中,美国也只能是个荒凉野蛮之地,因此对出洋留学之事避之惟恐不及,这为幼童的招选工作带来极大困难。1871年的首批30名幼童未招满,为此容闳只好亲自去香港续招,在英国人开设的学校中,遴选天资聪颖、有一定中西文基础的少年数人,以凑足其数。由于当时缺乏报纸传播新闻,故当时中国北方地区均未知政府的这一教育计划,结果来者皆粤人,其中多半为广东香山籍,在120名官费生中,南人十居八九,实在是件美中不足的事。

自1872年起,出洋幼童分4批赴美国留学。容闳先行赴美,为幼童安排好食宿和就读的学校。1872年8月11日,中国近代史上首批官费留学生30名,由陈兰彬监督率领,在上海登轮前往美国。1873年、1874年和1875年,每年也是30人,分别由黄平甫、祁兆熙、邝其照带领前往美国。第二批幼童赴美时,广东还有7名自费生搭附同船前往。至1875年10月,120名幼童全部赴美。1874年时,清朝政府出钱在美国康涅狄克州哈特福德市(Hartford)的林街(Collins St.),盖起一座两开间的三层楼房,可以容纳监督、教员及数十名学生住宿。该处亦是清朝政府“幼童出洋总局”(又名留美学生事务所)所在地,由区谔良任总办,容致祥、刘其骏任教习,邝其照任翻译。幼童分住在该市多处美国居民家中,随其居民家子弟学习洋文,并“以三个月一次



1872年由容闳带领出洋的首批中国留美幼童中之六人。

来局习华文,每次 12 人,14 日为期;逾期,则此 12 人复归,再换 12 人来;以次轮流,周而复始”。幼童每日卯时起身,亥正就寝,生活非常有规律,就是每人写寄家信,亦有规定,每月两次。

小留学生们虽然身处异邦,天高皇帝远,却仍然得时刻遵守中国封建王朝的礼制,如按时遥向清朝皇帝叩头,定期读《孝经》、《五经》,穿长袍,留长辫等。但既然是幼童,难改活泼好动的天性,久而久之,难免会受美国社会一些影响,如偷偷剪去长辫,和美国学生在体育场上游戏时脱去长袍等。学监陈兰彬对学生们的举止看不入眼,便招去严厉训

斥,认为文人脱去长袍,穿着短裤在外乱跑不成体统,命令剪辫子学生下跪,遥向北京皇帝请罪,并重新蓄发。对敢于穿西服和上教堂者更是视为大逆不道。对此容闳常为学生开脱。第二批学生中有位容揆,在美国上完小学、中学后考入了哈佛大学,后因剪去长辫而被人告发,陈兰彬取消其官费,令其回国,后在容闳暗中资助下,得以留下继续就读。陈兰彬等人与容闳之间的内部矛盾日益加深。

1875年陈兰彬请假回国后到总理衙门告发,1876年容闳调任中国驻美副公使。陈兰彬出任驻美公使后,由吴子登担任学监,此人的观念更加保守僵化,认为幼童赴美后,环境变化太大,随着美国化倾向的日益加深,将成为不折不扣的“洋鬼子”,昔日卑恭的大清顺民将不复存在。为此和陈兰彬接连上奏朝廷,攻击留美幼童一无是处,要求皇帝照准其请,下令全体幼童撤回中国。顽固派的上奏弹劾也起了火上加油作用,如恭亲王奕訢认为“外洋风俗,流弊多端,各学生腹少儒书,德性未坚,尚未究彼技能,先已沾其恶习,即使竭力整顿,亦觉防范难周,亟应将该局撤销”。此时继曾国藩之后成为洋务派首领的李鸿章也不愿伸出援助之手,留美学生事务所的厄运已无可挽回,慈禧太后批准下令撤销事务所,留美学生于1881年被分为三批遣送回国。

从1872年首批幼童出国至1881年回国,一共9年时间,离原计划第一批学成回国的年限15年还相差6年。9年中去世和中途辍学者26人,遣送回国者仅94人,其中的



60 多人尚在中学就读,大学已毕业者仅詹天佑和欧阳赓 2 人。国内的有识之士对清政府的这一行动,都感到万分惋惜,维新改良思想家郑观应(1842—1922 年)批评清政府的留学生政策为“浅尝辄止,贻讥中外”。但撤回幼童也是个极其复杂的问题。除了留美学生事务所人事倾轧和顽固派屡次上奏弹劾以外,也与当时美国的排华暴行激起国人公愤有关。容闳还在自己著作中谈到,吴子登回国见李鸿章时,李怒目而视,并命此后勿再来见,吴狼狈不堪,从此后便在官场销声匿迹。

尽管幼童留美计划中途夭折,被吴子登视为有“离经叛道之举”的学生被全部撤回,然而此事的影响及其留学生所取得的进步和成就,终究是抹杀不了的。这些十多岁的幼童,进入美国学校,呼吸独立自由空气后,很快适应了留美的新生活,接受美国新的思想观念,他们在校园里打棒球,玩足球,和美国学生一起游戏,偶尔还与挑战者用拳头较量。适应美国环境后的幼童,在学校的功课也日益进步。关于幼童在美国生活学习的详情,距今已有 120 多年,今日我们见到的原始资料不很多,作为亲自所见而又较详尽记述者,李圭的《环游地球新录》可算是其中之一。

为美国建国 100 周年大庆而在费城举办的世界博览会上,李圭见到了幼童学生的书面作业,对此记述道:“甘那的格省哈佛城(即康涅狄格州的哈特福德市)书馆我国幼童课程窗稿亦在列。尝见其绘画、地图、算法、人物、花木,皆有

规格。所著汉文策略,如《游美记》、《哈佛去馆记》、《庆贺百年大会序》、《美国地土论》、《风俗记》,亦尚通顺。每篇后附洋文数页,西人阅之,皆啧啧称赞……”

1876年农历七月初三日(8月21日),113名幼童在刘其骏、邝其照和美国教师带领下,由哈特福德市专程来费城参观博览会,对此李圭记述道:“……幼童聪敏好学,互相亲爱,见人礼数言谈彬彬然;有进馆方年余者,西语亦精熟;此次观会又增其识见,诚获益匪浅云云。”莘莘学子与清王朝的小官李圭在异国他乡相见,感到分外亲切,李圭的记述有:“于千万人中言动自如,无畏怯态。装束若西人,而外罩短褂,仍近华式。见圭等甚亲近,举止有外洋风派,心甚爱之。”李圭现场采访,与几位年龄稍大的幼童的一问一答亦非常有趣:

问:“询以此会(指世界博览会)究有益否?”

答:“集大地之物,任人观览,增长见识;其新器善法,可仿而行之;又能联各国交谊,益处甚大。……”

问:“何物最佳?”

答:“外国印字法,中国雕牙器。”

问:“想家否?”

答:“想也无益,惟有一意攻书,回家终有日耳。”

问:“何以作洋人装束?”

答:“不改装,有时不方便。我侪规矩,惟不去发辫,不入礼拜堂两事耳。”

问：“饮食起居何若？”

答：“饮食似较洁净，起居有定时，亦有时必须行动，舒畅气血，尤却病良法也。”

问：“各居停主人照料何若？”

答：“照料若其子弟。稍有感冒，尤关切，而哈地水土宜人，病亦少。”

李圭对此留下的印象和感觉是：“言皆简捷有理，心甚爱之，西学所造，正未可量。”西方教育与陈旧过腐的科举制度相比，其先进性和科学性是显而易见的。李圭认为，中国幼童寄居西人绅士家中，颇得群居切磋之乐，中西两种不同文化彼此交流，水乳交融，久而久之，幼童皆大受其益也。

这批幼童作为我国的首批留学生，他们所开创的向西方学习的新风气，在清末难能可贵，由此而对封闭保守、因循守旧的封建社会有所冲击，其影响也很深远。他们回国以后经过考核，去船政局、电报局和机器制造局等处任职。他们将西方第一次产业革命后的先进科学技术成果带回中国，在中国一些重要经济部门和军事领域，建立起较为先进的生产部门，在诸如造船、铁路、采矿、机器制造、电报电信等方面发挥作用，成为中国近代工业的第一批专家。例如在铁路工作的 16 人中 5 人是铁路局长，第一批幼童中的詹天佑（1861—1919 年）自耶鲁大学毕业回国后，独自勘察设计修建我国著名的京张铁路（北京—张家口）。

在从事电报工作中的人中，程大业建立了从北京到内蒙

## 费城世界博览会上的大清国代表

古的电报线,后有3人任电信局局长,成为开创自办电报业的主力;学习矿务的人中,如邝荣光等成为近代中国首批矿业工程师;从事教育的蔡绍基成为北洋大学校长,唐国安成为清华学堂第一任校长;在从事外交与洋务的人中,唐绍仪在民初曾任国务总理;在中法战役和中日黄海战役中,有7名留美学生担任舰长与指挥官,浴血奋战,最后为国捐躯。总之,这批早期幼童留学生,连同稍后的大批留美学生,在传播西方科学文化知识、增进中美人民之间相互了解方面,做了许多有益工作,成为沟通中美文化交流的桥梁。

## 四、费城世界博览会上的大清国代表

公元1876年,为庆贺美国立国100周年纪念,作为一项最主要的庆祝活动,选择在美国独立的纪念地费城举办一个空前规模的世界博览会(当时又称“赛会”,后称万国博览会),清朝政府亦派员前往参展,这是中美两国早期文化接触的重大事件之一,因而颇受人注目。中国之所以也派人前往出席这一赛会,主要原因为:其一,当时清政府的海关、税务和外贸等,都是请外国人“代办”的,总税务司官员为英国人赫德(Robert Hart, 1835—1911年),他们为了在中国获得更大的经济利益,故极力怂恿中国也派人去参加,藉此扩大与世界各国的商业联系;其二,在此之前的1873年,在奥地利首都维也纳举行博览会时,曾派英国人包腊

(Edward Charles Bowra, 1841—1874 年)代表中国出席,在国外产生一定的影响;其三,自 19 世纪中后叶起,美国资本主义飞速发展,在对华贸易中赚取大量利润,对亚太市场越来越重视,所以也着意邀请中国参加,并要求中国扩大参展的规模。

中国派出低级官员李圭,作为中国工商界代表前往出席,这在今天看来多少带有一点偶然性。李圭(1842—1903 年)字小池,江苏江宁(今南京)人,曾为太平军俘虏,在太平军军营中过了 3 年,后撰成《思痛记》一书。1862 年到上海后,始结识西人,1865 年被英国人聘为宁波海关税务司司文牍事,开始了他那“习洋务”的生活。有这段生活经历作

序  
大清光緒紀元之二年  
歲在丙子為夫利堅  
立國百年之期美人  
社會及行費里地費賊  
廣集各國玩古器日  
用那物生器動種話  
物區亦都畫各有其  
所予斯會者中國而外  
凡三十有六國名曰百年  
大會者實奇公會將  
欲考究物產備好睡騰  
善於歐洲實會而為  
是舉也江甯李圭以東  
海關稅務司法君謹琳

李鸿章为李圭《环游地球新录》一书所写之序。

复印自李圭:《环游地球新录》封里。



1876年5月10日,美国总统格兰特和巴西皇帝彼德罗二世,开动这台柯林斯(Corliss)蒸汽机,宣布费城世博会正式开幕。

里。游罢归来,李圭将这一环球旅游见闻撰写成一本《环游地球新录》,由李鸿章作序。该书分为《美会纪略》、《游览随笔》(卷二、卷三)和《东行日记》四卷,尽管只刊行三千册,却受到急于想了解外部世界、渴求新知的士大夫们的欢迎。

为“铺垫”,10年后他被选中去费城出席“赛奇公会”,并顺道有环游地球一周的壮举。李圭在归途中又涉大西洋,顺道游览英法等国,继由地中海经苏伊士运河,过红海、印度洋回国,前后历时8个月,行程8万多

也是依靠李圭在书中的记述,我们今日才得以了解大部分有关费城世博会的详情。

李圭携带翻译人员一名,同美国来华的客商鼎达结伴,于光绪二年四月二十日(1876年5月13日),由上海乘船东渡日本,再换乘美国轮船到达西海岸的旧金山,然后再乘7天火车横穿美国大陆到达费城。作为一位熟悉“夷情”的封建时代知识分子,他对费城世博会的记述和介绍,相当生动而有趣。例如,关于这次世博会的缘起及名称等记述道:

北阿墨利加州有美国者,洋文称“友乃德司得次”(即 United States),译即合众国,俗称“花旗”,泰西强大国也。在地之西半球,以球而论,适与中国腹背相对,自昔不通声闻。……光绪二年,为有国百年庆期,……因择喷夕尔费尼阿省费里地费城(即 Pennsylvania Philadelphia)建屋设会,广致天下物产互相比赛,美其名“百年大会”,又曰“赛奇公会”焉。

费城世博会共有37国参展,中国亦在其中。李圭见到的展览场地很大,其名物总院(总展览厅)“屋长1880尺,宽464尺,悉以精铁为梁柱,巨块玻璃为墙壁”,并认为这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展览厅了。美国展品在总馆中所占比例最大,约十之三四。另一大型建筑物占地14英亩,是机器馆,陈列各种各样的机器,也是美国货最多,约占十之八。上述两馆成为李圭参观的重点。

## 费城世界博览会上的大清国代表

---

费城世博会于 1876 年 5 月 10 日开幕,11 月 10 日闭幕,历时半年。美国第 18 任总统尤利塞斯·格兰特(1869—1877 年在位)和巴西帝国皇帝彼德罗二世一起,开动一台当时被称为全世界最大的“柯林斯”蒸汽机,宣布费城世博会正式开幕。格兰特总统在蒸汽机前致开幕词,作为重温历史,也许我们能从中获得不少有益的启示,兹将开幕词摘录如下:

“一百年以前,我国刚刚成立,而且只有部分地区有人居住。我们的需要使我们不得不把自己的力量和时间主要用于砍伐森林,征服草原,建造住房、工厂、船舶、码头、仓库、道路、运河和机器。这些都是不能拖延的极其必需的首要工作。虽然我们承担了这方面的巨大工作,可是我们在法律、医药、神学、科学、文学、哲学和美术各方面的工作,也足以同古老而先进的国家相颉颃,这些方面的成就亦将在本展览会中展出……”

美国南北战争的结束(1865 年以后),扫除了阻碍工业发展的南方奴隶制,使美国工业得到很大发展,特别是机车、农机、钢铁、化工、石油、电器等发展很快,机床生产超过了英国。1869 年横贯大陆铁路的修成,使西部的丰富资源与东部工业相结合,使工业产值在 1860—1890 年这 30 年内增长了 5 倍。在这一科学转变为技术的重大变革时期,欧洲、北美和日本等资本主义国家所取得的一系列科技新



成就,均在费城世博会上充分展现出来。

李圭认为机器远较人工优越,看到了机器使用的强大生命力和前途,为此他在参观中详细记载一台由美国生产的名为柯林斯(Corliss,李圭称为“哥阿力斯”)的大型蒸汽机,“……轮径三丈余,力抵马一千五百匹,专以轮激受他处蒸汽……铁轴之轮盘亦可随时拨动运用,如吸水、印字、纺织、锯、磨诸器咸赖焉。……如此大器,动时无甚声响,且一人即可运之,是可异也。”许多美国产品如新泽西出产的缝纫机,普林斯经改良的自来水笔能“保证书写 10 小时以上”,可以代替钢笔书写除簿记以外的各种文件的机器,纽约和芝加哥生产的手表,费城为儿童制造的幻灯放映机等,都给李圭留下深刻而美好印象。

我们从《环游地球新录》中看到,李圭对世博会的观察和记载,并非只停留在少见多怪的惊叹或猎奇方面,而是处处联系实际,想到自己国内的状况,这诚如他在该书自序中说的那样:“将会内情形并举行所闻见者,详细记载带回中国,以资印证。”通过这“亦欲敦交谊,广人才,冀收利国利民之效也”。李圭的所想所为,不管收效如何,在当时实属难能可贵。

李圭看到的造纸机在几小时内,能将原料造成纸张,而且连稻草、废纸、字纸、破布、败絮也能变成绝精之纸,相比之下中国的手工造纸太落后了,必须改良。而各种各样的吸水机,开动以后水声汹涌,此吸彼放,循环不断,效率极

高。由此他想到,中国江河之水,涨落不定,旱涝互患,尤其是西北高原缺水严重,种植和灌溉相当艰难,这种机器对中国非常重要。李圭看到的“绞棉子机”小而灵捷,每小时能绞出净棉花 240 磅,售价只有 250 元,他在赞叹不已的同时,又忽发奇想,认为这种机器“妙在不藉蒸汽运动也,产棉之乡能家置一具,或数家、数十家合置一具,较之手挽脚践,诚大省工力”。除此以外,如挖泥船、新出世的打字机、英国的纺织机、织麻线机、德国的克虏伯钢炮等,均给他留下极其深刻的印象。

李圭在《环游地球新录》中,对大清国展览馆的介绍详尽而有趣,为我们留下一份中国近代中外经济、中外文化交流的宝贵资料。中国赴费城世博会的参展产品共计 720 箱,价值约为 20 万两白银,其场馆小于日本因而不敷应用。中国馆的具体方位在总院之西门内,左边为智利、秘鲁,右边为日本、埃及和土耳其,对面为意大利、挪威和瑞典等国。中国馆而北,入口处有木制大牌楼一座,上书“大清国”三字。既是大牌楼,就非有额联不可,这是由李圭拟的,其横额为“物华天宝”,两旁的联为:“集十八省大观,天工可夺;庆一百年盛会,友谊斯敦”,扁额和联语倒也得体和工整。在两旁的东西辕门上插有黄地青龙旗,犹如中国官衙,庄严肃穆。作为一种标志和中华文化的象征,今天在世界各大都市华埠(唐人街)的入口处,均有一座气势雄伟、美仑美奂的大牌楼。例如如今在费城唐人街中心地带的第十街街



美国费城华埠大牌楼。

口,也耸立着一座气势雄伟、古色古香的中国式大牌楼。该牌楼主体结构为二柱三楼,高 12.7 米,跨度 9.7 米,牌楼上面书写着“费城华埠”4 个大字。牌楼是由天津市提供全部建筑原材料和技术咨询,北京市古代建筑工程公司负责施工的,最后于 1984 年 10 月 22 日举行牌楼的落成揭幕典礼。历史上不同时代的这两座中华大牌楼,在费城的先后出现,纯属巧合,没有必然的联系,但也由此表明,具有旺盛生命力的中华文化,在海外薪火相传,绵绵不绝。

鸦片战争以后,中国的自然经济逐渐解体,商品经济开始发展。19 世纪 60、70 年代,正是洋务派由“自强”到“求

富”的时代,通过创办民用企业,引进西方资本主义生产技术,出现了一种新的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出口增长刺激中国东南沿海茶、生丝、丝绸和布匹等的发展,这从大清国在费城世博会的展品中可以看出。李圭对此介绍说,其展品置于高八九尺的数只櫥柜中,四面都是玻璃,其陈列位置大致是,左列放武林胡观察景泰窑器;右列为粤省漆器、绣货、镜屏;后列为各式乌木椅榻;再后为宁波雕木器、瓷器及各种古玩等。公事房(可能指办公室)之陈设字画,纯为中国风格,无一外洋款式者,悉为他国游览官民目未经见,无不赞叹其美。且云:“今而后,知华人之心思灵敏,甚有过于西人者矣!”

南门外平屋的展厅是由“各物总院”分列于此的,展出来自中国各省的丝、茶、五谷、药材等,其中药材品种很多,不少于 700 种,亦皆由海关经办。从中可知,中国的展品大部分是些农副产品和小作坊生产出来的手工业品,与欧美资本主义国家的展品相比,已有很大差距。

在此之前的世博会,尽管清朝也物色外国人代表中国携物品前去参展,但对场馆如何布置装饰,何种展品最受欢迎,心中无数,完全凭空揣拟,严重影响参展效果,更因“无华人往也”而“未获贸易之益”。李圭注意到,前往世博会中国馆的参观者,把丝、茶、瓷器、绸货、雕花器、景泰蓝等推为第一,最受欢迎,其次为铜器、漆器、银器、藤竹器。玉石器几乎无人过问。在费城世博会上,中国有工商业者 10 余人

出席,整日在会场与西人接触周旋,获益匪浅,对以后世博会的参展和置货也更有把握了。

李圭作为一位清朝的小官员、普通的封建知识分子,抱着增进了解、寻求新知的满腔热情,在美国深入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接触各式各样的人物,打开了眼界,在书中留下了一个多世纪以前,有关美国政治经济、城市交通、社会生活各方面的宝贵资料,谱写了中美文化交流的友好篇章。尽管中美两国相距千山万水,但李圭在美国,仍时时处处感受到美国人民的友好情意。去费城世博会参观的人,平均每天为 6 万人,最多一天达 25 万人。当时费城地区华人不多,西人难能一见,故衣冠端正,举止文雅的远东客人李圭的出现,幽默豪放的美国人竟“无不以得一见,交一言为幸;而啧啧叹美,敬礼有加。因之每至一处,竟若身入重围,几不可出。……”

李圭在该书的“游览随笔”卷三中,专有一小段“西人待客说”,叙述美国人民的热情好客。无论在车船、旅馆或日常生活接触中,美国人民是“然其情意真挚,顾虑周详,一种勤勤恳恳处,几如骨肉之无间”。有一次在火车车厢中遇到 5 位衣着华丽的欧洲妇女,她们请李圭介绍中国,听后惊喜不已,点头称是,还请李圭书写中文与她们看,终日言谈不倦,毫无避忌,最后热情握手道别。李圭坐船因风浪太大,晕船不适时,美国船友还去床前慰问,并告知防晕办法,其友好之情令人感动。《环游地球新录》于 1877 年写成,但即使在今天,该书对于渴望互相了解和友好往来的中美两国

读者,仍会有很大价值的。

### 五、美国传教士与“洋学堂”

美国是个新兴国家,与欧洲国家来华的耶稣会士相比,派传教士来华的时间较晚,1830年2月所派遣的裨治文(Elijah Coleman Bridgman, 1801—1861年)和雅裨理(David Abeel, 1804—1846年)为美国来华的首批新教传教士。此后不久,浸礼会、圣公会、美以美教会等,相继在海外建立传教机构,并不断向中国派遣传教士。由一项统计资料得知,在1830—1848年之间,各国所派遣去中国的新教传教士98人,其中美国73人,占总数的2/3以上。19世纪80年代时,美国国内出现一股向外宣教运动,即招募大批大学生自愿到海外去传教,宣教运动与美国在亚洲的贸易扩张相结合,并将中国列为庞大的海外潜在市场,由此形成美国在华传教的高潮。19世纪中叶,不平等条约签订后,允许传教士深入内地活动,这是洋学堂迅速增加的重要原因。

所谓“洋学堂”,是指美国教会在中国所办学校的统称,最初规模很小,名称不同,体制极其混乱,大体只相当于小学或中学水平,19世纪80年代以后,办学重点才逐渐转向高等学校。美国传教士来华,对于沟通中美之间外交商务、文化教育等方面,有非常重要作用,洋学堂的创办,对于传播西学和促使中国社会的近代化曾产生很大影响,是西学

东渐的组成部分。自清政府 1846 年废除禁教令后,来华传教士日益增多,其中基督教(新教)来华人数 1874 年时有 436 人,耶稣会(天主教)来华人数 1870 年时有 250 人。外国传教士在创办教会学校方面也花了大力气,至 1875 年前后,在华的教会学校已达 800 所,有学生 2 万人;其中基督教传教士开办的有 350 所,学生约 6000 人,到 1899 年时已增至 2000 所左右,有学生 4 万人,其中美国传教士特别卖力,至 80 年代末,美国在华的教会学校已有 1100 多所。

自 70 年代末以后,一些教会大学相继创建,例如 1879 年培雅学堂和度恩堂合并的上海约翰书院成立,后来成为上海圣约翰大学。1881 年美国传教士林乐知在上海开办的中西书院,后来成为东吴大学。1882 年长老会在山东办起广文学堂,即是后来的齐鲁大学,1888 年美以美会在北京建立汇文大学。1889 年在广州开放的格致书院,后来成为岭南大学,同年公理会等在河北建立通州华北协和大学,后来和汇文大学、华北女子协和大学合并成燕京大学。19 世纪末至 20 世纪 20 年代中期,是美国在华创建教会大学的高峰期,原先那些教会书院相继合并改办成教会大学,分布在沿海各大城市者有数十所,几乎占外国人在华所办大学的十之八九,可见美国基督教会在中国开办教会学校态度最积极,且一直处于领先地位。

根据传教士 1877 年大会的决议,由在华各教派在上海成立一个学校教科书委员会,编写初高级两套教材。1890

年时又由传教士中一些著名人物组成中华教育会,即由原来的单纯编写出版教材扩大为对整个在华教会教育进行指导。英国人李提摩太任会长,美国人林乐知任副会长。在该会章程的第二条规定:“本会的目的是促进中国教育的利益和增强从事教育工作者的兄弟般的合作。”其任务除继续编辑出版教科书外,还要对中国进行教育调查,举办各种讲习会、交流会、演讲会,交流推广在华教会教育经验,策划教育方针,教育计划等。

教会学校对学生学习英语也予以一定重视,强调凡是有条件者都要开设英语课,制造全盘英语化气氛。1865年在上海开办的英华学堂,是一所最早以正式教授英语为主的教会学校,只招收富裕的商家子弟,在校主攻英语,藉此培养出一批通晓英语的学生。教会学校对英语的重视,与外国列强对华掠夺进一步加深有关,此外,也与外国在华商业发展需要、外国人控制的中国海关、邮局等急需人才、洋务派兴办工业需要人才有关。尽管对在教会学校里设置英语的必要性意见分歧,但主张设置者占大多数,例如当时任上海圣约翰大学校长的卜舫济也强调,凡有条件的地方,除国文课外,都应采用英语教材,用英语上课。约翰书院(圣约翰大学)于1881年10月设置英文部,学生入学需付墨银8元,先付后学。受其影响,中国沿海各主要通商口岸的教会学校也相继开设英语课。

19世纪末,传教士在中国创办的学校,不仅势力大,并



且已有夺取旧武士大夫在中国的统治地位的趋势。一些大学除国学课程外,很多课程都用外语开课,用西洋课本,在部分知识分子中,学英语、讲英语成为一种时尚,传教士在中国教育改革中所施加的巨大影响异常明显。对此袁祖志在《出洋须知》中夸张地说道:“中土之人莫不以英国语言为‘泰西官话’,谓到处可以通行,故习外国语言者皆务学英语。于是此授彼传,家弦户诵,近年以来,几乎举国若狂。”

在中国创办的教会学校,都把宗教课作为主课,学生还要参加各种宗教活动。主要为扩展教会势力,并培养中国籍传教骨干。但传授一部分西方科学知识也是教会学校的课程之一,特别是在学习英语过程中,会把西方人的价值观念和社会习俗介绍给学生,使学生接触西方社会生活,获得某些进步的新知识。不过教会学校对于科学知识的传播,是在严格的宗教指导下进行的,一切以不违反宗教为原则,即通过学习科学来加深宗教信仰。尽管这样,在清朝这样一个对外严重封闭的国家中,教会学校所引进的一些西方科学知识,具有一定启蒙作用,有助于启发中国人重新认识外部世界。本世纪 20 年代后,民族解放运动日益高涨,在强大的反帝呼声下,教会学校亦受到打击,许多学生退出教会学校,全国也有收回教育主权的呼声,第一次世界大战发生时的四五年内学生更加减少,到 1927 年为最低点。

中国的很多教会大学,都在外国注册立案,如苏州东吴大学于 1902 年在美国的田纳西州注册,上海圣约翰大学

## 中国官办“洋学堂”——京师同文馆

---

1906年时向美国哥伦比亚区注册,杭州之江大学于1920年向美国华盛顿州注册,南京金陵大学于1911年向美国纽约州注册,福州协和大学于1918年向美国纽约州注册。凡在美国注册过的中国教会大学,其毕业生不经考试可直升美国州立大学或挂钩合作大学,并可颁发相关的学士、硕士和博士学位,以此吸引学生报考教会大学。

美国在华创办的教会大学,很早就与美国本土的一些名牌大学挂钩联系,如哈佛大学、耶鲁大学、普林斯顿大学、康乃尔大学等。有关美国大学教学体制中的诸如院系设置、课程安排、教学工具、图书资料、教学方法、学风等也不断介绍移植到中国来,作为西学的一部分,这对促进中国教育改革有借鉴作用。燕京大学与哈佛大学合作建立起来的“哈佛燕京学社”迄今犹在,充当中美两国的学术文化交流的桥梁。西方国家将教会教育输入中国,适应了近代中国学习西方的需要,故这是中西文化交流中的一种特殊形式。

## 六、中国官办“洋学堂”——京师同文馆

第二次鸦片战争(1856—1860年)后,清政府为适应日渐增多的对外交涉和开展洋务运动的需要,于1862年在北京设立同文馆(1862—1902年)。该馆聘请西人开办英文、俄文、法文等班,最初仅是试验阶段,1868年算学馆成立,从学习西文逐渐转变为学习西学,使这所外语学校向一所

高等学校过渡。次年又在上海设立广方言馆,1864 年又在广州设立同文馆,都聘请西人教授外文,都是培养外语人才的学校,西方传教士在中国的官办学校中有了一个据点,其意义非同寻常。北京京师同文馆是中国官办洋学堂(又称西式学堂)的肇始,也是清政府转变对西学态度的开始。美国传教士丁韪良于 1865 年去同文馆接替傅兰雅任英文班教习,1869 年 11 月应总税务司赫德推荐出任同文馆总教习,开始整顿和发展同文馆,在同文馆大显身手。

为挽救和振兴濒临崩溃的同文馆,丁韪良进行了一系列改革,兴利除弊,逐渐理顺和完善一套教育体系,主要内容为:首先,确立总教习负责制。虽在行政上隶属总理衙门,须按时奏报,并作学校工作总结,但具体管理、教学活动等主要工作皆由丁韪良负责,使学校保持一个稳定发展环境。其次是为适应洋务运动发展需要,除最初设的英文馆外,增设了俄文馆和法文馆,1872 年又增替文馆,甲午战争后增设日文馆,反映出外国势力对中国侵略扩张的加深的演变过程。还制订新的学制,分为 5 年和 8 年两类,前者不学外文,5 年的课程大致和 8 年制的后 5 年相同,招生对象为年龄较长、无暇学习外语而借助中译课本的学生;后者前 3 年专攻外语,后 5 年学习代数、物理、几何、化学、航海测算、机器制造、微积分、天文测算、地质矿务、地理等自然科学,还要学习国际公法、富国策等社会科学以及外文翻译技巧和训练等。最后是改进招生办法,提高入学条件。主要

招收满汉年龄在 15 岁以上,25 岁以下,文理业已通顺者,藉此改善学生素质,提高教育质量。

在丁韪良主持下,中国第一所采用欧美学校办学方式的同文馆步入正常发展时期。为改善教学条件,他还广建馆舍,创办印书处,编译教科书,办起藏书阁(图书馆),添置实验仪器,创设化学、物理实验室,兴建博物馆、天文台,所有这一切都给教学活动创造了良好条件。学校所开设的课程如医学生理、国际公法、政治经济学等,均具有近代资本主义文化性质,也为国内首创,学校设总教习制,具有近代校长负责制雏形,分年制课程的设置以及由分馆学习到低年级、班级授课,也为中国教育史上首创,这一切都使近代科学文化及教育体制通过同文馆得到一定传播。

与中国书院、私塾等死背四书五经、注重形式、练习空洞死板有所不同,丁韪良强调实效,注意理论和实践相结合。例如学自然科学的要进实验室实验,上医学课的学生要去医院临床实习,学外文的学生常被召去总理衙门担任口头或书面翻译,或者要和外籍教习合作译书。这一资本主义新型学校的教学特点,具有很大的挑战性,促进了中国教育方法的改革。当然同文馆毕竟是封建官办的学校,具有很大的局限性,存在各种各样的弊端。同文馆注重语言,以“洋文洋语为要”,至于在自然科学方面,郑观应指出“天文、舆地、算学、化学只不过粗习皮毛而已”。梁启超甚至全盘否定同文馆的教学方针。特别是到了后期,“洋教习日久

敷衍成习”，不好好教；“诸生无所畏忌”，不好好学。

经过数年努力，同文馆的学生不断增加，1871 年时已从原来的 40—50 名增至 100 余名，1888 年时已达 125 名。同文馆开办 40 年，估计前后培养出 300 余名学生。学校在社会上的声誉日益提高，培养出一大批外交人才。初期在校学生，根据需要，不时随同各外交使团外出观光和充任译员，从 19 世纪 70 年代起，一些同文馆学生逐渐去大清国驻外使馆任职，如丁韪良的学生、与他一起合作译书的汪凤藻，于 1891—1894 年任驻日本公使，清末民初担任驻外公使的同文馆毕业生 12 人，他们都是丁韪良任总教习期间的学生。清朝洋务派中的重要官员户部尚书董恂，刑部尚书谭廷襄等也是同文馆毕业生。此外，尚有一些毕业生在中央各部、地方官衙、机器局、电报局和各地学堂任职。

清政府对丁韪良在同文馆主持教务工作所取得的成就深感满意，为此于 1885 年总理衙门奏请清廷赏其三品衔，总理衙门对他的评价为：“资格最深，馆课亦能勤慎。”他们把同文馆自 1862 年建馆后所取得的成绩，均记在丁韪良一人的账上：“规模略备，人才辈出，赖总教习分门析类，督课有方。”甚至赞扬丁韪良“较之从前的利玛窦、南怀仁、汤若望诸公，倍有光彩”，同文馆的种种弊端和缺陷却被掩盖了，使人觉得在这过誉之词后面还有媚外之意。丁韪良于 1850 年来华，1916 年病逝北京，终年 89 岁，他在中国度过的一生是值得进一步研究的。

## 第八章 中国园林艺术风靡世界

### 一、中国园林艺术的风格和意趣

中国园林建筑历史悠久,风格独特,其艺术价值、建筑成就以及鲜明的民族风格,在世界园林史上占有重要地位,英国植物学家威尔逊曾称“中国是世界园林之母”。中国园林起源于商周时代的“囿”,据《诗经·大雅》、《孟子》等书的记载,“囿”,基本上是原始的自然地貌,供帝王贵族进行狩猎娱乐的地方。春秋战国时代的楚庄王“筑层台延石千重,延壤百里”,已体现出了园林的主要组成因素,例如吴王夫差建造梧桐园和会景园。秦代时候的苑囿更为壮观。魏晋南北朝时,由于玄学和佛教思想的勃兴,在士大夫阶层中刮起崇尚自然之风,山林文学和山水画的发展创新,营造出以自然山水为主体的私家园林,促进了园林艺术的成熟与发展。唐宋时期,由于经济文化的繁荣和写意山水画的发展,文人与画家的参与营造园林活动,使园林建筑更加繁荣发

达,园林的设计创造也更具诗情画意。明清时,中国园林艺术的发展进入鼎盛期,明末计成撰写成园林学理论《园冶》一书,系统总结了江南造园技术的成就,强调造园要从实际出发,因地制宜,使之富有天然色彩,该书可谓是中国造园艺术在理论上的概括和总结。在许多宋元明清画家的画论中,也常写有造园的理论。

中国园林可分为皇家园林、私家园林和寺庙园林三类。皇家园林集中在中国北方,以气势宏伟和富丽堂皇著称。



被烧毁前的北京圆明园阁楼。

若论现存园林规模,以清代热河(今河北承德)的避暑山庄为最大,占地面积 500 多公顷。北京西郊的颐和园(前身为万寿山清漪园)是我国现存规模最大的一座古典建筑,与玉泉山静明园、香山静宜园、圆明园、畅春园合称为“三山五园”,为清代皇帝的夏宫。

在皇家园林中,规模最大、风景最美者当推圆明园。该园原是私家园林,后康熙帝将其赐给雍正,面积仅为 300 亩,康熙亲自赐名为“圆明园”,经雍正、乾隆时不断扩建,方圆 20 华里,占地 5000 多亩,包括圆明、长春、万春三园。园内有题名的景点 40 个,乾隆对各景点亲自赋诗,命沈源、唐岱绘 40 景图,由汪由敦书写 40 景诗。园中风景秀丽,有大量体现古代诗词意境的景点,全园 35% 为水,里面的大小湖、池、河、渠纵横,极具江南水乡之美。圆明园不但一年四季各有特色,一天之间的晨昏情趣也各不相同。园中建筑物既有历代宫殿,也有茅屋草舍,别具一格的“西洋楼”,等等。圆明园作为中国园林艺术的杰作和精品,成为在华传教士向西方介绍中国园林的典范,被誉为“万园之园”,“人间天堂”和“造园艺术的楷模”。法国文学家维克多·雨果(1802—1835 年)对此曾说:“在世界的一隅,存在着人类的一大奇迹,这个奇迹就是圆明园。……圆明园属于幻想艺术,一个近乎超人的民族所能幻想到的一切都荟萃于圆明园。”

可惜这座偌大的美丽皇家园林,在 1860 年时被英法联军放火焚烧,没用多久大火便使一代名园毁于一旦,成为世



界历史上人为地野蛮毁灭文明的浩劫。1904年清廷正式撤消圆明园管理机构,只留下一些断壁颓垣,荒芜不堪,如今已成为年轻一代牢记帝国主义侵华历史,接受爱国主义教育的一个场所。

私家园林主要聚集在南方,以江南园林名声最著,而苏州园林,又在江南称冠。苏州的造园艺术讲究利用自然,顺应自然。五代吴越时广陵王钱元漵在苏州所建的南园,不仅规模宏大,而且“鬲流为沼,积土为山,岛屿峰峦,出于巧思”,其建筑艺术已达到相当高的水平。据说宋初诗文革新运动先驱王禹偁(954—1001年)因任长州县主簿来苏州,见到南园后赞叹不已,并有“他年我若成功后,乞取南园作醉心”之句。苏州园林多为私家园林,现存大小园林数十处。江南园林较著名者有苏州拙政园、狮子林、沧浪亭、留园,无锡寄畅园和扬州个园等,都以小巧、雅致、平易和怡人著称。寺庙园林分布较广,是在漫长岁月中逐渐形成的,且大小和风格差异较大,虽不如前两类园林精致,却也能给人以和谐、简洁的美感。

中国园林虽有种类之分,但在建筑原则和技术手法上都有以下几个特点:

第一,追求回归自然。这主要是受老庄和儒家哲学思想支配,《论语》有“智者乐水,仁者乐山”的记载。道家也认为“天地有大美而不言”,“自然为万物之本”,人只有生活于自然环境中才能健康成长。所以,造园选址不拘一格,方向

任其四方,地势任其高低,置园只求因地制宜,合于方则就其方,合乎圆则就其圆,可扁就扁,能曲则曲。一切顺其自然,采取自由形式,处处扬长避短,因势而立,无明显的中轴对称布局,园内景物,树无行序,石无定位,建筑物也参差错落,灵活多变,但寓意含蓄曲折,给人留下极大想像与回味余地。造园设计也力求自然,许多造园家都将再现自然山水之美作为起点,并把自己喜欢的诗词、绘画、书法艺术与建筑相结合,把自然山水比作人内在的品质与情操,由此揭示人的思想感情,引发人的想像与联想。崇尚自然,追求自然山水清幽淡雅的意境,成为中国古典造园艺术的基本特点。

第二,中国园林追求含蓄也是其一大特点。即采用欲露而藏的手法,把某些景观或藏于偏僻幽深之处,或隐于山石树梢之间,切忌直率浅露,一览无余。主要原因是受到中国诗书画艺术影响,书画强调“意贵于远,境贵于深”的艺术效果,提倡“曲径通幽”。像承德避暑山庄在山谷幽僻处设置许多风景点,就是要造成“竹里通幽,松寮隐僻”,“千峦环翠,万壑流霄”的清新幽雅环境气氛。即使在喧闹的都市造园,也要运用造园家的妙思,趋利避害,着意于闹处寻幽,创造出幽雅含蓄的环境气氛来。根据园林诗情画意的发展需要,把全园划分为若干个层次不同的景区,有机相连,主次分明。园内景物安排有层次感,使之隔而不断,互相掩映,情景交融。用山石作为屏障,遮挡视线,可使园林景观深藏

不露,更加含蓄幽深。由于景物含蓄,意境深邃,游客只有凝神入静,细心品味,才能感受其中之美。宋诗《游园不值》中的诗句“满园春色关不住,一枝红杏出墙来”,也是园林艺术中藏露的一例。“露”是红杏出墙,一枝独秀;“藏”是满园春色,姹紫嫣红。这种欲露而藏的艺术手法,给人们留下了极大的联想与想像余地。“藏”与“露”的象征统一,也与中国民族传统心理密切相关。

第三,追求意境美。主要是追求一种“天然之趣”,追求把自然环境与现实生活协调起来的境域美,追求清新自然和淡泊宁静的情调。近代学者王国维指出:“文人造园如作文,讲究鲜明的立意,使情与景统一,意与象统一,形成意境。”山与水一刚一柔,一静一动,构成刚柔相济,动静相生的园林景观。叠石造山,引泉凿池,构成人工水景。理水技术包括引水、堰闸、驼峰、瀑潭、溪涧和喷泉等。园林假山的功能主要在于造景,以叠石堆山作为庭院空间的主题和核心。造园者还采用借景手法,将园林空间以外的景色,组织到园中来,突破园林的空间局限,产生咫尺千里的效果。例如在墙上开门,廊边开窗,通过漏窗把园墙以外或远或近的风景有机组合起来,给有限的空间以无限的延伸。又如大园包小园,使之园中有园,景观一层又一层,使人产生一种深邃悠长而难以穷尽的空间感。

第四,将诗情画意写入园林。造园不仅要达到美景如画,还要达到情从景出,具有诗情与画意的意蕴。为此在许

多中国园林中,常常借助名家所题匾额、对联、景题、石刻、雕塑、题咏、诗词等文学手段,揭示景观特色,开拓景观意境,启发游客想像力,引导游园者理解、领悟图中景色。例如,在园林建成后,常借助文学手法或点化前人诗文句意,道出景点的主题或意境。曹雪芹在《红楼梦》中曾借贾政之口,道出园林景点题名的作用。他说:“若大景致,若干亭榭,无字标题,任是花柳山水,也断不能生色。”苏州网师园内有一亭题名为“月到风来”,游客到此即使风和日丽,艳阳高照,也能领略到中秋明月之夜,微风轻拂,夜色凉如水的美景。苏州拙政园内有荷花四面亭,亭内有楹联曰:“四面荷花三面柳,半潭秋水一房山”。意在引导游客将山水花柳等远近景观组合观赏,方能领略园中景物的整体之美。扬州瘦西湖有联曰:“借得西湖一角,堪夸其瘦;移来金山半点,何惜乎小”,生动形象地点出瘦西湖秀美无比。在园林艺术中引入文学因素,能使景观增添浓郁、隽永的诗情,深化人们对景观的理解;能使园林更具诗情画意,从而使游园者享受美感,内心产生共鸣。中国园林是“凝固的诗,立体的画”。由此可见,古典园林确实是一门综合性艺术,凝聚着我国传统文化艺术的诸多精华。

## 二、中国园林艺术的西传

中国园林是中华五千年悠久文明的载体,中国传统文

化的组成部分。中国是世界造园史上三大发源地(中国、西亚、希腊)之一,在历史发展进程中,中国园林沿着自然主义的轨迹发展,即崇尚自然为主题的自然山水园林,并独树一帜,成为东方园林的代表,被称为世界园林之母,备受国外人士喜爱和重视。中国园林不仅对周边的日本、朝鲜等国家产生影响,形成东亚一个广大的建筑文化圈,同时也受到西方国家的重视,对欧洲、英国、法国、德国、俄国以至美国产生过很大影响,成为世界建筑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从17世纪末至19世纪初,欧洲各国曾先后出现过“中国园林热”,中国园林艺术对欧洲的影响一直保留到今天,并成为沟通东西方文化的桥梁。

欧洲的造园艺术,16世纪时开始在意大利兴起。16世纪末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到中国后,参观了南京的一处园林,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他写道:“在花园里,有许多从来没有见过的东西。那儿有一座人工的假山,山内有小洞,洞里有厅堂、房屋、池塘、花木等。”“山洞像迷宫一样”。意大利造园艺术后来又随着文艺复兴运动传播到法国、英国等一些欧洲国家。但到17世纪时,随着法国君主集权的发展以及社会思潮的变化,改变了从意大利传人的造园艺术,形成法国古典主义造园艺术,法国成为欧洲园林艺术的代表。

17世纪时在欧洲流行的古典主义造园艺术,其特点为用花圃图案来布置花园,宛如地毯一样,所以有绣花花圃之

称。这一平面图式的花园,既无掩映,也无层次,全园景观一览无余。由于花园面积过大,不宜步行,故又有“骑马者的园林”之称。例如17世纪中叶法国孚·勒·维贡府邸花园的中轴线长达1公里,凡尔赛花园更大,中轴线长达3公里。

古典主义花园中的树木都修剪成简单几何形,荷兰更特别,常把树木修剪成塔、船、花瓶、人或各种飞禽走兽的样子,名为“绿色雕刻”。英国“光荣革命”时,威廉三世国王(William III,1689—1702年)于1688年11月自荷兰回到英国后,在引进的荷兰文化中,包括有“绿色雕刻”艺术,使英国古典主义园林艺术中颇具荷兰特色。中国造园艺术首先在英国产生影响。

### 英国的自然风致园

英国皇家建筑师威廉·钱伯斯(William Chambers)青年时代从商,航海去过世界各地,可谓见多识广。他也曾去过中国,担任英王建筑师后再次去中国游览考察,回国后将所见所闻编为《东方的园艺》(Essay on oriental gardeniny),文中除盛赞中国园林艺术的成就外,也反对英国那种完全注重风景的花园。据说欧洲最早出现的中国式花园就是钱伯斯于1761年为肯特公爵(Duke of Kent,1750—1759年)所建造的中国式园林丘园(Kew garden)。当时的一些评论家说:“钱伯斯建园,用曲线而不以直线,一湾流水,小丘耸然,灌

木丛生,绿草满径,林树成行,盎然悦目。”除此以外,园中还有假山湖石、奇花异草、岩洞广场,以及中国时兴的佛塔。该塔共9层,高160英尺,每层有中国式檐角,角端饰以口含银铃之龙,涂以不同颜色彩釉,美仑美奂。丘园的佛塔旁还建有孔子庙,庙中有展示孔子生平事迹的文字和图片,以突出中国风味。丘园中的中国宝塔建成后不久,许多地方争相仿造,最著名的有荷兰的香塔庐、慕尼黑英国花园中的中国塔等。

通过钱伯斯文章的介绍,加上游客们参观以后的传扬,中国式花园遂成欧洲新式花园的蓝本。中国式庭园建筑在英国日趋完善,传到法国后便称为“中英式花园”(Jardin anglo-Chinois)。17世纪末时,英国王公贵族对传统的园林建筑已经感到单调乏味,一些人开始对岩洞、怪石、小溪等发生兴趣,经过一些文人雅士的推崇,18世纪上半叶一种新式花园应运而生,叫做自然风致园(Landscape garden)。该园最大特点是不再使用轴线对称的几何图法,而是布置得像田园牧场一样,其山林、河谷、湖泊等如一幅幅自然界画面一样,具有宁静、优雅和清丽的特点,就像是从自然界裁剪下来的一部分。18世纪中叶,自然风致园取代了古典主义造园艺术,但自然风致园明显受到中国自然山水园的影响。

历经两个多世纪的人间沧桑,位于伦敦西郊泰晤士河畔的丘园,如今依然是英国名园。从伦敦市中心出发,约需

半个小时车程便可抵达丘园。该园占地 120 公顷,三面环泰晤士河,景色秀丽多姿。原是供英国王室消遣的园林,后于 1841 年正式命名为英国皇家植物园,并拥有来自英国及世界各地的 5 万多种奇花异树及名贵植物,成为世界闻名的植物大观园之一。园中的中国式宝塔、小巧的凉亭、别致的假山、清澈的湖水、潺潺的溪流,给人以无限的温馨与美感。

英国一向有翡翠之岛的美称,终年温和湿润的气候,适宜于植物生长。冬去春来,无论是城镇公园,还是郊外原野,满眼苍翠,姹紫嫣红,鸟语花香。春夏之交,丘园更是百花吐艳,景色迷人,吸引无数游客前来赏春。人们竞相在湖畔、花丛中、凉亭前、宝塔下、温室里,细心观赏并摄影留念,丘园成为五彩缤纷的花海。每当人们在丘园中流连忘返,或是仰视这九层高的佛塔,为这万紫千红的美景和芬芳所陶醉时,自然也不会忘却钱伯斯当年“以中国园囿为模范”的独运匠心,以及中英文化交流的这段历史。

### 中国园林风行法国

随着法国封建专制制度的衰落,古典主义造园艺术开始走下坡路。18 世纪时随着中西贸易的扩大和中国文化的西传,在欧洲出现了“中国热”,首倡者为法国。法国的耶稣会士在大量介绍中国科学和文化艺术的同时,也把中国的植物以及园林艺术带回了欧洲。中国园林建筑艺术,通



过英国的自然风致园在法国流行起来。18 世纪的法国,正当人们对崇尚修饰、刻板划一的路易十四(Louis XIV, 1638—1715 年)式建筑风格感到厌倦时,传来了法国传教士王致诚(Attiret Jean Denis 1702—1768 年)对中国园林的详细介绍。这位学识渊博、曾充任清王朝宫廷画师的传教士,对中国园林艺术有细致的研究,并写过题为《中国皇帝游宫写照》的文章。他在致巴黎友人的书信中,极力称赞圆明园,说这是座真正的人间天堂,由曲折蜿蜒的山道相通的亭阁,更像是神仙宫阙,丘壑、曲径、假山、石道、山石、驳岸等都浑然天成,人工河流也布置得贴切自然,仿佛从田野流过一样,他还热衷于将中国园林与西方园林相结合的尝试,直接参与了圆明园西侧 12 座建筑物的监造。王致诚有关中国的园林资料公布后,在欧洲引起轰动,更引起欧洲园林建筑界很大兴趣,要求进一步获得更详细具体的资料,王致诚便把圆明园 40 景图的副本寄回巴黎。

受“中英式花园”的影响,18 世纪 70 年代在法国的凡尔赛建成了一小特里阿农宫花园,设计者借鉴英国风致园和中国园林的设计特点,园内有岩洞、假山、拱桥等,曲溪和小径曲折多变,园内花木错落有致,湖边垂柳依依,置身其中可领略到浓郁的中国风情。这股群起仿效中国园林建筑的风气愈演愈烈,在法国的任何园囿中,如果没有“中国亭榭”,就谈不上时髦。在巴黎一家饭店的屋顶上,也修建了一座中国花园,内有小桥流水,令观者赏心悦目。

### 中国园林对德国的影响

如果说中国园林建筑风靡欧洲,首先在英国,继之为法国的话,那末德国又在法国之后。德国波兹坦(Potsdam)附近一个叫斯腾(Stern)的地方,于1714年建造了一座猎亭,其檐外伸达1米,这完全是仿效中国建筑檐下以木衬托边的风格,建筑界称其为飞檐。德国易北河旁的弗尔尼兹宫(Pillnitz)也仿效中国屋顶建筑,那特殊的结构,扁平狭长的屋宇,侧面的凉亭等,都呈现出中国离宫别苑的特色。腓特烈二世(Frederick II, 1740—1786年)晚年,也强烈偏好新事物,例如于1773年在波兹坦附近的柏尔维第尔修建了一座“龙舍”,也是仿照中国塔建造的一个尝试。于1754年在波兹坦附近圣阿西宫(Sans-Souci)花园中建造的一座日本亭,被认为是“仿造中国凉亭最成功的一个例子”。

风景园艺学家西克尔(F·L·Sekell)于1773年被德国派往英国,向钱伯斯学习新的园艺建筑。同年有位名叫翁策尔(Ludwig A·Unzer)的学者出版了一本《中国园林论》,认为“中国园林是一切园林艺术的典范”,此书为西方人所写的研究中国园林的专著之一。位于卡塞尔(Kassel)附近威廉索痕(Wilhelm Shohe)的木兰村(Moulang)是“中英式花园”中最宏伟的作品,也是当时德国规模最大的中国式花园之一。取名“木兰”,可能承自中国承德避暑山庄中的“木兰围场”。村落中有中国式农舍,中央是一座圆形小庙以及龙宫、宝

塔、水阁等景点，一切情景均模仿中国，山麓旁的一条小溪取名“吴江”(Hu-Kiang)，溪上有木桥，桥下溪流湍急，还有身穿中国妇女服装的黑人挤奶工，1873年又增设了一座铜香坛及中文书刊目录等。这一“中英式花园”后来又通过德国传到匈牙利、瑞典与俄国。

### 美国对中国园林的倾慕

美国是个很年轻的国家，建国(1776年7月4日)至今只有200余年历史。在殖民地时期，北美十三州和中国的交往几乎是零，两国之间的文化交流也很有限。不过一些欧洲商人已经将一些日常生活用品和工艺品等中国货运入北美，如陶器、瓷器、漆器、丝绸、象牙扇和壁纸等，使十三州人民对古老的中国文化有了最初的了解。美国商船“中国皇后号”首航中国成功，开辟了中美关系的新纪元。在该船运往美国的360吨货物中，除大宗的茶叶、瓷器、丝绸、土布、肉桂等外，尚有中国的手工艺品，如刺绣、象牙扇、梳妆盒、丝质竹纹窗帘，还有一套精美的家具。自此以后，在美国掀起了一次对华“贸易热”，大量中国货一到美国，立即被人买光，“华化”(即中国化)成为一些美国家庭装潢布置的时尚。“独立前后的美国，户户为能有一件中国产的艺术性商品而光荣”。

美国人对中国园林建筑的倾慕和模仿，是在独立战争后的18世纪末期。有位名叫凡·勃拉姆的人在特拉华河

(Delaware River)西岸盖房一座,取名“中国静修所”,屋上有小塔,塔角系银铃,微风吹来,铃声清脆悦耳。其窗采用复式嵌板,配置巨型玻璃,开窗四望,远景尽收眼底。庭院中的假山、凉亭、游廊、清流、拱桥、花木等,处处展现出中国园林文化的情韵。另一美国人于1806年修建了一座中国式凉亭,并在费城建造了一座高约305米的宝塔,1832年时内森·邓恩在新泽西州(New Jersey)奥立山上建造了一座中国式小别墅等,可见在立国不久的美国居民中“其华化之远被矣”。

### 三、当今世界的中国园林热

社会在发展,人类在前进,各国人民都渴望相互了解,世界优秀文化需要相互交流和融合。自20世纪80年代起,随着对内改革和对外开放国策的实行,中国与世界各国在政治、经济和文化方面的接触交流日益扩大,彼此间隔断了数十年的联系又有了新的开端,中外文化交流进入新的发展时期。世界各国人民对中国历史上所累积下来的优秀文化遗产,对中国近几年来所发生的巨大变化和新的艺术创造都非常着迷,对作为中国文化艺术奇葩的古典园林更是惊叹不已。他们不满足于传媒、书本画册的介绍,也不满足于来华旅游参观,他们想把中国园林“扛回去”,建在自己的国土上,让更多人观赏丰富的中华文化景观,体味东方文

明的广博与深邃,由此而来的“中国园林热”浪潮汹涌澎湃,并波及五洲四海。数十个富有浓厚民族特色的中国古典园林建筑,相继在西欧、北美、亚洲、非洲、大洋洲的 10 多个国家和地区落户,有的尚在兴建之中,现择其最具代表性的各国中国园林分述一二,以飨读者。

### 纽约的室内苏州园林——明轩

建于 1807 年的美国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是美国最大的艺术博物馆,它收藏着来自世界各国 5000 多年来的 150 多万件艺术珍品,其中有大量中国明代的古董、家具和字画。该馆董事阿斯托夫人幼年时曾随父母在中国居住过,对中国明代艺术情有独钟,对中国的园林艺术深为着迷。本世纪 70 年代时,该馆在扩展东方艺术珍品时,就提出在馆内建中国庭院以介绍中国园林艺术,其计划很快被馆主任霍文所接受。

1978 年 1 月,阿斯托夫人率专家学者去苏州进行考察,并聘请上海同济大学的著名园林专家陈从周先生为建筑设计顾问。随即大都会博物馆派出东方艺术部负责人去上海,会同陈从周商谈具体事项。陈教授决定以苏州网师园中的一角“殿春蕊”为蓝本,采用明代庭园风格来设计明轩,并冠以一个动听的英文名字“Ming Room”。

阿斯托夫人做事十分认真,认为中国庭院不建则已,要建则一鸣惊人,定要达到真、善、美标准。在苏州园林局的

大力协助下，建园工程全面展开，苏州的能工巧匠们日夜施工，用中国产的木料、湖石、青砖、瓦片等，制作成“半成品”。精心设计，精心施工，为确保质量，据说将一个早已封闭了200多年的御窑重新开放，为明轩烧制砖瓦。全部构件制作完成后分装在193只集装箱里运往美国。由中国派出的工匠随之来到纽约，以中国传统工艺，一丝不苟地进行施工装配。施工期间，美国前总统尼克松、前国务卿基辛格夫妇、纽约市市长考奇、美国华人牛满江、贝聿铭以及李约瑟等学者前往参观，对精美的中国园林艺术赞不绝口。

经过4个半月的施工，一座400平方米的苏州古典园林明轩于1980年底建成，在美国纽约第5大道82街大都会艺术博物馆三楼开放。主要建筑为三间大厅，厅前为一庭院，院内假山叠石、长廊曲院、半亭清泉、月门漏窗、卵石铺地，集中展现了苏州园林的艺术精华。明轩共有50根柱子，为防虫蛀，全部用楠木制成。建造粉墙时，本打算用砖头，但被工程师否定了，因建在三楼，怕无法承受过重压力，便改用铝合金并敷上白土。园中铺砌小径及假山石，系用太湖石块，经加工铺叠而成。

北面为明轩的正厅，厅前为一条前廊，正厅当中有6扇落地长窗，在此可以凭栏远眺。正厅作为客厅，其北墙开三扇漏窗，窗外栽竹置石，花影移墙，峰峦当窗，宛然如画。正厅东为一条10余米的曲廊，外侧由花岗石砌成的矮栏，可充作条凳，在此小憩，可观赏院内景色。曲廊内侧墙上又有

几扇漏窗。正厅西为一座半亭，飞檐翘角，古色古香。半亭旁泉水潺潺，无一处不折射出中华文化的光芒。点缀其间的矮松芭蕉，文竹蒲草，也都是中国品味的，使人工建造与自然环境水乳交融，人工美与自然美化为一体。具有浓郁东方文化色彩的苏州园林落户美国，立即引起轰动，纽约数家电视台、《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等传媒竞相报导。在揭幕典礼上，美国友人竖起大拇指对陈从周教授说：“你为我们设计了美丽的明轩，你的名字将永远留在美国。”成千上万的游客前来观赏，从早到晚，络绎不绝，为此博物馆不得不采取保护措施，每次限 50 人入内参观。

### 温哥华的逸园

1986 年 5 月 2 日至 10 月 13 日，世界博览会在加拿大温哥华市中心举行。该展占地 70 平方英里，有 40 多个国家和地区参加。这为期 5 个半月的盛会，吸引世界各地 1500 多万游客前往参观游览，盛况空前。与此同时，世博会的“芳邻”，位于温哥华唐人街西侧、中山公园内的苏州园林“逸园”也建成开放，成为加拿大著名游览胜地。取名“逸园”由孙中山先生的字“逸仙”而来，反映出海外华侨华人缅怀革命先驱者的崇敬之情。逸园与中华文化中心相连，与文化中心多用途大会堂等形成一个系列，从而为温哥华华埠增光添彩。

这一令世人瞩目的工程由中国江苏省国际经济技术合

作中心与加拿大温哥华中山公园委员会合作建造,苏州市古典园林建筑公司承建。该园占地 1400 多平方米,于 1983 年 2 月 13 日破土动工,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省(简称卑诗省)省督亲自主持开工典礼,可见其对此工程的重视。许多主要的建筑材料如梁、柱、板、砖、圆石柱、长条石等都从中国运来。建园过程也是中加友谊和中加文化交流的象征。早在建园之前,中国就组织一批园艺家和建筑师认真策划,江苏省政府为工程捐赠 50 万加元人力和物资,苏州市也捐赠园林建筑中的“书斋”一幢。卑诗省和温哥华市两地政府拨地拨款,广大市民和温哥华市华侨华人踊跃捐款,才使工程得以顺利进行。

广大温哥华市民对逸园的建造倾注很大热情,寄以很高期望,他们均想先睹为快。为此工程建设领导机构决定边建设边开放,自 1985 年 6 月起,每月的第三个星期日成为逸园开放日。从加拿大联邦政府的部长到议员,从温哥华市民到来自世界各地的旅游者,在参观了逸园雏形后,均交口称赞。当时的温哥华市市长曾说:“中山公园将成为温哥华的主要风景区,从而增加吸引游客的魅力。”

经过建设者们 3 年多时间的努力,逸园于 1986 年 4 月 14 日建成开放。逸园为封闭式园林,完全按照苏州古典名园格式设计,整体布局利用假山、水池居中,建筑四周环筑,使空间主次分明,开合错落,疏密相间。设计者在园中配置的树木花卉、中国传统的亭台楼阁、廊榭桥洞等有机结合,



刻意营造一种借物抒情,以山水画面为重心、追求自然美的氛围。全园以其布局可划分为如下四个景区:

其一,主堂与入口处:中山公园月形洞门西侧为入口处,黑色大门上端的砖雕字碑“逸园”两字遒劲古朴。入园后一小院以曲尺形走廊与主要厅堂华枫堂相连。枫树为加拿大国树,枫叶是加拿大民族的象征,取名“华枫堂”,暗喻枫叶之国与中国人民之间的友好合作和文化交流。该堂坐北朝南,南侧为全园景观空间,右侧垒石造山,一亭枕于头上;左侧曲池复廊,一榭浮水,山涧瀑布,清溪细流,在喧嚣的大都市中,刻意创造出一种幽雅含蓄的环境氛围来,造园艺术家的智慧和巧妙构思,由此可见一斑。逸园中的树木花卉名种很多,如黑松、柏树、红枫、银杏、翠竹、藤萝、槭树等为温哥华当地品种;面冬青、黄杨、海棠、杜鹃、白玉兰、山茶、迎春、芭蕉、月季、梅花和芍药等为苏州园林传统名种。

其二,复廊水榭区:为该园主要观赏点之一。复廊、水榭另加水轩,起分割空间、景区相互渗透以及造景作用。整个区曲直有序,变化多端,南边为歇山式建筑涵碧榭,两面临水,水面清澈平静,岸畔堆石垒山,山水相映,这种湖山一体的布局亦是中国古代园林建筑的特色之一。水面架桥,回环曲折,水轩面北而筑,与华枫堂、云蔚堂互为对景,游人徜徉其间,乐而忘返。

其三,书斋庭院区:书斋建筑造型精致,古朴淡雅,书斋门上有“四宜书屋”匾额,取名著《园冶》一书中“收四时之烂

漫”之意。屋内一侧放置太湖石，书斋的北墙、山墙均为砖细窗宕的什锦花窗，松竹梅兰，四时盆景点缀其间，平添几分山林野趣的自然景色。

其四，为曲池山林区：由东部岛山和西部壁水组成，以山涧水溪相隔，池水缭绕山间。在岛山的峭壁之西有一花洞，游客涉水而入，观瀑听涛，享受难得的自然山水情趣。岛山顶部建六角形云蔚亭，游客在亭中待月近风，眺望中山公园和逸园全貌。

逸园为北美地区最大的户外中国古典园林，自建成开放后，游人如织，置身其间，有到了苏州的感觉。该园给人的总体印象是外景恰似姑苏的沧浪亭，其长廊仿佛又像拙政园，人在廊上走，影在水中移。别致的垒山曲池，崎岖石路曲折相接，葱郁的树木和众多的花卉疏密有致，相互掩映。由于该园设计新颖独特，建筑精致，景色秀美而荣获国际城市中心协会 1987 年度“特别建设奖”。逸园的建成不单是中加人民友好的象征，也是中加文化交流的结晶，正如温哥华市公园局局长纳特所说：“我爱这座园林，她对我们加拿大的文化背景是一个了不起的补充。”

### 悉尼中国花园

1980 年 10 月，广东省省长刘田夫应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州（以下简称新州）州政府邀请，率团去悉尼访问，并和新州政府总理代表双方签订缔结友好省州的协议书，与此同

时,经过双方友好协商,同意在经济贸易、科技教育、文化艺术、体育和卫生等方面进行广泛合作和交流。为此还成立了双边交流委员会,以保证上述交流具体落实。

旅居悉尼的华侨华人成为联结中澳友谊、促进中澳文化交流的纽带。华人社团在和代表团的广泛接触中,提出了为进一步促进中澳人民友谊而在悉尼修建一座中国花园的计划,刘田夫和新州政府都予以支持,并很快确定了具体的建园方案。花园的建筑设计由广州市承担,并委托佛山工艺陶瓷厂烧制建园所需的建筑材料。随后送去琉璃瓦、育砖、中国图案木雕、彩花玻璃等,还特地烧制了两座壁雕双龙壁,并把其中最好的一座送去悉尼。广州还派出儿批园林建筑专家和技工到现场施工兴建。1986年3月16日,新州政府中国花园举行隆重的开工典礼,当地华人社团载歌载舞,龙腾狮跃,鞭炮齐鸣,热烈庆祝。悉尼十多万华侨华人对中国花园的建设,倾注了一片爱心,他们提议将自己捐助的花园取名“谊园”,以纪念中澳两国、两省州人民之间的友好情谊。

广东省人民政府对谊园建造自始至终热情关怀,督促各有关部门具体落实,所派出的专家和技术人员,不仅传授维修技术,而且亲自去新州山区挑选堆砌假山所需的巨石,然后依靠吊车垒砌成具有中国园林传统特色的假山。中国驻悉尼总领事馆也做了许多联络、协调与促进的工作。中澳双方的友好合作,是促成该园顺利建成的重要原因。

谊园位于悉尼市中心悉尼塔脚下,达令港畔,靠近悉尼中国城,跟中国城联成一体,显示并突出了中华文化的多样性。这里东临港湾,碧波万顷,惊涛拍岸,帆影点点,风景如画;西接市区,高楼大厦鳞次栉比,车水马龙,热闹非凡。这座具有岭南园林风格的中国花园,以悉尼的高楼大厦为背景,玲珑精巧,由门庭景点、竹石山房、山涧瀑布、翠峦云阁、山林野趣和侨乡水路六个景区组成。大门门楣上的“谊园”由刘田夫题名,并撰对联曰:“谊结城邦欣好合,园临沧海焕光华。”“谊园”两字已巧妙嵌入其中。

谊园辟地为湖,垒石成山,具有“多方景胜,咫尺山林”,“虽有人作,宛自天开”的中国园林特色。沿湖而行,但见曲径回廊,丝丝垂柳,楼台亭榭散落其间,景色和谐而怡人。在有中国特色的各种花草树木中穿行,香气袭人。最引人注目的是那座仿北京北海公园内九龙壁的壁雕“双龙壁”,两条青黄色长龙浮游于云雾波涛之中,戏夺红宝珠,栩栩如生,色彩鲜艳,为中国琉璃结构建筑中的杰作。人工瀑布从造型奇特、千姿百态的假山中喷涌而出,水声潺潺,使空气更加湿润清鲜。园中心的水体,用五折桥将水而分成两个部分:大明湖和莲花池,碧波荡漾的湖面上白鹅嬉戏,盛开的荷花在轻风中散发阵阵幽香,诗情画意,令人陶醉。莲花池后面是石林“两诗玛”和瑞舫等景点。也许和澳大利亚地处南半球有关,谊园中的立体建筑皆坐南朝北。攀山而上,筑有“梨香荔影双亭”,分立左右,上下接宇,成为中澳两国

人民友好的象征。亭边广植红棉、松树、梅花和丹荔等，百花争艳，红绿相间，美不胜收。由澳籍华人、著名学者刘渭平撰写的亭柱联曰：“创业辟荆榛，市井通衢，瀛海今番新世界；登临遗客思，红棉丹荔，故乡同此好湖山。”既突出华侨先辈饱受折磨、艰辛创业的历程，也寄托着海外游子深沉的恋乡情怀。假山顶上矗立着全园的标志，三重琉璃檐阁——“澄观阁”，此为倚栏听涛景点。游人来此以望，悉尼大桥犹如空中彩虹，高挂万顷碧波之上；坐落子悉尼大桥附近班尼朗小岛上的悉尼歌剧院，宛如一只洁白的海蚌，在海面上蠕动。游人置身阁中，心旷神怡。沿山而下，右侧建有“文轩”，内藏中国历代名家字画。“文轩”之上建有古雅的茶楼，阵阵茶香随风飘荡，游人来此品茗小叙，领略那份难得的悠闲和宁静，乃人生一大乐事。

经过建设者们近两年的辛勤劳动，谊园于1988年1月17日上午正式对外开放。澳大利亚新州政府总理巴里·昂思沃斯和广东省前省长刘田夫共同主持开幕式。仪式开始时，人们敲锣打鼓，鞭炮齐鸣，还跳起狮子舞，为澳大利亚建国200周年的“澳大利亚日”活动增添不少喜庆气氛。是日虽然倾盆大雨，澳方官员、广大游客和华侨华人等数千人仍前来游园，欣赏花园雨景，他们对中澳两种截然不同的文化在悉尼港湾交相辉映称赞不已。谊园建成开放近10年来，连中国到悉尼出访的人员也前去一游。公园的功能也在不断提高和发展，例如不少华人青年在此举行婚礼，来自中国

的花卉展和工艺美术展也常在园内举行。谊园宛如一幅秀丽多姿的园林山水画,镶嵌在南半球的版图上,既是澳大利亚多元文化政策的象征,又是中澳人民友谊的硕果和中澳文化交流的结晶。

### 横滨友谊园

日本横滨与上海于1979年结为友好城市,两地人民之间的友好往来、经贸合作和文化交流不断。1988年2月,上海一园林设计工程代表团应邀访日,经在横滨的调查研究和实地考察后,作为横滨市捐赠上海市西区工人文化宫的回赠,上海应日方要求将给横滨捐建一座友谊园,上海园林设计师连夜修改图纸,受到日方高度赞赏,并顺利签订合同,并于1989年初奠基开工。

中国和日本的庭园都崇尚自然、顺应自然,一切置于自然之中,注意保持自然,利用自然,发展自然,以求得生活的乐趣。日本以自然风景为基础进行艺术创造,追求自然美的园林风格源于中国,具体反映在追求中国园林之美,再现中国园林的布局上。友谊园位于横滨市区本牧市民公园内,建于一小岛上,以日本著名古建筑三重塔、古园三溪园及原有海岸山峦、青松石岩为背景,以湖面为基地,构思巧妙,意境深远,景色秀丽多姿,基本上体现了上述追求自然美的风格。

这座以水面为主体的江南山水园,占地约3000平方

米,其具体设计方案为,以一个小岛和一片小水湾作为建园基地,计有两座建筑物(一厅一亭),两座园门,两座桥和一座石灯笼,以此构成一幅园中有园和湖中有湖的奇特景观。日方特别要求建造一座湖心亭,就像上海城隍庙豫园湖心亭那样。一进一出两座园门为砖雕门楼,门楼对面有



日本横滨友谊园中的九曲桥、湖心亭。

一照壁,壁面镌刻有中日文的园林碑志。碑志全文如下:  
“上海·横滨友谊园是为纪念上海、横滨两市缔结友好城市十周年,由上海市赠给横滨市的。这座友谊园由九曲桥、湖心亭、玉兰厅组成。它反映了中国传统的庭园风格,将成为中日世代友好的象征。1989年4月”主体建筑为木兰堂,

专供休息和展览用,堂前为前庭花园,园内有卵石嵌花地坪,以白玉兰为主体树种,间以樱花、银杏、红枫、腊梅、桂花和垂柳,由青瓦粉墙围成一封闭式花园。大厅对面以白粉墙为背景,以一块太湖石作为立峰,并由松柏等组成一小景,原有的树木垂柳和黑松予以保留。

湖中的重檐八角形湖心亭飞檐翘角,古色古香,与九曲桥连接。桥亭结合,自成佳趣,水中倒影,扶摇欲动,更添无限诗情画意。游人置身园中,既可凭栏观赏园内景色,又可眺望人工湖美景。

灯笼本是僧房的灯具,后来也用于庭园建筑。灯笼源自中国汉代,后来传入日本。奈良时代前期当麻寺金堂前的一对石灯笼,是日本最古老的灯笼,制作于7世纪中叶,灯笼中的蜡烛也来自中国。可见在日本庭园建筑中灯笼古已有之。湖中所点缀的一座中国式汉白玉石灯笼,给静止的碧波以动感,平添千种风情。庭园建筑所需原材料都从上海运来。总起来说,友谊园小巧精致、紧凑,具有飘逸洒脱、情谊连绵的神韵,明显具有上海园林特有的风貌。

经过上海园林建筑工作者3个月的紧张施工,友谊园于1989年4月建成。其时正值上海与横滨结为友好城市10周年纪念,于是双喜临门,给这座美丽的海港城市增添了浓浓的喜庆气氛。开园揭幕仪式于1989年4月28日举行,上海市市长朱镕基出席揭幕式,并为开园剪彩。日本各界人士对这一再现中国江南庭园风光的园林赞不绝口,在



园中细心观赏,留连忘返。友谊园的建成和开放,不但是上海、横滨两市人民友谊的象征,也为中日人民和平共处、世代友好下去作出了应有贡献。

### 泰国智乐园

在泰国首都曼谷偌大的九世王(普密蓬·阿杜德 Bhumibol Adulyeduj 1927— )公园内,分设有七个国家的小公园,即中国、日本、英国、法国、美国、西班牙和意大利园。这园中之园的七国小园,花木扶疏,环境清幽,设计新颖别致,造型奇特有趣,各具本国特色。据说建园目的在于让生活在曼谷的各国侨民节假日前去一游,在本国园中观赏山水景色,领略故国风情,可聊慰思念之情。

智乐园又名中国园,位于九世王园内的东侧,为中国政府特意制造敬献给九世王 60 大寿的贺礼。建园过程中得到了中泰两国人民及九世王的关怀和重视,所有建筑用材料全由中国运来,于 1988 年 11 月 5 日竣工。智乐园中的“智乐”两字取自孔子语“智者乐山,仁者乐水”,寓意为九世王仁爱慈祥,智德崇高,人民安居乐业。这座中国江南园林风格的园中之园,占地 1400 余平方米,分为前庭区、榭坊区和双亭湖石区三个部分。前庭区主要为入口处,庭院地面由卵石镶嵌成海棠蝴蝶花,周围粉墙花窗,院中湖石芭蕉,石桌石凳,竹影摇曳。院内的“绿荫轩”建筑艺术典雅,装饰金碧辉煌,室内陈设有各种中国珍贵文物。“绿荫轩”三字

系中国末代皇帝溥仪之弟溥杰手书。大门两旁有联云：小院回廊春寂寂，浴鳧飞鹭晚悠悠。春意盎然，湖鸟嬉戏的画卷跃然纸上。绿荫轩的南门檐上有檀忆之题写的“钦翠”二字，两旁配对联曰：“镜湖俯仰两青天，万顷玻璃一条船。”波光潋滟，景色如画，美不胜收。

榭坊区由水榭、曲廊和石舫组成。由庭院转入水榭平台后，峰回路转，豁然开朗，湖水、曲桥、双亭和假山等尽收眼底，名为“碧舟”的石舫酷似龙船，椰风婆娑，湖水澹澹，别有一番情趣。在船首的“碧舟”两字旁有联云：“细雨生在水，圆月在舟中。”在诗情画意中给人以很多艺术情趣，同时也会让人想起北京颐和园中的石舫……

在双亭湖石区的小山上，有小巧玲珑的双亭，名为“相映亭”，其亭名由赵朴初先生题写。对称的双亭象征中泰人民友好相处，其情谊绵绵不尽。与双亭隔湖相望有小石桥一座，远远望去，宛如玉带，盈盈湖水，似断非断，流向远方。智乐园成为曼谷市民的游乐场所，终年游人如织。对于泰国华侨华人来说，置身园中，亲近这久违了的中华文化胜景，心中不由会荡漾起思念故国家园的涟漪。

### 蒙特利尔梦湖园

· 蒙特利尔(Montreal,当地华侨华人称“满地可”)为加拿大魁北克省省会,也是一座古老的历史名城。皇家山为最高点,市中心在山的南麓,入夜在山顶眺望,星星点点的万

家灯火,宛如颗颗耀眼的宝石。自从该市与中国上海市结成友好城市后,彼此的交往和联系更加紧密。由该市与上海市合作兴建的梦湖园,位于奥林匹克对面的植物园内,占地2公顷。其名梦湖园,取自蒙(蒙特利尔)、沪(上海)的谐音,象征着两个城市之间的友谊。该园由上海市园林设计院和上海园林工程公司设计施工,于1990年秋动工兴建,并派出50余名能工巧匠精心施工,仅数月时间,一座玲珑剔透的中国江南式园林“降临”北美大地,实在是令人欣喜不已。

梦湖园虽小,但由于采用了一些江南园林的造园手法,加上精心设计和布局合理,故给人以一种园中有园,久看不厌,回味无穷之感。其布局以一泓池水为中心展开,以亭台楼阁、假山回廊、碧水莲藕、粉墙漏窗、池塘拱桥和奇花异草为组合,分成8个景区:鹤舞枫影、亦舫横渡、芳溪静流、平湖晨曦、金莲映日、熙院藏春、澄波叠翠、芝径通幽,各个景区之间既虚实有序,主次分明,步移景转,又相互因借,各具特色,浑然一体。院内的鹤舞枫影照壁,建筑古朴雅逸,壁上的砖雕白鹤、丹枫形象逼真生动。进得梦湖园,但见水光潋滟,散发出一种清心恬静之感,偶尔微风吹来,泛起阵阵涟漪,使人享受到“风乍起,吹皱一池春水”的美感。与梦湖相连的莲湖中,遍植莲藕,每年盛夏,荷叶团团,翠盖簇拥着千姿百态的荷花,轻风中带来阵阵幽香,景色迷人。每当人们登上用当地黄石叠堆成的“武康岭”,只见怪石嶙峋,苍松



加拿大蒙特利尔市梦湖园中的沁谊堂。

舒展挺拔，枝繁叶茂，景色秀丽多姿。被繁花杂树包围的凝霞阁飞檐翘角，古色古香，登阁俯视，园中远近景物错落有致，充满诗情画意。熙院藏春为盆景园，里面曲廊环绕，粉墙前摆放着造型别致的盆景，四季常青，相偕成趣，为梦湖园增添无限艺术氛围。

梦湖园的建设凝聚着中加两国园林工作者友好合作的情谊，经过9个多月的艰苦努力，于1991年6月20日举行了隆重的揭幕典礼。以倪鸿福为团长的上海市政府代表团、中国驻加拿大大使、魁北克省各界知名人士、蒙特利尔市市长多雷等数百人出席庆典。当多雷市长高度赞扬梦湖园的建设成就，并向上海园林工作者表示衷心感谢时，全场

的欢呼声和掌声响成一片。加拿大许多报纸、电台、电视台等,均对梦湖园的建成开放作了详细报道,北美人民竞相前来参观游览,徜徉园中,怡然自得,乐而忘返。当地的华侨华人,更是扶老携幼去观赏来自故国神州的江南园林,以亲近久违了的中华文化风情。加拿大航空公司总经理在游园后留下激动的肺腑之言:“一千年以后的子孙后代也会感谢你们建造了如此美妙的园林。”据不完全统计,开园仅一周,游人就有5万人以上,梦湖园美仑美奂,声名远播。

梦湖园是继温哥华逸园之后的加拿大第二座中国江南园林,梦湖园的建成开放不仅为该市增添了一个著名的旅游观光景点,而且作为一个长期的展示场所,有助于世界各地游客对中华文化的了解,并加深了中加人民的友谊,促进了文化艺术的交流。

## 第九章 孔子学说在世界各地的传播与影响

本章叙述孔子学说的传播与影响,所涉及到的国家有亚洲的韩国与日本,欧美的法国与美国。由于地理上的原因,孔子思想在亚洲的影响较大,而在同属东亚的韩国和日本,儒家思想曾占据过统治地位,其影响就更大。例如,朝鲜以中国传统文化为辐射源,儒学在朝鲜延续 2000 余年,与朝鲜的本土文化相结合后,所形成的朝鲜儒学是朝鲜民族传统文化的骨干和主流。为推行儒学教育,韩国成立有儒道会,而且还保存着李朝时期的乡校,中国的四书五经和诗词歌赋等,也是韩国知识分子的必修课,如今韩国全国性规模的祭孔大典,每年两次,由国家出面举行,场面很大。韩国人还称,世界上祭孔大典能如此完整保持原形的,也仅有韩国一家。

和韩国一样,儒学在中日文化交流史中也占有很重要的地位,中国儒家经典很早就传入日本,儒学被日本统治阶级用来为治理国家和稳定社会服务,振兴儒学成为江户幕

府的政策,日本的许多孔庙也建自江户时代。儒学在日本化过程中,还与日本神道相结合,所形成的“大和魂”成为日本的一种民族精神。如今在日本有许多孔庙,有的还是国家级保护文物,全国许多地方的孔庙,每年均举行祭孔典礼。旅居日本的华侨华人,也坚持不懈,为在日本弘扬儒家文化出力。但孔子学说的巨大影响,不仅限于华侨社会,而且遍及全国各地,植根于全体国民之中。日本孔庙之多,孔子在日本国民心目中的庄严神圣,在世界各地都是不多见的。日本企业界还关注儒学在现代企业中的应用,儒学与现代化的关系问题,也是日本学者喜欢探讨的问题。

作为中法文化交流中的汉学研究,儒学在法国传播的时间很早,早在 17、18 世纪时,来华的耶稣会士,将中国儒家经典翻译成拉丁文或法文。钱德明翻译的《孔子传》在欧洲有较大影响。在巴黎的国立图书馆中,还珍藏着许多有关儒家文化的书籍与资料。但是作为一种汉学研究,儒学在法国仅限于高等学府中少数从事专业研究的相关人员。作为世俗的意识形态和中华传统文化的组成部分,“孔子热”的出现又与法国的华侨华人有关,法国的祭孔大典正是由华人社团联合发起的。

美国是个新兴国家,尽管 19 世纪来华的美国传教士早已开始接触中国儒家经典,但儒学研究的不断深入发展,是在 1949 年新中国成立和朝鲜战争等一系列重大国际事件发生以后,才逐渐展开的。曾经导致科技和工业高度发展

的西方文化,固然为人类社会造福,带来许多好处,也带来许多弊端和危害,甚至使人对西方文化优越论产生动摇,许多有识之士便瞩目于东方文化,试图从中寻找良方,根治或者化解西方高度工业技术文明带来的毒瘤,补救高度工业化社会的种种弊端。于是在西方社会掀起一股小小的“东方文化热”,其中也包括“孔子热”。

儒学在美国的复兴,“孔子热”在美国的掀起,可以70年代为开端,不仅美国国会通过决议,将孔子的生日9月28日确定为美国教师节,而且在纽约的孔子广场上,竖立起孔子的青铜塑像。之后,又有美国华人社团联合发起的祭孔大典。另外,也与生活在美国的200余万华侨华人有关。许多华裔学者,出于寻根意识和文化认同感,从中推波助澜,一腔弘扬儒学的热情,使大海彼岸的“孔子文化热”有增无减。

### 一、儒学在韩国

朝鲜是世界上受儒家学说影响最深的国家之一。在儒家思想价值观的熏陶下,无论是在政治、思想、教育、法律、道德、文化,还是在风俗习惯和社会风貌等方面,都打上了孔子思想的深深烙印。在世界各国的汉文化建设中,除中国以外,影响最深远、贡献最大者亦推朝鲜。兹就儒学各个不同时期在朝鲜的传播、中朝文化交流的具体过程叙述如



下：汉武帝灭卫氏朝鲜后，于其地设置乐浪、玄菟、真番、临屯四郡，任命太守治理政事，并且鼓励四郡与汉通商，进一步加强汉地与朝鲜的交往。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儒学获得空前繁荣与发展，在这种气氛与环境下，儒学传入东邻朝鲜，是件很自然的事情。在高句丽、百济、新罗三国建立之前，朝鲜尚无文字，高句丽建国初期使用的文字是借用汉字。汉字的使用通行，也为儒学传入朝鲜创造了条件。

至于儒学何时、怎样传入朝鲜，并无直接的记载，但儒学在朝鲜传播的情况，见于中国史书记载者甚多。例如《旧唐书》上记载，高句丽人喜学，“俗爱书籍，至于衡门厮养之家，各于街衢造大屋，谓之肩堂，子弟未婚之前，昼夜于此读书、习射。”所读之书有《五经》、《史记》、《汉书》、《三国志》等。《新唐书》也记载，公元738年新罗圣德王薨，唐玄宗派遣邢琬前往吊祭，临行前玄宗对邢琬说：“新罗号君子国，知《诗》、《书》，以卿惇儒，故持节往。宜演经义，使知大国之盛。”说明唐王朝也支持和鼓励儒学在朝鲜的传播与发展。

儒学在朝鲜本国传播与发展状况，记载更多。公元372年以后，三国相继设立太学，教授儒家经典，以汉学为主要内容的高句丽教育事业获得更大发展，7世纪中叶起，高句丽派遣贵族子弟赴唐，入国学，开始直接吸收中国文化。公元735年新罗统一三国之后，向唐王朝派遣更多留学生，837年时在唐的留学生达216人，不少人还参加唐朝的科举考试，这些留学生学成回国后，成为弘扬儒学的一支

重要力量,为朝鲜儒学的兴盛打下了基础。

公元918年建立起来的高丽王朝,虽崇尚佛教,但亦不排斥儒学,高丽太学国子监所授课程仍以儒学为主,而且高丽国王定期在太学举行祭孔活动,倡导儒学,国王还定期到国学去祭孔,以倡导对孔子的尊崇。全国上下,上至国王,下至闾巷儿童,所受的正式教育均以儒家经典为主。公元1134年3月,高丽国王仁宗命令以《孝经》、《论语》等儒经分赐给闾巷儿童,以广教化。

在高丽王朝内做官的一些中国文士,也为中朝文化交流事业作出了贡献,五代后周人双冀即是其中之一。公元956年,双冀随册封使抵高丽,高丽王光宗爱其才,将他留在高丽,并委以重任。958年在双冀建议下设科举,以五经诗赋取士,自此高丽文官被儒生取代。

宋朝与高丽之间,书籍的交流也是友好关系和文化交流的重要内容之一,宋朝皇帝经常赠送书籍给高丽国王,内容有儒家经典及佛经等。在书籍的民间交往中,高丽对一些中国商人所带去价值较高的书籍,还出高价以资鼓励。当时高丽王朝书籍的刊印已非常发达,作为交流,高丽有时也赠送一些书籍给中国。高丽王朝末年时,程朱理学(新儒学)传入,儒学便取代佛学在学术思想界占主导地位。

最早从元朝把朱子学引进高丽者,是安珣、白颐正、禹倬、权溥等一批朝鲜朱子学的先驱。1289年,高丽儒学提举安珣(1243—1306年)随忠烈王访问元朝时,在元大都(今

北京)见到《朱子全书》，认为此书是“孔门正脉”，为此不胜欣喜，立即全部抄录下来，并且还摹写孔子、朱子等人画像，携带回去在高丽传播，又在太学讲授朱子学，“以兴学养贤为己任”。在安珣的组织 and 推动下，荒废许久的儒学很快得到恢复发展，《高丽史》中对此有记载：“禁内学馆内侍三都监五库愿学之士，及七管十二徒诸生，横经受业者动以数百计。”白颐正、禹倬、权溥等或教授生徒，或翻刻经典，从而也为儒学在高丽的发展作出了贡献。经过这些先驱者坚持不懈的努力，朱子学在高丽知识界的传播受到热烈欢迎，获得初步成功。

明初，中国和高丽一直保持着友好关系，两国文化交流仍在深入发展。1370年，朱元璋遣使高丽，颁布科举程式，在所颁的诏书中说：“高丽、安南、占城等国如有经明行修之士，各就本国乡试，贡赴京师会试，不拘额数选取。”同年，高丽也遣使京师，举子朴实、金涛、柳伯濡从行，涛中制科。1372年高丽还上表请求允准派遣子弟赴明留学。

朱熹是两宋理学的集大成者，其理学的核心内容可以概括为一个以“天道——人性——人道”为内在逻辑结构，以理气论、心性论、格物致知论为外在理论框架的“朱子学”思想体系。朱子学在中国思想界确立权威地位的同时，亦跨越国界传播到东方各国。公元1392年朝鲜建立李氏王朝，它以朱子学为理论指导来创制立法和制定内外政策，朱子学受到统治者高度重视，被确立为李朝官方哲学，儒学和

尊孔达到鼎盛时期,儒学与朝鲜文化逐渐融合,成为朝鲜民族文化的组成部分。

朱子学在朝鲜的普及和发展过程中,逐渐产生各种流派,最著名者为诞生于16世纪以李滉为首的退溪学派和以李珥为首的栗谷学派两大性理学派。学派的建立,标志着某一学术思潮日臻完善和成熟。朱熹全面系统地探究理气关系这一性理学基本问题,建立起以理为本体的理气论哲学,退溪学派亦以理气论为其性理学的出发点,论证了理气二物说,反对理气一物说,但又并非理气二元论,但终极仍为本原的主理一元论。该派的另一观点为四端七情理气互发说,肯定情有四端与七情之分。此外退溪学派重视敬的修养功夫,强调敬学的重要性和基本内容。栗谷学派则在朝鲜创立了一个以理气非一非二说,四端七情气发理乘一途说、心境界说等为主要内容,以主气为特征的性理学思想体系。上述两个学派,既创造性地阐发了朱子学,为朱子学增添了一些新的内容,也为朱子学在朝鲜的传播和发展作出了贡献。

在15世纪以前,朝鲜朝野正式退用的文字一直是汉文,目前通行的朝鲜语拼音文字方案《训民正音》是于1443年制定的。由于在制定过程中,朝鲜曾先后13次派出语言拼音方面的学者前来中国辽东,访问明朝翰林学士黄瓚等,共同探讨音韵、发音和表记法,因此《训民正音》的制定,也是中朝文化交流的产物。有了《训民正音》后,中国的儒家

经典、佛经、韵书、诗歌等才逐渐翻译过去。李朝除经常派人在中国采购或向明朝朝廷求赠书籍外,有时也自行刊印许多儒家经典,例如1421年时世宗命印《资治通鉴纲目》,并令集贤殿正其谬误。1428年时世宗又认为学者们不可不知《楚辞》,为此也下令铸字刊印。

时至今日儒学在朝鲜仍为世人所注目,以中国传统文化为辐射源所形成的儒家文化圈,其影响之深广,几乎无处不在。例如,中国的四书五经和诗词歌赋,长期成为韩国知识分子的必修课。韩国首都汉城的一些城楼和佛寺建筑,均是中国古建筑风格。在汉城许多政府机构的会客室、会议室,悬挂汉字书写的条幅,也成为一种时尚,连韩国的歌舞也和中国唐代的歌舞极为相似。

儒学肯定人格的尊严,认为教育就是“使人成其为人”,既要坚持自己人格的尊严,坚持自己的独立意志,又要爱敬别人,互敬互爱,团结合作,以此作为准则为人处世,这在今天仍然非常重要。孔子认为天地之间以人为贵,因此其教育宗旨将塑造人、培养人和提高人放在首位。作为推行儒教的保证,韩国成立起许多组织。例如:儒林组织——儒道会,1945年日本投降后即恢复活动,在全国的道、市、郡以乡校为中心,设立地方支部,全国共有263个地方支部,加入儒道会者达1000万人,约占韩国总人口的1/4。韩国至今还保存着李朝时期的乡校232处,1970年统计时,在分校从事儒教教化者达1万多人。在学校中一般均设有明伦学

院,定期向听众讲解儒家的四书五经。韩国的有识人士认为,通过儒教教化来确定社会秩序和礼仪风俗,保持儒教的传统和礼节,有助于继承历史上的良风美俗,铸造国民性格中以天下为己任的社会责任感。

受孔子思想影响,目前韩国人对教师的尊敬异乎寻常。例如许多年轻人在结婚时特别喜欢请他们的老师来做证婚人,故教师特别忙碌,有的教师甚至在一周内要做几次证婚人。韩国教师出国出人境时,每当海关人员在检查时得知其职业为教师,便特别尊敬和客气。有一位韩国妇女在海关,对检查人员说“我丈夫是教师”,也得到关员的特别礼遇。儒家文化如此深入人心,尊儒重教思想支配社会到如此程度,实在非常难得。

地处东亚的韩国,经济增长较快,为此有亚洲“四小龙”的美称。儒家学说和孔子思想,对他们国家的现代化,对经济发展和社会的稳定,对教育,对家庭道德和人格修养有什么影响,成为许多学者的研究课题。例如韩国釜山大学教授金日坤对此指出:“儒教文化的最大特征是依赖于家族集体主义的社会秩序。”也就是重家族、重群体、重社会、重国家和轻个人的伦理观念,以及忠于国家、尊敬长者、勤劳敬业的道德规范,藉此激发人们的精神力量,为建设一个健全、稳定的社会而努力。

又如成均馆大学东洋哲学系教授、韩国退溪学研究院院长安炳周先生认为儒学对解决社会现实的作用与影响有

如下4点:其一,儒家强调对学问的研究,这对普及教育,扫除文盲是很有意义的;其二,儒家思想对人的道德修养、自我人格的完善,起到积极作用;其三,儒家思想对防止随着社会发展而产生的私欲、利己主义等不良倾向的泛滥和社会思想的堕落可起调剂作用;其四,团体主义、团队精神所产生的凝聚力,使大家做到以社会为家,发挥自己的全部能力,把公事当做私事尽量做好。

如果说上述两位教授的独立见解,仅是高等学府中少数从事研究工作者的专业语言,那么人们在韩国访问时亲眼所见的浓郁的儒家文化氛围,同样给人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例如,在成均馆大学图书馆前厅墙上挂有一块大牌子,上书“博学、审问、慎思、明辨、笃行”10个大字。成均馆大学儒学大学(相当于我国大学中的一个学院)校长李东俊的办公室里,挂有吴道子画的孔子像,另有一幅“学而时习之,不亦悦乎?”的中文书法,还有12幅屏风,上面绘有《圣学十图》。

除此以外,当世界各国旅游者漫步汉城街头时,经常能在墙壁或石碑上见到汉字书写的“见义思利”(在市场经济和商业社会中要力戒见利忘义)、“身土不二”(身在韩国和身为韩国人,一定要专心致志地热爱韩国,把韩国建设好)等警句,给人以很多深刻的启迪。许多学者都认为,亚洲“四小龙”的经济腾飞与儒家价值观的继承发扬有一定关系。韩国三星财团创办人李秉哲说得好:“共荣共存的精神

和相互让步的美德,是解除因瓜葛和对立而纠缠在一起的社会紧张的第一步。吴越尚能同舟,我们还有什么做不到的呢?”这位著名企业家坦然陈言,“对我影响最深的是《论语》。”

### 韩国的祭孔大典

与世界上有些国家将祭孔作为一项旅游资源不同,韩国是世界上惟一真正祭孔的国家。根据史料记载,韩国全国规模的祭孔大典始于高句丽小兽林王二年(公元 372 年),这一极为隆重的仪式在国学文庙举行。朝鲜王国的李朝时代,这一大典在成均馆举行,场面更加壮观。成均馆于太祖李成桂定都汉城后七年(1398 年)设立于汉城东北部的崇教坊(今已更名为明伦洞)。这座以儒教为核心的国立大学,规定校训为“仁义礼智”。校内建有文庙,庙内有大成殿,庙外修建大成路,校门内的两棵参天古银杏树成为大成殿的标志。步入文庙大门后便是拜殿,拜殿右前方设有盥洗位和献官位。穿过拜殿便是文庙的主体结构大成殿,正中是孔子圣像,左右两边为四配像。拜殿和大成殿两侧还有东庑和西庑以及其他一些殿,整个建筑雄浑沉稳,庄严肃穆。

韩国名为“释奠大祭”的祭孔大典,每年两次,时间定在春(农历二月)、秋(农历八月)的第一个丁日。1994 年为孔子 2545 年诞辰,通过汉城的秋祭,人们得以窥其大祭盛况



的全貌，确实令人大开眼界。这一大规模的祭典由国家出面组织，在成均馆大学举行，该大学的校门上大书：“孔纪2545年奉行秋期释奠大祭，主催（主办单位）成均馆，后援（出资单位）文化体育部。”大成殿前阶下摆满了包括总统金泳三、前总统卢泰愚、各部部长、成均馆大学校长等政要的祝祭花篮。在来宾席上就坐的还有韩国各大财团代表、外国使节、汉城市长等，总人数当在2000人以上，确是盛况空前。

上午10时整，一身盛装的献官在盥洗位净手后，站立于献官位，然后唱颂大礼，释奠大祭仪式正式开始，拜殿前16只编钟和16只编磬，和着大小鼓敬奏圣乐，舞女在乐声中表演八佾之舞。整个大礼班子由139人组成，其分工为献官5名、执礼1名、大祝1名、执事27名、乐手41名、舞女64名。整个大祭仪式繁琐复杂，受篇幅限制，实在无法将祭仪的程式一一作详尽介绍。主要的仪式有奠币礼、初献礼、亚献礼、终献礼、分献礼、饮福礼、撤筯豆、望燎礼等8种，整个祭仪历两小时之久。如果说成均馆是韩国祭孔大典主会场的话，那末全国各地同时还设有很多分会场，例如韩国的232处乡校也同时告祭。韩国对儒学的拓展、人民心目中孔子德惠之高、全国朝野所予以的重视、奉祭规模之大、参加人数之多，确实是世界上其他国家无法相比拟的。除此以外，韩国人还称，祭孔大典能如此完全保持原形的，也只有他们一家。

## 二、儒学在日本

儒学在中日文化交流史中占有重要地位。中国儒学在传入“一衣带水”的邻邦日本后，深深扎根于日本社会土壤，不断生长发育，成为日本民族历史文化中的一枝奇葩。中国儒学东渐日本，最早是以朝鲜为媒介开始的。相传日本应神天皇 15 年（公元 285 年），百济博士王仁赴日，献《论语》10 卷与《千字文》1 卷，应神天皇之子稚郎子拜王仁为师，学《论语》、《千字文》，此为儒学经典传入日本的最早记录。自应神天皇至推古天皇的 300 年间，一大批以《易》、《书》、《礼》、《春秋》等儒学经典为中心的中国古代思想文化，经朝鲜半岛逐渐传至日本。

自公元 7 世纪开始，中日两国因互派使者而打开了文化交流的直接通道，日本直接吸取中国的先进文化，因而于公元 600、607、608、614 年先后四次派出遣隋使。<sup>①</sup> 在最后一次派出遣隋使后 4 年，隋灭亡后，又有遣唐使之举，中日两国之间由于一方可能，另一方需求，故中国文化源源不断向日本流泻。遣唐使自公元 630 年至 892 年，前后共 19 次，历时 260 余年，许多遣隋使、遣唐使、留学生、学问僧等，在中国如饥似渴地学习中国文化，回国时又带回许多文化用品

---

<sup>①</sup> 一说公元 600 年那次遣使，非圣德太子所派，仅是某地方政权所派，故遣隋使只有三次。

和儒家经典。

在奈良时代到平安时代前期的所谓“律令时代”，在日本意识形态的各个领域，受中国唐朝影响相当明显，例如公元645年发生的大化革新，从其酝酿到发动，始终在儒学思想支配下进行。虽然这一改革运动也经历了纷繁而复杂的斗争，但基本上完成了一系列以唐朝为模式的政治改革，既充分借鉴唐朝典章制度，又依据日本具体的历史及国情特点，有诸多变通和损益。后来又颁布了一系列意在维护封建统治的成文法，如根据儒家“百行孝当先”的说法，在公元757年的敕语中，学习中国唐玄宗的做法，“令天下家藏《孝经》一本，精勤诵习”。还令地方官推荐孝子，对不孝者要予以流放。文武帝大宝二年（702年），颁大宝令，学生必须通一经二经，经分大经（《礼记》、《春秋左氏传》），中经（《毛诗》、《周礼》、《仪礼》），小经（《周易》、《尚书》、《孝经》、《论语》），均须兼通。儒学在日本已由最初的传入进入到实际应用的阶段。

9世纪末日本停止派遣遣唐使，不久北宋王朝建立，封建王朝的更迭也并未使日中文化交流中断。日本的许多学问僧来华，或探讨质询，或抄写经典，或搜购内外典籍，宗教文化活动成为文化交流的纽带。南宋的学术思想界在继两汉经学、魏晋玄学、唐代义疏后，产生了由周敦颐、程颐为开端，朱熹集大成的程朱理学（日本人称为宋学）。后由中日两国禅僧互访为桥梁，宋学开始流入日本。由于宋学是融

佛教、道教等构成的一种思想学术体系，故传入日本后也儒佛一体，为统治阶级治理国家和稳定社会服务。在日本讲习宋学的热潮中，由玄惠法印首开讲席，传授程朱理学，开启日本宋学研究之风。而《四书》和训和点的出现，更使日本的宋学讲习趋于兴隆。在宋学日益日本化的过程中，逐渐形成了日本自己的宋学学派——朱子学派。早期的朱子学派分为四大派，即博士公卿派、京师朱子学派、萨南学派和海南学派。

明代时宋学进一步在日本传播。室町幕府末期（约 15 世纪末 16 世纪初）萨南学派创始者、日僧桂庵玄树，于 1467 年随遣明使入明参禅，在华滞留 7 年，回国后倡导宋学，在九州的萨摩刊行朱熹的《大学章句》，这在日本还是首次。宋学只局限于禅僧中间的局面有所改变，逐渐开始向地方渗透。15 世纪中叶时宋学已成为日本思想界的一大势力。17 世纪初所建立起来的德川幕府（1604—1867 年），统治 260 多年，日本国内承平，文教大盛，并将朱子学确定为官方哲学，一时读《论语》的人益多，研究《论语》的学人也益多。黄遵宪在《日本国志》卷 32《学术志》中所记日人之作，有关《论语》的书有好几种。近人丰田穰所编《日人研究〈论语〉著作目录》，所列的书共 90 种。幕府以朱子学长期服务于武家政治，以此作为巩固幕藩体制的精神支柱，自此日本各地相继建造起很多孔庙。

明末遗臣朱舜水（1600—1682 年）在中日文化交流史上

曾作出过特殊贡献,他在日本 23 年,热衷于传播中华文化,先后在江户、长崎、水户藩、加贺藩等地讲学,广收门徒,传播儒家经典,介绍中国服制、礼制、官制、学制和科举制度等,对日本文化界、思想界产生过深刻影响。朱舜水学术理论中的“经简而史明,经深而史实,经远而史近”的儒学史观,认为读史有裨于治道。受此影响,水户藩主德川光国开始设立水户彰考馆,组织人员编写《大日本史》,朱舜水出任修史顾问。

朱舜水在传播中国思想文化的同时,还把自己所掌握的工艺技能奉献给日本人民,他编写了《学宫图说》,为德川光国设计的学宫图纸,包括文庙、启圣宫、明伦堂、尊经阁、学舍、进贤楼、廊庑、射圃、门楼、墙垣等建筑物,结构复杂,造型别致。今日位于东京汤岛的圣堂(孔庙)等建筑群,就是按此模型建造的。朱舜水还按照古典图样,指点匠师制造各种祭器,教授他们实行祭孔典礼,这就为日本进行较规范、正统的祭孔大典奠定了基础。

儒学在日本化过程中,与日本的传统思想融为一体,逐渐凝聚成日本的民族精神“大和魂”。儒学的日本化是指把中国儒学加以改造,使之与日本神道相适应、相结合,用于治世。儒学与神道相结合成为日本武士道的根基。“大和魂”成为一种日本的民族精神,日本的国民性深受这种儒学的薰染,儒学对日本学术文化的影响遍及各个领域,特别是在江户时代,武士和庶民都受到儒家道德的强化教育。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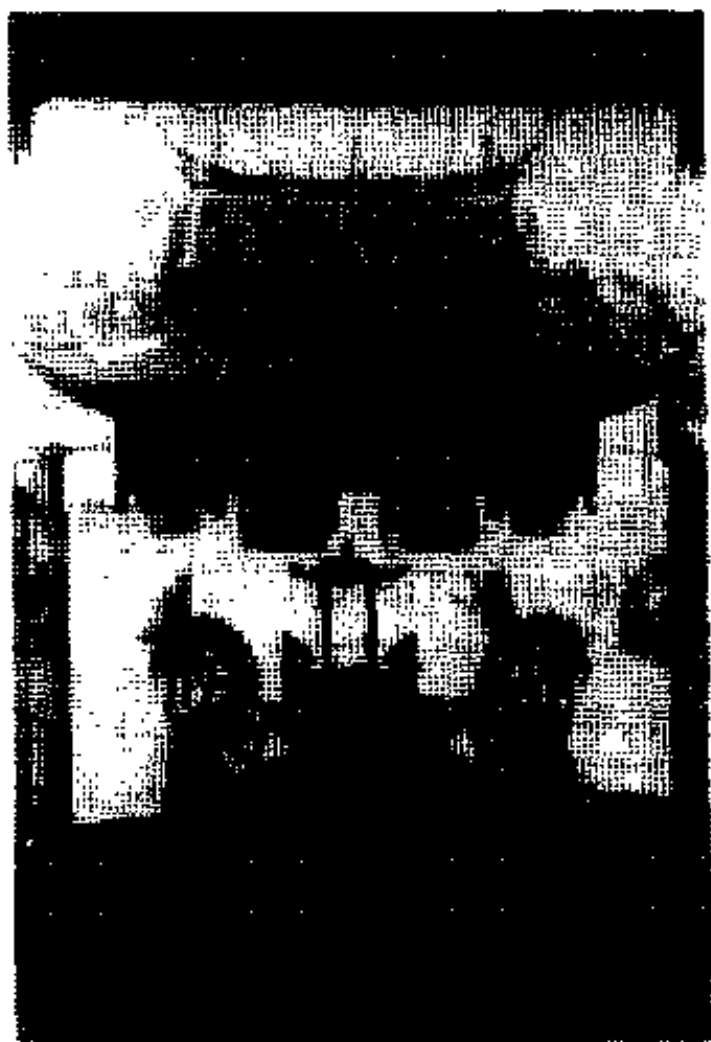
治维新后儒学曾一度失势,但不久又被恢复,在道德教育方面占统治地位。由德川光国编纂的《大日本史》,实脱胎于孔子的《春秋》和朱熹的《通鉴纲目》。幕府末期的日本学者吉田松阴,深受中国阳明学影响,在“开国倒幕”运动中,提出了中国传统的“尊王攘夷”口号,起到了团结革命力量的作用,从而动摇了幕府统治的根基。在日本的其他领域如音乐诗歌、文学创作、绘画等方面,儒学影响也随处可见,深受中国文化浸润。

### 日本的孔庙

日本的孔子庙,有的称“圣堂”,有的称“学校”,有的直接叫孔子庙,学庙一体,既是孔学庙,又是学校。日本大力普及儒学,目的是利用儒学为政治服务。据不完全统计,目前在日本各地存有孔子庙 30 多座,主要的有长崎孔子庙、冲绳孔子庙、名古屋孔庙、东京附近的汤岛圣堂、栃木县足利学校、闲谷学校、佐贺县多久孔庙、水户孔子庙、弘道馆孔子庙、会津藩校日新馆等。

日本孔庙的历史短长不一,但大部分建自江户时代。振兴儒学是江户幕府的政策,例如位于足利市的足利学校(孔庙),创建于 1668 年,大门悬挂的匾额“学校”两字,系由中国明代文人蒋龙溪书写,内有入德门、杏坛门,正殿为大成殿,内供孔子坐像、四配木主及学校创办人和德川家纲的神位,每年春季祭祀。庙中还收藏有《周易注疏》、《尚书正

义》等中国古籍。冈山县的闲谷学校位于群山环抱、风光旖旎的翠谷之中，系 300 多年前当地一藩主为在庶民中普及教育、以儒教改善民风而创办的学堂。校内设有孔庙、家庙、讲堂、宿舍等，孔庙门前有两棵楷树，高大挺拔，根深叶茂，这是中国山东曲阜孔林中特有的树木之一。如今这里已成为冈山县的青年教育中心，以学习孔子的《论语》为主，每年



日本孔子庙。

来此接受短期轮训者达 3 万余人，儒学对于日本人的精神的形成产生了巨大影响。位于东京附近的汤岛圣堂，建于德川幕府之前。为了表示对孔子的敬意，便将孔庙所在地用孔子家乡（昌平乡）的名字来命名，称为昌平阪，孔庙又名昌平圣堂。该堂中所供奉的孔子木像系明朝遗臣朱舜水（1600—1682 年）东渡日本时带去的。

日本冲绳中国古称琉球，在历史上与中国一向有着较多的经济文化联系，因而在其首府那霸市留有诸多中日文化交流的史迹是很自然的，孔子庙即是其中之一。最初的孔子庙正式名称为久米圣庙，又叫文庙，始建于1647年，殿堂内奉祀至圣先师孔子神像。光阴荏苒，岁月不再，300多年的风雨侵蚀，使它难免衰败废颓之厄。1973年中日邦交正常化之后，旅日华侨中眷恋故土家园的情感越发强烈，于是由福建籍移民后裔捐款7000万日元重建孔庙。于1975年1月落成的冲绳孔庙占地约400坪，呈正方形，四周围以石墙，大门上方悬挂着“至圣庙”门匾。殿堂正中供奉着“大成至圣先师孔子”神位，左右两边安设颜子、曾子、思子、孟子四配位像。在正梁高处还高挂着一块由陈立夫先生题赠的“万世师表”的匾额。大殿左右两侧分别建有天尊庙和明伦堂，以此作为奉祀关帝和聚会之所。

在日本所有孔庙中，规模最大和知名度最高者，当推长崎孔子庙。在长崎市的大浦町，除了孔子闻名遐迩外，还有早已闻名的华侨学校——“时中学校”，以及建于80年代初期的“中国历代博物馆”。由于这样，大浦町以长崎市内的“中国缩影”而出名，并成为介绍中国文化的旅游景点，无论是导游的小册子，还是市区街道的分布图上，都有专门介绍。

长崎孔子庙兴建于1893年，在建庙的同时，也奠定了



长崎各华侨组织之间团结合作的基础。1905年又在孔庙中建立了以弘扬中华文化,教育华侨子弟为宗旨的“时中学堂”(后更名为时中学校)。1945年8月9日,美国原子弹轰炸长崎时,孔庙也遭到破坏,房屋结构变形倾斜,庭院荒芜,满目苍凉。1967年9月,长崎华侨曾发动全九州国籍华侨力量进行修葺,但未如人意。80年代时又组织力量重新修缮和装饰,并得到了北京市长城工业公司和山东曲阜市的大力协助,获得由国内提供的许多琉璃瓦、石栏杆、雕龙御道石、石翁仲等建筑材料,始有今日庄严雄伟的中国式庙宇。

从大成殿后面出来,经过一座石桥,便是中国历代博物馆。这座三层楼的现代建筑是于1983年孔庙建立90周年时建造的,于当年10月14日揭幕。尽管长崎孔庙和中国历代博物馆都是由日本华侨经营管理的,但中国儒家思想在日本渗透很深,孔子学说影响很大,不仅仅限于华侨社会,而是遍及全国各地,植根于全体国民心中。日本孔庙之多,在日本国民心中的庄严和神圣,确实给人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这诚如李约瑟博士所说:“世界上任何地方都没有像中国的孔庙那样具有神圣化的意义。”

位于福岛县的会津藩校日新会取名于孔子《大学》中“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句,该校始建于日本后西天皇明历二年(公元1657年),1664年时改为稽古堂,变为专授儒学的教育机构。此馆的建筑风格仿中国山东曲阜孔庙,中

为大成殿，殿前为半圆形的洋池，两旁有各种馆舍，里面不仅供奉贤儒像，而且设置尚书殿、毛诗殿、三礼殿、习书殿等，是教授儒生学习的地方。该馆后毁于戊辰战争（1868年），1986年重建。新馆内孔庙大成殿中的孔子像，颜、曾、思、孟四配像以及所居神龛、殿内的礼器、乐器等均特仿曲阜孔庙形制，由中国北京、曲阜等地名匠精制而成。新馆在祭孔时的祭文内容也有德侔天地，道冠古今，删述六经，垂宽万世等内容。祭孔仪式中的三献礼、佾舞也模仿中国。

佐贺县的多久孔庙始建于18世纪初叶的德川时代，距今已有270余年历史，为日本国家级保护文物。该庙于1989年由国家投资进行修建，历时两年，于1991年秋竣工。多市一向以拥有孔庙而感到自豪，就连市政府印制的信封上也带有孔庙标志。

### 日本的祭孔大典

日本孔庙中最重要的活动就是祭孔，通过祭孔来表达对孔子的尊崇，通过祭孔来增强本民族的精神力量，以建立起一个健全和稳定的社会。尽管孔子的《论语》早已被日本人广泛阅读，但日本的祭孔典礼最初见于日本古代史书《续日本纪》大宝之年（701年）条下。《续日本纪》称：“文武天皇大宝元年二月丁巳，释祭”，并注“释祭之礼于是始见矣”。在律制中还作出具体规定：“凡大学、国学，每年春、秋二仲之月上丁，释祭于先圣孔宣父。”也就是说每年的春、秋二祭

定在二月和八月初的丁日举行。

所谓释祭,即是中国古代学校流传下来的一种典礼,陈设酒食以祭奠先圣先师。中国的祭孔大典,历代相沿成习,但亦有一定变化。汉代时主要祭祀周公与孔子,或者祭祀孔子与颜回。唐代时祭祀对象扩展到孔子及孔门 10 哲、72 弟子、22 贤人。例如唐玄宗(712—756 年在位)时祭孔已正规化,封孔子为王,取代周公先圣地位,两旁 10 哲东西并列,72 弟子配祀。先圣先师祭祀,以孔子为中心,祭孔的一套礼仪就此被沿袭下来。

由于日本的祭孔沿用中国唐制,故常在宫廷内的大学寮举行,主要祭祀至圣先师孔子及颜回,以及闵子骞、冉伯牛、冉仲弓、宰子我、端木子贡、冉子有、仲子络、言之游、卜子夏等孔门九哲。日本祭孔自奈良时代大宝元年起延续 3 个世纪,至摄关时代的宽弘二年(1005 年),尚有释奠的记载,其仪式有“拜先圣先师”、“命献题作文”等。但自室町时代以后这种祭孔仪式渐趋衰亡,至江户时代初期,随着儒学的勃兴,祭孔礼再次盛行起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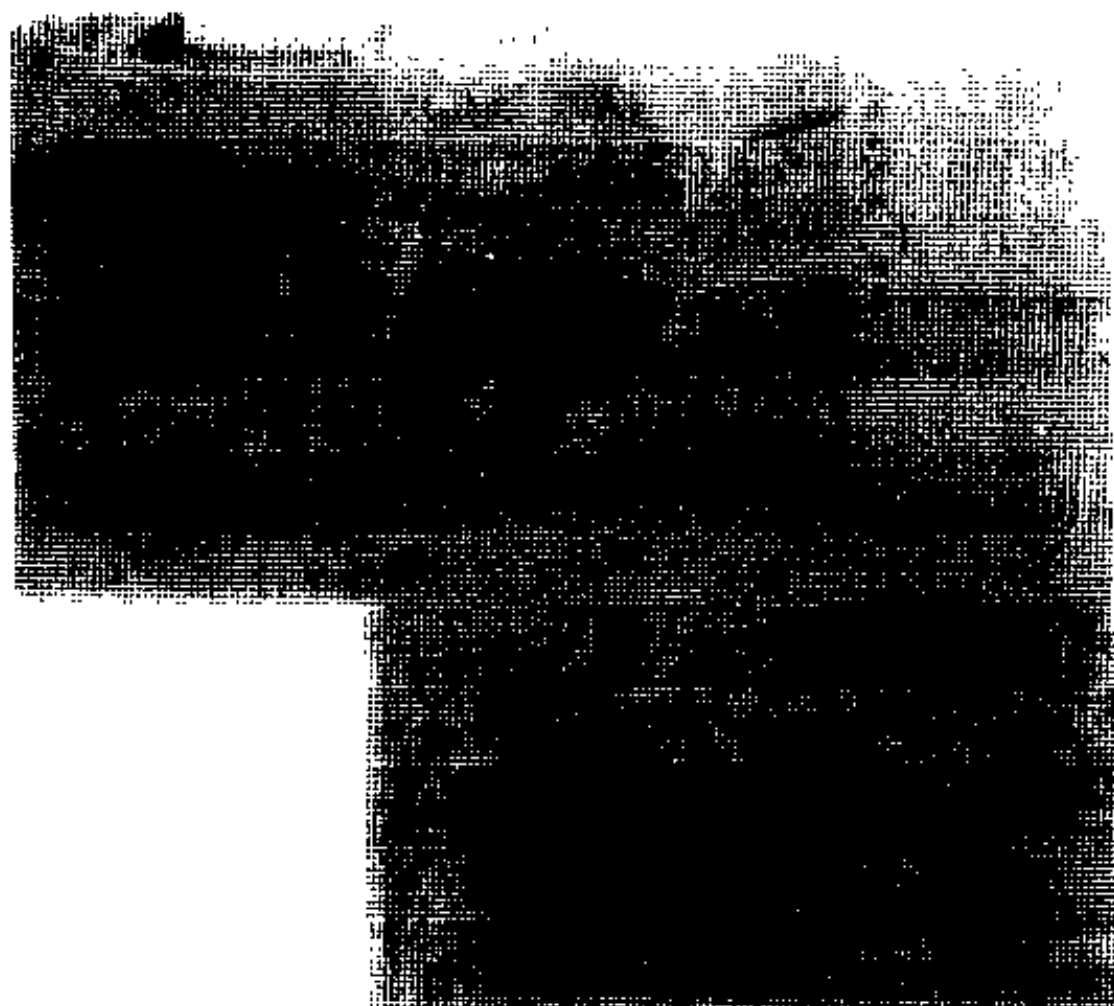
日本孔庙中开始有祭孔大典的时间,因地而异。汤岛圣堂自德川时代起每年举行祭孔典礼,香火鼎盛。从 1907 年 4 月起,仿照中国春祭惯例,定每年 4 月为祭孔节,1941 年祭孔时的祭文为“道配天地,德并日月,风教普及东亚”。

日本的多久市每年 4 月和 10 月举行祭孔,分别称之为“春祭”和“秋祭”。1991 年的秋祭由于加上该庙修复的落

成典礼，故更显得热闹隆重，先后有 7 万余人参加庆典。佐贺县知事和一些高级官员、中国驻福冈总领事和孔子家乡的山东曲阜市市长房立泉、孔子 77 代嫡孙女孔德懋女士等也应邀参加这一庆典。

1991 年 10 月 20 日，由多久市百崎素弘市长率领的 20 多名市政府官员，身穿中国明代服装主持“秋祭”仪式和新庙落成典礼。多久孔庙前那块两米多高的大石碑特别引人注目，上面所刻写的“孔子世系谱”相当具体详细。从孔子到儿子孔鲤、孙子孔伋一直到孔子 76 代衍圣公即孔德懋女士的父亲孔令贻以及她的胞弟孔子 77 代孙孔德成等全部网罗无遗。日本对儒学研究的深入和资料之丰富，由此可见一斑。

祭孔大典在和谐悠扬的“雅乐”声中举行，人们向大成殿的孔子像行跪拜大礼，整个仪式历时 40 分钟之久。作为孔子的嫡系传人，孔德懋女士成为庆典注目的中心人物，她在平台上向成千上万名观众发表演说：“看到孔庙修葺一新，我非常高兴，这是对孔子的尊敬和对文物保护的重视，我作为孔子后代感到欣慰。我衷心希望多久市人民今后托孔子的福，生活幸福，繁荣昌盛。”随后孔女士将一幅“孔子行教像”赠送给多久孔庙。礼毕许多人争相和孔女士合影留念，有位老人当即跪在孔女上面前说：“见到您就如同见到孔子一样。”还有一位妇女抱着刚满周岁的孩子让孔女士摸顶，以此祈求圣裔的祝福。由此充分体现出孔子学说的



上图:1993年9月,日本长崎市孔庙举行  
该庙创建100周年纪念庆典。

下图:孔子后裔、华人华侨社团领袖举行祭孔大典。

伟大和日本人民对孔子的尊崇之情。

自1986年起长崎孔子庙恢复了祭孔典礼,即每一年在孔子诞辰纪念时,孔庙依照古代的礼仪程式举行祭孔盛典。1993年秋,正值世界文明史上的文化巨匠孔子2544周年诞辰,也是长崎建立孔子庙100周年暨中国历代博物馆开馆

10周年纪念,为此长崎各界华侨、本地官员和居民等600余人举行了盛大的庆祝活动。祭孔按照古代仪式进行,祭坛前特别安放一座原在长崎圣堂的约30厘米的孔子像。9月28日下午2时开始的庆典活动,由120余名身穿中国古典服装的青年男女作为游行队伍的先导,他们或擎旗,或捧香,或持各种古代礼器,或举孔子塑像,一路上燃放鞭炮,敲锣打鼓,众多市民在路旁围观,充满着节日的快乐气氛。特意由国内派来参加这一盛典的沈阳杂技团也献艺助兴。

下午4时许,祭孔典礼在孔庙内开始举行,整个典礼由24项仪式组成,即1、鼓初严(开始大鼓),2、鼓再严(二次大鼓),3、鼓三严(三次大鼓),4、正献官就位,5、启扉(开门),6、瘞毛血(献牺牲),7、迎神,8、鞠躬,9、进饌(进供品),10、上香,11、行初献礼(献酒),12、恭读祝文,13、鞠躬,14、行亚献礼(二次献酒),15、行终献礼(三次献酒),16、饮福受胙(撤下牺牲),17、撤饌,18、送神,19、鞠躬,20、捧祝帛诣燎所(送走供品),21、望燎(以目送),22、复位,23、阖扉(闭门),24、礼成。

庆典过程庄严肃穆,使人们沉浸于伟大孔子学说的最高境界之中。晚上,在中华料理“四海楼”举行盛大的庆祝酒会,以中国国务院侨办副主任李星浩为团长的祝贺团成员,长崎市市长本岛等出席,东京、横滨、函馆、神户、长崎、福冈、鹿儿岛等地旅日华侨总会的会长或副会长,也出席了这一盛大的庆典活动。由祭孔大典的盛况可见,儒家思想

作为一种民族文化形态,至今仍影响着日本社会的各个领域,仍然有着生命力。这正如美国著名学者、日本问题研究专家埃德温·赖肖尔所指出的那样:“今天,几乎没有一个人认为自己是孔教徒了,但在某种意义上来说,几乎所有的日本人都是孔教徒。”

孔子学说在亚洲的影响有如上述,行文至此,本可打住,不料近又获信息,在素有亚洲“四小龙”之称的新加坡,对中国传统的儒家思想异乎寻常的重视。内阁资政李光耀指出,儒家思想的道德价值和伦理规范,是建立一个健全和稳定社会的两大要素。孔子儒家思想讲求中庸之道,注重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同时更重视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的“五伦”,是中国传统思想的主流。今天的政府已不再由封建王侯掌管,政府的职权范围也扩大了,因此君臣有义、政府与人民之间的关系必须重新定位。

鉴于 2000 多年前的孔子学说,对当代人的思想修养仍有巨大现实意义,新加坡从 1994 年至 1995 年底,已前后将两批孔子语录作为公众教育广告,布置在 40 多个地铁站月台上,在 16 条地铁隧道里还有更大的孔子语录海报。饱含人类智慧与哲理的孔子学说广告,其内容以修身养性和治国之道为主,每条语录下面均有相应的英文注释。这样做是在注重形式、赶时髦因素驱使下的花架子,还是实实在在、重视国民教育的一种投资,令人深思。

### 三、儒学在法国

在儒学向法国传播的过程中,法国传教士起过很大作用。与一般的史籍相比,中国的经学更深奥难懂,但又是了解中国文化的基础。法国耶稣会士中造诣更深者都试图将中国的部分经书翻译成拉丁文或法文,例如马若瑟、孙玮都译过《诗经》,韩国英译过《大学》、《中庸》,蒋友仁译过《书经》、《孟子》等。钱德明(1718—1793年)1750年奉派来华,通晓满、汉语言,在北京居住40余年,除翻译《乐经·经传》外,其儒学著作有《孔子传》和《孔门弟子传略》等,前者对欧洲的影响很大。孔子思想传入法国后,在法国启蒙运动及其法国大革命中,成为法国思想家和政治家的精神武器。儒家也强调人与人之间的团结合作,即所谓“人和”。“爱人者人常爱之,敬人者人常敬之”,这样可以达到人和,树立起做人的典范。

在欧洲国家中,法国的汉学研究起步较早,且人才济济,成果较多。法国是较早开始搜集中国古籍的国家之一,早在本世纪30年代时,仅巴黎国立图书馆所珍藏的各种刊本、写本汉籍已达10000多册。丰富的中国古籍收藏,为法国的中国研究提供了大量资料。20世纪前半叶,对汉学贡献最大的汉学家沙畹(1865—1918年)在中国史学研究中,翻译了《史记》,并对《礼记》、《周礼》、《书经》、《左传》等也颇



有研究。在对中国的考古考察中,他来到山东研究泰山的封禅碑刻,瞻仰了孔孟庙堂并凭吊了太史公陵墓。沙畹的3位弟子伯希和、马伯乐和葛兰言,在汉学研究中也有成就,例如在葛兰言的一部综合性著作《中国思想论》中,论及儒、墨、道、法各派,认为儒家学派重在增进人民幸福。

在中国直隶省河间府献县从事汉学研究的顾赛芬神甫(1835—1919年),在对孔子的宗教观研究中指出,孔子并非是宗教领袖,也并未创立宗教,孔子思想在抵制宗教在中国的影响方面起了重大作用。这一肯定儒学非宗教的观点,至今仍得到世界上许多国家学者的赞同。鸦片战争以后,即19世纪和20世纪,作为法国对中国文化侵略的一部分,法国的儒学研究逐渐衰落下来。当代法国对孔子思想的研究,主要为设在巴黎大学的中国学研究所,这些研究及其所取得的研究成果,对于促进法国人民对中国的了解和推动中法文化交流,都具有积极作用。

### 法国华人的祭孔大典

作为一种学问,孔子学说在法国的流传和影响,仅局限于高等学府中从事专业研究的极少数人,作为一种世俗的意识形态和中华传统文化的组成部分,又局限于华人社会。法国华侨华人的祭孔大典始于1987年,发起人为詹剑青老先生及其儿子詹致远,由多个侨团联合举办。1987年9月28日,适值中国古代教育家、思想家孔子2538年诞辰,法国

华裔互助会、法国潮州同乡会及旅法的部分艺术界人士，在巴黎十三区新世界酒楼集会，隆重纪念至圣先师诞辰。在詹剑青、詹致远的先后致词中，盛赞孔子倡导教育的思想，呼吁各华人社团推崇中文教育，弘扬中华文化。同时，他们还要求巴黎的侨团能团结合作，相互支持，在巴黎逐渐创办几所正宗的中文学校，把孔子学说中的精华发挥出来，使优秀的中华文化在异国他乡发扬光大。

大会在庄严肃穆的气氛中举行，来自比利时的沈德光先生有感而发，即席为孔子诞辰赋诗曰：“儒家学说远流传，道德文章宏史观。孔教今朝播海外，开来继往有渊源。”旅法华人画家、微雕家戴顽君先生，为缅怀先人和勉励后者，题写了“忠恕仁爱”四个大字。

法国华人的祭孔大典每年一次，受上述良好开端的鼓舞，祭孔规模逐渐扩大，内容更加充实，仪式更加庄严隆重。参加者除华人以外，还有不少在巴黎的法国汉学家。例如，第4次祭孔大典于1990年9月28日晚间，在巴黎最大的中餐馆白天鹅大酒楼举行。会场布置得古色古香，在“纪念孔圣”的四个金边红字中间，竖立着孔子的大幅画像，几十位应邀与会的法国汉学家在大会开始之际，随大家一起向孔子圣像行三鞠躬礼。詹剑青先生在演讲中呼吁法国华侨华人同心协力，发扬孔子的仁爱思想，在白手起家、自立自强、勇于开拓的同时，必须兼顾传统文化和伦理道德，为把孔子学说推向全世界，实现一个精神上的大同世界而努力。会

上还决定在巴黎设立中法孔学研究会、基金会,并为创办正规的华文中小学而努力。

法国华人每年的祭孔大典,后来由欧华文化交流协会作为一次重大的会务活动,每年在孔子诞辰前后举行,参加者除华人社团领袖、侨界名流外,还有中国驻法国大使馆官员,以及不少学者。中国大使馆官员对欧华文化交流协会弘扬中华文化所作出的努力,对其促进中法文化交流所作出的贡献,给予了较高的评价和很多鼓励。大家在孔子圣像和“忠恕仁爱”、“信义和平”条幅下,重温孔子天下为公、世界大同的至善境界。一些学者就儒家思想在亚洲的复活、孔子思想对个人修养、处事、治国影响、儒家思想对中医理论的影响等问题发言,具有一定的学术探讨气氛。

### 四、儒学在美国的复兴

儒家学说所创造的华夏民族的精神文明,其流传时间之久,浸润范围之大,确实没有其他学说能与之相比。孔子思想文化中的哲学、教育、德育、艺术等方面所留下的大量珍贵遗产,对全世界都有持久而广泛的影响,对此美国普林斯敦大学牟复礼教授说:“没有人像孔子对一个文明具有如此持久的影响及贡献,担负了那样重要的历史角色,是人类经验中所罕见的。”

如果说 13 世纪马可·波罗东方游记的问世产生了欧洲

## 儒学在美国的复兴

---

以儒学为基本内容的汉学研究,后来又以 18—19 世纪外国传教士来华达到高峰的话,那末从二战以后,1949 年新中国成立和朝鲜战争等一系列重大国际事件发生后,世界研究中国的重心开始从欧洲转移到美国。二次大战爆发时,整个美国设有中国或亚洲问题研究的大学仅 5 所,如今,美国研究中国的机构和学术团体已有好几百个。《美利坚百科全书》为孔子列有专条。书中详细介绍孔子的生平思想,高度评价了孔子在中国和世界历史上的地位,称赞孔子是一位卓越的思想家、改革家、教育家、哲学家和中国古代的圣贤。可以这样说,美国学术界权威性的孔子观,均已浓缩在这一专条中。英美合编的《新不列颠百科全书》“儒学”专条长达 4 万多字。近年,美国出版的《人民年鉴手册》将孔子列为世界 10 大思想家之首。随着美国经济重心的西移,太平洋战略地位的突出,“工业东亚”与“社会主义东亚”经济的起飞,使越来越多的美国人对东方文明,特别是对儒家文化有了新的更高层次的认识。

尽管自 50 年代起,美国国内的儒学研究不断深入和发展,但对孔子学说的推崇和孔子文化在美国的复兴始于 70 年代,是配合欧美追寻另外一种精神出路的需要而形成的。美国在工业化以后,人们在财富不断增加的同时,也出现了物欲横流、道德沦丧的社会弊端,人与人之间缺乏一种可以相互沟通道德人伦的境界,而儒学正好可以弥补此中不足,提供一个解决问题的方向,于是儒家思想引起西方的重视,

美国的儒学研究热火朝天。生活在美国的 200 多万华侨华人中,教授、学者、科学家等饱学之士不计其数,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儒家思想与孔子文化得以在美国多元文化土壤里生根发芽,这与广大美国华人承先启后、长期坚持不懈地承传和弘扬分不开。儒学在美国复兴,“孔子热”在美国兴起,70 年代是个重要时期。

### 孔子生日——美国的教师节

儒教教义和儒教文化在美国也有较大影响。孔子教育观中的一些精华,如以德育为本,平民教育,首创私人办学,主张行在文先,因材施教,教学相长等,都值得提倡。孔子的教育宗旨为:第一,天地之间以人为贵,故教育最重要的在于塑造人、培养人和教育人;第二,教育具有广泛性,学校教育与社会教育,自我教育与他人教育等,都在教育思想之内,而自我教育更重要;第三,教育的教学作用在于指导学生自学,在自学过程中指点其方法,解除疑惑。孔子所编定的《诗》、《书》、《易》、《礼》、《春秋》等,成为人们长期使用的教科书,他的一些学说和主张,被后人不断丰富和发展,几千年来成为中华民族之根,历万古而长新,成为东方文化的象征。在联合国大会上,孔子被尊为世界文化名人,居世界十大思想家之首。孔子所确立的一些价值观念既属于中国,也属于世界。

为了继承和发扬孔子的教育思想,1970 年时美国加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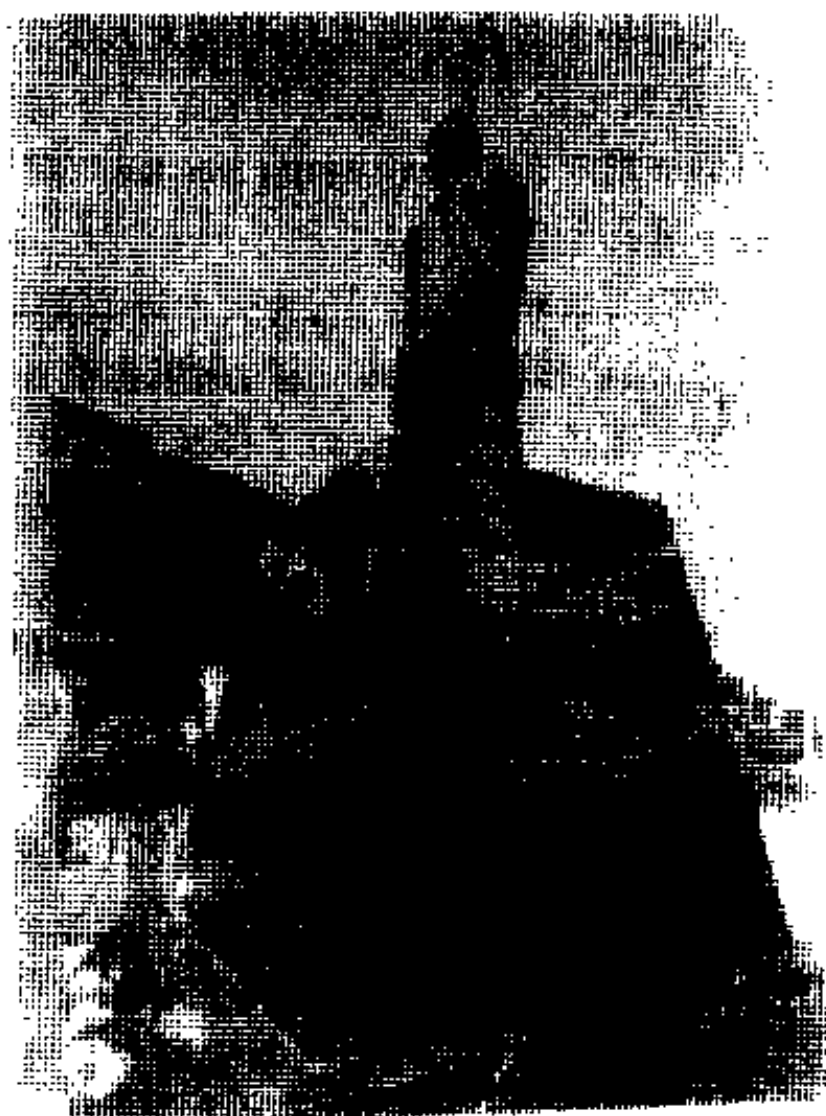
圣大卡拉县、圣荷西市有人提议，将每年孔子诞辰的9月28日定为教师节，圣荷西市在该年还付诸行动，率先组织教师在该市公民大会堂举行纪念仪式。1973年9月6日和7日，美国参众两院通过H·L·RES677号联合决议，规定每年9月28日为教师节，通令全国人民开展纪念活动。从此以后，中国孔老夫子的诞辰，也就成为美国广大教师的“万世师表”。

### 美国的孔子塑像

纽约不仅有美国最大的华人社区，而且华人的各项文化活动开展得有声有色，华人社区在发展过程中始终与自己的文化发展相联系。70年代时正值美国立国200周年，作为敬献给美国人民的礼物，纽约华人在华埠中心竖立起一尊孔子铜像，迄今已成为纽约唐人街的一个旅游景点。铜像位于100多平方米的孔子广场上，立式的孔子青铜塑像高1丈8尺，在大理石的基座上刻有金字的“礼运大同篇”：

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已。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

其座上还镌刻有“纽约华人为庆祝美国建国 200 周年纪念敬献孔子铜像以隆盛典，纽约中华公所谨志，1778—1978”字样。孔子广场还背倚着一幢高达 44 层的孔子大厦，共有 3000 余间客房，附近还有一所容闳小学和一个商业点。



这位生于春秋鲁国的文

位于纽约华埠的孔子纪念像。

化先师，越过 2500 余年的历史时空，随华人移民飞渡万里关山，来到美国纽约，昂然屹立于华埠的孔子广场，接受千千万万人的顶礼膜拜，在充分展示其古代东方文明的同时，也为人们解除困惑和提高道德修养提供了有益的借鉴。来自世界各地的炎黄子孙到此一游都会感到无比骄傲。

美国华人对孔子思想日渐成为人类思想宝库中的精神财富,感到无比自豪。在纽约竖立孔子像的 20 多年后,美西加利福尼亚州的圣荷西市(San Jose)潮州会馆门前也竖立起一尊孔子像。

圣荷西市毗邻旧金山,为美西新兴的高科技工业城市。和旧金山、洛杉矶等城市一样,那里也有一个不小的华人社区。为了弘扬中华文化,为了使那里的华人能够瞻仰这位“至圣先师”,至少已经竖立起两座孔子像。其一是在圣荷西市中国文化公园的山顶上,立有一座高达 30 余英尺的孔子铜像。孔老夫子形象栩栩如生,系出自雕塑艺术的名家之手;其二是由青岛市政协惠赠的一座孔子座像,已于 1995 年初运抵美国圣荷西市,并安置在该市潮州会馆门前。由青岛市雕塑家徐立忠先生设计雕凿而成的孔子像,像高 4.5 米,重达 14.5 吨,用整块山东莱州花岗岩雕成,雕像底座上的碑名由青岛市政协主席杨在茂用篆书题写,孔子生平则由书法家高小岩书写。雕塑作者以传统装饰性雕塑为基调,手法简洁洗练,造型明快,使双目微合、神情凝重、衣袖宽大、双手合放胸前的孔老夫子像栩栩如生。有了这尊形象较为标准的孔子像,圣荷西市人民瞻仰孔子圣容更为方便,见像思敬,其祭孔活动的开展也将更加有声有色。青岛市政协赠送给美国人民的这件礼物,又为太平洋彼岸美国华人社会的“孔子热”添了一把火。



## 美国的祭孔大美

美国华人社会弘扬儒学的热忱,对孔子文化的现代价值进行的多方面多层次的开掘,为世界文明发展提供了借鉴,坚持了孔子学说中以仁为价值取向、保持个体人格尊严和目标专一的追求,藉此指导人生,在美国谋求生存发展,推动中美两国文化交流,这是导致在美国华人中出现祭孔大典的主要原因。

1982年8月,正值孔子2533年诞辰,美国第一届祭孔大典在美国旧金山举行。祭孔大典分为两个部分,第一部分是8月27日晚上,旧金山各华人社团在皇后酒楼举行了盛大的祭孔公宴,并欢迎来自台湾的孔子77代孙孔德成(孔德懋女士胞弟)前来参加祭孔大典,美国教育部副部长比林斯先生向孔德成颁发了“学无止境”奖状,他在即席演说中认为,在美国举办祭孔大典时,美国社会应关注如下三件事:其一,是伟大学者孔子的智慧;其二,中国人的崇尚教育已有悠久的历史;其三,教师是这个社会中最有价值的资产之一。

这次祭孔大典的第二部分——祭孔典礼于8月28日上午在旧金山金门公园音乐厅举行,1000多人出席庆典,并观看了这美国有史以来的首次祭孔大典。一幅巨大的孔子像悬挂在祭台中央,横幅上写着“至圣先师”字样,更增添了大厅内的肃穆气氛。供桌上排列着各种鲜果,三只巨碗

内盛放着牛、羊、猪，代表三牲。两只火烛台和一个香炉安放在香案上，大小不一、形状各异的乐器放在前台两边，开阔的舞台中央便是舞蹈队的演舞之处。

上午 10 时整，祭孔大典正式开始，在敲响三通后，乐师和舞蹈员就位，各个执事各司其职，陪祭者、分献者和正献官分别到位，乐队开始奏“宁和”之乐，主祭者点烛上香，开始三献礼的仪式。行初献礼和分献礼时，舞蹈员开始跳六佾舞。奏乐停止后，由执事读祝文，全体来宾起立向孔子像行三鞠躬礼，此时乐声又起，在“安和”乐声中，正献官和分献者行亚献礼。在行终献礼和分献礼时，乐队则演奏“景和”之乐。三礼献毕，各界代表前去上香，然后撤班，舞蹈员和乐师离台来到台下两侧，在各界代表致词后，钟鼓齐鸣，整个大典结束。

对子这次祭孔大典，美国政府予以高度重视，当时的美国总统里根在致祭孔子大典筹备委员会主任委员朱先生的信中说：“际此庆祝孔子 2533 年诞辰纪念，我们尤应缅怀与推崇这位思想家的贡献。”贺信还说，“孔子所倡导的伟大的伦理道德思想，不仅影响了他的国人，也影响了全人类。孔子学说世世代代相传至今，为世人留下了为人处世的原则。”美国加利福尼亚州还宣布该年 8 月 23 日——28 日为“尊孔周”。

1983 年 8 月 26 日，美国的第二届祭孔大典在旧金山举行。由于有了首次祭孔大典的经验，故准备工作更加顺利，

考虑更周详,例如这次大典时所表演的仿古舞蹈,水平更高,博得了一致好评。在这次祭孔大典上,来自美国各地的华人社团和世界各地的代表,提出了如下两项建议:其一,吁请美国国会通过,规定每年9月28日为国定教师节,全国放假一天,并在学校教室内悬挂孔子像;其二,为进一步弘扬孔子学说,增进福祉,应在旧金山设立孔子庙,创立孔子大学或孔子学院等文教机构,俾使美国的祭孔大典由旧金山而推广到世界各地去。

1984年10月27日在洛杉矶举行的美国第三届祭孔大典,无论其规模和水平,均超出前两届。这次祭孔大典具有如下三个特色:一是组成了一个庞大的筹备委员会,设有主席团、顾问委员会、执行委员会等,均由侨界领袖和社会知名人士担任。秘书处则抓日常具体工作,整个筹备工作扎实有绪。二是捐弃前嫌,力求团结。海峡两岸长期分裂和对抗,华人移民的强烈祖国政治取向情绪,是造成美国华人社会不团结的直接原因。因此这届祭孔大典的宗旨规定,加强各华人社会的联谊和团结,不分新侨旧侨,不论来自中国大陆、台湾、香港、东南亚等地的新移民与留学生,均在热烈欢迎之列,使这次祭孔大典真正成为海外华人社会和睦团结、充分展示中华文化的盛会。三是增加项目,使祭孔大典的内容更加丰富多彩。除了原有的祭孔典礼和祭孔公宴以外,增加了孔子学说论文比赛、学术座谈会、优秀教师的评比选拔、出版祭孔特刊、举办文物、图书、书画展览、孔子

铜像奠基典礼、文化之夜联欢活动、宴请代表团酒会、各界华人社团座谈会等多项活动项目,使祭孔大典在古朴、祥和的学术氛围下进行,整个庆典过程成了弘扬孔子文化的盛大节日。

祭孔大典的开展,不但是美国华人社会的一件大事,也是儒学在美国复兴和中美文化交流中的一件大事,自此以后,孔子学说在美国的影响更加深入人心,这正如美国第三届祭孔大典执行委员会主席顾衍时先生所说的那样:“实际上,美国有的东西也是学了我们的。美国加州议会把9月28日(孔子诞辰)定为加州教师节,这一点我们应该感到光荣。……中国是人类文化的发祥地之一,山东又是孔孟的故乡,对孔子思想的精华,我认为更应该继承发扬。”

之后美国每一届的祭孔大典,情况大致差不多,例如全美华人第四届祭孔大典,自1985年11月1日起在纽约陆续展开。在2日举行的“孔子学说座谈会”上,张隆延、熊玠、陈庆教授等先后发言,来自台湾的孔德成先生亦与会。1—3日还在孔子大厦联谊厅举办了文物书画特价展。11月3日在容闳小学大礼堂举行的祭孔大典,孔德成成为主祭人,大典后举行了宴会。1989年纪念孔子2540年诞辰的美国第八届祭孔大典,于旧金山南湾的狮子城举行,中外来宾200余人出席庆典,布什总统不但发来贺电,还专程派代表前往参加。布什总统在贺电中盛赞孔子哲学思想和伦理规范,孔子学说已成为人类生活的价值基础和能够接受的一

种伦理思想。儒学中的仁爱、调和、世界大同的思想，儒学中的不尚虚华、力倡求实等等，都能给个人的道德思想提供有益的借鉴，在多元文化背景下，可能会成为一个对未来人类所面临挑战有发言权的学说。

“未来人类文化犹如一幅镶嵌画，儒家思想就是这幅镶嵌画中的一颗光亮夺目的瓷片。”这是杜维明教授对儒学发展前途的理解，也是给儒学在美国这个多元文化社会中的一种定位。世界各地“祭孔热”的出现，证实了李约瑟博士的预见：“这位鲁国圣人的思想影响似乎开辟了以前想像不到的广阔天地。”

## 第十章 千年茶香飘五洲

### 一、中国茶文化的内涵与特点

中国是茶的故乡,不论是原产地、最早发现茶的用途、饮茶、人工种植茶、制茶等都从中国开始。中国的茶文化历史悠久,千年飘香,名扬海内外,不但是中华文化中的奇葩,亦是世界文明的组成部分。什么叫茶文化?茶文化是中华传统文化的一个分支,包含着哲学、宗教、艺术、伦理及社会观念等极其丰富的内容,是在数千年的饮茶历程中,积淀、培育出的以茶道为核心的茶艺、茶礼、茶德、茶寿、茶客、茶室、茶题的精神,以及在各阶层人民中表现出来与茶相关的众多文化现象。它是物质文化与精神文化两者巧妙结合的产物。

中国茶文化的发展历经数个朝代,并不断补充、完善才最终形成,因而具有非常丰厚的文化底蕴,既包括儒家中庸、内省、亲和、凝聚的严谨伦理思想,又包括佛家的崇定、

苦寂、内敛的宁静出世观，还有道家的五行和谐、返璞归真的神秘自然论色彩。茶艺中所贯彻的儒、佛、道各家的深刻哲理和高深思想，“三分解渴七分品”，表明饮茶的解渴和醒脑作用已退居次位，饮茶不仅是人们相互交往的手段，也是增进休养，助人内省，使人明心见性和回归自然的方式。

尽管有些人不喜欢“茶道”两字，想用“茶艺”来代替和概括“茶道”，但接受者似乎不多。“茶道”一词始见于唐代封演的《封氏闻见记》，其本意极为简单，仅仅是茶店很多，投钱取饮，非常方便。而陆羽在《茶经》中对饮茶的器具和环境、茶艺、茶事都有具体论述，人们便以《茶经》作为茶道诞生的标志。茶道具具体可指茶艺与茶德等精神和茶的礼仪相结合，使饮茶人通过茶对精神的作用而得其道，悟其理，以求得物质与精神，人类与自然，主观与客观之间的和谐统一。用现代语通俗点讲，茶道是以饮茶为契机，营造一个高雅、宁静、谦让、融合的环境气氛，讲究物质享受与精神修炼两者兼融，追求天地人三者合一的身心活动仪式。自茶道风行，深入到人民生活中之后，便逐渐产生出宫廷茶文化、文人士大夫茶文化、道家茶文化、佛家茶文化、市民茶文化、商业茶文化以及各种各样茶的礼俗与习惯。尽管层次的高低不齐，内容丰富多彩，表现形式不同，但以茶雅志、以茶会友，以茶敬客，都体现了茶道精神。

茶文化与其他文化相结合，社会派生出许多与茶相关的文化，例如文人学者饮茶作诗、作画，茶与艺术结缘，民间

出现茶歌、茶舞、茶戏等,于是出现了茶文化与茶艺术,很早就在国内外流传。例如日本早在14世纪中叶时就有描写茶室环境的小诗,日本嵯峨天皇的弟弟也留有“散怀”的茶诗。英国大诗人拜伦写有《绿茶女神》的诗句,英国玛丽女王的宫中技师于1700年作有《茶桌诗》,伦敦一画家还有名为《茶桌的愉快》的茶画,法国文学家彼得·安顿·马特斯作有《茶颂》诗,一位美国诗人也于1873年12月16日创作了一首《波士顿》爱国诗,以纪念“抗茶会”百年纪念。限于篇幅,上述咏茶诗歌的创作背景、具体内容及其艺术成就等,都只能一笔掠过而不作介绍。围绕着普通的茶叶,竟会在国外形成如此丰富多彩的专门文化艺术现象,这在中外文化交流史上实不多见。

在茶文化的故乡中国,其茶谚、茶故事、茶诗、茶歌、茶舞、茶戏就更多了。甘肃人民出版社1986年曾出过《饮茶诗话》一书,内详载中国历代咏茶诗话,所选诗文以诗词为主,颇受读者欢迎。著名电影演员赵丹曾为湖南省茶叶研究所创作茶画,郭沫若也在品茗时诗兴大发,即席赋茶诗一首。老舍先生的名作《茶馆》在戏剧舞台上获得很大成功,展现出多姿多彩的市民茶文化风貌。湖南民歌《挑担茶叶上北京》粗犷豪迈,充满阳刚之气,颇受欢迎。《采茶扑蝶舞》融歌舞于一体。反映浙江采茶人劳动生活情趣的《采茶舞曲》,是用越剧曲调编成的越歌,音调轻松优美,悦耳动听。





流行于中国民间的采茶灯舞。

中国茶文化中渗透着中华传统文化的精华。我们的祖先早已发明创造了一套茶文化体系,并非是渴了就喝,一喝就完,而是饮茶有道,茶中有艺,讲求精神,而且流传下来许多茶艺形式。例如朝廷会试有茶礼,寺院佛诞有茶宴,民间结婚夫妻行茶礼,节庆时开茶话会等。尽管有些茶礼程式过多,令人不胜其烦,但其中所表达出来的精神仍然被接受,世代相传,主要是体现了秩序、仁爱、敬意与友谊。

中国寻常百姓家的开门七件事,即“柴米油盐酱醋茶”,只有茶备受青睐而列入“文化”行列中,并渗透到人民日常生活之中,全国每一角落,不分东南西北中,都有饮茶习惯,以茶待客,以茶会友,以茶为礼蔚然成风。茶在由最初的药用、食用到饮用的过程中,逐渐拓展为祭品、贡品和礼品,以及用茶来解毒、降火、明目养神等自然秉性的同时,还发现

和挖掘茶的社会与精神属性。例如,茶的先苦而后甘,具有先苦后甜,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韵味。茶的不可移植与人类白头偕老的传统美德,茶开花时籽尚在树与人类的母子相依和数代同堂的伦理,茶的清纯淡雅和朴实无华与人类的淡泊宁静思想等,都有着许多一致性。此外茶也是高寿的象征,日本人活到一百零八岁称为“茶寿”。因为据传“茶”字头上的“艹”为二十,下面的“余”为八十八,上下相加得一百零八。饮茶长寿是千百年来的传统观念,文人学士常把茶称作仙浆、琼浆、玉液,赞美常饮茶、多饮茶可使两腋生风,长生不老,上天成仙。由此饮茶深得全国人民的喜爱,并被尊为头号“国饮”。

中国人从一开始便把饮茶提到很高的品位。伴随着茶肆、茶坊、茶寮、茶楼、茶馆的出现,茶建筑也成为一门专有学问,特别是现代的茶楼和茶艺馆,其建筑风格,装潢布置,桌椅茶具等都有一定要求,即要竭力营造一种古朴中透着清雅、宁静中含有温馨的氛围,又要讲究意境和效果。至于选茗、蓄水、备具、烹煮、品饮等程式,也要体现美学意境。如今中国南方广州等大城市流行的“喝早茶”,又名粤式饮茶,生意红火,大凡亲友欢聚、家庭共享天伦之乐、恋人相会、老朋友聚旧、商业谈判等常在茶楼举行。据说做生意很累,在茶馆里细细品尝,口留余香,其味无穷,烦躁和忧思顿消,这种体闲方式远比喝酒和唱卡拉OK放松,有些生意也常在轻松愉快的茶桌上拍板成交。作为传统饮料的茶,与

人们血脉中的文化渊源一脉相承,也许在某一时期,某些国民曾醉心于异域文明的体验——喝洋酒、咖啡和可乐等,但只是暂时的和局部的。如果置身于上海一家高雅的茶艺馆里,那飘洒在空气中的阵阵茶香,悠悠的古琴乐音,使人的心灵立即为之宁静。茶馆是中国特色的休闲场所,在这现代人制造出来的古意里坐上半天,沉浸在这份难得的安静里,对物欲横流,精神匮乏,易生焦虑浮躁之心的都市人来说,不啻是一种可遇而不可求的境界。茶不仅是物质,更是一种精神力量。

中国茶文化走向世界,又是国际间经济、文化交流的重要内容。在国际交往中,茶成为国礼,是一种友好的象征。例如中国国家领导人给西哈努克国王送茶叶,江泽民同志曾陪英国伊丽莎白女王到上海豫园喝茶。当年基辛格博士为打开中美关系大门来到中国,就喜欢喝龙井茶,当周恩来总理送给他的茶叶被部下瓜分一空后,还直言不讳地又向周总理要茶叶。茶文化必将把中国人民与人为善、注重友情、热爱和平的精神,传播给世界五洲人民。

文化向来是没有国界的。作为一种文化交流现象,中国茶文化的精神与思想不仅向周边国家流泻,占领了整个东亚文化圈,而且在15世纪以后又传到欧洲,传向世界各地。今天,无论是亚洲、欧洲、非洲(如摩洛哥)、拉丁美洲(如巴西),其植茶技术皆源于中国,东方各国今日的茶道、茶礼和茶德,如日本崇尚“和敬清寂”,韩国推广“和敬俭

真”，新加坡的“和爱谦静”等，提法虽然不同，但均和中国茶文化有渊源关系。中国茶飘香世界各地，茶事在国际的勃兴，也与现代人为求得内心沉静、师法自然、自视强身健骨的世界潮流相合相应有关。

## 二、日本茶道——中国茶文化的分支

在今陕西省扶风县城北 9 公里处的法门寺，创建于东汉，为唐宋时期的皇家寺院。1987 年 3 月，在清理寺塔时发现了地宫天井，除从中发现数枚佛指舍利外，还发现了一批唐代文物珍品，其中有一套由鸿雁纹茶槽子、团花银碾子和天仙鹤纹壶门座茶罗子组成的鎏金茶具。说明我国唐代时用茶先把茶叶碾碎、筛细，再用水调成糊状饮用。这就是“吃茶”的原意。而日本茶道至今也保留“吃茶”的方法，足见茶道与我国唐代“吃茶”之间的渊源关系。

据记载，公元 8 世纪时，正值日本奈良时代（710—794 年），一批又一批日本遣唐使者来华，出于憧憬中国文化，唐朝的大量文物传入日本，茶叶、种茶、制茶方法也传入日本，当然也带去了中国的饮茶习俗和文化风尚。不过此时传入的茶仅供药用。平安时代的第一阶段（794—894 年），日本有位梵释寺的和尚永忠，参照中国唐代的煎茶技术，奠定了日本的制茶和饮茶方法。在和中国交往后的相当一段时间内，日本人的饮茶习惯并不普遍。公元 1192 年，日僧荣西

(1141—1215年)再次去中国研究佛经,返回时带回茶籽并种植成功,所撰写的《吃茶养生记》两卷,宣传饮茶有益,称茶为神圣药品,有养生延寿之功。以此为契机,至镰仓时代(1192—1333年),饮茶风气渐渐传人民间,以饮茶为时尚之风逐渐在禅僧、武士及公卿中盛行起来。

进入幕府时代,日本高僧村田珠光按照唐代饮茶方式,创立和式(日本式)茶道,为此村田有“茶道大师”之称。最后由村田的第三代弟子千利休(1521—1591年)作改进完善,形成了今日日本的天道,并规定了附加设施,如洗手盆、踏脚石、矮墙、条凳和厕所等。1990年3月28日,为千利休逝世400周年纪念日,在日本掀起了一个声势浩大的弘扬茶道精神,追溯茶道源流的热潮。中国茶文化传入日本后有一个特点,即从一开始就被视为一种艺术,显得万分尊贵,只有皇族、僧侣、官僚和文人雅士才能品饮。中国文化在日本人眼中具有特殊的地位,他们对中国文人的茶艺形式无限崇拜,并刻意模仿,历久不衰,一直保存到今天。

日本茶道的发展演变,迄今已有几十种流派,每个流派都有师家,千利休的子孙们继承下来的分为三宗,即表千家宗、里千家宗和武者小路宗,世称“三千家”。今日人数最多的流派有表千家、江户千家、石川千家、远川千家、千宗言等。尽管流派很多,但操作方法与规矩程式大同小异。明治维新以后,茶道打破了只有男人才能点茶的习惯,女性也开始学习茶道,并成为日本妇女的一种必修课和有教养与

身份的标志。当今日本茶道人口据说有 700 万之众，茶道已经成为日本国民的文化形态之一。

日本茶道的基本精神是恬静和朴素，在百忙中挤出片刻闲暇，以达到千利休所提出的“四规”：即和、敬、清、寂。和——提倡和平友好，体现自然人与万物之间的和谐关系；敬——尊敬长辈，朋友晚辈间平等互敬；清——洁净幽静，心平气静，以纯净无垢的心灵面对世界；寂——大自然永恒的寂灭，通过茶事与大自然化为一体。简言之，要求人们在茶室中饮茶时进行自我反省，彼此沟通，于清寂之中清除内心尘垢和彼此的芥蒂，以和敬为目的。

茶道崇尚环境幽雅，陶冶心情。茶师沏茶时的一招一式都有严格规范，使用的茶盘、茶罐、茶碗和茶勺等都极讲究，富于艺术性，饮茶者的服饰、语言、神态、坐立、接物也有一定要求，主客间互相鞠躬致谢，和蔼可亲，彬彬有礼。上茶时（或称让茶）女主人双手捧起茶碗，轻轻转两圈，将碗上的花纹对着客人，送到客人手上。客人接茶后不能急着饮用，必须先举碗过额，再端起茶碗细细观赏碗上花纹，再转着碗慢慢品茗。饮茶时时饮时停，还须啜啜有声，表示由衷赞赏主人的好茶。客人多时必须传着喝，在“传碗喝茶中”，一碗浓茶要传 3 至 7 人。

整个茶道过程需 4 个多小时，主客跪行数次，每位客人的行礼超过百次，其程式的繁复由此可见一斑，看似相当累人，但据说茶事后，主客都因难得的高级艺术享受、灵魂得

到文化洗涤而满意而归，久久难忘。茶道靠这种方式代代相传，不仅在国内作为讲究礼仪和陶冶性情的手段，而且已发展成为外交上的重要礼仪。需要说明的是日本民间的普通老百姓并非是这样喝茶的，故茶道也只是一种精神仪式。

日本民族一向以善于吸收外部思想文化著称，在对外来文化经过改造、补充后，巧妙融合，使之逐渐日本化。日本在将中国的植茶、制茶、饮茶技艺、茶道精神引进后，又根据自己的民族特点加以吸收整理，并以一种崭新的形态出现，为此也常使我们在惊讶之余，会产生一种茶道是否来自中国的疑问。日本茶道延续了我国饮茶艺术的某些部分，是中国茶文化的分支，中国茶文化与日本茶道是一种源与流的关系。

### 三、摩洛哥的薄荷茶

穆斯林禁止饮酒，其他饮料也不大饮用，饮茶却断不可少，因此茶成为人们日常生活中除吃饭以外的第二必需品。西北非地区人民以食牛羊肉为主，且气候炎热，饮茶有助于去腻消食，又能解渴祛暑，故茶叶需求量很大。早在中国元朝时他们就知道了中国茶叶，这与伊斯兰著名旅行家伊本·贝图达有关。

伊本·贝图达于1304年出生在摩洛哥丹吉尔一个穆斯林法官家庭。伊斯兰教规定，穆斯林一生中至少必须前往

## 摩洛哥的薄荷茶

---

麦加圣地朝觐一次。1325年,22岁的贝图达只身登上了朝觐的行程,外部世界的风光令他惊叹不已,由此萌生出当旅行家的愿望。1346年7—8月间,这位伊斯兰旅行家来到中国泉州,开始了他在中国的旅行,后又去广州、杭州等地,受到中国官吏、商人及侨居中国的穆斯林的热情欢迎和款待。贝图达对中国城市的建筑特式,人民生活习俗和某些政治制度等,均仔细观察了解,这些都给他留下了新奇而美好的印象。后来他将自己在世界各地旅行的所见所闻撰写成书,即著名的《伊本·贝图达游记》。

贝图达在游记中也详细记述了中国人用茶待客的礼仪,并带回茶叶茶树。早在中国明代时摩洛哥已从中国输入茶叶,在该国东北部的非斯城博物馆里,陈列有中国明代的陶瓷,并绘有各式山水画,此为随茶叶一起装箱运去的。摩洛哥直辖市卡萨布兰卡(即达尔贝达)便是倾卸进口茶叶的最大的港口。

摩洛哥人的日常生活离不开茶,在各城镇中漫步,茶叶店随处可见,茶壶、茶杯、茶盘等各类茶具品种繁多。摩洛哥人家中,几乎都有铜茶壶及茶具,有的还涂上银,讲究的茶壶,精美的大茶盘,别致的糖缸,都是饮茶时精神享受的一部分。热闹街市中的茶棚、茶室鳞次栉比,生意红火,在人流中可见手托锡盘来回穿梭的小伙子,盘中有茶壶一个及几只杯子,这是为茶客送茶或收杯时的忙碌景象。茶棚中炉火通红,大铜水壶冒着热气,老板娘抓一把龙井茶叶,



挖一勺白糖,拿一些薄荷叶放入壶中,兑上开水后在火上一滚,便送到茶客桌上。这种茶芬芳甘甜,且能提神,深受欢迎。举行茶会时的气氛热烈,常点燃檀香,边品茗边聊天。在宴会上主人常以茶代酒,敬茶时十分隆重,饭后还有请客人饮茶三道的习惯。每逢大的国宴、招待会和婚丧喜事,都必须备有中国茶,这已成为当地风俗。摩洛哥人最爱喝中国的绿茶,所需茶叶历来都从中国进口,茶叶成为国家的重要进口物资。许多居民家庭也常把大部分收入用于茶的消费。摩洛哥人的一句俗语为:“饮茶想到中国兄弟”,代表着和平与友谊的茶叶,成为摩中两国人民间的友好纽带。

### 四、中国茶文化在欧洲的传播

在西方正式有中国茶的记载始于元代,成书于13世纪末的《马可·波罗行记》(又名《东方见闻录》)中,详细展示了中国和亚洲的情况,还盛赞东方中国的富庶,同时还详细记载了从中国带回去的瓷器、通心粉和茶叶等。从此中国茶渐为欧洲人所知和向往。中国茶叶输入欧洲是从17世纪初开始的,这与世界资本主义的发展和殖民主义掠夺政策有关。1602年荷兰东印尼公司成立,随后其海船来到印尼爪哇,不久又来到中国澳门,将中国绿茶运回欧洲。1367年英国船只直接来广州运回茶叶,相传此为中英茶叶贸易之始。此后不久,欧洲的瑞典、丹麦、法国、荷兰、西班牙、葡

葡萄牙、德国和匈牙利等国，每年相继都来中国运回不少茶叶。

茶叶初到欧洲，人们对这种饮料相当陌生，经历过相当长的熟悉和适应过程，据说 18 世纪初时有人对茶叶还心存疑虑。此时正好咖啡也逐渐传入欧洲，人们对这两种饮料的看法也不尽相同。据说瑞典国王古斯塔夫三世（约 1771—1792 年在位），为弄清茶叶和咖啡的可靠程度，从狱中找来两个死囚作试验，如若同意作试验，可免一死。于是两人中一人每天喝咖啡数杯，另一人饮茶数杯，结果两人均安然无恙，喝茶者还活到了 88 岁。试验的成功不但使中国茶为广大欧洲人所接纳，而且还使它的传播范围越来越广，影响越来越大。

### 俄罗斯的饮茶之风

原先的俄国地跨欧亚两洲，本文的论述仅指欧洲部分。在欧洲国家中，最先得到中国茶叶的是俄国人，早在中国明穆宗即位之年的隆庆元年（1567 年），两个哥萨克人就在中国得到了茶叶并送回俄国，又向本国介绍和报道茶树及茶的新闻，此为俄国有茶文化记述的开端。明万历四十六年（1618 年），中国使节又以少量茶叶赠送给沙皇。伊利莎白女皇（1741—1762 年）在位时所建立的私人商队来往于中俄之间，专门运送茶叶，供宫廷和贵族享用。这支通商队一般由 200—300 匹骆驼组成，每匹驮 4 箱茶叶，路上要行走 16

个月左右。由于运输艰难,故茶价昂贵,饮茶者只局限于王宫贵族。

鸦片战争后,沙俄在中国得到了许多贸易特权,1850年左右开始在汉口购买茶叶,俄商还在汉口建立起砖茶厂,1886年时“有70艘俄国汽船从汉口运茶至黑龙江”。除此以外,欧洲太平洋航线与中国直接通航后,俄国敖德萨和海参威港,与中国上海、天津、汉口和福州等航路相通,俄国商船队相当活跃。后来俄国又增设了几条陆路运输线,加速了茶叶的运销。俄国还专门在汉口、福州、九江、宁波等地设立茶行,兴办茶叶加工厂,沙俄购买华茶的数量也在不断上升之中,例如到1890年时,俄国购茶数量已超过英美,居第一位,1894年已高达中国茶叶输出总数的40%,1916年达68%。和当时的英国、美国等殖民者一样,沙俄也伴随着大规模的茶叶贸易,对中国开展血腥的殖民掠夺。他们在福建兴办工厂,利诱中国人将锡兰茶末混入中国茶叶中制造红砖茶,并和张家口、天津等地的俄侨俄商形成运输网,运往俄国销售,但半数转卖蒙古,掠夺外蒙经济利益。俄国茶行也派人直接去产地设栈收购,压级压价,残酷剥削茶农。他们违背了平和、礼让、亲敬的中国茶文化精神,在从中国取走大量强身甘露后,留下的是暴力、掠夺和残忍。一些学者认为“西方只能吸取中国茶的物质力量,而很难吸收中国茶的精神”,看来是有道理的。

随着华茶源源不断的输入,俄国的饮茶之风逐渐普及

到各个阶层,茶叶开始成为俄国人的主要饮料,19世纪时出现了许多记载俄国茶俗、茶礼、茶会的文学作品,俄国诗人普希金(1799—1837年)就有俄国“乡间茶会”的记述。俄国贵族的茶仪十分讲究,一种名为“沙玛瓦特”的茶炊,是由铜制成的,工艺精美,茶碟别致,俄国人喜欢将茶倒入茶碟后饮用,饮时嘴唇须咂吸作响,以此赞赏女主人的美味佳茶。来自中国的陶瓷茶具也很多。俄罗斯贵族阶层的饮茶礼仪,没有普希金笔下的“乡间茶会”那样轻松随便,悠闲自在,而是相当繁琐拘谨,有点虚华和做作,而且也学习欧洲国家贵族们的附庸风雅之风,对中国的茶具、茶仪怀有浓厚兴趣。

俄国在从中国不断购买茶叶的同时,也开始发展本国的茶叶生产。1883年自中国湖北的羊楼洞地区大批购买茶籽、茶苗,在尼基特植物园内种植,但效果不佳。1884年时又将部分茶树移植到苏呼米、索格茨基植物园、奥素格斯克苗圃内。此后不久,又从汉口运去1.2万株茶苗在查克瓦巴统地区种植,开始了俄国种茶的新纪元。1889年,俄国学者吉洪米罗夫教授,率领一个代表团专程来中国参观学习茶叶生产技术,回国后不但大面积开辟茶园,还设厂用从中国学来的制茶技术加工生产茶叶。十月革命胜利后,随着中俄茶叶贸易的发展,中俄茶文化的交流更加密切。俄国还聘请一些中国技术人员前往,为开创俄国的种茶、制茶技术作出了贡献。

中国茶文化传入俄罗斯,最初也许是以中国北方民族为中介的,故其饮茶方式和习惯与中华内地和南方饮茶时的儒雅隽秀之风有所不同。俄国人较重视丰实的饮食,每天只有一次正餐。他们早餐吃得很少,仅是面包和茶,中餐、晚餐则合而为一,于下午3—6时之间进餐。平时除了睡觉,终日喝茶不断。喝茶时每杯放入一片柠檬,没有柠檬时便放牛奶及乳酪,也有人放入一汤匙果酱以代柠檬。冬季饮茶时,也有人混入一汤匙甜酒,以防感冒。一般家庭煮茶以铜制圆形“茶炊”为主,颇像火锅,即底部烧火,亲友相聚,围炉而饮。在集会饮茶时,客人们常从大盆内夹起糖块,放入小碟内用银钳弄碎和入茶中。

俄国的茶室遍布都市、城镇及乡村,有的还不分昼夜,24小时欢迎茶客光顾,其供应的茶要先将红茶冲泡开,再加入白糖、蜜饯、樱桃、草莓或数片柠檬等饮用。饮茶之风已经成为俄罗斯人民的生活习俗之一,许多家庭来客人后也敬茶待客。在俄国旅行,列车上也以茶奉客,甚至给服务员小费,也像中国某地一样称为“给茶钱”。如今,俄罗斯每年进口的茶叶约14—16万吨,仅次于英国占世界第二位。中国茶,特别是绿茶和茉莉花茶备受消费者欢迎。莫斯科有家专门销售茶叶的老字号店铺,装潢布置至今还保留着浓郁的中国风格。茶叶还是俄国军需品之一。在1877—1878年的俄土战争中,一些得到茶叶的俄国军队,在征战巴尔干半岛途中,昏迷和患其他疾病的人极少,其耐力和战

斗力远远超过饮葡萄酒的土耳其军队，茶也在战争中立下了不朽功勋，为此被列入俄国的军需品之一。

### 法国的茶会

中国茶叶传入法国的时间也不晚，大约也在 17 世纪 30—40 年代。据记载，1648 年时，一名医学博士在巴黎宣读一篇关于茶叶药用价值的论文，人们不以为然，甚至有人认为这是哗众取宠，说明茶在当时还是新生事物。1657 年，当另一篇有关茶叶的论文宣读时，许多大臣和朝野名流均与会，气氛相当热烈，说明茶叶已开始为人们所接受。不过当时茶价昂贵，一般人无法享受。中国茶叶所以不能像在英国那样在法国大行其道、广为接受，成为人们的一种生活习惯，其原因是很多的，首先，法国人嗜好咖啡和葡萄酒，茶叶很难与之成为三足鼎立；其次，英法两国气候虽同属温带阔叶林气候，但法国不像英国那样湿润、多雾、寒冷，需要热茶来祛散潮气；另外，英国人垄断了欧洲的茶叶市场，法国人满足于喝咖啡，大部分人不知道存在着不同品种、茶味各异的茶叶。法国人平均每人每年消费茶叶仅 120 克，今天法国各超级市场里出售的茶叶，仍以英国的袋泡茶为多。

法国的一些文人，对于有“康乐饮料之王”的茶写过一些赞美诗，例如法国文学家彼德·安顿·马斯特，于 1712 年发表茶诗《茶颂》，对茶酒的功过发表自己的见解。在诗中他以假设的在奥林匹斯山众神集会时的辩论，热情颂赞饮

茶，“葡萄酒交恶，饮茶是神人的甘露”，倡导人们戒酒，热衷于饮茶。中国茶在法国流传的过程中，还有许多美丽动听的传说。法国另一大文豪巴尔扎克(1799—1850年)亦有咖啡瘾和茶瘾，并不时在家举行茶会，经常是高朋满座。他的朋友为此曾记叙说，大文豪招待客人的茶叶呈金黄色，装在堪察加木盒内，用薄纸严密包封。以茶聚会，以茶会友，这是崇拜恬淡、静谧的象征，以示文人雅士的高洁情怀，亦是中国茶文化境界的升华。

每逢亲友来赴茶会，巴尔扎克常常介绍说，这些茶叶是中国皇帝送给俄国沙皇的，沙皇又赏赐给驻法使节，再由使节转赠于他。他又说，这些茶叶产在中国某省，一年只收几斤，并说这种茶是由中国最美丽的少女，在旭日升起之前，唱着动人的歌曲，如跳舞一般运用手足，方能摘制出这种茶，最后进京送给皇帝。巴尔扎克又说此茶不能多饮，饮3次必瞎一眼，饮6次必双目失明，故弄玄虚，神乎其神，怕是担心客人多饮他这来之不易的中国茶叶。巴尔扎克的故事可能是出于作家特有的艺术嗅觉，捕捉到了中国茶文化中天人合一宇宙观的思想踪迹，也可能是当时的欧洲人对中国茶文化和饮茶技艺等已略有所闻。如今，许多法国人仍爱饮茶，特别是法国姑娘更爱喝中国祁门红茶，说是常喝中国茶，可使身材保持苗条。

### 荷兰的饮茶礼仪

早在明代万历三十五年(1607年),荷兰海船便从爪哇来澳门贩运茶叶,约在1610年开始转运欧洲,此后他们便凭借航海优势将中国绿茶运回国内。这是西方人从东方殖民地转运茶叶的开始,也是中国向欧洲输入茶叶的开始。公元1650年中国最初输入德国的茶叶,也是假道荷兰入境的。最初,中国茶叶在荷兰仅局限于宫廷和豪门世家享用,饮茶成为上层社会炫耀阔绰、附庸风雅的方式。随着进口茶叶的增加和饮茶风气的普及,饮茶逐渐从上层社会转入普通家庭,并分为早茶、午茶、晚茶等,一如中国南方那样,成为待客习俗。荷兰人的饮茶礼仪相当讲究,每逢客至,主妇以礼迎客就座,敬茶、品茶、寒暄直至送别,其过程相当严谨,虽然不能与日本茶道相比,却亦是欧洲茶文化的典型表现。中国宋代大文豪苏东坡有“从来佳茗似佳人”的诗句,18世纪时,荷兰也曾上演过一出名为《茶迷贵妇人》的戏,从中反映出荷兰人饮茶蔚然成风的社会时尚。

### 茶叶与鸦片战争

在欧洲,将中国茶文化用自己的思想来表露的首推英国。早在1600年时,英国茶商托马斯·加尔威写过一本名为《茶叶和种植、质量与品德》一书。茶在英语里最初也叫Cha,直到19世纪下半期,英国上层社会受法国人影响,才



按中国福建方言的发音叫做 Tea。中国茶叶进入英国,最初是从葡萄牙、荷兰等转口的,1637 年东印度公司船只去广州运茶回英国,后来又在福建厦门设立了采购茶叶的商务机构,直接进口武夷茶。最初英国人对这来自东方的茶叶仍感神秘,识者不多,饮者寥寥,以保守和高贵矜持著称的英国王室也不敢开戒。当时咖啡也开始引入欧洲,许多人面对这两种新奇的饮料看法不一,对于饮茶有人还专门进行了试验。

当时英国社会酗酒成风,整日狂饮,昏昏沉沉,对社会家庭十分不利,因此英国人最初引进中国茶叶,是为了医治和抵御饮酒昏迷症,茶在打倒酒精饮料这一点上,成为节制主义者的盟友。1677 年时英国共进口茶叶 5000 磅,整个 17 世纪末期,英国平均每年进口茶叶约 20000 磅。

随着茶叶的大量输入,英国人的饮茶习惯逐渐普及,这在英国的一些文学作品中也有反映,例如撒姆尔·佩皮斯在 1660 年 9 月 25 日的日记中说,当时上等茶叶每磅售价 10 英镑,其价格之昂贵只有王公贵族才能买得起。但到 1799 年时伊顿爵士写道:“任何人只消走进米德尔塞克斯或萨里郡(均在今伦敦西南部)随便哪家贫民住的茅舍,都会发现他们不但从早到晚喝茶,而且晚餐桌上也大量豪饮。”英国从中国进口的茶叶,随着国内消费量的增加而不断扩大,到 19 世纪初时,“每年竟高达 2000 万磅,茶已代替巧克力成为不可缺少的饮料。”

1820年以后,英国人开始在大英帝国殖民地印度和锡兰(斯里兰卡)种植茶树,斯里兰卡的红茶颇有名气,今天英国人主要喝那里的茶叶。到1834年时,中国茶叶已成为英国的主要输入品,总数已达3200万磅。为了抢时间及时运来中国新茶,英国海运公司竞相采用快速帆船,将航程从原来的120天缩短为90天,据说至今在伦敦东部格林威治天文台外面的干船坞里,还展示着当年由海军保护的名为“短袍”的第一艘苏格兰快速运茶帆船。

英国人从中国进口大量茶叶,需支付巨额白银,19世纪初流入广州的银元,平均每年约在100万两,以至当时英国商船到广州来,所带货物不多,大部分是银元。为了改变这一不利情况,英国便将印度的鸦片输入中国,由此使英国鸦片商大发横财。据记载,1821年英国输入中国的鸦片不过5000箱,1831年时达10000多箱,1838年增至40000万箱,烟毒的祸害,已达到空前严重地步。在鸦片战争前的20年(1821—1840年)间,因鸦片而从中国流出的白银,至少在亿元以上。中国银子如潮水般流向英国,出现了空前严重的“银荒”危机,中国市面上产生了剧烈浮动的“银贵钱贱”现象,广大农民和手工业者陷于绝境。白银外流,银贵钱贱也造成百业萧条,市场凋敝。以林则徐为代表的爱国官吏,主张严禁鸦片,终于爆发了反对英国殖民侵略的鸦片战争。茶叶与鸦片战争关系之大,由此可见一斑。英国人以摧残中国人肌体生命的毒品鸦片,来换取中国健身长寿

的茶叶饮料,由此可见,只要有殖民主义存在,世界就无公平可言。

### 饮茶——英国人的头号国饮

风靡全国的饮茶之风,首先在英国王室盛行起来,这和英王查理二世(1660—1685年在位)王后卡瑟琳娜有关。这位葡萄牙公主不但体态颀长苗条,姿容绝代,而且嗜爱中国红茶。她在出嫁时作为嫁妆,将几箱中国红茶带到英国,不但自己饮用,还向众人宣传红茶的功能,并说自己饮茶后身材逐渐苗条起来,由此饮茶风尚在英国王室传播开来,不但宫廷中开设气派豪华的茶室,一些王室人员和官宦之家也群起仿效,在家中特辟茶室,以示高雅和时髦。据说在查理二世和卡瑟琳娜的婚礼上,而对花容月貌的王后,许多王公贵族举起世界各地的名酒频频向王后祝贺。但王后均以微笑谢绝,只管举起她那盛满红色汁液的高脚杯与人碰杯。这杯中所装何物,人们费尽猜疑,她那神秘莫测的举动,引起参加婚礼的法国王后的极大好奇,便待机靠近卡瑟琳娜,很想亲口尝一尝这“琼浆玉液”,机敏过人的王后早有察觉,未等她启口便举杯一饮而尽,法国王后顿生妒意,回宾馆后令侍卫官潜入王宫,定要搞个水落石出。侍卫官奉命越墙入室,发现卡瑟琳娜服用的是中国红茶,便偷出少许想献给王后,不料出门时被发现而遭逮捕。由此引发出当时震惊英伦的“红茶窃案”。

在卡瑟琳娜成为英国王后一年后过生日时，英国诗人埃德蒙·沃尔特作了一首题为《饮茶王后》的诗献给查理二世，这或许是欧洲最早的一首饮茶诗：

花神宠秋色，    嫦娥矜月桂；  
月桂与秋色，    难与茶比美。  
一为后中英，    一为群芳最；  
物阜称东土，    携来感勇士。  
助我清明思，    湛然祛烦累；  
欣逢后诞辰，    祝寿介以此。

英国人从中国进口茶叶的同时，也进口中国瓷器，从1684年到1791年的一个多世纪里，东印度公司垄断了中国瓷器的进口，共进口2.15亿件瓷器到英国。整套的瓷器茶具，也像餐具一样，成为英国和欧洲国家的常备器皿。最初中国的茶杯也是无把手的，其后欧洲人学会了制瓷，并为烫手的茶杯加上了把，又将这一技术传回中国，从中显现出东西方文化交流的轨迹。1851年在英国海德公园大型国际展览会上，曾展出一把特大茶壶。据有关资料考证，这是英国维多利亚时代(1819—1901年)用过的中国茶具。此壶高约1米，重27公斤，容量为57.3公斤，可泡2.3公斤茶叶，能倒出1200杯茶，可谓是世界茶壶之最了。

如今茶叶已成为英国人的头号“国饮”，每年进口茶叶18万吨，是世界上进口茶叶最多的国家。英国人每年平均约消费茶叶4公斤(一说是3公斤)，不论男女老少(指10

岁以上者)每天至少要喝8杯半茶。伦敦还有世界上最早、最大的茶叶市场。英国人嗜茶如命在世界上一向是出名的,早年海盗走私,茶成为紧俏的走私货,两次世界大战中茶又成为生活必需品而配给供应。1939年9月3日英国对德宣战,纳粹潜艇猖狂一时,英国商船航行海上,时常要冒被击沉的危险,故只有人民生活的绝对必需品才准予运输。即使这样,在居民每月的配给中还包括一包茶叶。这些史实从一个侧面证明了茶的功能。中国茶传到了英国,300多年来,英国人的生活、文化、社会环境无不深受茶的影响。

在英国,因茶而产生许多传统,如茶娘、喝茶时间(Tea time)、晨茶、早点茶、午餐茶、下午茶、小吃等。茶娘的传统来自当年东印度公司的一位管家太太,当时该公司每次开会,都由她泡茶服侍,所立下的一套喝茶模式成为300多年来的传统,当东印度公司于20世纪决定以机器冲茶取代茶娘时,遭到英国很多人的反对。在一般情况下,每天喝茶五六次,清晨在床上饮茶叫“Morning tea”;吃早点时饮茶叫“Breakfast tea”;吃午餐时饮茶叫“Lunch tea”;下午3—5时饮茶叫“Afternoon tea”;有时还备有一些小吃,英国人则称之为“Traditional English tea time”。英国人早上醒来后,第一件事就是在床上伸手插上电源插头,将临睡前准备好的茶水煮开,然后不洗脸不刷牙就在被窝里倚枕喝起来,当一位华人学者说中国人不习惯这种饮茶方式时,一位牛津大学的毕业生说:“这才是一天中最美妙的时刻呢,盥漱后再

喝茶味道就差多了。”大部分英国人喜欢喝红茶，其习惯是将茶叶放在水里煮，喝时加上蔗糖或牛奶，这是热饮；冷饮是先在杯中把柠檬汁和冰块放好，然后将泡好冷却的浓茶倒入杯中，再放一片柠檬或薄荷加以点缀。大约有 70% 的人喜欢喝袋泡茶。

在中国古代有以茶助文思的说法，这在英国也有表现，据说英国 18 世纪的作家赛缪尔·约翰逊，每日必饮茶 40 杯，以此启迪灵感，使之文思泉涌，下笔如神。英国诗人拜伦(1788—1824 年)也写了一首《为中国之泪水——绿茶女神所感动》的诗，这对当时饮茶的普及也起到了推波助澜作用。英国首相格莱斯顿(1809—1898 年)曾经说：“如果你发冷，茶会使你温暖；如果你发热，茶会使你凉快；如果你抑郁，茶会使你欢快；如果你激动，茶会使你平静。”英国人对茶的崇敬，由此可见一斑。

茶在英国的普及，影响到了千家万户，火车、轮船、机场都有茶供应，宾馆以午后茶招待顾客，甚至在电影院、剧场也藉茶言欢。到 18 世纪时，伦敦有 2000 个茶馆，还有许多“茶园”，这是学者名流议事和青年们交际的场所。普通人家也把客来泡茶作为礼节，这和中国完全一样。作为一种社交方式，英国人还不时举行各种茶会，藉此相聚，把杯论道，品茗磋商，进行学术探讨，从而推动文化和科学技术的发展。参加这种茶会也要有一些技巧，例如既要机智风趣，又忌说教卖弄，茶会是个获取信息、知识、学习为人处世、训

练外交官的好场所。英国茶会有个规矩,除各类面包点心可自取外,茶壶自始至终由女主人掌握。一张桌子上常摆得满满的,茶壶、奶罐、糖罐,另有一个装热水的茶壶。女主人在频频为客人倒茶时,必会先问一句是浓还是淡,以便兑上点开水。放糖之前,也先问一声“您要几块?”这也是一种尊重客人的英国礼节。不过这种时候,两只手常忙个不停,好半天以后才能真正喝上茶。

大学里的学生之间、学生与老师之间也经常举行茶会,这种茶会实际上是学术交流会和一种教学方式。在英国的大學里,无论是上午还是下午,学生在课间都有 Tea time(喝茶时间),学校均设有大茶室。一到 Tea time,茶室里人头攒动,跟午餐没有什么两样。一般每人花二三十便士就可以了,包括茶、加糖、加奶等。学生们边喝边聊,气氛热烈。有人说这也是上课,因为在茶桌上大家用英语交谈,藉此进行感情交流。许多留学英国的中国学生认为,中国人社交方式是吃饭,英国人社交方式是饮茶,其实以清茶一杯作为广泛的社交方式,省时省钱,比大吃大喝要文明得多。总之,三个多世纪以来,茶不但是英国人的主要饮料,而且也在他们的历史文化中扮演了重要角色。

## 五、美国的“饮茶革命”

美国原是英国的殖民地,故美国人的宗教习俗、社会礼

仪和生活方式等诸多文化内涵都呈浓烈的欧洲色彩。美国人的饮茶习惯也是由欧洲移民带去的,所以饮茶方法大致也与欧洲相同。美国的饮茶以纽约人为最早,约在17世纪中叶时,荷属阿姆斯特丹(1674年归英国管辖后改名为纽约)已经有人饮茶。在1776年之前,纽约人泡茶用泉水,由水贩们从近郊装入水唧筒内运来,沿岸叫卖分送。到美国独立战争爆发前夕,整个北美殖民地人民已将茶叶当作日常生活中的重要饮料。1783年美国取得独立后,美国商人组织“哈里特号”(Harret)和“中国皇后号”(Empress of China)远航中国,其贸易的主要目的就是想购买中国茶叶,以满足日益增加的茶叶需求。“哈里特号”于1783年12月启程前往中国,结果途中为英国商船所阻而半途而废,紧接着“中国皇后号”于1784年8月25日抵达广州。该船运回美国的货物计有棉花、铅、羽纱、皮毛等,更有大量茶叶,例如红茶2460担,绿茶562担,土布24担(864匹),瓷器962担,丝绸490匹,肉桂21担,总价值为99676元,仅茶叶一项就占载货总重量的92.1%。

在大英帝国本土内的人民已饮茶成风时,却不允许殖民地人民饮茶,1765年,英国立法规定,凡殖民地人民所用茶叶及其他物品,均须课税,结果遭到强烈反对,不到一年就作罢了。1767年,英国议会再次立法对茶课税,殖民地人民拒绝交税,并转向他国购买茶叶。英国对殖民地课以茶税所引起的怨声载道,终于发展成为一场抗暴斗争。



1773年12月16日晚,英国三艘满载茶叶的货船停泊在波士顿港口码头,为反抗英皇乔治三世(1760—1820年)的苛税,90余名愤怒的波士顿市民上船将所有茶叶342箱投于海中,史称“波士顿倾茶事件”,并成为美国第一次独立战争的爆发点。这342箱茶叶正是英国东印度公司运销北美殖民地的中国茶叶。

美国是个相当年轻的国家,所以饮茶时没有欧洲贵族那么多礼仪,不过美国人民对茶叶的喜爱,在早期的戒酒运动中就有发现。在以“甜酒之瓶”和“茶之盘”为题的大幅印刷品上,有一首宣传饮茶有益的诗,原刊藏于波士顿图书馆中,这首诗写道:

一盘茶,更怡怡,  
发轻吹,起微音,  
启意志,无鄙猥。

该诗充分反映了美国人民对茶文化的理解及对饮茶的喜爱之情。据说美国首任总统乔治·华盛顿(1732—1799年)也嗜好饮茶,“平常早餐时按照英国之风俗,有茶及印度饼佐以奶油,有时以蜜佐食,因他对蜜有特别之嗜好。他的晚餐甚为简单,有茶及烘面包并饮酒”。

由统计资料得知,在18世纪的最后10年间,中国输往美国的茶叶平均每年为17000余担,但到了1831至1840年的10年间,已上升到平均每年113600担左右,在1817—1845年间,中国输美茶叶平均占输美总商品的58.04%。

## 美国的“饮茶革命”

---

美国进口茶叶数量的大量上升,其原因之一是茶叶已成为美国人民晚餐中的主要饮料,在19世纪时美国的“晚餐”和“茶”竟成为同一意义;其二为许多美国商人大量购买中国茶叶后,有一部分并不直接运回美国,而是辗转于世界各地,藉此销售牟利。

美国人最初的饮茶方法为滤茶球(Tea ball),又称茶蛋,为一小型的有孔金属容器,将茶叶装入容器后放入杯中,再冲泡饮用。到1920年前后,又发展为用布把茶叶扎成小球后入杯中冲饮,后来又研制成袋泡茶(Tea bag)包装机,初时用纱布将定量的一份茶叶倒入,用细绳扎紧成球状,后来又用热纸封口代替纱布线缝袋,包装速度大大加快,每分钟可装160—180包,大大降低了成本,袋泡茶风行全国。最近几年又出现了全自动高速包装机,电脑控制,每分钟400包,并自动封袋、计数和纸盒打包等。这种袋泡茶符合快速、方便、清洁卫生的要求,又不浪费茶叶,因此在美国、加拿大等地相当流行,销售量占茶叶消费总量的比重在美国是50%以上,在加拿大则占82%以上。美国人饮用的热茶95%是用袋泡茶来泡制的。

除了用热开水冲泡的热茶外,更多的美国人喜欢冷饮茶,不论天热天冷,都喜欢在茶中加些冰块,冰茶(Ice tea)即是其中之一。冰茶的具体做法是将速溶红茶用温开水或凉开水冲泡成浓茶汁,再注入加有冰块的玻璃杯内,加上适量的蜂蜜(或蔗糖)和一二片鲜柠檬,便变成了带有甜、酸、

涩三种味道的清凉饮料。据说饮用冰茶始于 1904 年,战后更加盛行,一位贸易公司的经理说:“50 年代后喝热饮的人越来越少,我们已有二三代人就是以冷饮养大的。”冰茶在美国市场上的消费量相当大,且逐年上升,1993 年为 20 亿美元,几乎占美国茶叶市场的 80%,而且行销到加拿大等国。

### 美国饮茶新潮的再起

尽管亚洲人早就认识了茶叶的优良特性和对人体的种种好处,但美国人以茶取代咖啡成为一种时髦保健品还是不久前的事。

每天品茶 88 杯,尝足世界茶美味,

当今时尚惟品茗,健康饮料数饮茶。

上面的广告词说明最近几年来,美国的饮茶新潮又起,又成为美国人的一种新时尚,其标志为:

其一,对于饮茶有益于健康的宣传报道俯拾皆是,屡见不鲜。经美国许多专家研究分析指出,茶不但有提神、镇静的功效,而且没有咖啡那样的刺激性,所含的咖啡因比咖啡要少一半以上,而众多美国人认为含咖啡因多的饮料对健康不利。此外,茶价便宜,细斟慢饮,有益于身心健康,为一种非常理想的饮料,这是备受生活节奏紧张的美国社会大众欢迎的原因。

其二,新开的装饰豪华的茶叶店越来越多,除了供应普

## 美国的“饮茶革命”

通的散装茶、袋泡茶、冰茶和速溶茶外，特别精茶和保健茶等新品种也很多，大家对绿茶、大吉岭茶和乌龙茶的兴趣也在增加。和中国广州等地的南方城市一样，美国一些烹饪水平一流的饭店、酒楼，越来越注重茶水服务，许多食客所要求的服务与在飞机上的乘客一样，一杯水和一袋茶。

其三，美国的品茗家协会成立于1994年，在该协会会员看来，饮茶是一门学问很深的艺术，由此以品茗为业的品茶师也开始走红，成为美国许多茶叶进出口公司、制茶厂、茶吧间、茶叶店的高薪聘用对象。品茶师们均烟酒不沾。据说最敏感的味觉是天生的，短期训练很难达到，故拔尖的品茶师很难寻觅。纽约某茶叶公司的一位品茶师约翰·森迪，只要他呷一口茶，几秒钟后即能正确得出茶叶好坏、品种、价格、烘烤程度、是否发酵过久、在何种气候下采摘、产地、行销美国哪一个州等结论。另一“品茗专家”沃尔斯和他在香港出生的伙伴罗伊·方在旧金山市合开一家中国式茶馆——帝国茶馆，他们对在美国传播中国茶文化满怀信心，并期望最终将茶叶变成90年代的葡萄酒。经营英国茶社的萨拉·贝内地已经在波特兰开设了第二家茶店，经营来自中国的300余种茶叶。

其四，随着这股强劲的饮茶之风和人们对茶叶的情有独钟，与茶相关的进口商、包装机械行业、茶具、茶文化书籍杂志出版商等也生财有道。例如，一些为追求茶的奢侈消费所想出来的“婚礼品茗”也大行其道，新婚时家中要购买

许多高档精美的茶具,使纽约商店中的茶具销量猛增,婚姻登记处商店中的茶具销量也大大增加。在美国下午茶也为越来越多的人所喜欢,以此来替代业务会晤和工作聚会。专为品茗者开设的茶吧、茶馆在咖啡店林立的街道上随处可见,茶叶的销售额继续增长,据设在纽约的美国茶叶协会统计,1990年茶叶销售额为18亿美元,1994年时已增长到37.5亿美元。总之,“饮茶革命”已经在美国悄悄兴起,这正如加州圣拉斐尔共和国公司经理比尔·罗森韦格先生所说的那样:“我们的任务是在这个国家鼓励饮用优质茶,从而在美国掀起一场饮茶革命。”茶正在成为美国人跨世纪的时尚饮料。

## 六、中国茶文化回归与复苏原因析

在中外文化交流过程中,丝绸之路曾起过重大作用,如今人们也会发现“茶之路”在联结华夏神州与外部世界中,其桥梁作用也功不可没,这正如萧乾先生所说的那样:“关于中国对世界的贡献,经常被列举的是火药和造纸,然而在中西交流史上,茶叶理应占有它的位置。”这一说法颇有见地。中国茶文化先是自唐宋时期起逐渐影响周边国家,不但占领东亚文化圈,而且在15世纪以后逐渐传到欧洲,传向世界各地。经过数个世纪的长途跋涉,中国茶文化在异国他乡生根发芽,开花结果,香溢五洲,渐次成为人民大众

的生活习俗,且历久不衰,产生了极其深远而广泛的影响。如果说随着人们物质生活的日趋丰富多彩,以及各种新饮料的层出不穷,茶叶一度曾受到冷落和冲击的话,那末时至今日,茶文化在世界各地的重展新姿和再振雄风,既是一种现实的需要,也是一种回归与复苏的必然,其原因是多方面的,归结起来有如下几点:

一、作为一种外来文化,中国茶文化在远播世界各地后,经过人民大众不断学习、吸收、整理和融化,已沉积在本民族文化中,成为当地文化的一部分,茶在日常生活中已成为“须臾不可离”的东西。“文化成就只有当它能代代相传并能逐渐成为所有人们群体的集体财富时才能发生积极作用。”茶文化确实是这样的,可以这样说,茶仪、茶艺、茶具、茶会、茶诗、茶歌等,并不是一种简单的物质,而是东方优秀思想文化的浓缩,茶文化是一种精神力量。中国茶文化的回归与复苏,也许应了中国一句俗语:只要是黄金,终究会发光。

二、是当今现实生活中的需要。两次大战以后,人们一直在一种充满矛盾、焦虑和紧张的氛围中生活,后工业社会的快节奏生活,使人精神空虚,情绪紧张,压力很大,所以有人吃迷幻药和抽大麻,希望寻求解脱,但又带来负面影响,使西方世界充满狂躁,犯罪率居高不下,社会动荡不安。自60年代起,西方文化思想和基本观念开始经历一次新的转折,其新动向之一便是吸收东方文化中的某些因素,东方神

秘主义备受西方重视,禅尤其受到青睐,被认为是一种最好的清醒剂和情绪稳定剂。但禅高深莫测,很难达到较高境界,于是便通过喝茶来接近禅,因为“茶禅一体”,有助于入门。

中国茶文化以亲和、礼敬、平朴为特征,物质财富膨胀,被高消费尘埃埋得透不过气来的西方世界,都渴望从茶文化里呼吸新鲜空气,藉此一爽精神。工业化社会中,人们忙于追逐名利,人情淡漠,人际关系日渐疏远,而以茶待客,以和为贵,以茶会友,能协调沟通人际关系,化解隔阂。通过饮茶聚会,敞开心扉,各抒己见,用茶水冲洗掉内心尘垢和彼此心中的芥蒂,使之同心协力,和睦团结,增加人生乐趣。饮茶也可缓解工作中的紧张节奏,减轻心理受挫后的失落感,以求得进取中的平衡。茶文化成为一种启迪心智的精神财富。

三、饮茶长寿是千百年来传统观念。随着工业的发达和人们生活水准的不断提高,人们的饮食中带来了大量非自然的有害物质,如粮食中的化肥、自来水中的氯、蔬菜水果中的农药、调味品中的化学添加剂、食品饮料中的色素等,加上环境和空气的污染,对人体健康带来许多不利影响。而天然原始的茶则是一种相当好的调和剂和解毒品。由此可见,喝茶已经成为工业化社会中的一种润滑剂,成为人们强身健康的途径。

四、饮茶又是抵消、减轻吸烟危害的最好方法。据世界

卫生组织的一份调查统计报告说,目前全世界每 10 秒钟就有一人死于因吸烟引起的疾病。但瘾君子们一时又难以“割爱”,那末从健康出发,饮茶则是减轻吸烟危害的最好办法。其一,茶叶中的茶多酚类物质能抑制自由基的释放,控制癌细胞增殖。经过对 145 种茶叶进行研究后证实,茶叶确有隔断亚硝酸合成的能力,经常饮茶可以减轻因吸烟诱发癌症的可能性;其二,据美国马萨诸塞大学医疗中心一教授估计,每天吸 30 克香烟的人,他肺部一年内放射性物质的辐射量相当于 X 光 300 次的胸透,而饮茶可以阻止这些放射性物质侵入骨髓,并可使镅 90 和钴 60 迅速排出体外,减轻吸烟引起的辐射污染;其三,多饮茶可以补充因吸烟而消耗掉的维生素 C。

五、在中国的几种茶叶中,绿茶含维生素 C 最多,其防癌作用也最明显。经调查得知,日本静冈县的人因普遍饮茶,放那里的胃癌发病率要比其他地方低得多。经一项对人胃腺癌细胞、人急性早幼粒白血病细胞的生长进行的实验观察,发现绿茶、乌龙茶和红茶均具有抑制癌细胞的作用。另外,从广岛调查发现,在原子弹爆炸后,长期饮茶人的生存率也比一般人高得多。日本的另一位大学教授大森正司说,茶叶中含有维生素 C、能抑制口臭的类黄酮以及防蛀牙的氟素。茶叶中所含的另一种物质(绿茶、乌龙茶、红茶中都有)儿茶素,是一种容易氧化的物质,还原力强,可以抑制血液中的酸化成分,延缓人体的衰老。在一杯茶中,约



含有 0.1 克儿茶素,其含量之高,是其他植物无法比拟的。

日本东京家政学院的河野教授认为,把绿茶叶直接吃下去(不是泡茶喝)更好,每天吃 6 克茶叶(约 3 杯泡茶用的茶叶数量),可得到每天所需维生素 E 的 50%,每天所需维生素 A 的 20%,一种可以生吃的绿茶粉已经开始供应。除此以外,茶水可防止感染糖尿病和龋齿,还可以降低胆固醇含量和中性脂肪,降低血压,增强毛细血管作用,限制体重增加,并有利尿作用。总之,随着时间的推移和科学的发展,茶文化将会表现出更加深厚的潜力,以崭新的姿态走向世界,可以预见,即将到来的 21 世纪,饮茶之风将席卷全球。

## 主要参考书目

- (1) 卡特:《中国印刷术的发明和它的西传》,商务印书馆 1957年12月版
- (2) 钟叔河:《走向世界》,中华书局 1985年5月版
- (3) 李圭:《环游地球新录》,湖南人民出版社 1980年8月版
- (4) 容闳:《西学东渐记》,湖南人民出版社 1981年1月版
- (5) 沈福伟:《中西文化交流史》,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5年12月版
- (6) 沈立新:《中外文化交流史话》,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1年1月版
- (7) 梁容若:《中日文化交流史论》,商务印书馆 1985年7月版
- (8) 实藤惠秀:《中国人留学日本史》,三联书店 1983年8月版
- (9) 王晓秋:《近代中日文化交流史》,中华书局 1992年9月版
- (10) 王晓秋、大庭修主编:《中日文化交流史大系:历史卷》,

- 浙江人民出版社 1996 年 11 月版
- (11) 马兴国、宫田登主编:《中日文化交流史大系:民俗卷》,浙江人民出版社 1996 年 11 月版
- (12) 陈从周:《说园》,书目文献出版社 1984 年 6 月版
- (13) 郦芯若等:《中国园林》,新华出版社 1992 年 8 月版
- (14) 杨沛霆:《科学技术史》,浙江教育出版社 1986 年 3 月版
- (15) 王玉仓:《科学技术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993 年 3 月版
- (16) 任复兴主编:《徐继畲与东西方文化交流》,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3 年 9 月版
- (17) 任复兴译:《徐继畲及其瀛环志略》,文津出版社 1990 年 7 月版
- (18) 王介南等:《中缅友好两千年》,德宏民族出版社 1996 年 11 月版
- (19) 沈海宝:《饮茶诗话》,甘肃人民出版社 1986 年 11 月版
- (20) 王玲:《中国茶文化》,中国书店 1992 年 12 月版
- (21) 政协山东德州市委员会编:《苏禄国王在中国》,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4 年 6 月版
- (22) 郑一钧:《论郑和下西洋》,海洋出版社 1985 年 6 月版
- (23) 《郑和下西洋论文集》第二集,南京大学出版社 1985 年 4 月版
- (24) 顾长声:《从马里逊到司徒雷登》,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5

## 主要参考书目

---

年 8 月版

- (25) 顾长声:《传教士与近代中国》,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5 年 4 月版
- (26) 陈玉龙等:《汉文化论纲》,北大出版社 1993 年 6 月版
- (27) 罗荣渠:《现代化新论续编:东亚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北大出版社 1997 年 5 月版
- (28) 罗荪等:《法国文化史》,北大出版社 1997 年 5 月版
- (29) 杜美:《德国文化史》,北大出版社 1990 年 2 月版
- (30) 周一良主编:《中外文化交流史》,河南人民出版社 1987 年 11 月版
- (31) 留学生丛书编委会:《中国留学史萃》,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1992 年 5 月版
- (32) 徐缉熙等:《旅游美学》,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7 年 2 月版
- (33) 朱杰勤译:《十八世纪中国与欧洲文化的接触》,商务印书馆 1962 年 11 月版
- (34) 朱杰勤:《中外关系史论文集》,河南人民出版社 1984 年 6 月版
- (35) 中国文化书院讲演录编委会:《中外文化比较研究》,三联书店 1988 年 12 月版
- (36) 徐远和:《儒学与东方文化》,人民出版社 1994 年 5 月版

## 作者简历



沈立新 上海市人,1938年11月生,毕业于北京大学历史系,后入上海社会科学院从事研究工作,现为上海社会科学院欧亚研究所研究员,中国东南亚研究会理事、中国华侨历史学会理事。专业研究方向为华侨华人史、东南亚史、中外关系史。主要著作有《中外文化交流史话》、《海外上海名人录》、《世界各国唐人街纪实》、中华文化通志之一《海外华侨华人文化志》(合著)。另已发表各类学术论文百余篇。